BUWANG LAISHILU

不忘来時路

泰道夫題 🏢

——中国人民保险的记忆

中国人保编写组 ◎ 著

回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清民

责任校对:潘 洁

责任印制:程 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忘来时路:中国人民保险的记忆/中国人保编写组著.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21.6

ISBN 978-7-5220-1201-8

I.①不··· Ⅱ.①中··· Ⅲ.①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企业史 Ⅳ.①F84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08434号

不忘来时路——中国人民保险的记忆

BUWANG LAISHILU: ZHONGGUO RENMIN BAOXIAN DE JIYI

出版 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2号

市场开发部 (010)66024766,63805472,63439533(传真)

网上书店 www.cfph.cn

(010)66024766,63372837(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尺寸 183毫米×243毫米

印张 27

字数 400千

版次 2021年6月第1版

印次 2021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98.00元

ISBN 978-7-5220-1201-8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010)63263947

记住来时的路

○罗 熹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让我自然联想到新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历程,回忆起中国人民保险与中国共产党血脉相连的红色历史。

我曾有幸先后在华润集团和太平保险工作,对我党早期在经济贸易及金融保险领域开展革命斗争的历史,有过比较系统的了解。如今,通过对中国人民保险历史的深入了解,我发现三家公司的红色历史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

非常巧合的是,1933年成立的广大华行,在周恩来的亲自指导下,于1943年在重庆投资创建了民安保险公司,后来成为太平保险公司的子公司;由"红色保险掌门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创建者谢寿天领导成立的大安保险公司在1945年陷入困境时,曾得到广大华行的增资支持;1949年初,广大华行作为华润公司前身的香港联和行的创始人,并入华润公司。可见广大华行与华润、太平、人保三家公司都有着深远的渊源。

三家公司的名称"华润""民安""人民"等字眼,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而许多与三家公司相关联的共产党人,如卢绪章、杨延修、程恩树、谢寿天、 郭雨东、陈巳生等成为红色保险的代表人物。

20世纪30年代这些代表人物在上海的许多故事,可以说是惊心动魄、感人至深的。华润的创始人秦邦礼靠陈云拨给的两根金条,开办四家小店,历经洗礼;民安保险的创始人卢绪章出污泥而不染,"与魔鬼打交道",机智勇敢;而人民保险创始人程恩树当年秘密发展新党员的情景,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

那是 1938 年初冬的夜晚,在上海里弄一个狭窄的亭子间内,保险业地下党支部第一任书记程恩树,将一本《共产党宣言》扉页上的马克思像轻轻翻开,庄重地放在高处的床铺上。在他的带领下,公司职员张庆祥、吴振年两名同志庄严地宣读着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人民保险的摇篮。非常巧合的是,中共一大是在浙江嘉兴的红船上结束的,当年上海保险业地下党也经常在船上组织秘密活动。可见,中国人民保险自萌芽开始,就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同呼吸共命运。

红色保险的历史值得记录,那些博大精深的历史内涵有待进一步挖掘和研究;红色保险历史引人思考,那些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呈现出不朽的风骨和精神;红色保险历史需要传承,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沉淀出永恒的价值,激励后人勇往直前.不停追求。

红色保险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脉相承;红色保险历史是中国保险史的组成部分;红色保险历史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历史的源头。党史与司史之间的天然拴缚,是中国人保独有的光荣传统,也是中国人保弥足珍贵的红色资源。

回望红色保险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一是红色保险的启蒙者、燃灯者。他 们有的来自延安宝塔山下,历经硝烟弥漫的战场;有的来自上海黄浦江畔,穿 梭在波诡云谲的白区。二是人民保险的创建者、缔造者。他们在新中国成立的 前夜汇聚在北京,如同"进京赶考"一般,踌躇满志。三是人民保险事业的开拓者、建设者。他们怀揣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肩负着"人民至上"的使命, 开启新中国保险业的征程。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要求全党同志做到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撰写出版《不忘来时路——中国人民保险的记忆》一书,意义非凡。这些弥足珍贵的史料,不仅是公司开展党史教育的补充素材,也是公司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献礼。

学好党史,重温司史,这是中国人民保险广大党员干部的时代要求。我们要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精神之"钙",感受信仰之光。为加快推进公司"卓越保险战略"落地见效,实现"十四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新的"赶考"中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在真抓实干中书写鲲鹏击浪的壮丽华章。

目 录 不忘来時路

第一章 在鲜红的党旗下 / 1

- 1. 共产党对红色保险理论的探索与实践/3
- 2. 黄浦江畔第一家红色的大安保险公司 / 8
- 3. 红岩村映照着民安保险公司 / 16

第二章 一条来自南方的红色血脉 / 25

- 1. 燃灯者 / 27
- 2. 上海保险业地下党支部的诞生 / 35
- 3. 高举火炬的保联组织 / 48
- 4. 让革命书籍照亮漫漫黑夜 / 61
- 5. 林震峰创办《保联》《保险月刊》 / 68
- 6. 主导保险学术的课堂 / 73
- 7. 划破夜空的歌声 / 81
- 8. "罢工是地下党的培训学校" / 89
- 9. "十三太保" / 92
- 10. 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 97

第三章 一条来自北方的红色血脉 / 111

- 1. 参加万里长征 / 113
- 2. 有理想的人在延安聚集 / 118
- 3. "马背"与"挎包"的冀南银行 / 127
- 4. 人保创业者的摇篮——瑞华银行 / 136
- 5. 用鲜血染红的货币 / 142

第四章 布局海外 / 151

- 1. 卢绪章完成将广大华行并入华润公司的任务 / 153
- 2. 沈日昌南下 / 158
- 3. 周作民北归 / 163
- 4. 孙文敏主导三家红色保险公司在香江河畔的聚首 / 170

第五章 进京赶考 / 175

- 1. 石家庄的小灰楼 / 177
- 2. 上海滩上穿军装的接收大员 / 181
- 3. 东北最先迎来人民保险的曙光 / 185
- 4. 南北两条红色血脉汇聚成河 / 187
- 5. 心向祖国 / 194
- 6. 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 / 199

第六章 诞生,伴随着开国大典的礼炮 / 203

- 1. "人民保险号"在西交民巷 108 号起航 / 205
- 2. 更旗易帜,中国保险公司的成立 / 213
- 3. 太平保险公司的尘埃落定 / 219
- 4. 民安保险公司成为海外市场的桥头堡 / 224

第七章 建章立业 / 227

- 1. "咖啡"和"大蒜"的融合 / 229
- 2. 书写"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 234
- 3.《组织条例》和排兵布阵 / 240
- 4.《保险法》试水 / 247

第八章 重打鼓 另开张 / 249

- 1. 苏联老大哥传授的强制保险 / 251
- 2. 以火灾为主的城市自愿保险 / 257
- 3. 人身保险先树形象后做业务 / 261
- 4. 防灾防损抓得早 / 265

第九章 反复耕型的农业保险 / 269

- 1. 在希望的田野上 / 271
- 2. 保险漫画到了田间地头 / 275
- 3. 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夫 / 281
- 4. 处暑里的雨 谷仓里的米 / 288
- 5. 成败之间 / 292

第十章 海外保险的浪花一朵朵 / 297

- 1. 英美保险告别"东方巴黎"/299
- 2. 苏联保险告别"达里因" / 302
- 3. 靠"海后"轮起家的涉外保险 / 305
- 4. 分保分东西阵营 / 308
- 5. 海外机构主要在东南亚 / 311

第十一章 阿护蠃弱的火种 / 317

- 1. 一次决定人保命运的会议 / 319
- 2. 走进中南海的"跃进"轮赔案 / 323
- 3. "保险业务 9 人小组" / 328
- 4. 在逆境中的坚守 / 333

第十二章 春风化雨 / 337

- 1. 恢复业务的牌子挂在大树上 / 339
- 2. 老当益壮的归来者 / 344
- 3. 世界屋脊上的保险公司 / 348
- 4. 劳合社主席米勒的来访 / 352
- 5. 大亚湾上了保险 / 355

附录/359

附录一 中国人民保险历任主要领导人简历 / 361

附录二 红色保险、中国人民保险大事记(1921-2021) / 373

引 文 / 409

参考文献 / 415

后记/419

不忘来時路 BUWANG LAISHILU

第一章

在鲜红的党旗下

1 共产党对红色保险理论的探索与实践

20世纪20年代初期,上海已然非常繁华。南京路上车水马龙,林立着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先施百货公司的招牌耀眼闪烁。苏州河上的老式货船往来穿梭,一些淘金的外国冒险家由这里乘船而上,鱼贯而出。

上海金融界掀起设立交易所的狂潮,各种交易所多达136家,包括布、麻、煤油、火柴、烟、酒等许多看似不起眼的行业都成立了交易所,呈现出普罗大众一心追求金钱利益的疯狂态势。

1921年7月23日晚上8时,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106号,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石库门楼房前,几位穿着长衫的人,行色匆匆地走进了楼内。楼外的虫鸣此起彼伏,更显得夜色浓重。

这些人操着各地不同的口音,悄声低语。陈潭秋在1936年的回忆文章中讲述, 附近博文女校的一位厨师,负责为他们做饭。"他根本不知道这些客人是谁,因 为他不懂他们的土话,他们讲的都不是上海话,有的讲湖南话,有的讲湖北话, 而有些则讲北平话。"

这是一次非常隐蔽的会议。但二楼客厅的那盏碳极弧光灯,似乎被感染了一种 能量,散发出夺目的光芒。它要向外传递着什么,也许是要向世界预示着什么。





中共一大会议

中共一大会址

不在现场的李大钊这样描述:"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 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 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 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 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董必武、周佛海、陈公博和包惠僧 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列席会议。

在202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写道:

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它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1]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充分展现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这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精神之基、精神之本。正是对这一精神的坚守与践行、光大与发扬,让中国

共产党创造了人间奇迹,"敢教日月换新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和塑造着世界。

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成立初期就摸索出既要注重政治也要注重经济,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这一理论。共产党认识到,发动工农群众靠什么来鼓励他们,还是靠经济利益,这就离不开金融。因此,共产党说,搞革命要靠枪杆子,但是如果没有钱袋子,也是支撑不起枪杆子的。

北京大学1912年即设置保险专业。因此,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陈云、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陈云等早期共产党人对保险业有初步的了解和认识。1918年2月,青年运动领导人恽代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译著《人寿保险事业之新发展与长生会》。

1921年8月11日,也就是在党的一大召开十多天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都北路19号(今成都北路893弄),成立了第一个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该机构下设北京、武汉、湖南、广州、济南等分部,分部首任主任分别为邓中夏、罗章龙、包惠僧、毛泽东、谭平山、王尽美等革命先驱。

该机构也是宣传劳工保险和社会保险的大本营,并很快发布了《劳动法大纲》,其中就有工人享受劳动

保险的权利,并且主张劳动者 的保险费用应该由雇主和国家 分担。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 出的保险概念。

为了推动社会保险这一重要的民生政策,建党初期先后有瞿秋白、邓中夏、毛泽东、王尽美、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等革命先驱投身于劳动立法研究,先后以"劳工保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

不点来時路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 代表大会在汀西瑞金召开



大会部分参会人员合影

险""劳动保险"等概念介绍传播社会保险。

中国共产党对劳动者保险问题的关注,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属性 使然, 也是"五四"运动时期劳工阶级地位有所提高的必然结果。蔡元培率先喊 出"劳工神圣"的口号, 在思想界和舆论界获得了广泛呼应, 他们将劳工阶级看 作是创造世界的力量,将改善工人处境视为改造中国社会的重要涂径。

1922年7月,在党的二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工厂保险,以及保护女工、童工 和失业工人的条款。

1928年7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规定在苏维埃委员会设立劳动监督 部、社会保险部、社会保险委员会、劳动保险委员会和劳动法庭。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对 讨论通过的《劳动法》中的养老保险、工伤救济、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条款做 了详细规定。大会还选举成立了负责处理劳动保护、救济工人、社会保障和社会 保险事项的中央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劳动部。

1932年12月,中央劳动人民委员部专门下达"建立社会保险局"的命令。有些 根据地还成立了劳动保险委员会、劳工委员会、劳工保险局或失业保险局、社会 保险局。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报告中,为红色保险 事业做了总结,并且强 调社会保险制度必须方 可能实行的地方有 实地实行,即给予社会 保险局的工作应有的主 意。会议修订了《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为中 块革命根据地统一社会 保险立法的指导方针。



20世纪40年代初期,陕甘宁边区领导及财政厅人员合影

这些劳动保险法规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激发了广大劳动者的政治热情和工作 积极性,支援了工人运动和革命战争。同时,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 社会保险制度积累了经验,为商业保险的建立进行了探索和思想准备。

1943年,延安革命根据地根据实际情况,着手制定实施关于社会保险、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的政策法规,并对商业保险进行试验和探索。陕甘宁边区华池县联社设立了牲畜保险委员会和牲畜保险合作社,这一做法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赞扬,这里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开办商业保险的摇篮。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指出,根据不同情况,只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事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这一指导思想,为各解放区制定社会保险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

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保险事业的探索实践,一直没有停息。这一切为今后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及人民保险公司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黄浦江畔第一家红色的大安保险公司



郭雨东

就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年,郭雨东从东北考上了北平朝阳大学,这是北京大学的附属学校。 他近距离接触新文化的陶行知、朱其慧等人,励 志在教育、法律等方面寻求救国之道。但郭雨东 以敏锐的眼光,发现现代经济手段是改变社会的 捷径,认定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在于社会互助 事业缺失所致。因此,他最终选择了那时还是显 学的保险专业学习。

1936年,郭雨东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应丁雪农之聘进入上海太平保险公司,负责编辑出版《太安丰保险界》。1946年上海发生"下关事件",上海爱国人士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阎明复的父

亲)、陈震中(陈巳生的儿子)等人被国民党特务打伤。 身为大安保险公司总经 理的郭雨东掩护阎宝航、陈震中在自己家里隐蔽疗养,在他们伤好后,郭雨东又 设法分别护送他们前往东北解放区和转道香港,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郭雨东当时所在的大安 保险公司,是在中共上海地 下党组织的支持下创办起来 的,并在经济上得到地下党 的大力资助。大安保险公司 在发展保险业务的同时,遵 循党的指示,主要在上海金 融保险界上层人士中开展统 一战线工作,掩护部分地下



20世纪40年代初期,上海保险业地下党组织的革命活动

党员从事革命活动,还积极支持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以下简称保联)的各项活动。

1941年12月8日,爆发了"珍珠港事件"。日军随即占领了上海的两个租界。原来控制上海保险市场的英美资本各保险公司,在租界被日军占领后被迫停业。日商保险公司在上海的实力原较薄弱,一时难以取代英美各公司的地位。租界形同"孤岛"时期,上海在经济上曾一度出现畸形发展,吸引了不少沦陷区的游资,在急切地寻找出路,新开设的华商保险公司一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上海保险市场。

当时在中国天一保险公司任襄理的中共地下党员谢寿天,认真分析了以上经济 形势,认为这是发展民族保险事业的大好时机,便向上级联系人、中共江苏省委 职员工作委员会书记陆志仁提出创办一家保险公司的建议。党组织考虑到保险公 司的业务与各行业的联系相当广泛,通过保险公司可以与各行业的中上层人士发 生和保持经常的联系,有利于发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同意了谢寿天的建 议,并支持他出面,积极筹建。

经谢寿天多方联系,邀集郭雨东、陈巳生、关可贵、董国清、龚渭源、全宝 瑜等7人为发起人,分头负责从社会上筹集股金。商定新成立的保险公司注册资本是50万元("中储券"),实收半数25万元,按法定手续,申请登记批准。孙

瑞璜任董事长,常务董事为陈巳生,聘请郭雨东为总经理,谢寿天为总稽核。借广东路51号大莱大楼二楼办公(后迁北京东路356号四楼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原址办公),于1942年春开始营业,定名为大安产物保险公司(以下简称大安保险公司、大安)。

大安保险公司开业后,陆续在天津、南京、广州、青岛、烟台和北平建立了分公司,另外,在武汉、无锡和苏州等地设立了代理处。还与大东、大中、大上海等19家保险公司组成大上海分保集团、业务经营比较顺利。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颁布的有关法令规定,上海所有在敌占期间设立的保险公司,必须以法币为计算单位增加资本,重新登记,方能继续经营。当时有许多小型企业因受"中储券"贬值的影响,无力增资,被迫关闭停业,大安也陷入缺乏资金的困境。在这关键时刻,地下党组织拿出十根金条(即100两黄金),由市委委员张执一亲手交给总经理郭雨东,并嘱咐他一定要设法把大安保险公司维持下去。后来,在公司增资改组时,民安保险公司也认了大安的部分股金,助了一臂之力。

在党的大力支持下,大安保险公司得以继续经营。为了保证大安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受法币不断贬值的影响,曾由公司副经理董国清出面,通过艾中全(地下党员)的关系,投资设立一家大安木材公司。该公司的资本主要是由大安保险公司运用这100两黄金的一部分投资的。大安木材公司由陈巳生任董事长,董国清任总经理,郭雨东任监察人,一直经营到上海解放。按照党的指示,在关勒铭金笔厂改组时,大安保险公司也投入了一部分股金。

1947年前后,由大安保险公司总经理郭雨东筹划,在广州设立了永康进出口贸易行,派公司翻译江殿珵常驻广州,经过香港经营进口橡胶、文具和纸张等贸易,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永康进出口贸易行在香港的业务活动曾得到广大华行经理李再耘的帮助。永康进出口贸易行的建立是为了谋取保险业务外的收益,以维持大安保险公司庞大的开支。

通过以上种种努力, 大安保险公司终于渡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动乱年代, 迎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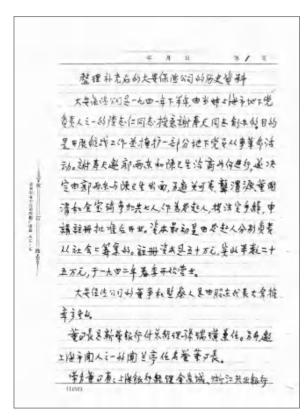
上海的解放。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大安保险公司率先参加公私合营新丰保险公司,它的资产均上交国家作为公股。

大安保险公司是一家职工不满30人的小型企业,它的高级、中级职员中,有中 共地下党员8人。该公司的人事组织情况如下:

董事长孙瑞璜,原新华银行副总经理,曾连任数届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理事长,是一位思想倾向进步、提倡革新的金融界上层人士。

常务董事金宗城,原上海银行上海分行经理。

常务董事徐寄庾,原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



郭雨东回忆大安保险公司的手稿

常务董事李康年,原中国 国货公司总经理。

常务董事刘伯含,原北京 鼎丰银行总经理。

常务董事陈巳生,原宁绍 人寿保险公司经理。

常务董事谢寿天,原中国 天一保险公司襄理。

常务董事郭雨东,原永宁 保险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 机构,在7名常务董事中,谢 寿天、陈巳生两人都是在抗战 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 员,郭雨东在1948年去香港后 也入了共产党。他们在公司内 分别担任总经理、副总经理、 总稽核等领导职务,还在由大

安投资设立的其他企业兼任领导职务。社会地位的提高,为他们在金融保险界的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公司的中层负责人员有:

协理关可贵,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秘书长。

副经理董国清,原永宁保险公司襄理。

副经理李晴斋,原永宁保险公司会计主任。

襄理蒋学杰,原宝丰保险公司职员。

会计主任赵帛,原保裕保险公司职员。

会计主任蔡同华, 原北美洲保险公司职员。

庶务主任吴福荣, 原马勒轮船公司仓库职员。

在这7名中层人员中有蒋学杰、赵帛、蔡同华、吴福荣4名地下党员。蒋学杰同志曾任职业妇女救国会副主席,是茅丽瑛烈士的亲密战友,赵帛同志后来由组织安排去苏北解放区,他的会计主任职务由蔡同华同志接替。此外,曾担任广州分公司经理的石志昂,以及天津分公司负责人孙文敏也都是地下党员。

根据地下党组织的决定,这些党员没有编在同一个支部,也没有横向的组织联系,所以他们虽在同一公司工作,但互相之间并不知道真正的政治身份。当然,



20世纪40年代初期,大安保险公司人员合影

他们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 步调是一致的。他们在大安 保险公司的职业掩护下,遵照 地下党的指示,相互支持,从 事革命活动,作出了不同的 贡献。

大安保险公司的大多数中 上层干部担任保联的理事长、 常务理事或各部的负责人。大 安保险公司总经理郭雨东是保 联的发起人之一, 担任保联第一 仟理事长: 总稽核谢寿天也是保 联的发起人之一, 担任保联常务 理事兼秘书长:常务董事陈巳牛 担任保联的常务理事: 副经理 董国清担任保联的常务理事兼 组织部长: 协理关可贵担任保 联的常务理事兼出版委员会主 席: 会计主任赵帛担任保联出 版委员会委员,负责《保联》 《保联会报》的出版工作: 会计主任蔡同华是保联图书委 员会的实际负责人。庶务主任 吴福荣扣仟保联福利委员会委 员, 也是消费合作社负责人之 一。天津分公司负责人孙文敏 后来是保联党团成员,以及平 剧组负责人。南京分公司经理 刘文彪是保联话剧组的骨干。



大安保险公司保险单

大安保险公司如此众多的中上层干部先后担任过保联的群众工作,他们实际上 是保联各项活动的积极赞助者和支持者。在保联历届征求会员运动、创办各种福 利事业中,大安保险公司捐助各种款项,在同业中起了带头推动作用,在组织上 又吸收保联的部分骨干进入公司任职,为他们参加和领导保联的各项活动提供了 有利条件。保联在日寇占领租界时期,仍能坚持下来,大安保险公司在人力、物 力方面的积极支持起了重要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洋商保险公司相继关闭,一时华商保险公司的分

保问题陷入困境,而日商保险公司凭借日寇的势力计划乘机攫取垄断地位。在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下,我国民族保险业需要自力更生。当时,在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大安的谢寿天、郭雨东与保险界有一定声望的董汉槎、顾中一等人一起,发起筹组大上海分保集团,参加该集团的有大上海保险、大安保险、大东保险、大中保险等19家公司。每家公司的保险溢额,统由大上海分保集团根据合约规定,由参加成员各自量力分担。华商保险公司依靠自身的力量,团结互助,不仅妥善解决了各公司的溢额分保问题,还互通有无,大大增加了业务收益。

大上海分保集团的建立,为发展民族保险事业创造了范例。以后,相继成立了 久职、太平、华南联合、五联、十五联等分保集团,参加的公司共有78家,从而 避免了部分保险金额的外流,使日商保险公司妄想控制上海保险业的企图始终未 能得逞。

郭雨东在《上海是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中回忆:

大安保险公司董事长孙瑞璜、常务董事陈巳生、谢寿天,在抗战初期,就经常参加金融界、工商界知名人士组织的座谈会、聚餐会,大安建立后,形势虽有变化,但他们的这些活动却未曾中断。参加这些聚餐会的人员多数是爱国人士,也有少数地下党员,聚餐会的形式比较灵活,大都假座香港路银行公会举行。聚餐时经常请有知名民主人士作简短演说,主要内容大都是大家关心的时局形势,参加者通过这种途径可以很自然地受到党的教育,增进相互了解,加强横向联系。这是开展统战工作的好形式。座谈内容,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抗战初期,宣传国共合作,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在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威胁恫吓工商业者撤离上海的情况下,陈巳生积极宣传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稳定他们的思想情绪,使一部分金融界、工商界的人士没有随"蒋家"逃往台湾。[2]

大安保险公司投资的关勒铭金笔厂改组后,宁思宏任总经理,陈巳生、谢寿

天、郭雨东等分别担任该厂的董事、监事。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 化名刘镜清, 以在该厂担任常务董事作为职业掩护。石志昂是抗战初期入党的老同志, 1942年 化名为石景彦进入大安工作, 后转移到安徽游击区。抗战后期, 他从解放区回到上海, 为了分散隐蔽, 经组织安排进入大安, 到广州分公司任经理。

大安在外地的南京分公司经理刘文彪、青岛分公司经理杨德华、烟台分公司 经理任盈海受上海总公司的影响,也都在当地通过业务联系,对我国民族保险业 者进行了一定的统战工作。大安保险公司建立后,始终贯彻上海地下党的指示精神,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工作的阵地作用,为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3. 红岩村映照着民安保险公司

民安保险公司的创办人卢绪章,就是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中张公甫的原型之一。

卢绪章14岁离家赴上海,在源通轮船公司当练习生,业余时间就读于上海总商 会商业补习班夜校。



卢绪章

1933年,为了筹措抗日救国经费,卢绪章 策划活跃在商界的热血青年杨延修、张平、田鸣皋和郑栋林,共同集资500元(法币),在上海成立广大华行,开展西药和医疗器械的邮购业务。所谓华行,是为了区别于上海滩大批的外国洋行。广大华行的办公地点就是杨延修的家,那时杨延修和妻子朱学明新婚不久。

杨延修出生在江苏泰州一个手工业者家庭。1925年,14岁的他进入上海英商信纳洋行当小茶房,并成为洋行保险部经纪人处的练习生;后到法商保太保险公司担任高级职员;不

久,他担任了水险部华员经理;后又任江南银行保险部经理;还与人合办了永平保险总行,并任总经理。

杨延修一直追求进步,参加了上海市商会社 会童子军团等群众团体的抗日救国活动,并很快 结识了风云人物卢绪章。

1938年4月,杨延修任广大华行副总经理。 卢绪章发展杨延修等广大华行创始人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广大华行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的秘密联 络点之一,也是中共南方局的秘密工作机构。广 大华行发展成为一家上海地下党的企业,为党提 供和调节经费,卢绪章、杨延修也成了共产党领 导下的"大老板""财神爷"。



杨延修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当时中国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工商业和运输业高度发展。广大华行也迁到重庆,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加速资金积累,壮大经济力量。

1939年底,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亲自约见了卢绪章,并布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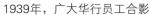


1933年,广大华行五位创始人合影



1940年卢绪章(前排左二)在重庆与广大华行员工合影







广大华行办公楼

任务。周恩来开门见山地对卢绪章说,广大华行由红岩村单线领导,广大华行内的党员由卢绪章单线领导,不与重庆地下党发生横向联系。

接着,周恩来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说,最近中央制定了当前白区工作的方针,中心内容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一定要做到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广大华行作为党的第三线机构之一,只有在第一、第二线机构遭到破坏后才能动用,所以今后要做到不与"左派"人物往来,不再发展组织,即使在自己妻子面前也不许暴露身份。对外要广交朋友,包括国民党方面的朋友,参加公开的社团活动,提高广大华行和个人的社会地位。要充分利用各方面的关系作掩护,使这个机关长期保存下去,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远处传来公鸡啼鸣声,黎明即将来临。为了安全,卢绪章必须在天亮前离开红岩村。周恩来用力握着卢绪章的手又一次叮嘱说,因工作环境险恶, '资本家'可一定要当得像呀。要卢绪章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与各方面打交道、交朋友,一定要记住同流而不合污。

1943年初,卢绪章为进一步提高广大华行的实力和社会地位,构想创办一家保险公司。这一拓展计划,得到周恩来的肯定和支持。

卢绪章以广大华行总经理的身份,在重庆开始筹建保险公司。卢绪章找来当时 在重庆最著名的保险业专家、重庆中兴保险公司总经理、太平保险公司重庆分公司 副经理杨经才先生和民生轮船创办人、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卢作孚先生,共同推动创办保险公司的理念。

1943年秋,民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安产物保险公司、民安保险公司、民安保险)在重庆成立,之所以取名"民安",是因为卢作孚认为该保险公司的职责,应侧重于人民物资的安全保障。以卢绪章代表广大华行为一方,以卢作孚代表民生实业公司为另一方,双方各筹资一半,共同投资1000万元。当时,民安保险由卢作孚任董事长,杨经才任总经理,卢绪章任副总经理,杨延修等被选为常务董事。

民安保险公司的创立,标志着地下党所领导的企业社会层次提高,经营领域扩大,广大华行跻身金融实业界的行列。

民安保险公司开业后,保险业务发展蒸蒸日上,很快成为西南大后方保险界的 一支新秀。







民安产物保险公司保单



民安产物保险公司 保单

在《卢绪章传》一书中有这样的评价:

民安产物保险公司是广大华行地下党组织直接领导下的一个经济实体,是共产党秘密机构的重要据点,卢绪章作为总经理既要千方百计做好经营管理,又要十分重视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使合作双方双赢。民安产物保险公司经济效益很好,先后多年为党提供了大量的活动经费,累计数十万美元。不仅为地下党多了一个可以公开活动的掩护体,而且它作为保险业金融机构,社会接触层次和档次都比较高,也提高了广大华行的社会地位和信誉,有利于更广泛地在上层人士中结交朋友,开展秘密活动。[3]

保险史学家王珏麟说: "民安保险公司对上海地下党领导的群众团体保联给予有力的支持与资助,还为党培养了一批富有经验的金融保险骨干。"其中,中共保险业支部支委兼党团书记沈润璋、支委兼太平保险支部书记程振魁和保联骨干洪文等人先后被安排到民安保险公司工作,并以民安保险员工的身份参与保联组织的活动。当时保险业的国民党人罗北辰曾公开扬言:"民安保险公司是共产党的窝,必须加以清理。"

1943年,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在重庆红岩村接见了杨延修,周恩来交代他要更好地为党的特殊战线工作,说在白区的工作,等于战场上的一个师。要杨延修当好这个"资本家"。

1944年12月,总经理杨经才不幸病逝。1945年5月,卢绪章接任民安保险公司总经理职务。

1945年9月, 抗战胜利, 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东移。根据形势变化, 经中共中央同意, 民安保险公司东迁上海, 并进行参股投资, 进一步扩展业务, 业务覆盖全国各地, 为共产党筹措了大量资金。

1947年3月15日,广大华行召开第十二届股东会议,会上对民安保险公司的业务状况及发展是这样说的:"该公司业务较一般公司为佳。凡国内重要商埠均

通设分公司及办事处,前途发展可期。在该公司之下,另投资金设立民益运输公司,为时亦已一载有余,由王应麒君主持。该公司除为配合本公司之驳运事宜外,还为外界办理报关运输事宜。"

为何民安保险公司的业务比一般公司要好?关键就是有广大华行和民生实业公司在业务、营业网络乃至人才方面的大力支持。比如,民安保险公司以航运险为重点,承保业务主要来自民生实业公司。许多市地的代理处,特别是西南区域的代理处大多数设在民生实业公司的分支机构内,比如乐山、宜宾、泸县、江津、固陵、万县、北碚、宜昌、沙市等地,均由当地的民生实业公司代理民安保险公司的业务。

广大华行一方,迁回上海后,在办公地点上更是与民安保险公司合而为一,两者的总公司均设在中山东一路1号。双方董事、监事管理层也有着明显的重合性,广大华行董事长卢绪章同时身兼民安保险公司总经理。由此可见,广大华行对民安保险公司的影响力更深一些。民安保险公司后来设立香港分公司,经理即由广大华行香港分行经理梁次渔担任。

在《太平史话》中介绍:

抗战胜利时中国法币的贬值已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等到1946年国共爆发内战,通货膨胀就如脱缰的野马,越发不受控制了。这对广大企业而言,原先的资本额在贬值面前已经了无价值,而这势必会影响公司实力和经营。因此财政部要求各公司必须增加资本,以应对货币贬值的压力。1947年4月,民安保险公司奉财政部之令,将公司资本额扩增到2亿元,每股1000元,共20万股。相比原先的1000万元资本,这次增资名义上扩大了20倍,但抛却通货膨胀因素,实际价值却是大幅减少的。增资后广大华行共持股43600股,占总股本的21.8%。这些股份分别由各董事出面持有,其出面者及持有股数依实为:卢绪章10200股,杨延修6400股,郑栋林5000股,张焕文5000股,吴承康5000股,张军光2000股,舒自清2000股,梁次渔2000股,陈鹤2000股,程恩树1000股,颐乐邮1000股,潘水木1000股,金少云

1000股。[4]

1942年3月,为了应对战后局势的恶化,除增资扩股外,民安保险公司还借重早前广大华行与民生实业公司联合投资的另一家企业民孚企业公司,由卢作孚任该公司董事长,卢绪章任总经理。1945年2月广大华行由卢绪章、杨延修等11人出面持有民孚企业公司股票2000股,每股1万元,共2000万元。民孚企业公司主要从事桐油、猪鬃、肠衣等物资的出口及化工原料、钢铁五金材料的进口业务。同时,还代理苏联出口的白报纸、西药等产品的整船运华业务。

广大华行此时已在纽约设立分公司, 经销美国产的医药及钢铁产品和杜邦公司



20世纪40年代中期,广大华行和民孚企业公司春节联欢纪念

的化学产品等。与民安保险公司相关联的企业还有民益运输公司。该运输公司原是民安保险公司的附属企业,名为民益商行。1946年初,民益商行扩股独立为民益运输公司,6月获得经济部颁发的营业执照,总公司设在上海江西路316号,由民生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同时身为民安保险公司监察的童少生任董事长,广大华行的王应麒任总经理。民益运输公司拥有汽车、驳船等多种运输工具,还有仓库两处。它利用民生实业公司的关系,在国内多个重要口岸包括基隆港在内设立了十多处分支机构,同时建立了轮船、铁路、飞机海陆空"三位一体"的联运网络,成为上海开创运输业新体系的中坚力量。其运营中所产生的所有运输险需求一律可由民益运输公司代为向民安保险公司投保,手续简便,服务周到。伴随着民孚、民益等这些关联公司在国际贸易业务和运输业务上的迅速发展,它们互利共进,更是推动民安保险公司从西南一隅走向国际市场,不仅为民安保险公司的业务开辟了新领域,也推动民安保险公司与美国的美亚保险公司建立了合约分保关系,成为市场中的一颗后来居上的新星。根据档案数据记载,截至1946年7月底,民安保险公司总资产达3.69亿元,当月纯益为112万多元。

民安保险公司除与各关联企业密切合作外,1947年初又联合他人出资创办了另一家保险公司,即联安保险公司。根据卢绪章等人数十年后的回忆,联安保险公司是与朱介成合作创办的,资本为法币5000万元。作为联号企业,联安保险公司与民安保险公司同在一处办公,卢绪章任董事长,朱介成任总经理。因年代久远,其记忆难免会出现偏差,这里朱介成实为朱介人。并且,联安保险公司的总经理其实先是卢绪章,后为杨俊三,代理经理是陈鸣舉,朱介人是副总经理兼公司的董事。另外,联安保险公司的总务处长为张孟周、业务处长为夏步青、会计处长为文步生,公司共有员工76人。

与民安保险公司和广大华行相关的保险企业还有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该公司 由卢绪章出面持有2000股股份。广大华行投资的其他企业还有华利公司、建业银 行、利群大药房、开来兴业公司、同生福钱庄、成大银号、安通运输公司、东方 联合营业公司、上海市民日报公司、中华制药公司、建国大药房、中国农工投资

公司、上海商报社、大安木材公司、商务报、五和贸易公司、中国文化投资公司、现代经济通讯社、沪报馆、玲珑食品公司、侨声新闻出版公司、之江药业公司、中国保安玻璃公司、上海乳品制造厂、中法药房公司、上海市抵押信用合作社、台湾七星纱管厂等数十家各类企业。这些企业特别是各联号企业为民安保险公司的经营业务扩大了范围和潜能、提高了社会影响力。

1947年,上海经济和金融市场一片萧条,一些企业纷纷把资金转移到香港,当做一条退路。民安产物保险公司上海总公司也筹划在香港设立分公司,为日后开展地下斗争做资金方面的准备。

民安保险公司凭借太平保险公司的老关系,也考虑到沈日昌的开明和进步精神,便游说沈日昌到香港负责筹设民安保险分公司。

历史就是这样,等待翻开新的一页。

不忘来時路 BUWANG LAISHILU

第一音

一条来自南方的红色血脉

1 燃灯者

2017年10月,习近平在瞻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时说,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这个比喻很形象,我看这里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习近平在中共一大会址久久凝视, 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收藏着共产党创建初期的许多珍贵文物,其中有一件是胡愈之在1940年写的《忆詠骐先生》的手稿。

这份珍贵的文物,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红色血脉的圣物,特别是成为来自南方这条红色血脉源头的证明。上海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摇篮,也是新中国保险业的出发地。

胡詠骐作为上海保险业地下党的创始人,被铭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也被 镌刻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红色家谱的顶端。

著名作家郑振铎的《蛰居散记》是一部散文集,其中第三篇文章就是写给胡詠骐的:

上海战役失败后, 上海的情形, 紧张、混乱。友人们撤退的、躲避的纷纷不





胡詠骐

1940年,胡愈之写的《忆詠骐先生》手稿

绝。其间,也有许多若橡树似的,屹立于暴风雨之中而坚定不动的,胡詠骐先生 即是其中之一。他稳定地站在危难、艰苦、恐怖、纷扰的环境中,像一个巨人似 的;在他的巨影之下,许多人赖以安定、不惧。他执了一盏光明四射的灯笼,在 茫茫黑夜里,引导着许多人向前走。他的忠勇、冷静与明晰分毫的理论,增加了 同伴者无穷的勇气。

他不是一位孳孳为利的普通商人,他看得远,见得广,想得透彻。他知道一个 商人在这国难时期应尽的责任是什么。他的一切措施、一切行动、都是以国家民 族的利益为前提的。他从事商业近二十年,但他的经济情形也仅足够一家温饱而 已。而对于爱国事业,则无不竭力帮助着;比千万百万富翁所尽的力量更多,更 大! [1]

胡詠骐是淅江宁波鄞县人。少年时就读干教会学校裴油中学,并开始信仰基督 教。中学毕业后, 讲入上海沪江大学学习。1919年, 获文学学位。他回到宁波, 创办基督教青年会并任总干事,后转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董事。胡詠骐 每天沐浴在圣歌的歌声中,似乎在信仰的道路上,正在一步一步向前走。

1926年,胡詠骐得到教会资助,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金融、人寿保险和商 业管理学专业。其后,到纽约联邦人寿保险公司实习。

1929年,胡詠骐回国后,任宁绍商轮公司保险部经理,后任宁绍水火保险公司 总经理。1931年,他在上海创办了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并任总经理。公司在广州、 北京、汉口、青岛设分公司、九江、重庆、南京等地设代理处。股东大多是宁绍 帮寓沪的富商、资本收足规银25万元。

胡詠骐可以说是一个思想和智慧非常通透的人,同时有着过人的经商才能。在 保险领域里、充分施展着经营管理的才华。胡詠琪把上帝的慈爱融入保险经营理 念中,把对人的关爱价值体现在对客户的呵护中。他提出"以被保险人利益为前

提"的经营理念、并 热心"客户服务月" 的活动,免费为驻沪 保户注射霍乱及伤寒 疫苗,以期不负被保 险人之原意,而完成 寿险的关爱使命。正 如郑振铎所说:"他 把人寿保险事业,作 为社会事业之一…… 足为后来人最好的 楷模"。



1933年,胡詠骐 1932年,胡詠骐(前排左四)与宁绍商轮公司保险部同仁合影



1936年9月19日,中国保险学会第一届年会参会人员合影

创办了《寿险季刊》《人寿保险学讲义》,构筑保险理论体系。这是中国保险界第一次出版定期刊物,也是第一本人寿保险学的专业刊物。

1935年8月,中国保险学会成立,胡詠骐任常务理事。其后,胡詠骐又出任上海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他首次建议成立中华寿险再保委员会,并主持制定《火险经纪人登记与管理规章》。

1936年5月,胡詠骐应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马寅初函请,出席保险法修订会议,出台了新《保险法》。其间,胡詠骐建议政府聘请寿险专家,编制中国国民经验死亡表。他主持翻译了保险单上长期沿用的英文条款,结束了中国民族保险公司在保险单上没有中文条款的历史。

胡詠骐重视保险教育,呼吁政府在公派留学生中安排保险专业名额,并在中小学课本中增加保险知识内容,建议在大学设置保险学必修课。

1936年,胡詠骐在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工作报告中指出:

保险事业在国内之历史,既尚肤浅,一半经验自属缺乏,以致不知不觉间,难免有盲人瞎马、夜半深池之憾!唯商战无异兵战,我人营业如欲驾乎洋商之上,而须熟练保险业务之状况,取人之长,弃己之短,所谓知己知彼,则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以是目前最重要之工作,厥惟编制各种统计及设计之工作。

今日之研究保险事业者, 辄以难得正确之材料及统计数字为苦。故欲保险事业之发达, 而不以搜集材料编制统计为务。实等于缘木而求鱼耳。[2]

随着胡詠骐在上海保险业中的声名鹊起,他成为保险业的领军人物。但无论是在宗教信仰方面还是在事业的耕耘方面,胡詠骐似乎都没有获得心灵的慰藉。他在思索寻求,他的理想是开辟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这时,共产党也在寻找他,共产党像一束拨动心扉的光芒,胡詠骐在人生的道路上,终于与它相遇。

共产党为了保持胡詠骐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有意安排他留在党外,并没有马上批准他人党,指示他广泛发展保险精英,有效开展地下斗争。

1937年,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胡詠骐以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的身份,致力于难民救济工作。他发起组织上海保险界战地服务团,开展各项为抗日前线服务的活动,为抗日爱国救亡运动甘愿肝脑涂地。

1937年底,在共产党的指示下,胡詠骐联系保险业地下党同仁,发起筹建保联。保联是一个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实际上这是一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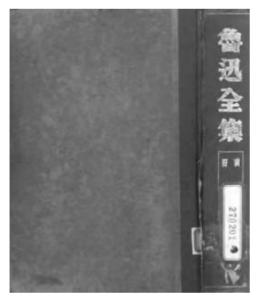
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里,有一件展品是一套湖蓝色的四层搪瓷手提饭盒。那是胡詠骐当年每天上班的必备之物,里面装着他和职员的午餐。身为"大资本家"的他,当年每天还要提着饭盒,带着"便当"去上班,这在上海滩几乎是个传奇。胡詠骐生活朴素,自奉甚俭。尽管他对自己的花销如此之少,显得十分"小气",但在资助我党革命事业上,却耗费巨资、十分慷慨。

胡詠骐出资协助胡愈之组织"复社";资助夏衍出版《译报》。当时上海出版

的斯诺的《西行漫记》、鲁迅的《鲁迅全集》、瞿秋白的《海上述林》和《瞿秋白文集》等进步书籍,都是胡詠骐出资印制的。

胡詠骐的亲密战友林震峰曾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详细记录了胡詠骐与地下党以 及文化界、工商界人士的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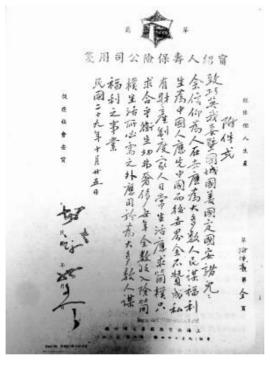
他经常和我地下党的领导同志刘少文、刘晓(刘镜青)、沙文汉(张登)等在一起,他善于利用他的社会地位,掩护党的工作,开展各项进步的抗日救亡活动。他经常以社会化的方式,如在家宴请等方式与地下党的领导人聚会,畅谈革命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请刘晓同志任宁绍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员。刘晓同志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时,他利用宁绍轮船公司的关系,沿途予以照料。他经常以不让人知道的方式帮助一些同志和进步人士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他利用座谈会、聚餐会等适合文化界、工商界人士的方式开展各项活动,他经常利用他的办



胡詠骐出资出版鲁迅的《鲁迅全集》



胡詠骐出资出版斯诺的《西行漫记》





胡詠骐的遗嘱

胡詠骐的全家福

公室和比较宽敞的家庭住房举行各种聚会,他与文化界、教育界胡愈之、郑振铎、许广平、王任叔(巴人)、刘湛恩等,以及工商界进步人士章乃器、王志莘、孙瑞璜等往来很密切。[3]

1939年初,上海金融业地下党终于同意胡詠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他的人党事项是报请中共中央批准的。上海文化界地下党书记沙文汉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胡詠骐在其指导下研读了《资本论》(英文版)。

1940年5月,胡詠骐患病住院,同年11月5日逝世,年仅42岁。在他的葬礼上, 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一名共产党员。胡詠骐在去世前的遗嘱中写道: "余信仰为 人在世应为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生为中国人应先中国而后世界。余不赞成私有财

产制度,家人日常生活应力求简朴,只求合乎卫生,切弗奢侈。每年全数收入除简朴生活所必需之外,应用于为大多人谋福利之事业。"郑振铎写道:

他执了一盏光明四射的灯笼,在茫茫黑夜里,引导着许多人向前走。一个火种遗留下来,可以传之不熄。他便是不熄的火种。他虽死,但他的巨影还荫覆着无数的未死者们。他虽志以死,不及见最后胜利的完成;但未见死者们一念及他的忠笃的大无畏的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便增加了无穷的勇气。[4]

胡詠骐不仅为近代中国民族保险的事业播撒星火,也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传递 火种,名副其实的又红又专。胡愈之说他"是个实业家,但也是一个真诚的爱国 者"。他当年培养的多名保险业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后来都成为中国人保的创 始人。

2. 上海保险业地下党支部的诞生

在1938年10月一个初冬的夜晚,上海宁波路 上钱庄银行的石库门建筑门楣霓虹闪烁,宁绍水 火保险公司宿舍楼安静如常。在一个狭窄的亭子 间内,灯光昏暗,家具杂乱。房子的主人张庆祥 把正在怀孕的妻子请了出去。保险业地下党支部 第一任书记程恩树,将一本《共产党宣言》扉页 上的马克思像轻轻翻开,庄重地放在高处的床铺 上。在他的带领下,公司职员张庆祥、吴振年两 名同志庄严地宣读着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 国共产党……"

程恩树

那昏暗的灯光照进了他们的内心, 那低沉的 宣誓声音如春雷在他们的胸中划过。

那一年吴振年只有16岁。40多年后,吴振年的回忆依然历历在目:

程恩树紧握着我们两个人的手说,"组织上已经批准吴振年、张庆祥入党

了。我们是同志了!我们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我第一次被称呼为"同志!"这个称呼,使我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起了《祖国进行曲》中的一句歌词。"我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他比什么都更亲密!"[5]

这是上海保险业地下党支部刚刚成立5个月的时候。面对这个简陋的入党仪式,让我们无比敬重。

中共一大会议后,共产党犹如星星之火,在全国逐渐形成燎原之势。随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上海召开了二大、四大会议。在上海这个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指挥着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与此同时,面对中国共产党的逐渐壮大,蒋介石于1927年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上海一时间变成了白色恐怖的地方,共产党不得不转入地下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民族危机更加严重。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抗日救国。

1936年1月,上海人民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也于同年2月9日成立。在抗日救亡的浪潮中,部分保险业进步职工,如外商保险公司的杨经才、杨延修、施哲明、董国清,华商保险公司的胡詠骐、谢寿天、程恩树、郭雨东、林震峰等分别参加了世界救国会,他们通过座谈时事,议论和宣传我党抗日救亡的主张,参加各项抗日集会、游行等救亡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上海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进一步纠正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倾向,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领导各界人士支援抗战。在上海保险界,涌现出一大批追求进步的代表人物。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租界成为敌占区包围中的"孤岛",形势急剧恶化。

此后,在上海公开的党团活动因而受到限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考虑到保险公司与各行各业的联系相当广泛,通过保险公司的业务活动,又可与各行各业中的中上层人士建立和保持经常的联系,有利于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还可利用保险公司这一组织掩护地下党员和党组织的秘密活动。

1937年11月,受上级党委指导,上海金融业地下 党书记张承宗先后发展了宁绍水火保险公司的程恩 树、中国保险公司的林震峰两人入党,他们成为上海 保险业最早加入共产党的人。



张承宗

在宁绍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保险业同业公会 主席胡詠骐的积极创导和支持下,发起筹备组织一个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定名 为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目标是要把保险业所有职员都组织起来,既包括下 层、中层职员,也包括上层人士,形成一个全行业性的群众性联谊团体。

在保联筹组的过程中,上级党组织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决定在保险业建立党的地下组织,扎根在行业群众之中,积蓄力量,准备长期成斗。这不仅有利于壮大党的力量,还有利于推动上海华资保险业的发展。

1938年 5 月,张承宗传达组织决定,在保险业创建党支部,由程恩树任支部书记兼组织委员,林震峰任宣传委员。中国保险业的第一个党支部就在这个初夏秘密成立了。

保险业党支部在抗日高潮中建立后,十分重视党的发展工作,在发展党建的过程中,贯彻了"积极慎重"的方针。根据"把抗日救亡活动和工作重心转入企业内部,广泛地团结群众,使党扎根于群众之中"的指示,以保联为基地开展各种政治斗争活动。通过实际斗争的考验,培养和锻炼了一批积极分子,党组织从中物色入党对象,确定党员分工联系,进行个别考察教育,向他们推荐阅读《西行漫记》《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等进步书刊,组织他们观看进步影剧,并关





上海保险业地下党活动(左三为孙文敏)上海保险业地下党活动(左五为吴越)

心他们的生活疾苦,同他们结为知心朋友,和他们一起分析革命形势,研究革命道理,帮助他们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从党支部建立到1940年共发展党员12名,并从"华联"同乐会调入党员一名,此时保险业党支部有党员15名。

保险业早期党员吴振年在《保联,我的摇篮!》一文中回忆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他把保险业第一任书记程恩树称为"我的带路人":

程恩树用他明智的巧手,潜移默化,轻轻地把我的思想脑门儿推开了。他给我的心灵上点燃了一把火,使我逐渐懂得了人间的不平。他同我讲红军长征的故事,我第一次从他的口中,听到了朱德、毛泽东的名字,听到了中国有一个共产党。他还启发我读书,我开始饶有兴趣地读了《西行漫记》《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论持久战》。

程恩树循循善诱地告诉我, 近百年来, 我们的祖国多灾多难。眼前这个国家不

是工人农民的。蒋介石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搞"攘外必先安内",发动 反共内战,而对日本实行不抵抗政策。[5]

程恩树耐心细致地解答了张振年许多看来幼稚得可笑,但又十分实际的政治思想问题:

我问:"我现在在帮助资本家做事,我算什么人?我也在剥削吗?"

程恩树说: "你是一个学生,是一个被剥削的小练习生。是资本家雇佣你为他们做事。你没有资本,靠什么来剥削?"

我又问: "你不是也天天夹了皮包出去跑生意吗? 你一早出去,准时在5点下班前回来,你在忙些什么?"

程恩树说: "我每天只带几份保险单出去, 跑完生意, 就去找'朋友'聊天。 时间早的话, 就到公司旁边北四川路图书馆去看书, 到下班前才回来, 我要使自 已生活得更加充实, 我要和许多朋友一起去寻找理想的生活。"他讲的这个情况, 在我入党之后才弄清楚, 程恩树每天以职业作掩护, 忙于开展党的工作。

我问:"你有那么多朋友吗?"

程恩树说: "有,苏联就是我们的朋友。你到沪光大戏院去看过苏联电影《农 夫曲》没有? 你看十月革命节后苏联工人农民的生活多好,我们也要像苏联一 样,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才真有出路,个人也才有真正的出路。"

就这样,程恩树带领着我,认识了马克思、列宁,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当程 恩树问我,你愿意不愿意参加我们的组织时,我已经十分明确自己所要走的道路 了。^[6]

张振年说: "我对党的认识,党对一个党员的起码要求,在我入党之初,都是由程恩树灌输培育的。"后来,张振年被党组织派往苏北抗日根据地,成为一名新四军指导员。1939年10月,地下党又输送党员饶志德、青年积极分子翁子樵、



程振魁

周繁琍、虞瑞德等前往抗日民主根据地,随后, 那几位非党积极分子都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由于斗争的需要,那个时期保险业党支部发展党员非常讲究策略,不能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一般都是面对发展对象借故说是有朋友要人党,请他谈谈看法。如果他支持,那才可以进入下一步。如果他反对,那就据此别过。

保险业早期党员徐天碧,早年在北美洲保险公司做勤杂和实习生。那个时期,他因年幼对政治无知,有次他问表兄:"什么人是毛、朱?" 表兄有点紧张,责怪他不要瞎说,劝他最好远离政治。

经同仁也是地下党人蔡同华的介绍,徐天碧加入保联。在那里经地下党人孙文 敏介绍,徐天碧进入了四明保险公司工作。在保 联里,徐天碧成为积极分子。他参加歌咏比赛、 出演话剧、评剧,给会刊写文章、写诗,几乎样 样都大显身手。程振魁是徐天碧入党的介绍人, 程振魁培养徐天碧整整四年光景,尽管他比他 大不了几岁。在回忆文章《党引导我走上革命道 路》中,徐天碧讲道:

1944年9月的一天,程振魁约我到一个公园 里谈心。他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要我帮助解决。 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征求他参加共产党,问我意 见如何?我一听就明白了,顿时又惊又喜,想不 到保联就有共产党地下组织,他就是共产党员!



徐天碧

他劝我回去考虑考虑,但还有什么考虑呢!我当即表示:自己也愿意加入共产党。不久,我写了一份《自传》,交给了他,他叫我等着。该年10月10日下午,一位自称王林的人来找我,此人穿着敞领西装,骑着自行车,作风很老练,似乎看起来比我年岁大许多(后来才知道也只比我大两岁)。这次会面给我一个极深刻印象,我向他提了一个问题:"什么叫托派?"他回答:"国民党从外面破坏共产党,而托派是从内部进行破坏。"我在思想上挂了多年的一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此后,一直是这位叫王林的同志联系我。解放以后,我才知道,这位叫王林的人就是林震峰同志。[7]

徐天碧入党之后,革命干劲冲天,激情澎湃,甚至有些急于求成。他有两个要好的同事,平日接触很多,他自认为对他们已进行了"教育",就打算发展他们入党。当他公开谈到这一话题时,他们表现得很惊愕,结果弄得双方都很僵持,他险些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保险业党支部建立以后,由于"孤岛"形势日趋恶化,日寇在"孤岛"不断制造恐怖事件,暗杀抗日进步人士。党组织从长期抗战的要求,对一些群众团体中前一时期从事进步活动比较出头露面的党员,有计划地安排转移。

1939年10月,程恩树、林震峰两位同志由上级党组织决定,通过社会关系,加入"十三太保",撤退去大后方昆明、重庆中央信托局。上海保险业支部由施哲明任书记(施哲明1938年10月已任支委),张先成、陈瑛任支委。1940年4月,党组织决定张先成转移去昆明,翁辅庭(秉伟)为支委,保险业党支部由金融党委领导,上级党组织联系人先后有张承宗、袁君实、项克方、江春泽、叶景灏。

1942年12月,支部书记施哲明因病调离休养,此时从昆明回沪的林震峰接任支部书记职务,支部委员为陈瑛和程振魁,上级联系人为杨世仪。1944年12月,陈瑛从保险业支部调往职业妇女支部,上级党组织为了充实保险业支部力量,借调银钱业北四行支部戚白明任支部委员。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在上

海、南京地区开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在南京、上海设立中共 代表团办事处。上海思南路107号的房子就作为周恩来的公馆。

当时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是刘晓(大安保险公司职员)、刘长胜,张承宗(金融业地下党书记)负责党的组织和群众运动。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是华岗。华岗通过刘少文、张登(即沙文汉、胡詠骐的入党介绍人)、潘汉年与地下党沟通之间的信息。周恩来调冯文彬由延安秘密来沪,进行调查研究,协助地下党工作。

1945年9月,为配合民主运动高潮,党通过上层人士陈巳生的推动,在保险业职工中建立具有明显政治性的组织——上海市保险界民主促进会,通过它在保险业内开展有关的活动,为支援当时学生爱国运动和广大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

1946年5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上海办事处与地下党互相配合,在上海工商界、文化界、教育界及民主党派等方面,广泛开展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工作,组织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参加的有民主同盟会、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妇女联谊会、学生团体联合会、杂志联谊会、中小学教师团体以及酒菜、百货、水电、机器各职业、产业工会等共52个单位,保联也在其中。马叙伦、许广平等29人为理事。联合会发表了"反对内战宣言",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以具体行动,阳止内战。

周恩来根据黎明之前黑暗的形势,对地下党必须坚持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 待时机的方针,作了精辟的论述,使上海地下党避免冒险倾向,深入隐蔽,发动 群众,最后配合解放军的进攻,解放上海,接管上海。

抗战胜利不久,1945年11月,地下党为了加强对保联总的领导,成立了保联党团,并逐步把在保联参加具体活动的党员深入到各公司内部。党团书记先由林震峰兼任,成员有沈润璋、徐天碧、蔡同华、吴福荣4人。不久,党团书记改由沈润璋担任,又增补孙文敏(刚从重庆回来)为党团成员。

1946年1月,党团发动群众参加上海玉佛寺于冉烈士的追悼会;同年6月23日, 参加在北站欢送马叙伦、胡厥文等10位人民代表赴南京请愿的群众大会和会后的



太平、安平、丰盛3家保险公司全体同仁合影

"六·二三"大游行。

此外,党团还结合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职工的利益,发动保险业职工反对 国民党对保险业增资的活动,起草并散发了宣言。在这一时期中,党组织还在太 平、安平、丰盛、天一等保险公司中组织和领导了争取最低生活待遇的几次罢工 斗争。

1946年,太平保险公司经过经济斗争后,同年5月成立了太平保险公司支部,书记由程振魁兼任,此时,保险业支部上级联系人仍为杨世仪。1946年3月,保险业支部增加沈润璋为支委。此时,保险业支部书记是林震峰,支委为程振魁、戚白明、沈润璋3人。1946年6月,廖国英任保联党团书记。

1947年2月"二·九"惨案发生后,党团组织群众参加集会,讨论"二·九"惨案的性质和声援的意义,成立了保险界"二·九"惨案后援会。申新九厂惨案发生后,及时成立了保险界"申九"惨案后援会,开展募捐活动,扩大政治影响。

1947年5月,程振魁因受到特务注意而离开支委,9月转移到武汉,以后又转移到香港。1947年5月,经中共上海市职员工作委员会讨论决定保险业支部改建为保险业分党委。分党委书记为林震峰,委员为沈润璋、廖国英。下属两个支部和一个党团。太平保险公司支部由廖国英兼书记,保联党团由沈润璋兼书记,



吴越

其他公司支部先由沈润璋兼书记,不久改由吴越任书记。上级联系人为职委王致中(1947—1948.11)。

1948年11月,保险业地下党遭到破坏,国民党党通局上海办事处逮捕了地下党员廖国英、吴越。上级党委采取紧急措施:立即撤退沈润璋等一批地下党员到苏北解放区淮安中共华中党校学习;调林震峰、姚乃廉(洁忱)到上海局策反小组工作;决定让没有暴露身份的金家铨、杜伯偶等6名党员继续留在上海坚持斗争,迎接上海解放。金家铨等党员的组织关系转到沪中区委,黄浦分区委由张俊联系。

1949年1月,职委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重组了保险业党支部。由金家 铨、杜伯儒负责,把留下来的党员和新发展的7名党员归在一个支部,并将其他行业的几名党员划归这个支部单线领导。

自1948年底开始,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准备力量,配合接管,迎接解放上海的斗争。1948年11月,党组织派孙文敏、徐天碧去华中解放区学习接管城市的政策。1948年底调林震峰、姚乃廉到上海局策反小组做争取国民党军队的起义投诚工作。在上级党组织的部署下,通过地下党员收集了官僚资本保险公司的组织、人员、业务、财务等各项资料,以及华商公司和外商公司的动态,送往解放区,为解放上海、接管官僚资本的保险公司作准备。

上海解放前夕,在白色恐怖下隐蔽的党员仍坚持斗争。他们散发党的文件、传单,宣传党的各项政策,稳定中上层人士的情绪,在职工中发展"职协"(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向群众介绍解放区人民的新生活;激发群众斗争情绪,进行反破坏、反迁移、保产、保业的斗争,维护好企业迎接上海解放;将保险业务上用的上海市区道路详图送给解放军,以利入城时使用。在临近解放的前几天,

上级党组织又部署组建人民保安队,保险业党支部的金家铨、杜伯儒、徐通豫、王永昌、顾青云、陈君明、刘延垲、董孝杰、姚益君等党员积极参加,并发动保险业职工40余人,在统一领导下组成沪中区队"华联"中队保险支队,由金家铨、杜伯儒各带一个小队,为刚进市区的解放军作向导、巡逻、站岗、放哨和查坏人等维持社会治安的活动。

为使上海解放后能顺利接管保险业并立即恢复生产,1949年5月贯彻丹阳会议精神,由孙文敏通知原赴华中党校学习的一批地下党员到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保险组,组织他们学习城市接管政策、入城纪律,讨论制订接管官僚资本保险公司的计划。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保险组的同志旋即按计划宣布接管中央信托局保险处及中国保险、太平洋保险及中国农业保险等公司。不久保险组的同志与留守在上海的地下党员会师。先后参加接管保险公司工作的同志为林震峰、孙文







太平洋保险公司的老保单

敏、施哲明、徐天碧、朱元仁、刘凤珠、汤铭志、唐凤喧、杜伯儒、吴越、姚乃 廉(洁忱)、翁辅庭(秉伟)、廖国英、徐达等。其他同志分配到上海其他单位 和江苏、浙江等省工作。

保险业地下党组织自建立以来,在党的正确政治路线指引下,在不同阶段都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开展活动,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把党的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上。同时,还有一批组织关系不在保险业支部的地下党员,他们利用当时担任的职务和社会地位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争取保险界、金融界中上层人士,在推动保联筹建成立和开展各项会务活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宁绍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胡詠骐(1939年由沙文汉介绍入党)是成立保联的创导者,他在尽力支持保联的一切活动、培养进步青年的爱国主义思想



地下党员李馥甄、吴越、廖国英、孙文敏(左起)四人合影

等方面都作出很大的贡献;原中国天一保险公司协理、上海保险界战时服务团秘书长谢寿天(1941年2月由石志昂绍入党)是成立保联的发起人之一,1941年下半年受党的委托筹建创办大安保险公司,在支持保联各项活动和掩护保联地下党骨干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原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副经理,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常务理事陈巳生(1941年12月由谢寿天介绍入党)也是保联的维护者之一。因此,保险业地下党在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在同行业其他地下党员的帮助下,长期坚持以保联为主要阵地,开展地下斗争,在斗争中不断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从而保证了抗日救亡运动、敌伪时期深入的群众工作、抗战胜利后的反美反蒋的民主运动以及迎接上海解放等重大斗争的胜利。

截至上海解放前夕、保险业地下党组织先后共有党员60名。

上海保险业地下党支部自1938年5月建立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历时11年,经过了"孤岛"时期、敌伪统治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三个不同时期的艰苦斗争。中共地下党通过各种方式的群众活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教育群众,对敌伪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公开的和秘密的、合法的和非法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在斗争中教育培养了骨干积极分子,发展壮大了党的队伍,在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在上海保险业的职工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3. 高举火炬的保联组织

在中国人保博物馆里展示着一枚小小的铜制徽章,一只有力的手臂高举一把闪光的火炬,下面刻有保联两个字,在斑驳的包浆上,落满时光的烙印与记忆。这是来自20世纪30年代上海保险业群众团体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的徽章,它是共产党外围组织的珍贵标志。



保联徽章



保联徽章

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是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的广泛团结保险职工和中上层人士的群众团体。为了广泛团结教育群众,上海保险业党组织根据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总任务、总要求,按照不同历史阶段的环境条件,针对各种不同类型群众的特点与需要以及保险业的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改善生活福利与寓教育于娱乐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组织广大保险业职工和中上层人士,开展了群众性的联谊活动。

地下党通过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活动阵地,在困难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经过各个阶段的斗争实践和锻炼,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发展了保险业党的组织。地下党领导下的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在上海职工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为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一定的干部力量。

根据翁逸平在《党教育我参加革命》一文中描述,我们可以仿佛勾勒出保联的 坐标结构,但就是这么一个狭小的环境,却成为红色保险的发源地:

说起保联,会所的地方并不大,陈设也很简单。一进门就是一个空空的大间,除了靠右手装设了一个事务员专用的小柜台,房间正中摆着一张乒乓球桌,别的就没有什么了。球桌四周既站人又走人,走路还得注意避免踩瘪滚过来的乒乓球。有时候球桌一撤,就成了作学术报告的会场或话剧彩排的舞台。我在那里打过乒乓球,也听过时事报告,看过排练独幕话剧《锁着的箱子》,那是谈峥声、吴振年、周繁琍和程振魁演的。乒乓球室旁还有三个小间,北面那一小间放着一架风琴,是话剧组和歌咏组的阵地,中间摆着保联仅有的两只小沙发和几把椅子,似乎经常为学清唱平剧的六七个人所占领。我们有时也站在边儿上看,这不是听戏,而是看他们用手在沙发扶手上拍打板眼,看他们那种闭眼、哼鼻、晃头的姿态,觉得好笑,但又不敢笑,因为据说学唱的人里有保险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还有部主任、科长。南面的一间是图书室的小会议室,就是这样一块还不到90平方米的地方,每天晚上照照攘攘进进出出总有一二百人。保联具有那么一股

青年人火一样的青春活力,有那么一股充满人情温暖的吸引力。保联的各项活动都受到广大会员甚至有些会员外群众的欢迎拥护。^[8]

吴振年入党后,接受程恩树委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到保联去,多接触一些青年 同志。他在《保联,我的摇篮!》中写道:

我在公司里每个白天六个小时,光线昏暗、人情冷漠,世俗生意经的圈内,度日如年。可是一到夜晚六小时外,我踏进挂着《泰晤士报》招牌的爱多雅路160号大厦四楼,扑进保联俱乐部的怀抱时,我顿时精神焕发,犹如到了人间天堂一样,在保联俱乐部的一大间、三小间近100平方米的套间里,我有着广阔的天地。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国东北以后对华侵略步步紧逼,华北形势岌岌可危。而国民党当局却置国家民族灾难深重于不顾,顽固地继续推行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于同年7月6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宣言,提出"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深得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北平学生掀起的"一二·九"运动,波澜壮阔,在全国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高潮。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纷纷起来,组织救国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中一部分银钱业、洋行业的进步职工,为使救亡活动进一步深入到各行业广大群众中去,先后发起组织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上海市洋行华员联谊会(以后改名华联同乐会)等群众团体。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又爆发了"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华民族神圣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上海人民抗日斗争的热潮蓬勃发展。

经上海保险界进步的中上层人士胡詠骐、谢寿天、杨经才、郭雨东等人的积极

筹划,于1937年7月9日成立了保险界战时服务团,号召保险界职工投入抗日战争的各项活动中,深得各保险公司和广大职工的热烈响应,报名参加战时服务团的达300多人,积极开展劝募、战地慰劳、救济难胞以及抗日宣传等活动。1937年11月,国军西撤,租界成为沦陷区包围的"孤岛",公开的抗日活动受到限制,战时服务团无法继续活动。党组织根据当时环境的变化,于1938年5月抽调在洋行华员联谊会活动的程恩树和在银钱业业余联谊会活动的林震峰两位党员组成保险业党支部,及时改变了活动方式,推动组织适合保险业各阶层群众需要的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

随着地下斗争的迅猛发展,上海保险业追求进步的职员队伍日益壮大。上海保险业地下党提出了参照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的形式,创建保险业群众团体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的设想。

银钱业业余联谊会和洋行华员联谊会两个团体是在1936年10月成立的,它们在 救国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党和广大职员群众的密切联系。实践证明,这种组 织形式更适合于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广泛发动群众。这样的组织形式同 样也适合于保险业的特点。

抗日战争初期,上海的华商保险公司有30余家,而外商保险公司及代理商有160余家。以英美势力为主的外商保险公司在保险业中占主要地位。华商保险公司不仅数量少,而且资力薄弱,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依赖性和投机性。保险业全行业的从业人员有2000余人,其中有些还是专业经纪人或兼职的经纪人。从业人员的文化程度差别也较大,除少数大学生文化程度较高外,大部分是初高中文化程度。上层人士是各公司的资方代理人,如经理、协理等,他们在公司中握有大权,在整个行业中享有一定的声望,除少数具有政治头脑外,一般对政治缺乏兴趣。中层的主任、襄理,在业务技术管理等方面被公司倚为支柱,得到上层或资本家的信赖。广大的中下层职员,生活比较艰苦,在工作上埋头苦干,对业务与文化方面有迫切的进修要求;在政治上对日寇残酷统治的现实强烈不满,要求抗日救国;在业余生活上要求有正当的娱乐社交活动。除少数外商保险公司规模较

大,职工人数较多外,华商保险公司中仅少数有银行背景而稍具规模,职工人数较多,如中国银行创办的中国保险公司,金城、大陆、中南、东莱等银行合办的太平保险公司等,职工较多的也仅一二百人,少的几十人,甚或一二十人。由于多数公司规模小,职工人数少,又较分散,各公司职工单独组织开展活动有一定的困难,建立一个全行业性的群众组织甚为需要。

根据保险业的特点和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由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宁绍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胡詠骐、中国天一保险公司的谢寿天、太平保险公司的郭雨东、美商北美洲保险公司的董国清、宁绍水火保险公司的程恩树、中国保险公司的林震峰等人发起筹备。以华商保险中的中国、天一、宁绍等公司为重点,在筹备期间,通过个别征求的方式,征集会员达300余人。筹备组提出的保联宗旨为联络感情、交换知识、调剂业余生活、促进保险业之发展、得



1943年4月,天一保险总公司及上海分公司全体同仁合影

到保险业上层、中层和广大职员的普遍赞同。保联设会所于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160号,原《泰晤士报》大厦四楼。

1938年7月1日,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华商和洋商保险公司的职员400余人。大会选举胡詠骐、谢寿天、董国清、程恩树、林震峰、关可贵(保险业同业公会秘书长)、王中振(保险业同业公会秘书)、朱懋仁、郭雨东(以上两人是太平保险公司)等组成第一届理事会,推选郭雨东为理事会主席。理事会下设秘书处、会员部、总务部、娱乐部、体育部、学术部、妇女部、出版委员会、图书委员会及福利委员会等工作部门。各部、会根据工作需要,再分设若干组,吸收各公司会员参加各项会务活动。保联向当时的公共租界当局工部局政治部办理团体登记,于1938年10月4日,领到"华人总会"第5号执照,取得了合法的社会团体地位。

1938年10月30日,保联在浦东同乡会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增选叶孝焯、胡树白、过杰庆、庄祖濠、姜纪鑫、奚景高、沈有光、李言苓、李嘉宾、陈立文10人为理事;方嘉书、谢育仁、陈人麟、孙永祥、陶锡凤、潘齐英、傅瑞庆、赵伟民、储培善9人为候补理事;邱菊夫、王文龙、瞿振鹄3人为监事;沈小愚、张立生、吴玉祺3人为候补监事。这样保联理事会、监事会队伍扩大了,包括更多的保险界上中下各阶层的代表人士。为适应广大保险业职工的不同需要,各项活动迅速展开,原有会所太小,未能满足需要,于是分别租用学校教室,举办各项学术活动;租用体育场,开展各项体育活动。各项文、体、娱乐及学术活动的迅速展开,受到会员群众的热烈欢迎,得到大部分上层人士的赞助和支持。但也有个别的如太平保险公司的上层在保联成立之初,有所顾虑,怕它成为对抗资本家的职工会,因而采取不积极的态度。后来由于太平系统大部分职工的推动和其他保险公司积极赞助的影响,他们也改变了态度,出面支持。由于保联的各项活动能适应广大群众的需要,又得到各公司中层人员的积极推动和上层人员的赞助支持,参加保联的人数不断增加。1938年8月,第一届征求会员运动结束时,会员即达973人;1939年3月,第二次征求运动增加到1116人;到1940年1月第三次征求运

动增加到1402人,占整个保险业职工总数的70%左右。

1939年6月11日,召开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选出保联第二届理事会、监事会。理事25人:董国清、王中振、关可贵、谢寿天、李言苓、沈雍康、庄祖濠、张统桢、程恩树、林震峰、胡树白、过杰庆、卓牟来、潘齐英、张先成、施哲明、谢育仁、卢蓉舟、滕运寿、顾君长、杨士珍、陈瑛、邵竞、应瑞桐、赵焕章。监事11人:庄锡华、邱菊夫、曹骏白、林绳佑、刘经甫、沈雷春、沈有光、吴玉琪、王文龙、储培善、瞿振鹄。常务理事9人:卢蓉舟(主席),关可贵、谢寿天、王中振、董国清、李言苓、杨土珍、过杰庆、林震峰。名誉理事兼顾问:胡詠骐,名誉理事:项馨吾、丁雪农。

为有利于开展会务活动,吸收更多的会员参加,保联历届的理事、监事适当 考虑了上中下各阶层的人员,每届理事会的主席,均推请保险公司的总经理或知 名人士担任。为使一年一度的征求会员和筹募经费的活动得以顺利进行,每年征 求会员时,还组织征求委员会,聘请各公司的上层人士分别担任征求委员会的主 任、委员、征求队长等职务,如宁绍人寿保险公司的胡詠骐、陈巳生、龚渭源; 中国保险公司的过福云、孙广志;永安水火保险公司的容受之;宁绍水火保险公 司的方椒伯、李言苓;太平保险公司的王伯衡、朱懋仁;中国天一保险公司的谢 志方、谢寿天;大安保险公司的郭雨东、董国清;外商保险公司的朱孔嘉、邱菊 夫、过杰庆、曹骏白、胡树白、林绳佑、陈立文等均先后担任过历届征求委员会









天一、四联、大安等保险公司的保险单及宣传单

委员、征求队长,或理事会主席和常务理事等重要职务,他们对于保联的创建和 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开展中上层工作的同时,还适当利用了华商保险公司 组织的保险业同业公会的地位和作用。同业公会的主席,在工商界、文化界有一定影响的社会活动家胡詠骐,参与领导保联的组建和成立以后的各项活动,并为 《保联》撰写论文,倡导振兴民族保险事业,深受保险界同仁的赞誉。秘书长关 可贵教授、秘书王中振均长期担任保联理事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并主持出版委员会、总务部的工作,他们都曾对保联的各项活动给予极大的支持。

保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保险业建立了统一的抗日战线。党的保险业 支部以保联这个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为中心,结合保险业的特点,在职工中宣传 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保联成立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上海的租界成为日寇占领区四面包围的"孤岛"。当时上海租界的英、美、法势力与日本侵略者,既有妥协,也有矛盾,租界还暂时处于苟安的局面。"孤岛"这一特殊的环境,正好可以利用来团结广大人民继续开展各项较隐蔽的抗日活动。保联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引下,利用租界这一特殊环境,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组织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各项活动。

保联成立后,为与广大职工建立密切联系,会员部在各个公司中设联络干事 100余人(约每10人中有1名联络干事),都由热心会务活动的积极分子担任。通过他们深入公司内部,向会员介绍会内的活动情况,并向保联反映会员的意见和要求。通过联络干事推动各公司的会员和职工参加各项会务活动,成为保联与会员间联系的桥梁,增进了会员间的联系,扩大了保联在群众中的影响,起到了联系群众的纽带作用。

保联每年发动一次征求运动,征求会员、筹募经费。每届征求运动除由各保险 公司上中层领导任征求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征求队长外,各公司的联络干事在 征求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组织推动作用。保联还以公司为单位开展竞赛活动,经 常的活动如各项体育比赛、文娱以及图书室在各公司建立借书站等活动,也往往

通过联络干事协助开展。通过联络干事分期分批地发动各公司会员来会所参加联 欢会。保联还经常召开联络干事会议和联欢会,通过这些活动,使会员和保联建 立密切的联系,使广大会员感到保联是他们自己的团体,是温暖的家。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而上海各界根据当时环境仍积极开展支 援抗战的捐献的活动,如支援前线、救济难民、劝募寒衣等活动。保联也积极参 加这类活动, 如劝募寒衣以及利用各个纪念节目义卖纸花、小国旗等活动, 将所 得捐献给前方战士。当时女会员人数只有50人左右,而经保联唯一的女党员陈瑛 同志的活动,于1938年秋成立了妇女部。陆缀雯(不属保险支部的老党员)、饶 志德(姚志英)、周繁琍(周础)、舒鸿梅、汪建征、郭素珍等人经常来会,参 加妇女部及其他会务活动,并利用"母亲节"的机会义卖纸花,向各公司职员推 销、当时一次义卖活动即得300多元、全部用来支援前线。为纪念"七・七"事 变,开展义卖小旗的活动,将事先购到数以千计的小旗,分发给各公司的妇女联 络干事。在纪念"七·七"事变那天,妇女联络干事分别到各保险公司的大门口 或电梯旁等候职工上班,见面时轻轻地说一声,"请您支援前线",就把一面小 **施别在她(他)的衣襟上,受到职工的热情支持,即从衣袋里掏出钱来,表示心** 意, 生动地体现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忱。1939年秋, 为配合上海市职业妇女俱乐 部发起的义卖活动, 在陈瑛同志的带动下, 将陆静芳、姚益君、朱肇芬等同志利 用业余时间编织的毛衣、裁制的儿童衣帽等服装送去参加义卖活动。这些爱国活 动取得的成果, 使妇女部的姐妹们感到十分自豪和激动, 从而更加增强了爱国主 义思想,坚定了抗日的信念,推动了妇女工作的开展。以上劝募的寒衣和义卖所 得,都通过适当途径捐献给难民和新四军。此外,保联还结合其他会务活动,通 过各种形式,筹募款项,支援抗战。

此外,保联还举办了新文字、英文、俄文、国文、漫画、簿记、会计等学习 班,帮助广大职工提高业务技术及文化水平。

提倡正当娱乐, 寓教育于文体活动之中, 是保联的重要活动之一。娱乐部和体育部根据保联的宗旨和广大会员群众的要求, 积极组织开展了各项活动。





保联学术部人员合影

保联体育部人员合影

根据会员职工的不同爱好和需要,保联还成立了评弹组、国乐组、口琴组及舞蹈组等,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把广大会员职工发动起来,各取所好,或弦歌在一堂,或演出于舞台,气氛非常活跃。

体育活动是团结群众,调剂业余生活,增强职工身体素质的一项活动。保联经常开展篮球、足球、乒乓球、游泳、弈棋等活动。

1939年冬,物价飞涨,广大职工生活日趋困难。保联福利委员会为减轻职工的生活负担,发起筹组保险业职工消费合作社。由陈瑛、林绳佑、董国清等负责筹备,拟定社章,筹募股金,得到广大职工的热烈响应,参加社员达400多人,实收股金5600余元。保险同业公会理事谢颂玉与各大公司、行号有密切的联系,被聘请任社长,合作社以批发价购进各项生活用品,以低于市场的零售价格转销给社员。合作社的组织,从生活上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解决了职工的部分生活日用品需求,显示了在困难环境中保险业职工的团结互助精神。

"孤岛"时期的前一阶段,在群众抗战热情仍然高涨的情况下,保联仍继续开展各项条件许可的支援前线、教济难民等活动,各项会务活动也结合宣传抗日形势和政策,传播进步思想,散播革命种子。随着形势的变化,并从长期打算,准备应付日益恶化的政治环境,保联的各项进步活动也逐步采取较隐藏的方式,并把工作重点转向与群众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福利性的活动和与保险业务直接有关的







保联排球队队员合影,后排左五为沈润璋

文化教育和保险业务知识教育。

保联在"孤岛"环境中,经过四年艰苦奋斗,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群众业余活动,广泛团结了保险业职工和中上层人士,开展了统战工作,使自己的群众基础得到巩固和扩大。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结束了上海"孤岛"时期。日伪的统治,使公开的政治性活动被迫完全停止。保联组织讲究策略,依然坚持开展活动。为适应群众需要,开展了以生活互助为中心的各项活动,如开办医疗服务,为会员打针、防疫,治疗一般疾病,以减轻保险职工医药费用的负担;改进理发室的经营管理,为会员提供服务,想方设法尽可能地帮助职工克服一些生活上的困难。

新中国再保险专家王仲石,当年是保联组织的积极分子。在保联中,他接触了地下党进步人士和革命书籍,使他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他身患疾病,体质羸弱,也及时得到保联的医疗服务,身体得到康复。因此,王仲石说是党挽救了他的精神和肉体两个生命。

徐天碧在回忆文章《党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中对保联充满了感情:

我参加保联后,结识了一些后来才知道是共产党员的青年同志。特别是由于程 振魁同志的耐心帮助、教育,使我这个倒是在政治上完全茫然无知、思想作风上

有不少小资产阶级毛病、在人生道路上彷徨的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保联就是 我的家,我每当一想起这段经历,总是对保联充满十分亲切的感情和感激。[10]

抗战胜利之初,保联立即进行复兴会务的各项工作。通过谢寿天、程恩树、董国清、陈巳生、林绳佑多方联系,及时调整了保联组织,并推选林绳佑为保联总干事,赵伟民为副总干事,迅速恢复各项会务工作,积极开展在新形势下的各项活动。1945年11月,地下党成立了保联党团,党团书记由保险业支部书记兼任,党对保联的领导得到加强。

1945年底至1946年4月底,保联根据形势需要,连续举办了20多次有关时事形势、政治经济方面的演讲会,邀请著名民主人士郭沫若、黄炎培、陶行知、马寅初、沙千里、马叙伦、章乃器、沈钧儒、茅盾、胡子婴、雷洁琼、吴晗、娄立斋、吴承禧等来会所作报告,听讲者非常踊跃,一般有二三百人,多的有四五百人。郭沫若的一次演讲,临时借金太食堂(金城银行七楼)作会场,济济一堂,座无虚席。通过这些演讲会对广大会员和职工进行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迫害、要求自由的政治教育,对团结群众、教育群众收到一定的效果,为以后开展的各种活动,扩大了群众基础。

在上海解放前夕,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在保险业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上海职业界协会(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会员,散发党的各项文件,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政策,向群众介绍解放区人民的新生活,激发群众的斗争情绪,教育群众维护好企业,迎接上海解放。同时,在保险业中组织了人民保安队两个小队,有40余人参加。队员佩戴着人民保安队臂章,沿街巡逻,站岗放哨,维持社会治安秩序。有的队员到街上张贴布告,宣传《约法八章》;有的为刚进市区的人民解放军做向导带路。

保联的活动,激发了保险界职工的爱国热情,一大批有志青年积极投身抗日 救亡运动,先后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保联熔炉里锻炼成长起来成 为坚定革命战士的有:被誉为"红色保险掌门人"的谢寿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的创建者林震峰、郭雨东、施哲明、姚洁忱、廖国英、朱元仁、刘凤珠、李锵等 人。党组织先后输送吴振年、蔡佩伦、饶志德、周繁琍、翁子樵、虞瑞德进入根 据地,成为光荣的新四军战士。

保联组织通过各种方式的群众活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教育群众,对 敌伪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公开的和秘密的、合法的和非法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斗 争,在上海保险业的职工运动中起了核心作用。

4. 计革命书籍照亮漫漫黑夜

《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的纪实文学作品,于1937年10月在伦敦首次出版。当时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方便,曾易名为《西行漫记》,于1938年2月由上海地下党出资,在上海首次出版中文版。

该作品真实记录了埃德加·斯诺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从多个方面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而艰苦奋斗和牺牲奉献的精神,瓦解了种种歪曲、丑化共产党的谣言。斯诺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普通民众的观察和描述,把红区党组织以及各种文件、会议等内容转变为让读者读起来感到亲切生动的文字。

《红星照耀中国》为国外记者开辟了采访苏区、报道中国革命和毛泽东的途径。在斯诺的影响和介绍下,外国记者纷纷前往中国苏区和抗日根据地。中国许多进步青年通过此书,了解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了解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从《红星照耀中国》中得到鼓励,纷纷奔赴延安,走进革命斗争的行列。同时,这本书后来成为上海租界巡捕"抄靶子"搜身的借口。

上海宁绍水火保险公司的实习生翁逸平,当年在公司同事(地下党书记)程恩 树的介绍下,得到了这本红封皮的《西行漫记》,使他第一次知道了毛泽东、朱 德以及长征,也成为使他进入保联,参加革命活动的媒介。

同样, 在北美洲保险公司工作的徐天碧回忆:

保联的一位同志介绍,我看了《西行漫记》,我一下子被这本书吸引住。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情况,我几乎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样好的人,这样理想的地方,我将自己在上海所见到、所感到的一些现象,和边区及红军的状况进行对比,顿时对书中所描述的一切产生了好感,《西行漫记》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影响了我以后所走的道路。[11]

徐天碧(毕世英),1920年出生在上海一个小菜贩家庭。通过徐志摩的《猛虎集》,迷上新诗,写过一首《云与愁与爱与恨》;1940年,在北美保险公司当打字员;在保联中,他阅读了《西行漫记》及马雅可夫斯基的诗;1944年,程振魁介绍他入党;1949年,负责接收保险公司。他曾任人保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后到外交部工作。

1938年7月,保联成立之际,即设有图书委员会,主席为谢寿天,副主席为夏绍言。图书委员会着手开辟阅览室,筹建图书室,以满足会员追求真理、渴望知识的需要。

当时的华商保险公司,除"中国""太平"两家外,绝大多数是小型企业,一家公司一般只有职工20名,且公司间平时也很少往来。各家保险公司一般都没有条件单独设立图书阅览室。但保险业职员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其中不乏爱好读书者。然而要了解时事新闻、读书求知,都得自己掏腰包,买报买书的开支,对一名小职员来讲,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因此,保联图书室的建立,为丰富保险业职员的业余文化生活创造了条件。同时,通过图书室可以传播进步文化,宣传抗战形势,以争取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所以,保联图书室也是我党保险业

支部在保联进行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阵地。

保联理事会在经费和场地较紧张的情况下,优先照顾图书委员会,决定挤出一间有20多平方米的会议室辟为阅览室,添置了必要的报架、书橱杂物,订购了几十种报纸杂志供会员阅读。阅览室虽小,却是保联的一个窗口,它吸引了不少会员到会所来参加活动。通过阅览室,可以进一步了解会员,熟识会员,增进友谊联系,从而发掘积极分子,组织他们到图书室来义务工作,并在小范围内征集图书,积极筹建图书室。对来会所进行其他活动的会员,在他们休息时,阅览室也为他们提供阅读报刊,了解时事新闻的机会,所以阅览室内经常座无虚席,给整个会所增添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38年10月,在各方的支持下,征集到的图书已有500余册,另外又购置了少量新书。以此为起点,图书室的干事们,边干边学,利用业余时间,把这些旧书修补整理,编订分类目录,立卡贴签,并制定流通出借办法,于1938年11月,图书室在保联成立后的第三个月就正式开放,向会员办理图书出借业务,到年底已拥有读者150余人。

图书室开放后,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爱好读书的会员。但经过一段时间,原有的书籍,在数量和内容上都不能满足会员日益增长的需要,如果只靠有限的固定经费(预算每月书报费为6元),逐月能添置的新书是很少的,这显然解决不了燃眉之急。在保联理事会的支持下,经过积极准备,于1939年4月成立了征书运动委员会。谢寿天、林震峰、关可贵等理事亲自参加,在全行业开展了一次群众性的大规模征书活动,聘请华商联合保险公司经理邓东明为征书总队长,下设25个征书队,由热心关怀保联的各保险公司的中上层人士担任队长。从1939年5月11日开始至6月11日结束,历时一个月,共征得书籍4059册,现金90元,还有众多的杂志画报,超额完成了预定的目标。其中,12队在队长蒋学杰的领导下,单独征得图书973册,几乎占总数的1/4,名列榜首。保联名誉理事,中央信托局保险部经理项馨吾把珍贵的《四部各要》10大箱也寄存到保联图书室来,供会员借阅。征书运动的优异成绩,说明广大会员从上到下,对保联是积极支持和信任的,愿意把私



《保联》杂志

人藏书捐献或寄存到保联图书室,参加流通,使这些书的作用能得到充分发挥。通过征书运动也扩大了图书室在会员中的影响,到1939年9月,领有借书证的会员增至500余人,图书室藏书已达5000多册,为初创时的10倍。其中以进步书刊为最多,有鲁迅、茅盾、郭沫若的著作,还有不少高尔基等苏联作家的书籍。藏书的骤然增加,不得不在会所增辟了一间藏书室。图书室的干事就在这四壁都是图书的小天地里办理出借手续。至此,图书室已初具规模。

在征书运动开展之前,图书室还聘请了两位图书馆学的专家扣任顾问,按照最新的"杜

氏世界编目法",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集中力量把存书全部重新分类整理,为 图书室走上正规化,迎接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书室除了设立一个阅览室并办理图书出借等日常工作,还主办过多种座谈会和代购书刊的工作。

1938—1939年,图书室定期主办"刊物研究座谈会",每星期四举行一次。第一次专题座谈"读书问题",座谈内容在《保联》辩特辑报道,对"怎样读书""读些什么书""读书的方式及态度"等都有精辟的专稿。以后还组织了《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习小组。座谈会和学习小组的活动在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交流读书心得体会、促进和引导会员学习进步书刊,关心政治经济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

当时,《大众哲学》《西行漫记》《论持久战》《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 史》,以及每日译报社出版的小丛书在青年职员中颇受欢迎。图书室以优惠价格 为读者代购代订进步书刊,并印有详细书目分发给读者,供订购时参考。这些活 动使健康的、革命的进步文化在青年职员中广泛迅速地传播,使党的政策、抗战 形势及时为群众了解掌握。

为加速图书流通,便利会员借阅,图书室在会员比较集中的保险公司内部,还设立借书站,将图书目录分发到各借书站,供会员借阅时查考,另外还聘请了一些联络干事负责办理集体借阅手续。图书室走出会所办图书的措施,使有些会员不出公司大门就可借到自己需要的图书,深受会员欢迎。到1940年8月,这类借书站已遍布23家保险公司。

由于地下党的正确领导,利用"孤岛"的特殊形势,保联图书室发动群众,依靠骨干,尽力为群众服务。随着工作的不断开展,积极分子的队伍也日益扩大。1939年第二届理事会聘请了陆缀雯(太平保险公司)、王祥熊(四明保险公司)、淳于伯兰(肇泰保险公司)、章耕华(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徐兰甫(天一保险公司)、蔡同华(北美洲保险公司)、卓观挺、李春生(怡和洋行保险部)和朱同文、舒鸿梅、罗丽桐11人为图书委员会委员,推举陆缀雯为主席。

陆缀雯是1927年入党的老同志,她爱人原是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王一飞,20世纪30年代初被国民党杀害。陆缀雯来到上海,进入太平保险公司工作。在她的影响和教育下,该公司同事程振魁、陈瑛逐步走上革命道路,他们两位后来经施哲明介绍入党,成为保联和保险业支部的领导成员。但当时由于陆缀雯的组织关系是由中央直接联系的,大家都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1940年,陆缀雯经组织安排去了延安,离开了保联。

此后,蔡同华成为图书室的实际负责人。图书室的干事当时都还年轻,精力充沛,又肯学习,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为群众服务的热忱。在自愿的基础上,他们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图书室的工作上。正是依靠这些同志的不懈努力,图书室得以巩固和发展。在群众的心目中,图书室是很"红"的。保联骨干中不少人,都是先从向图书室借书开始的,从进步书刊中不断汲取营养,并逐步熟识保联,然后参加了保联的其他活动。图书室在培养保联骨干中起了重要作用。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了租界。由于上海地下党事前正

确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并提出了相应措施,所以党领导下的各群众团体都没有遭到大的破坏。保联的各项活动也都作了应变准备。图书室不能再以"红"的面目出现在群众之中,少数骨干连夜把存书分成三类。忍痛销毁了一部分宣传抗日和介绍共产党情况的书籍,又整理出一部分进步书籍,集中存放到谢寿天同志的家中,留下来继续流通的多数是政治色彩不显眼的文艺小说,约有500本,放在两个大书橱内,继续公开出借。为了避开检查员的耳目,将少量马列经典著作贴上"七侠五义"这类武侠小说的封面进行伪装,这就是所谓的"白皮红心"。经过这样一番整理,于1942年3月图书室又重新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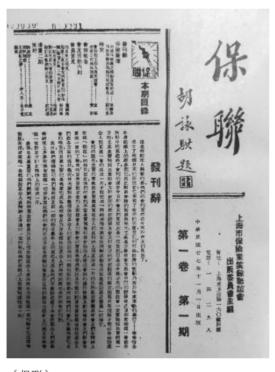
距太平洋战争爆发仅两个月余,中间还有一个农历春节,当时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图书室干事们的工作积极性也是很高的。日寇占领租界后,英美法商保险公司歇业,许多新的华商保险公司迅速成立,保险业职工也有较大的流动。保联的骨干有些去了内地,有些奔赴了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图书室的干事也有了不少变动。这时图书室的负责人是吴越,他在艰苦的环境中,一直坚守阵地,默默地为会员读者服务。1944年,吴越为追求真理,曾只身去外地寻找新四军,暂时离开了保联,图书室也就停止开放。在老图书委员蔡同华同志的主持下,把全部存书整理在肥皂箱内,藏到阁楼上。参加图书室工作的同志们以抗战必胜的信念,等待黎明到来,坚信那时这些书籍定将与会员再次见面,重新发挥它们的作用。

1945年9月, 抗日战争胜利。保联的会务活动逐渐恢复, 重新开放图书室也提到议事日程。在蔡同华的指导下, 组织了一批新干事, 先开放阅览室, 同时把珍藏起来的书籍——整理上架, 根据保存下来的图书总目录, 经核对后, 补制书卡。另外, 又购置了一些新书, 于1946年9月图书室重新开放。这时图书室的干事先后有汤铭志、周建新、潘有福、韩精武等人。除出借图书外, 还恢复了主办座谈会及代办书刊的业务。有次座谈会专题讨论妇女的问题, 对妇女是应该走出厨房, 从事社会活动, 还是应该被"关"在家里做个家庭主妇, 与会者各抒己见, 辩论相当热烈。1948年8月, 国民党当局发行金圆券, 大肆搜刮民间财富。在保险

业支部的推动下,图书室于1948年10月22日主办了关于金圆券问题的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薛志章(中国保险公司)、陶锡凤(大信保险公司)、姚乃廉(中国工商保险公司)、唐凤喧(民安保险公司)、唐在洞(太平洋保险公司)、魏静嘉(美亚保险公司)、韩精武(兆丰保险公司)、吴丹生(中国保险公司)。参加人员虽不多,但他们所在的公司,既有外商企业,也有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企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会上有人抨击金圆券发行以来,"政府措置失策,不得人民拥护。"有人评说:"金圆券发行不到两个月,工商业遭受沉重的打击,波及保险公司的生意清淡,工作清闲得可怕,预感这是失业的不祥之兆。"会上还谈到华商保险公司与洋商保险公司应在互惠的条件下,交换分保溢额,以防止资金外流的问题。陶锡凤在书面发言中还指出:"各公司的命运都寄托在金圆券上。除非目前环境完全改变,公司业务发展将不可设想。"这次座谈会的内容经主持人汤铭志整理后,通过保险业支部书记吴越寄广州《保险知识》,以"金圆券发行前后的保险业"为题、特载在1949年1月该刊第二卷第三期上。

保联图书室在上海解放前的11年中,几经起伏,但它始终以传播进步文化为己任,积极为会员服务。因为知识分子接受革命理论,一般是从进步书籍中受的启蒙教育,如许多青年当时就是从阅读《西行漫记》开始了解共产党,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保联图书室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贯彻群众路线办图书室的方针,通过借书、代订、座谈会等方式,在进步书刊和青年会员中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而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培养了部分骨干,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一定贡献。

5. 林震峰创办《保联》《保险月刊》



《保联》

1938年7月,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诞生后,随即成立出版委员会,积极筹划出版代表保联并适应保险业各个层次群众需要的宣传刊物,以加强保联与广大保险业职工的联系。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同年11月1日,《保联》月刊正式创刊。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胡詠骐为月刊题了字,目录上首还刊印了有火炬图案标志的保联会徽。

正如创刊词中所说的,对于《保联》,不仅希望它是会的喉舌,而且更主要的是希望它成为全体会友乃至全体保险业同仁共同的园地,共同所有的刊物。它的任务

是报道会务消息,反映保险业同仁在各方面的现状、趋向,鼓励同仁在学术研究上交换知识,使同仁在精神上相互融成一片。

《保联》以杂志的形式,每月出版一期,从创刊到1939年12月,共出版了14期。为适应"孤岛"这一政治环境的不断变化,和长期抗战的需要,适应保联各项活动的广泛开展,《保联》自1940年1月起改为《保险月刊》,成为保险学术性的刊物。同时,另行出版《保联会报》半月刊,加快会务活动的报道,及时沟通情况,进一步扩大保联与广大会员群众的密切联系。

《保联》作为会刊,作为保联的喉舌,结合保险学术的交流和会务活动的报道,宣传了党的政策,团结教育了保险业广大职员群众,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一定的作用,深受保险业上中层人士和一般职员的爱护和支持。

《保联》主要是通过消息报道、特写、报告、会员意见等形式,及时报道保联各部、会在各个方面的活动情况,如征求会员运动、会员代表大会、各公司会员交谊会、学术、文娱、体育、福利以及图书室等各项活动,密切了保联与广大会员的联系。保联各项生动活泼的活动,如经济学讲座、文学讲座、保险讲座、漫画班、摄影班等各项学术活动;话剧、平剧(即现在的京剧)、参观、旅游等各项文娱活动;乒乓球比赛、篮球比赛、象棋比赛、游泳比赛等各项体育活动;福利委员会的优待购货、消费合作社、代办服务以及理发、缝纫、医疗等各项生活福利活动;图书室征书运动、读书交谊会、读书会等各项会务活动,都及时以通讯、特写等方式,具体地、形象地反映了保联"联络感情,交换知识,调剂业余生活,促进保险业之发展"的宗旨。使广大保险业职员认为保联是真正适应职工业余生活需要的组织,也消除了保险业个别上层分子担心保联是与资本家对立的职工会的疑虑。

保险学术的研究和保险知识的交流是保险业中上层人士和职员群众共同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因此,《保联》一开始就结合保险业的特点,进行保险学术的研究与交流。月刊按照文稿的内容,《保联》分别设置了"保险论坛""保险浅说""保险信箱""保险问题研究"等专栏。"保险论坛"主要登载一些论述保险

界重大问题的文章,如《中国保险业之特点及其前途》《中国保险业的近况与将来》《西南经济与中国保险》《自力更生为中国保险业的唯一途径》,以及《再保险》《保险与防险》《推进保险教育刍言》《人寿保险之意义及其种类》《保险业投资之研究》等文章。作者大多数是保险界中上层及对保险学术有研究的著名人士,如中央信托局财产保险处经理项馨吾、华商联合保险公司经理邓东明,以及关可贵、王效文、张仲良、邵竞、魏文达、陆士雄、郑元森、郭雨东等教授、学者和对保险学术有研究的业务骨干。保险业地下党员谢寿天、林震峰、施哲明、赵锦仁(赵帛)等也结合保险业的实际状况,宣传发展民族保险事业的方向和政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占租界后,上海大部分华商保险公司自力更生地组织"久联""大上海"等再保险集团,抵制日商保险公司的控制和垄断。《保联》上发表的这些文章为保险界的行动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保联》还结合保险业务的实际情况,通过"保险座谈""保险浅说""保险信箱"等专栏,通俗地宣传保险知识,解答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深受各保险公司领导和从业人员的欢迎。《保联》每期都刊登"保险界人物志",介绍保险界上层人物、老前辈及对保险业有影响的人士的照片和经历,如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宁绍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胡詠骐,中国保险公司总经理过福云,以及朱如堂、冯佐芝、严福堂、王仁全、吕岳泉、傅其霖、任硕宝、徐可升、丁雪农等人的经历及其对保险界的贡献,在保险界引起很大的兴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此外,为适应爱好文学会员的需要,还辟有"原野"专栏,刊载一些进步的散文、诗歌和苏联作家短篇文艺作品的译文等。

1940年1月,《保联》改为《保险月刊》,成为纯粹的保险学术刊物。它继承《保联》"普及保险知识,发扬保险学理,研究保险问题,报道保险消息,从事保险服务,促进保险事业"的宗旨,改善和充实了内容。除保留原《保联》中深受群众喜爱的"保险论坛""保险问题研究""保险浅说""保险界人物志"等专栏外,还新增设了"专论""防险谈座""保险判例""保险消息""大学保险论文",以及"保险书报介绍""保险参考资料"等栏目,以丰富的材料,精辟的论述,致

力于保险学术的研讨,注重人寿保险的宣传,介绍欧美保险刊物的论文,扩大为读者服务的范围,促进保险事业的发展。

《保险月刊》从第1期至第12期(第11期、第12期两期合并发刊),先后刊载 了保险学术研究和与保险实务有关的文章107篇。除一般的论述和寿险、火险、意 外险等各专业方面的著述外, 还结合保险实务刊载一些保险判例、保险问题、保 险资料等文章,如胡詠骐的《中国保险的近况》、谢寿天译的《意外保险与责任 保险》、郑元森的《经营人寿保险方略》、邓东明的《火险查勘概述》、林绳佑 的《保险事业与抗战建国》、陆士雄的《人寿保险的宣导价值及其方式》、陈稼 轩的《人寿保险与保健工作》、施哲明译的《火灾保险与海上保险》、彭金泉译 的《人寿保险、意外保险与健康保险》等文章,都结合保险业务上的一些实际问 题,介绍各种保险知识,对提高职工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起到一定的作用。在 当时保险业对减少社会财富损失的防损工作还不为人们注意的条件下、刊物就系 统地提出了都市防险、家庭防火、保健等预防灾害及保健的常识,以引起社会上 对保险、防险、保健工作的重视。《保险月刊》还报道了大后方和外国的保险动 态。如那时在重庆、昆明等大后方办理的战时陆地兵险、水上运输兵险、以及有 些国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财产损失的处理意见等。在每期中还连续洗泽 和介绍英国保险学会学位考试的试题汇解,以及当时大学保险专业毕业生的毕业 论文、介绍了一些保险书刊、如《海上保险理论与实务》《火险审估学》《火灾 保险原理与实践》《海上保险法原理》《中国保险年鉴》等,为广大保险业职工 提供了大量的业务参考资料。

1940年11月,《保险月刊》第11期即将付梓时,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保联创建人之一、保联名誉理事兼顾问胡詠骐不幸病逝,噩耗传来,闻者哀伤。为悼念他的逝世,《保险月刊》在第11期、第12期合刊上,特刊出了《胡詠骐先生纪念专辑》共14页,其中有照片4帧、遗墨2件、题词10则、悼文14篇,追述了他生前的业绩,表示了对保险业一位杰出人士的哀悼!

出版《保险月刊》的同时,另行出版了《保联会报》。《保联会报》全面报道



《保联会报》

保联的各种会务活动,并保留了原《保联》的"原野"副刊,登载一些健康、有益的文艺作品。《保联会报》在保联与保险业职工之间起了桥梁作用,沟通了与会员之间的联系,吸引他们到保联参加活动。

后来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经费困难,《保联会报》就改为不定期的会刊,特别是在每届征求会员运动的前后,由《保联会报》事前刊登征求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单,以及各分队领队的名单,并报道各队之间开展竞赛活动的情况,以

资宣传鼓动。

对于《保联》《保险月刊》《保联会报》这样的保险学术性的刊物,是在我党地下组织直接领导下办起来的。它广泛地联系了同业中的中上层人士,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成为红色保险的珍贵文物和保险学术的珍贵资料。

6. 主导保险学术的课堂

保联根据"联络感情,交换知识,调剂业余生活,促进保险业之发展"的宗旨,设立了各个工作部门。其中学术部是深受群众欢迎、十分活跃的部门之一,学术部结合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保险业的实际需要,开展了保联特有的群众性的学术活动。

历届学术部的负责人,均由理事会邀请同业中对保险学术有研究的中上层人士 担任,如顾君长、张仲良、邵竞、赵焕章、杨均猷、过杰庆、唐雄俊等。地下党 员林震峰、赵锦仁(赵帛)、吴越等也曾担任过学术部部长或副部长职务。

学术部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采取各种不同方式举办各种座谈会、讲座、研究 班、学习班以及业余补习学校。通过这些活动,更广泛地团结了保险界上中下各 阶层的群众。

根据保险业的特点,为了帮助会员提高保险业务技术水平,举办了保险技术讲座,英文、会计等学习班。1939年初,首先办了火险实务讲习班,由学术部副部长邵竞亲自主讲,内容是兜揽业务、查勘危险、决定承保、缮拟保单与应用条款、承保限额与同业转(分)保,赔偿请求之解决与赔款之摊派共六讲。结束后,接着举办了寿险实务讲习班,由寿险专家、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卓牟主讲。会

计班由会计师、中国天一保险公司副经理金瑞麒主讲。那时,除上述讲习班固定 在每周三晚上上课外,其他活动也非常活跃,当时在会所每晚都有学术部安排的 活动。

此外,学术部还举办不定期的保险知识讲座、邀请保险界著名人士,如中国保险公司副经理项馨吾等作报告,还举行其他知识讲座、学术座谈会,使会员们有了交流知识的机会,并达到联谊的目的。通过参加刊物研究座谈会和青年知识讲座等活动,一些有志自学的会员结识了更多志同道合者,以集体智慧来探讨和研究许多复杂而又为进步青年迫切需要了解或解决的问题。新文艺座谈会在黄忠达(原名戴行恩,现名肖岱)的指导下,由学员编辑出版了四期油印刊物《艺声》。后来这些学员又集体编辑《保联》的"原野"文艺栏,其中发表的作品大都出自学员的手笔。新文字班学员代表保联参加上海市新文字研究会的竞赛,荣膺全市集体第一名。

1939年4月,在学术部主办的保险实务、国语、英文、速记四个班师生交谊会上,谢寿天同志代表理事会致辞说,"学术部活动是保联最成功的一个部门。"

1939年冬,为了鼓励会员研究保险理论,促进保险事业,学术部特发动了一次"保险论文竞赛"的征文活动,聘请保险界对保险学术有研究的副经理邓东明、金瑞麒、邵竞、郑元森、陆士雄5人组成评判委员会,从应征论文中评选出10名优秀者、优秀论文在《保险月刊》上陆续发表。

同年,为了便利会员补习英文和簿记,并减轻他们的学费负担,学术部筹建了 业余的保联补习学校。

保险界地下党支部回顾前阶段学术部的活动,认为它确实起到了会员之间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以及促进保险业发展的作用,因而加强了学术部的力量。

1940年春,学术部继续不定期地用保险知识讲座的形式举行专题演讲。请永宁保险公司副经理郭雨东讲《保险界康采恩之得失》,请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副经理 王其培讲《经理员成功之要诀》,等等。同时又举办了几期分险别的保险研究讲 习班,如火险技术研究班,共分三讲,历时三个月:第一讲为《火险投保、查勘 及保费计算》,由美亚保险公司查勘部主任金济生主讲;第二讲为《缮写保单、批单及条款应用》,由保裕保险公司火险部主任诸懋益主讲;第三讲为《承保限额与同业(分)保》,由四海保险公司分保部主任李志贤主讲。由于讲课内容注重实务技术,符合实际需要,很受会员欢迎。1940年9月,又举办了水险技术讲习班,由美亚保险公司水险部主任吴道麟、副主任陈良栋主讲;11月,又举办了人寿保险讲习班,由友邦人寿保险公司精算师郑元森主讲。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英、美、法、苏联国籍的侨民商人被关进集中营,这些国籍的保险公司也均停业。日本的保险公司如东京海上火灾、日产火灾海上等保险株式会社相继来沪设立支店,妄图取代英美独霸中国的保险市场。但因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有深仇大恨而不愿与之合作,民族资本的保险公司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设立,多达100余家,并团结起来筹组分保集团,自己解决再保险问题,抵制日商的控制。

党组织及时研究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必须促进华商保险公司的团结,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的民族抗日意识,同时也应该帮助会员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针对新建公司新职工对学习业务技术的需求,学术部于1942年初秋,适时地举办了规模较大的保险学术研究讲座,该班由赵锦仁(赵帛)等负责,聘请具有保险学识和专业技术的人士如诸懋益、李志贤、金济生、陈良栋、林绳佑、骆承绪等人,分别担任火灾保险、承保、查勘、分保、水灾保险、人寿保险和保险会计等课程。

当时,许多新成立的保险公司面对新招收的绝大部分青年职工缺乏保险专业技术的情况,深感这是与日商同业竞争的一个弱点。有些资本家出钱办保险公司,却对保险业务很不熟悉,也缺少各自培养业务技术人员的条件。保联学术部举办的保险学术研究讲座,实际上为中小保险公司分担了培训技术人员的重任,因而博得这些公司的赞扬,它们竞相保送学员来学习。绝大多数学员刚踏进保险公司的大门,急需求得一技之长,所以学员踊跃报名参加。原定第一期名额100人,实际报名超过200人。曾设想分期分批举行,但学员争先恐后,都要求参加第一期,

最后决定,采取甲乙两班制,每周甲班星期一、星期四晚上上课,乙班星期二、星期五晚上上课,以3个月为期同时结业。通过学习,学员普遍提高了业务技术水平。

1946年,学术部部长是唐雄俊,副部长是吴越,干事有陆自诚、华德芳、唐凤喧、韩精武、李家培、陶福生、章启桢等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规定,凡战前曾经政府注册,留在上海的保险公司可以继续营业,在重庆的保险公司也可迁沪营业。对在汪伪政府注册的保险公司一概予以取缔,如需继续经营的,必须重新申请注册,按照财政部规定另缴保证金。因此,抗战胜利后,上海的保险业又出现一次大的变动。有的因经营不善或通货膨胀等原因而停业,有的通过增资改组重新注册登记,有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联合或分别投资组织新保险公司,加上官僚资本及大后方的私营保险公司纷纷东下上海,于是保险公司一时又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英、美、法等外商保险公司也争先恐后卷土重来,企图垄断保险市场。上海的保险公司总数一时发展到近300家,从业人员激增到4000人左右。上海保险业处于畸形发展的虚假繁荣时期。

随着许多新保险公司的建立,一些大公司也进一步扩展业务,增加人员,大批不懂保险业务的人员也涌入保险业。因此,对学习保险知识和技术有迫切的要求。保联党团决定学术部及时组织保险新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保险专业知识。1946年8月,唐雄俊分四课主讲"火险再保险"。接着筹备有系统的保险学术讲习班,招生消息一经传出,反响十分热烈,得到如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中国、中国农业、太平、太平洋、丰盛等大型保险公司,外商如美亚、四海、北美洲等保险公司,以及百余家中小保险公司的赞扬和拥护。参加报名者共200余人。学员中绝大部分是抱着增进业务知识与技术目的来学习的青年职员,也有一部分中层职员,有的是为了进修,有的是为了熟悉同行、增进友谊以及利于解决分保问题而来的。学术部原设想参照1942年的办法,分甲乙两班同时进行,因考虑到讲师的劳逸结合,最后决定还是分期分批举行。第一期学员100人,于1946年10月初开班,由于课程设置齐全,讲课内容丰富,持续8个月之久,直至1947年6月结束,7

月26日举行结业典礼。

讲习班由学术部部长唐雄俊兼班主任,副部长吴越兼副班主任。讲习班的课程和讲师:"火险之意义作用"是由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营业部副经理李志贤讲的;"火险承保"是由新丰保险公司副总经理诸懋益讲的;"火险查勘"是由美亚保险公司查勘部主任金济生主讲的,周士康助讲的;"火险费率规章"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火险部经理沈毓龄讲的;"火险限额与分保"是由中国再保险公司协理唐雄俊讲的;"火险赔款"是由太平保险公司总管理处赔款部主任卢蓉舟讲的;"海上保险"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水险部副经理王澡清讲的;"人寿保险"是由中国人事保险公司副经理林绳佑讲的;"保险会计"是由新丰保险公司襄理兼会计部主任骆承绪讲的。所聘讲师都具有丰富的理论修养和实际经验,其中大多数还有教学经验,是素负盛名的保险专家。

讲习班每周办两次,星期二、星期五晚上五时三十分至七时上课,风雨无阻。 为了巩固正常的教学秩序,一开班就划分学习小组,产生组长和联络员,成立班 会,推选太平洋保险公司火险部科长缪焕华为班会总干事,同时建立点名、请 假、联系制度。为鼓舞学员的学习热情、检查教学成果、增进师生友谊、互相勉 励、共同进步,在讲学期中还举行了两次交谊联欢晚会,大家交流了学习心得, 师生同欢,情绪热烈。

讲习班结束时,规定每人写一篇学习心得或论文,由陶锡凤、陆自诚和华德芳 3人负责命题和评卷,有70多位学员撰写了结业论文,经评阅结果,兆丰保险公司 的韩精武为第一名,太平洋保险公司的缪焕华为第二名,对前十名优秀学员发给 了奖状和奖品,及格者给予结业证书,以资鼓励和纪念。

这次讲习班是在总结过去办班经验的基础上举办的,尽管规模较大,人数多, 学期长,但因课程齐全,内容丰富实用,加上学习制度较正规,师生精神始终饱 满,盛况持久不衰,得到许多保险公司的称赞。

正当此时,中央信托局人寿保险处经理、国民党上海市金融特别党部常委罗北 辰在攫取保联理事长职务,依仗国民党社会局势力,强行将保联改名为上海市保 险界同仁进修会后,控制经济大权,干扰会务的正常活动。

面对我党力量全被排挤出学术部的形势,保联党团决定另起炉灶,在第一期保险学术讲习班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团结部分骨干,把群众学习保险业务技术的热情坚持下去,还进一步设想以第一期结业同学为骨干,在团结中层争取上层的基础上,待条件成熟时另行筹组中国保险学会。党指定仍由吴越负责。当时先发动骨干们筹组了同学会,参加者达70余人,分布在近40家保险公司,同学会成立大会上选出缪焕华、韩精武、唐在洞、李家培、章启桢等7人组成干事会,公推缪焕华为总干事。排除了罗北辰的干扰和阻挠,由同学会自主举办"太立夫TARIFF"(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制定的保险费率规章)研究组、"火险条款研究组"、"水险讲座"和"保险实用英文班",坚持自愿参加、自由结合、定期辅导的原则,依靠群众力量,持久而深入地开展保险学术研究活动,时间长达近两年之久。同学会在活动中,得到不少公司的支持,如太平洋和新丰等保险公司借给活动场所,还获得沈毓龄、诸懋益、关可贵、王滦清等保险专家的热情指导。

保联学术部不仅组织保险专业讲座,同时利用这个阵地,积极开展政治培训。

保险业地下党支部根据党的方针和任务,结合当时形势的需要,利用"孤岛"的特殊性和保联合法团体的有利条件,宣传抗日战争的意义,经常举办政治形势讲座和时事演讲会,邀请知名人士、学者如胡愈之、范长江、梅益、扬帆、王任叔、吴大琨等来会所作国际政治形势和抗日战争前途等问题的报告,开展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斗争,激发保险职工的民族意识,增强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8年,适应当时形势发展和群众的需要,先后举办了由韦悫主讲的"政治经济学讲习班",梅益、王任叔(笔名巴人)、杨帆、黄忠达(肖岱)等进步人士主讲的"新文艺讲座",胡愈之、范长江、吴大琨等专家学者、知名人士作报告的"时事政治讲座"。这些进步人士分析了国际政治形势和抗日战争前途,宣传了革命的社会科学及文艺理论知识,激发了民族意识,增强了坚持抗战的信心,进行了进步思想教育,使听讲的会员受到很大的教育,有的逐步成长为革命的骨

干力量。

保联学术部先后举办了青年知识讲座、政治经济学讲座,还组织时事座谈会、新文艺座谈会、刊物座谈会、政治经济学读书会等活动,适应了当时抗日热情高涨的形势需要,受到保险界青年中要求进步者的欢迎。

1942年前后,在党支部的直接指导下,总结保联初期的经验,组织了非公开的《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读书小组,对党员和进步群众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发挥了一定作用。参加者读书小组的有蔡同华、程振魁、姚乃廉、沈润璋、徐天碧、华世德、吴越、程文魁等10余人,其中的非党群众在后来都参加了党组织。

抗战胜利后,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群众的爱国热情高涨,一度活动比较沉寂的社会群众团体又活跃起来,保联也重振旗鼓,积极开展各项活动。根据形势需要,保联党团决定在广大会员群众中进行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迫害、要求自由的宣传教育,从而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与国民党进行斗争。

学术部举办了20多次演讲会,邀请郭沫若、马寅初、黄炎培、陶行知、沙千里、马叙伦、章乃器、沈钧儒、茅盾、胡子婴、雷洁琼、吴晗、娄立斋、吴承禧等著名民主人士来会作政治时事形势报告,听讲者非常踊跃,一般有二三百人,最多时有四五百人。郭沫若的一次演讲,临时外借会场,座无虚席。这样的时事形势教育,帮助职工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吸引不少人参加了民主运动的活动,有的积极参加了保联会务工作,有的后来被发展为共产党员。

保联学术部通过开展政治、经济、时事、形势报告以及各种知识讲座的宣传教育,在抗战期间,激发了保险业职工的爱国热情,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有的转入大后方,有的进入解放区,奔赴抗日前线。抗战胜利后,保联学术部大力宣传和平民主,提高了保险业职工的政治觉悟,许多人加入了上海市保险界民主促进会,参加了于冉的追悼会、"六·二三"示威大游行以及"二·九""申九"惨案保险界后援会的活动,从而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

历次举办的保险业务或学术讲习班,均得到广大会员职工的欢迎和拥护。讲师

都是保险业知名的业务骨干,他们均热忱合作,放弃业余休息时间,坚持授课。同时,保险公司由于帮助他们的职工熟悉业务技术,解决工作上的实际问题,因而得到许多上层人士的赞扬和鼓励。对保险学术和实务的研究和学习,在团结保险业上中层人士,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通过保险讲座和学术讲习班等方式,先后培训保险业务技术人员共600余人,满足了广大青年职工学习保险技术的迫切需要,适应了各个阶段保险业发展的业务需要,也为新中国保险事业培养储备了一批专业领导干部。上海解放后,许多同学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业务骨干。

7 划破夜空的歌声

仪征古称真州,大运河在这里汇入长江。仪征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滨江古城, 史称"风物淮南第一州"。从两宋到明清,仪征籍科举连登进士及第,状元、榜 眼、探花三鼎齐全,涌现出一大批文化学者,奠定了浓厚的文化基础和淳朴的 民风。

在仪征东圈门街14号,至今保留着一座青砖黛瓦、古朴典雅的宅第,这就是著名的"青溪旧屋刘宅"。刘家是扬州著名的家族,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经嘉庆年间以后,刘家出现了一代又一代著名的经学专家和国学大师,他们筚路蓝缕,爝火传薪,成为扬州历史的佳话。其中,当属刘师培最为著名。

1905年,章太炎、刘师培等创办《国粹学报》,使"国学"之名得以广泛传播。刘师培与陈独秀在安徽组织公学,宣传革命。随后,刘师培夫妇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了《天义报》《衡报》。刘师培曾组织编译《共产党宣言》,被专家公认为最高的译本。当时,在早稻田大学上学的李大钊深受他的影响,最后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及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

1923年1月, 刘葆儒的大女儿刘凤珠出生, 刘师培是她的三叔公。刘凤珠作为

父母的掌上明珠,自然得到了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家庭的抚育,在传统与现代文化背景的交织中,刘凤珠的人生帷幕悄然打开。那时,她父亲刘葆儒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负责编辑鲁迅的《热风》《南腔北调集》等作品。1940年,刘凤珠在著名的江苏省立上海中学高中学校商科专业毕业。受当时在天津中国银行工作的堂叔公刘师颖的影响,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泰山保险公司做财务会计工作。

刘凤珠成长在一个开明的家庭环境中,自小接触了西方的进步思想。她开朗活泼的性格和热情奔放的文艺天赋,使她积极投入到保联的活动中。在话剧组中,她始终努力担当着不同角色的演出。

1945年抗战胜利后,保险界职工举行庆祝大会,保联话剧组上演话剧《宁静的江南》,内容是江南民众艰苦抗日的剧情。徐慧英、程振魁、朱元仁、刘凤珠等参加了演出。演出结束时,全体演员在台上领唱抗日歌曲,所有观众群情激动,起立合唱,歌声持续了20多分钟,久久不肯散去。[12]

这次演出, 给刘凤珠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话剧组是培育上海保险业进步青年的革命熔炉,许多进步青年从话剧的舞台出发,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找到了革命角色的坐标。保联话剧组的骨干先后有吴振年、刘文彪、孙文敏、徐天碧、吴越、廖国英、朱元仁、周础等,刘凤珠是话剧组泰山保险公司分队的成员。

1946年,刘凤珠成为共产党的一员。刘凤珠在保联话剧组中不仅找到了革命组织,而且还找到了自己的心上人朱元仁,并喜结良缘,在共同奋斗中,结出爱情的果实。徐天碧不仅是刘凤珠的入党介绍人,同时也是她的婚姻牵线人。

保联成立不久,为联络感情、交换知识、调剂业余生活,积极开展各项会务活动,委派程振魁同志负责,在娱乐部下筹建话剧组。开始时参加的有十余人,这些青年思想倾向进步,要求抗日。以这部分青年为骨干,保联话剧组很快就活动起来。他们凭着满腔爱国热情,依靠自身力量,积极排练独幕剧、活报剧以及一



1939年,上海抗战歌咏会



1940年,保联话剧组演员合影

些中外名剧。在社会上,以"保联剧团"的名义举行义卖公演,参加联欢慰问演出。话剧组的规模由小变大,逐渐发展成为保联很活跃的一个组织。组员逐步发展到80余人,最多时达100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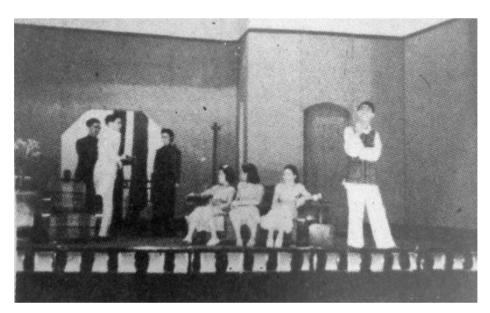
1937年底,上海的租界沦为"孤岛",抗日救亡运动已无法公开进行,但它播下的种子,转变为各种形式,到处发芽生长。当年,活跃在"孤岛"文艺舞台上的进步戏剧运动,就是从抗日救亡的街头宣传活动演变发展过来的,除专业剧团外,许多群众团体都有业余的话剧活动。众多剧团的频繁演出,形成了一股"话剧热"。这股春风很自然地吹到了保险界的青年职员中间。保险业党支部根据当时的形势及会员要求,积极推动保联话剧组的成立。

保联话剧组的第一次公演是在保联庆祝第一届征求会员运动胜利的联欢大会 上。这次大会是在1938年12月25日借宁波同乡会举行的。这是保联成立后第一次 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娱乐部动员全体干事全力以赴,准备了丰富的文娱节目,话 剧组承担的是重头戏。经研究、选择苏联独幕剧《锁着的箱子》作为话剧组呈献 给群众的见面礼。该剧内容是沙俄时代一位贪婪的老农,在警官的威逼利诱下, 为了讨得三个卢布的常钱,不惜出卖为正义而斗争的小舅子,但老农的妻子把她 的表弟藏在锁着的箱子里,帮助他躲过了警官的搜捕。该剧的导演是张方、沈以 定(上海剧艺社的演员)。主要演员有中国天—保险公司的谈峥声(饰特尔的兄 弟, 自私懦弱的老农)、周繁琍(饰威格弟, 热情机智的中年妇女, 特尔的妻 子), 宁绍水火保险公司的吴振年(饰多罗夫, 勇敢而热情的庄稼汉, 威格弟的 表弟)、太平保险公司的程振魁(饰银基尔特,奸猾卑鄙的警官)。他们虽然都 是第一次登台, 但是都酷爱话剧, 热情很高, 从排练到演出, 只用了不到两个星 期。由于大家的奋力合作,演出获得了较好的评价,由于是初出茅庐,他们不可 避免地出了点洋相。这次演出,《保联》辟专栏进行了报道,主要演员还写了体 会文章。话剧组打响了第一炮,在保险业中,特别是在青年职员中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他们中不少人纷纷报名参加话剧组。

1939年2月21日,保联借四川路青年会举办了春节联欢会。这时话剧组的阵



保联话剧组人员合影



保联话剧演出

容已经扩大,拥有会员50余人。在这次联欢会上演出了《春回来了》《二楼上》 《征婚》三个独幕剧。这是话剧组的第二次公演。

第三次公演是在第二届征求会员运动结束后欢迎新会员的大会上,演出的剧目有《一杯牛奶》《忍受》两个独幕剧。《一杯牛奶》的导演是金鑫先生。

《忍受》还参加了上海戏剧交谊社组织的各业余剧团的竞赛。导演是话剧组的沈伟、程振魁和谈峥声。演员为:吴振年(饰士英,一个具有专业技术却遭受失业的痛苦,又受妻亡子夭的打击,在忍受中彷徨的社会青年)、周繁琍(饰伊文,士英的妻子,病后失业,吐血而死),许铨(饰房东太太,一个典型的势利二房东)、张佩芬(饰奶妈,一个在下层挣扎的劳动妇女)。该剧揭露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忍受是没有出路的,要找到光明的前途,必须同旧社会搏斗,扫除一切反动势力。演出后群众反映强烈,认为演得生动深刻,催人泪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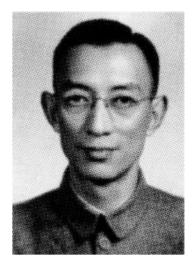
1939年4月27日,保联学术部举办的国语、英文、保险实务和中文速记四个学习班,在本会会所联合举行了师生交谊会。在余兴节目中,话剧组演出了活报剧《精神总动员》和独幕剧《忍受》。

活报剧《精神总动员》的演出是话剧组的一个尝试。从决定排演到演出仅两个小时,而且还临时编了一支《精神总动员》的歌曲。话剧组勇于创新的精神,博得了观众的赞扬。剧中的妥协者这一角色由施哲明扮演,堂倌由谈峥声扮演。这出活报剧虽短,但给观众的印象却很深刻,给了妥协者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频繁的演出活动期间,话剧组还采取多种措施切磋技艺,以提高演出水平。 积极分子吴振年、蔡同华为提高理论基础知识,到中法剧艺学校选科进修。保联 话剧组加入上海戏剧交谊社为团体会员,是为了参加观摩演出,学习兄弟剧团的 经验,争取更多的机会。保联、银联、华联、益友社、永安五个群众团体的话剧 组还联合举办了导演集训班,于1939年3月18日在保联会所开班,自力更生培养导 演人才。此后,除对外公演的大型演出任务外,一般都不再靠外边的导演了。程 振魁、徐天碧、洪汶等人士先后担任过导演。此外,还分别在银联和华联联合举 办化装训练班和演技班。 1939年7月,上海地下党发动组织上海市业余话剧界举行慈善公演,参加演出的有保联、银联、华联、益友社及职业妇女俱乐部等11个单位。金瑞麒、关可贵、谢寿天等15人组成保联义卖公演委员会,负责剧务、演出、义卖等事宜,金瑞麒还亲自扮演角色,上台演出。

金瑞麒,1911年生于上海嘉定。天一保险公司是他保险职业生涯的启程之处。1951年10月,任人保旗下太平保险公司副总经理。

公演演出地点在八仙桥黄金大戏院(现在的 大众剧场)。戏票由各社团分摊推销,保联话 剧组演出由沈宥(阿英)创作、上海剧艺社鲁



金瑞麒

思导演的三幕剧《群驾乱飞》(演出时改为《日出之前》。这次联合慈善公演,是"孤岛"上的一次大规模戏剧活动。仅保联售票所得就有1400多元。公演筹备委员会副主席胡詠骐通过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刘少文,将演出收入转交给了新四军。

根据程振魁在《活跃在抗战时期的保联话剧组》一文中介绍:

话剧组自1938年成立到抗日战争胜利,在漫长的艰苦环境中,始终在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把话剧这门综合性的艺术,作为教育群众,团结群众的武器。通过它的活动,宣传抗日救国,揭露社会黑暗,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密切联系一批保险界的青年职员。[13]

1939年秋,话剧组全体同志到胶州路集中营,向坚守四行仓库英勇抗日的"八百勇士"慰问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这对于话剧组演出的同志也是一次很好的教育。以后,又陆续在卡尔登剧院(现长江剧场),演出了根据法国莫里哀名

著《吝啬鬼》改编的《生财有道》三幕剧。另外还演出了《沉渊》《湖上的悲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话剧。话剧组先后单独或联合演出近40次。通过演出活动, 宣传抗日救国,团结教育了保险业广大职工群众,培养了很多积极分子。

保联的歌咏活动,参加的青年职员很多,由施哲明主持。主要骨干有蔡同华、翁逸平(翁子樵)、周繁琍(周础)等,聘请作曲家陈歌辛每周来会指导练唱,他们慷慨激昂地高唱《祖国进行曲》《船夫曲》《义勇军进行曲》《流亡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如一首歌曲的歌词: "渡过寒冷的冬天,春天就会到人间,不要为枯树失望,春花就会开……"激发了人们的革命斗志和抗战胜利的信心。

平剧(即现在的京剧)组是深受中年职工和中上层人员喜爱的娱乐活动,先后曾由上中层人士李言苓、胡树白、过杰庆、邱菊夫、谈峻声等人主持。平时聘请教师教唱,每晚有20余人参加学戏吊嗓,公开演出时则有更多爱好平剧的职工参加演出或观看,每次粉墨登场,观众一般都有五六百人。通过平剧组的活动,团结了一批中上层人士,有利于统战工作的开展。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当消息传来时保联会员和上海人民一样,欢欣鼓舞,庆祝胜利。保险业地下党也及时地发动和组织保险业的职工开展庆祝活动。当时曾组织了一次有1000余人参加的庆祝胜利大会,在白俄罗斯剧场召开。保联话剧组演出了两幕剧《宁静的江南》,内容是在一个宁静的江南乡村,被日军侵略烧杀,人民起来反抗,打倒日本鬼子。演出结束时,演员们在台上领唱革命歌曲,台上台下,歌声交融,汇成一体,持续达20多分钟之久,情况极为热烈,充分反映了保险业职工群众在抗战取得伟大胜利后高涨的政治热情。

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的话剧组是在保险界青年中影响很深也很广泛的一个组织,它的活动经历了大部分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保险业党支部通过这个组织与保险界的青年职员,特别是一部分要求进步、要求抗日的青年,取得了广泛的联系,培养了不少积极分子。因此,这个组织在上海保险业地下党的活动中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8. "罢工是地下党的培训学校"

1945年,国共合作面临破裂,内战爆发在即。国民党上海政府执政涣散,通货膨胀更加严重,物价飞涨,上海各行业职工的经济斗争此起彼伏。太平保险公司普通职工的工资指数下降,悬殊加大,生活困难加剧。

在太平保险公司的共产党地下组织非常坚固,并设有支部。地下党根据上级指示,分析了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及群众的情绪和要求,认为在太平保险公司发动经济斗争的条件已经具备,决定从维护职工经济利益出发,发动一次以改善工资待遇为目标的罢工运动,并达到树立共产党的威信、教育团结广大群众的效果。这次罢工准备得非常充分:

当时,在太平公司工作的上海保险业地下党支部委员程振魁召集太平公司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秘密商议。参加秘密商议的人先后有廖国英、朱元仁、姚乃廉(姚洁忱)、金家铨、杜伯儒、董仁民等。李锵作为党的积极分子全程参与了斗争策略的制定和战前动员,李锵任纠察队长。[14]

程振魁(程子范),1917年出生于上海;1936年在安平保险公司任职,后到



李锵

太平保险公司任职; 1939年, 加入共产党; 1946年, 罢工结束后, 到民安保险公司工作; 1947年, 到汉口建业银行工作; 1949年, 随刘晓北上, 后在纺织、统战部门工作。夫人陈瑛。

李锵,1924年10月出生于苏州悬桥;1942年,经王伯衡介绍,在太平保险公司谋得一职;1950年,经朱元仁举荐,冼派到北京人保总部。

1946年2月,太平保险公司各单位代表40余人召开了准备会议,对罢工斗争进行部署。第二天,在公司食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250余人到会。会议通过了三项要求:一是工资计算基础从

按生活指数的50%提高到70%;二是一律发年奖三个月;三是传递生即行提升为职员。会上还推举程振魁、金家铨、张少渔为交涉代表,罢工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纠察等小组。

太平保险公司总经理丁雪农面对罢工,非常懊恼,蛮横地拒绝了罢工要求。罢工职工集中在食堂,看守大门。封闭电话室,动员安平保险公司职工一致行动,以壮大声势。

太平保险公司资方代表丁雪农、李祖模不得不出面谈判,并派社会局处长顾炳元出面调解,还让太平保险公司的职工陈瑛劝说丈夫程振魁,不要领导罢工。但罢工持续了三天,声势浩大。

资方最终答复:第一条要求缓期考虑;第二条要求立即实现发放;第三条要求原则同意,但需经过考试。斗争取得了基本胜利。罢工委员会顺势成立了太平同仁联谊会,朱元仁、金家铨等13人为太平同仁联谊会理事,廖国英为联谊会理事主席。

但此后太平保险公司资方反守为攻,采取报复措施,宣布对李锵、姚乃廉、严 秉中等罢工骨干进行工作调动,将他们调往太平保险公司汉口分公司。 1946年3月,经济斗争胜利后,太平保险公司火线发展姚洁忱、金家铨为新党员。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上海保险业支部的支部书记林震峰亲自到姚洁忱的家里,与其进行了人党谈话。

1946年5月,太平保险公司从外单位转入廖国英、杜伯儒两位党员,此时共有8名地下党员,党员得到了锻炼,共产党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不久,太平保险公司成立了地下党支部,书记由程振魁兼任,保险业党支部的上级联系人仍为杨世仪。

1948年端午节期间,太平保险公司因为停发奖金的问题,再次引起职工反对。 朱元仁、金家铨、李锵等代表向丁雪农表达诉求。丁雪农以公司面临财政困难为 由,拒绝职工的合理要求。职工以怠工形式展开罢工。地下党从政治军事的大局 出发,认为斗争目标是打垮国民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还要以团结为主。当然, 也考虑了大家遇到的实际困难。此次罢工适可而止,主动收兵了。

1948年秋,共产党相继解放济南、连云港等地,解放军大举南下,上海四面楚歌。太平保险公司的资方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采取观望态度,脚踩两只船,见机行事。他们一方面欲把资金转到香港,另一方面宣布解散公司。太平保险公司的地下党积极组织职工斗争,安稳态势,恢复保险市场,迎接共产党接管。

9. "十三太保"

1938年冬,日军进入广州,广州失守,武汉吃紧。当时我国工商业大半集中在长江及沿海一带,为避免毁于战火,重庆国民政府号召工矿企业内迁。但一部分工商界人士担心内迁后,厂房机器设备和储存物资会随时遭到日军敌机轰炸的危险,因而徘徊观望,不肯内迁。

1939年夏,国民政府考虑内迁工厂物资运输的安全与实际困难,拨付中央信托局资金1000万元(旧法币,约合黄金3万两),办理陆地兵险,内地工矿企业于是纷纷响应内迁。

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在香港、上海分设了两个办事处。保险部经理项馨吾由昆明潜伏上海,会见了上海办事处主任姚达人等。通过上海保险同业公会秘书关可贵在《保联》刊物上发布了一条招聘保险人才的广告,传播面很广,半月内报名的达到百余人。项馨吾用了两个星期,分别进行了面试,择优录取了13人,组成一支办理陆地兵险的骨干队伍。这支队伍后来被保险界称为"十三太保"。[14]

"十三太保"源于唐末典故。

文13位保险同仁分别是:

林震峰,中国保险公司职员,地下党员,后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

程恩树, 宁绍保险公司职员, 地下党员, 后任中国外经贸部第一局局长。

张仲良, 美亚保险公司职员, 后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东区公司副经理。

包玉刚,中央信托局保险部职员,后任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号称"世界船王"。

唐雄俊,中国保险公司职员,后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

沈雍康,四明保险公司职员,后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理赔部负责人。

茅子嘉,华商联合保险公司职员,后任大信保险公司总经理。

徐曾渭,中国保险公司职员,后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东区公司业务科 科长。

周志斌, 英商保险公司职员, 后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职员。

胡肇忠, 四海保险公司职员, 后到西安工作。

沈尔元、中国保险公司职员、后到香港从事贸易工作。

童肇麟, 四明保险公司职员, 后到中国机械讲出口公司工作。

赵镇圭,美商慎昌保险职员,后到上海冶金局外事办公室工作。

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林震峰用"一切为了祖国"的口号感召着大家,陆 地兵险小组成为一个坚强的团体,为抗日战争胜利争取更多的资源。

1939年10月,为躲避日寇制造恐怖事件,保存党的实力,程恩树、林震峰按照上海地下党的领导部署,通过办理陆地兵险者的身份掩护,撤退转移到后方昆明、重庆。

根据保险历史专家王珏麟的介绍,在当时内地大片领土被日军占领的情况下,"十三太保"奔赴云南,尝尽了千辛万苦。姚达人、赵镇圭曾回忆:

10月17日,他们一行搭乘当时唯一通向海外的怡和轮船公司的"裕生轮",经中国香港、越南转辗由滇越铁路到达昆明。第二年(1940年)随总部迁重庆。[15]



"十三太保"合影



"十三太保"在昆明合影

他们跋山涉水,奔赴大后方开展救亡运动。尽管大后方物资匮乏,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这13位保险同仁以大局为重,积极开展兵险业务。

从林震峰遗留的许多照片中,可以看见 当年"十三太保"在香港、河内、昆明、重 庆等地的活动情景。随着陆地兵险结束,人 员也随之分散各地。这项爱国主义行动, 在我国保险业发展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

林震峰在西南边陲纵横跋涉期间,积极 开展地下工作,在队伍中发展进步人员。其 间,林震峰与包玉刚结下了深厚友谊,为包 玉刚成为红色资本家打下了基础。



姚达人

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期间,林震峰在红岩村见到了周恩来,并提出奔赴延安的诉求。周恩来告诉他,上海地下党遭到国民党清洗,人员紧张,以他的社会关系和家境条件,更适于在上海。周恩来为林震峰提供了部分费用,加上林震峰卖掉西装的钱,凑够了路费,他从重庆飞到香港,又从香港乘船回到了上海。

对于林震峰的地下党身份,他的夫人一直都不知道,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林震峰穿着军装回来,公开了身份,他的夫人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干大事的人。

1941年秋,江姐(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奉中共川东特委之命到达重庆,任重庆市委委员,负责领导重庆沙磁区、新市区一带的工作。为了顺利开展工作,彭咏梧以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职员的身份为掩护,1943年又与江竹筠扮为夫妻(1945年经中共党组织批准二人正式结为夫妻),时常西装革履出入于各种社交场合,团结了一大批中央信托局、工商界的进步人士,并向他们揭露官僚资本主



高功福

义侵吞民族资本、破坏民族工商业的事实,教育 广大工商业者团结一致,反对"四大家族",共 同抗日。中国人保上海分公司的陈希贤曾与彭咏 梧一同工作。

中国人保早期统计科科长高功福是四川地区 地下党员。1938年,高功福在成都参加"星芒 社"工作。"星芒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 1937年9月在成都成立的一个比较大的抗日救亡 团体。1939年,高功福在泸县因参加抗日救亡运 动的组织工作,被川康殖业银行开除。高功福由 颜国瑾介绍,在泸县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39 年,高功福在泸县兵工署二十三厂成品库担任雇

员。后来,到重庆的四川桐油贸易公司会计组工作,随后在重庆华西建设公司会 计科任科长。其间,高功福在地下党支部先后担任宣传、组织委员及支部书记等 工作。

1941年,高功福在济康银行重庆分行储蓄部任主任。1942年,高功福离开重庆,在济康银行雅安总部、西昌分行任职。因与异地组织关系没有接应上,高功福暂时与党失去了联系,但他始终保持对党的忠诚,时刻期待党的召唤。

1949年, 高功福参加共产党接收工作, 后在人保西南区任职。

10. 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从外白渡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 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 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藤似的绿焰: Light, Heat, Power(光、热、能源)!"

20世纪30年代,上海这个堆金积银的冒险家乐园的形象,在茅盾小说《子 夜》的开篇跃然纸上。各种金融交易所林立,呈现出普罗大众一心追求金钱利益的超常热情。

但是,在显达尊贵的保险界,有一批地下党人,他们坚定地执行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为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白色恐怖中,开辟了第二条战线。

张承宗,原籍浙江宁波北仑,20世纪20年代至沪求学,后在上海辛泰银行当职员;1937年8月,张承宗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辛泰银行建立了上海第一个银行党支部;1938年,张承宗负责组建金融业党委,并任第一任书记;1947年9月,他出任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市副市长。

1937年11月、上海金融业地下党总支书记张承宗先后发展宁绍水火保险公司



1979年,习仲勋(右)与荣毅仁(中)和张承宗 (左)亲切交谈

的程恩树、中国保险公司的林 震峰两人入党,他们成为上海 保险业最早加入共产党的人。

程恩树,上海高桥人,早年在鸿兴金号当学徒,1930年,到宁绍水火保险公司任职员;1936年,加入上海职业救国会;1939年,在重庆中央信托局保险部任职,开展地下工作;1943年,任民安保险公司业务处副处长;1949年后,在

外贸部门工作。

林震峰(吴善德),祖籍浙江慈溪。1918年,林震峰出生在上海,父亲为上海印书局老板。林震峰17岁到中国保险公司做实习生。他被同母异父的哥哥建议改为林姓,但也有人说他的改姓与隐蔽身份有关。林震峰积极参加公司内的读书会及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积极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很快成为党的发展对象。1936年,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成立,林震峰任第一届监事。1949年后,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他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创始人之一。

1938年5月,张承宗通知程恩树、林震峰,在保险业组建党支部,程恩树任书记,林震峰任宣传委员。从此拉开了中国共产党对保险业领导的序幕。

1939年10月,程恩树、林震峰前往昆明,在中央信托局保险科任职。美亚保险公司的施哲明担任保险业党支部书记,英商保险公司的张先成、太平保险公司的陈瑛任支委。

施哲明,1914年10月出生于上海,家境贫寒;1930年,在上海美亚保险公司任职员;1934年,投身革命,从事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活动;1936年1月,在抗日救亡的浪潮中,上海成立各界救国联合会,施哲明、杨经才、杨延修等作为外

商保险公司的进步职工代表,与来自华商保险公司的胡詠骐、谢寿天、程恩树、郭雨东、林震峰等进入救国会,成为上海保险业早期从事革命的骨干;1938年9月,施哲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后,施哲明先后担任华东区公司监理科科长,中国保险公司副总经理。

陈瑛,浙江宁波人,1934年,上海天一保险公司职员;1938年,参加保险业业余联谊会,从事妇女部工作,带领妇女编织毛衣支援新四军;1939年,加入共产党;1948年,随刘晓北上;1949年后,在纺织系统任职。

1942年12月,施哲明因病调离休养,由昆明回沪的林震峰接任保险业党支部 书记。其后,施哲明、赵锦仁等地下党员转移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

1946年6月、太平保险公司的廖国英担任保联党团书记。

廖国英,早年在丰盛保险公司任职;1946年3月,加入共产党,介绍人为章丽华;1947年,任太平保险公司党支部书记;1949年后,任中国保险公司财务主任;后任人保山东分公司顾问。

1947年5月, 民安产物保险公司的沈润璋担任保联党团书记。

沈润璋(沈光荣),上海松江人,1944年12月加入共产党;后在民安保险公司工作;1949年1月,撤退到华中党校;1949年后,在人民银行任职;1987年,任交通银行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1947年5月,新丰保险公司的吴越担任保险业党支部书记。

吴越,原名吴光远,江苏武进人,1939年进入太平保险公司工作;1943年,独自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1946年,在新丰保险公司工作;1946年5月,加入共产党,任保联学术部副部长;1949年后,任中国人保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

还有两位上海其他行业的地下党党员,后来也成为人保公司的创建者。顾濂溪,中央信托局保险处领组;后在上海信托局任党支部书记;1949年后任人保上海分公司经理。张蓬,1937年加入共产党,上海益友会党支部书记;1956年,任人保总公司总经理。

这些战斗在保险业的地下党们,他们有的平日里穿着长袍马褂,在上海车水





林震峰

程恩树





 马龙的街市中穿行,俨然一副账房先生的模样;有的是西装革履的职员,叫着黄包车,出入洋楼。他们一般是在咖啡馆,或在"星二聚餐会""星五聚餐会"中联络同志,在家里秘密开会、印制材料。

吴越介绍,那时他与谢寿天、蔡同华、孙文敏在一起碰面,对暗号、传递情报、部署任务。为掩人耳目,他们一般在南京东路的永安公司的七重天舞厅喝茶跳舞,时间也是选择不被人注意的下午5时至7时。他们在"靡靡之音"与细碎舞步的陪伴下,传递着红色的火种。在热闹的夜场来临前,及时把自己的身影掩藏进黄昏的里弄中。

在他们隐藏身份的背后,是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铮铮铁骨,时刻都有为共产党捐躯的危险。他们每天都在出演着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有声有色的戏剧。 其实,那些真实的故事一点不比《潜伏》《风声》逊色。

这就是《潜伏》的台词:

穆晚秋: 听到有人在哭泣, 然而我并不悲伤。抬起疼痛的头来, 我看到深夜的天光。

金则成·新体诗。我不大懂。深夜怎么会有天光呢?

穆晚秋:因为心底有人,所以暗中有光。[16]

上海保险界地下党创始人之一的谢寿天,自小生活在清贫的家境中,勤于读书,烛火产生的黑硝,比那浓浓的黑夜还要深厚。1926年,谢寿天自诚意商业学校毕业后来到上海;1931年,进入民信银行当练习生;1935年,沪江大学商学院夜校部毕业,进入上海天一保险公司担任会计科科长,成为筹建保联的骨干力量。

谢寿天的夫人蒋学杰,曾用名蒋浚瑜。她出身于上海资本家的家庭,父亲蒋惠先是一家银行的高级经理,家境富裕。蒋学杰在上海启秀女中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在大学期间,蒋学杰就参加了苏联红军远东情报站工作。







廖国英

沈润璋

吴越







顾濂溪

张蓬

谢寿天

大学毕业后,蒋学杰进入大安保险公司工作。蒋学杰利用家庭作掩护,并无私地将住房腾出来,为从延安、苏北来的共产党人留宿过夜,她还用父亲的汽车,秘密接送他们。那时寄给共产党人黄维祐的信件都是投入她家的信箱里,收信人的名字写的是蒋渊若(蒋学杰的另一个名字)。年仅23岁的蒋学杰,像个阔

小姐,利用父亲的地位,周旋于上海各大饭店,出入上层社会,自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由于叛徒陆海防的告密,蒋学杰最终成为特务追捕的对象。

1935年,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出了一桩轰动一时的奇案——怪西人案。 《申报》1935年8月24日报道:

上海怪西人,又称神秘西人之约瑟夫·华尔顿,前因勾结刘燧元、萧柄实、陆海防等组织机关,刺探中国关于政治上及军事上之秘密,报告第三国际案发,经淞沪警备司令部于本年五月五日派探将陆海防捕获,继由陆自首指供,先后捕获该西人等,分别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起诉,开庭审判。[17]

这个西人约瑟夫·华尔顿被捕后,一言不发,始终以沉默来应付一切审讯。 国民党军警特务一筹莫展,虽绞尽脑汁,也未能查清其身份,只好称之为"怪西人",聊以自嘲。约瑟夫·华尔顿,真名叫罗伦斯,出生在苏联立陶宛,早年投身布尔什维克革命,担任过红军上校。他为人机敏,仪表堂堂,会讲德、俄、英、法四国语言,颇有一副西方绅士的派头。1933年,受苏联红军情报部派遣,罗伦斯来到中国,接替他的前任、"红色间谍"左尔格的工作。当时,正值国民党军队集中全力"围剿"苏区红军。苏联红军情报部在华工作的重点是搜集有关情报,以协助中国工农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罗伦斯经过一番努力,打开了情报工作的新局面。但由于陆海防的叛变,除罗伦斯外,国民党当局还陆续逮捕了苏联红军情报部人员陈绍韩、黄维祐、汪默清、胡克林、俞瑞允等人。

共产党对此极为关注,急派"左联"盟员关奚如等请鲁迅先生通过内山完造 和其他日本友人了解案情。

蒋学杰被捕,关进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牢房,娇嫩的她看见各式刑具,听到各种惨叫,但始终保持坚定镇静,一口咬定黄维祐只是其大学同学,其他一切均不知晓。最终法庭以蒋学杰"年幼无知,受共党利用,无罪释放,责家长严加管教"结案。



谢寿天与夫人蒋学杰合影

20世纪80年代初,外贸部为平反 蒋学杰的"叛徒"案,发现当时她投 递的是苏联红军总参三部截获破译的 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计划,而 接收情报的人是邓颖超。为此,邓颖 超特意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蒋学杰。

1949年,蒋学杰与谢寿天一同参 与了中国人保华东区公司的建立。

根据《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一书中介绍:施哲明有个妹妹叫施月珍,在大安保险公司任职员。她是保联积极分子,经常参加歌咏组和话剧组活动。施月珍同样早就参加革命,是中共华东联络部的地下党员。

施月珍的上线是张莲舫,施月珍 经常向其汇报保联工作。张莲舫后来 叛变投敌,这不仅破坏了华东联络部 党组织,而且国民党中统局上海办事

处也掌握了保联的活动和骨干情况, 时局非常严峻。

1947年3月6日晚,施月珍被特务抓去。但施月珍在次日傍晚即被放了出来, 敌人是想利用她放长线钓大鱼。

上海保险业党支部派蔡同华向她了解情况,施月珍诉说了被捕经过和特务机 关要挟她监视保联的活动,还有特务多次上门催要情报的情况。上海党支部认识 到情况危急,决定让施月珍以患肺病为由,不到保联参加活动,暂时对付特务, 随后决定让施月珍离开上海,到宁波蔡同华的家乡暂避,再转至解放区。

但就在这时, 施哲明从苏皖解放区来上海办理货物, 顺道探亲, 他并不知道

妹妹已被特务盯上,施哲明的行踪不慎被发现。在回苏区的船上,施哲明被军统特务系统水上警察逮捕,后侥幸过关,被释放。

而施哲明这次被捕的经历,在"文革"期间,成为造反派批斗他的把柄,受 尽摧残。

1946年6月23日,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面对国民党特务的白色恐怖,郭雨东不顾个人安危,掩护受伤的阎宝航(阎明复之父)、陈震中两位民主战士在自己家中隐蔽疗伤。在他们伤愈后,谢寿天、郭雨东又设法分别护送他们转道香港前往解放区,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据郭雨东的儿子郭瑞讲,那时郭雨东住在上海虹桥附近的一栋日本别墅内,门口经常有国民党特务蹲点,情况十分紧张。有一次,赶上一个郭雨东的东北老乡当班,因为争执,那老乡掏出手枪说:姓郭的!我知道你是共产党,你给我老实点。情况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郭雨东曾跟他讲,那时特务经常会从上到下搜身,他一般把情报都贴在手臂下方,搜身时举手,以防特务发现。还有一个暗号,有时假装叫外卖面条,如果地下党人把一根面条头露在外面,就是情况不妙,是赶紧走人的暗号。

1948年11月21日,国民党党通局在太平保险公司门外,秘密逮捕了下班的廖国英及保联骨干洪汶、体育部的赵伟民3人。情况复杂危急,党支部书记林震峰先是按兵不动,稳住战局;紧接着以到香港做买卖为名,转移已暴露的程振魁到香港学习,将近期比较活跃也可能已引起敌人注意的徐天碧、蔡同华等地下党员撤退到江苏、浙江等地,指定吴越留守,全面负责领导保险业地下党组织。

3天后的24日,吴越在新丰保险公司办公室,忽听见门口传话有人找,吴越内心喜悦,以为是急切盼望的上级党组织来接关系了。他走到办公室门口,来人很斯文地出示了一张便笺,上面写着:"越兄:兹有要事,请随来人即至沙利文(咖啡馆)一叙,弟洪汶启。"吴越一看,破绽很多,怀疑自己已暴露。吴越正想脱身的办法,来人马上用插在大衣口袋里的手枪顶住他,吴越被架上一辆军用卡车,直奔党通局魔窟。

吴越等人先被关在亚尔培路2号党通局上海办事处,后转到蓬莱路警察局内 党通局看守所。在狱中,吴越历尽折磨,但他坚持斗争,始终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没有涉及任何同志,没有影响地下党组织。

1949年1月,国共和谈,在释放政治犯的舆论呼声压力下,经地下党的营救,并付出20万元金圆券后,吴越等4人终于被保释出狱。

据吴越介绍,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保存着一份档案,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此事的经过。国民党党通局局长叶秀峰于1949年1月11日,为破获中共上海保险地下党案给蒋介石的报告节选如下:

为呈报破获上海市共匪保联支部洪汶一案经过,恭请鉴核案由。据本局上海办事处报称:经查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范围颇大,有会员2000名以上,实足证明该会确有共党活动,经派员打入侦查,探悉共匪在该会设有保险支部,成立迄今约有8年之久,所发展之党员计有民安公司会计主任洪汶、新丰保险公司职员吴越等4人,旋经派员跟踪守候于上年11月21日至25日先后将该4犯捕获,据讯廖国英,赵伟民供认参加共党组织,洪汶自认系"非党干部",吴越仍未承认有共党关系,然就各犯口供研究,似有互不相供之嫌等情,除指伤继续询问保联支部全貌,追究上层关系……[18]

1948年11月,为了保存力量,上海地下党组织保险业人员分3批撤退到解放区,等待解放军横渡长江。其中,第一批为沈润璋、王伟、王培荣;第二批为刘凤珠(化名刘敏芬)、朱元仁(化名朱国文)、汤铭志、姚乃廉(姚洁忱);第三批为徐达(徐慧英)。

刘凤珠,1923年1月出生在著名的经学世家,后在泰山保险公司做财务工作;1946年,在保联加入共产党;1949年后,任人保太平保险公司办公室主任。

朱元仁,1922年10月出生在扬州一小业主家庭,在堂叔朱懋仁的介绍下,来







刘凤珠

朱元仁

姚洁忱

到太平保险公司工作;1945年,在保联加入共产党;1949年后,在中国人保国外业务部工作。

姚洁忱(姚乃廉),1921年11月出生于浙江湖州市南浔;1940年,姚洁忱考入上海沪江大学夜校,同时进入丰盛保险公司工作;1945年,在太平保险公司工作;1946年3月,经程振魁介绍加入共产党;1949年9月,参加为组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而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

据刘凤珠回忆, 当时撤退的情景真是惊心动魄:

在将近11月底的一天晚上,我们四人化装成回乡探亲的生意人,随身带着一些糕点杂货,从北站乘火车动身。临行前金家铨代表组织上关切地叮嘱我们:路上要听从交通员同志的指挥,遇有情况时,要沉着应付。也由他出面交涉。可是,当我们4人已上车待发的时刻,突然看到交通员在车窗下向我们招手,示意赶紧下车。我们不知所以,慌忙走下火车,随着人群走出站台,交通员机警地迎着我们,在擦肩而过时,轻声说了一句:"回原地等候。"[19]

原来,计划撤退的路线因战斗情况已不能使用,要另选新的安全路线。他们 全都住在亲戚的家里,每天焦急地等待组织的信息。

姚洁忱住到了他的舅舅沈兆福家里。沈兆福是粮油店的店员,收入较低。他 在打浦桥棚户区找了一处房子居住。上海人所说的棚户区就是贫民区,居住条件 极差,人口密集。舅妈为了保护外甥,常常把姚洁忱反锁在家里。她自己在邻居 家打麻将,实际为外甥望风。

姚洁忱因身份并没有暴露,最终被留在上海。他与林震峰一起被调入共产党 上海局策反小组,做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的工作。

直到1948年12月下旬,其余人再次搭上开往镇江的夜车,换上渡轮,在瓜州上岸。

瓜州是通向苏皖解放区边界的门户,当地交通员指示他们在一家小饭铺进餐休息,关照他们见到有肩扛着红花棉被的人从饭铺门前经过时,要立即跟上,但不要搭讪,只管继续赶路。刘凤珠描述:

快到中午时分,果然有个肩扛着红花棉被的农民模样的人,从饭舖门前一晃而过。我们3人相互使了个眼色,激动而紧张地提起行李,就迈步跟着他上路。事后才知道,这个肩扛红花棉被的人,就是解放区派来接我们的交通员同志。我们跟着他跋山涉水,埋头赶路,由于我们在上海从未走过这么多路,这么难走的乡间小道,越走身上的包裹越沉,腿酸脚痛,欲歇不能,一路上出了不少洋相。

经过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到了仪征的一个共产党的交通站。当时,他们十分 兴奋,不仅因为这里是刘凤珠、朱元仁的家乡,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了找到组织的 归属感。

1948年12月,经林震峰联系,姚洁忱化名姚骏,潜入地处虹口的淞沪警备旅,实施策反工作。他在部队里的军衔为上士,但他只是在部队当伙夫。对于一

个保险公司的职员,在家中又很少下厨房的姚洁忱来说,要扮演好这个角色有一定的难度。但他居然还和其他伙夫一样,把自己吃胖了,看来他对这个角色很投入。

1949年3月,张承宗的弟弟,地下电台报务员张困斋被捕就义。刘长胜、张承宗、沙文汉留守上海,他们住在共产党内线的国民党将领家中,准备接应解放军。

不忘来時路 BUWANG LAISHILU

第三章

一条来自北方的红色血脉

1.参加万里长征

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撤离长江南北各苏区,转战两年,到达陕甘苏区。 此次战略转移被称为"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被称为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是一部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史诗。习近平说:"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

现在,参加过长征的人,全国所剩无几。"老红军"这一空前绝后的光荣称 谓,更是一种无法比拟的赞美。

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早期创业者中,有三位是从长征中走出来的,他们分别是总务科科长胡良英、东北区公司经理罗高元、门卫王某。

黄安是湖北省红安县的旧称,位于鄂东北大别山南麓。这里是黄麻起义的策源 地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摇篮,与井冈山、延安并称为中国革命圣地。鄂东军、 红一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五支革命军队都是在这里成立或 改编的。这里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任共和国主席,走出了韩先楚、陈锡联、 秦基伟等223位将军。因此,1952年这里正式更名为红安县,又称将军县。

1902年6月,胡良英出生在黄安一个贫苦的农民之家。胡良英兄弟三人因贫穷,一直都没有上学。革命者在地主家大门上写下鼓舞革命的宣传标语: "穷莫



胡良英



罗高元

忧愁富莫夸,哪有常穷久富家。土豪把我穷人压,不劳而获得荣华。只要农民团结紧,千年铁树也开花。"这使闭塞的山村燃起了暴动的星星之火,也激起了胡良英兄弟们的反抗斗志,他们参加了农民自卫军。

1927年11月,徐其虚、廖荣坤等共产党 人率领黄安、麻城的农民自卫军和上万名群 众参加黄麻起义,起义军攻克了黄安城。胡 良英参加起义后,随之参加了工农红军。

1931年11月,以鄂豫皖苏区部队为主力组成的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立,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政治部主任刘士奇,总兵力共4.5万人,胡良英成为其中一员。

1932年7月,国民党以30万人的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起围剿,这是第四次围剿战争的一部分。迫于国民党军的强大压力,红四方面军决定放弃鄂豫皖苏区,转战西进,在陕西和四川边界创建川陕苏区。

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击败川军的三路 围攻,力量迅速发展。胡良英在这一年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排长。胡良英在坝 圣灯山的战斗中冲锋在前,身负重伤。

1935年3月28日, 红四方面军发起渡江战役。胡良英在嘉陵江战役中英勇善战, 再次负伤。嘉陵江战役胜利后, 红四方面军放弃

川陕苏区,夺取茂县、理番县、松潘等地,开始长征。胡良英随部队日夜兼程, 踏上人生不平凡的征途。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一部在四川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两河口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统一领导指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张国焘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任军委委员,胡良英任连指导员。

张国焘率左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到达阿坝后,拒绝继续北上,南下再过草地,希望能在西康创建根据地,但屡遭挫折,部队损失严重。胡良英付出了几过草地的辛劳。

过了黄河的西路军被号称"西北五马"的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马仲英军阀打败,散落在河西一带。由于众寡悬殊,胡良英不幸被俘,历经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侥幸逃出魔爪,追上大部队。许多被俘的战友,最终被"西北五马"军阀活埋,场面惨烈。

罗高元与胡良英一样,有着几过草地的经历。

1914年9月,罗高元出生在四川达州宣汉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在初小结业后, 毅然离开家乡,参加了地方武装。

1929年4月,共产党将一些松散的地方武装组织起来,组成川东游击军,成为 红四方面军的一支队伍。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12月过大巴山入川北,1933年1月, 占领通江,建立川陕根据地。

1933年,罗高元告别家人,加入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的长征队伍,同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岁的他比当时的"红小鬼"大不了多少,但他从此便跟定了共产党,走上了红军的长征路。由于罗高元有文化和政治觉悟,并对当地环境和语言熟悉,他被委派为第四军交通队的交通员,负责传达首长指示和督战任务。他骑着马,带着刀和枪,在艰苦的跋涉中渐渐成长,在战火的考验中走向成熟。

但是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红军损失很大。罗高元因此爬过两次雪山,走过 三次草地,这是一种多大的体能付出啊!在他的后背留下了一块枪伤的疤痕。

延安就是北斗星指引的方向,就是心中的圣地,就是唯一的目的地。罗高元坚守信念,跟着走,从不掉队。

1936年7月,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同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汇合。同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隆德会师,标志着长征结束。

"文革"期间,罗高元在讲座中叙述红军经历时,谈到他的交通队死了一匹马,大家分吃马肉。有一名饥饿的战士竟胀肚死了。但造反派批斗他,说他污蔑红军,红军是吃草根、啃树皮过来的,怎么会有吃马肉撑死的?

1996年红军长征60周年的时候,已经离休的罗高元曾写下《英烈赞》一诗: "弃守苏区新运筹,红军转战半神州。长征谱写千秋史,无数英灵壮志酬。六十春秋瞬息过,长征战友已无多。雪山草地埋忠骨,吾辈幸存赋赞歌。"

人保第三位红军老战士是负责门卫的王某,可惜连名字都没人记得,大家只记得叫他"王老头"。由于他没有文化,只做了门卫。他当年是为毛泽东牵马的小战士,参加了万里长征,一路艰辛。

在《中国共产党简史》中指出:

红军的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的,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力量,宣传了党的主张,播撒下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红军在行军途中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行进到湖南汝城县沙洲村时,三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 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半条被子"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把共产党当成自己人。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

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 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1]

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极为宝贵的精华,是以后领导全民族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同样,中国人保创业者中参加过长征的老前辈的精神遗产,也是激励我们今天改革创新的强大动力。

2. 有理想的人在延安聚集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2]

延安是中国共产党的又一个圣地,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宝塔山像一只巨笔,饱蘸着延河水,在辽阔的天空中书写着历史。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创建者也是从这里出发的,虽然他们不可能"身长翅膀脚生云",但他们满怀豪情,一路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1936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20日,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为抗大规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

抗大是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 抗大的毕业生, 纷纷成为新组建的八路军





延安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和新四军的主要骨干, 也有多位学员成为中国人保的创建者。

随着红军到达延安,胡良英通过抗大的补习,获得了高小文化水平。由于战时紧张,胡良英奋不顾身地转战杀场,遗憾的是他再没有机会补习文化。

同样,罗高元也在延安的抗大接受了再教育,得到了精神的洗礼和灵魂的 升华。

1939年,在抗日战争中,罗高元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特派员,与妻子韩桂英一同奔赴太行山。

1942年,罗高元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在惊心动魄的运动中,罗高元曾为 当年的红军战友说情,证明清白,差点被保安处检毙。

1944年,罗高元的第一个女儿在延安出生,但因患病,没有得到及时医治,仅 几个月便夭折了。在战争年代,罗高元就是用一个女儿夭折、两个女儿伤残的巨 大代价,坚定地走在革命征途上。

此时,还有几位人保的创业者,正在投奔延安的路上,先后成为延安抗大的 学员。

孙继武,1905年出生在甘肃省榆中县城南的李家营村。祖上是山西移民,一家 人以耕地务农为生。

1922年,孙继武在本县高级小学毕业后,一心想去省城兰州上中学。但其父亲

总想让他到商店里去当学徒,做点买卖,以图改变家境。舞文弄墨的希望已然破灭,无奈之下,孙继武选择了习武之道。

1924年底,孙继武加入甘肃省督办陆洪涛的军队,开始了职业军人的生涯。受同乡梁子玉的影响,孙继武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在甘肃共产党史记中都有记载,可见时间之早。

1930年, 蒋冯大战爆发, 结果冯军失败, 新编第八师中的团长雷邦敏恰是孙继武在教导团时的同学, 为扩充自己的势力, 便强拉在家务农的孙继武出山。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烽火遍燃,冯玉祥与吉鸿昌在张家口组成抗日同盟军。孙继武兴奋地赶到张家口参战。

1933年冬,青海、宁夏回民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联合抗击屯垦督办孙殿英,史称"四马拒孙"。蒋介石利用他们相互攻伐,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乡党雷中田任孙军第五军军长,孙继武也随军打到宁夏,但结果全军覆没。1934年7月,孙继武又回到了榆中家里,陷入绝望之中。

1936年,红军已由四川到了甘肃陇南,在榆中家乡的孙继武仰望陇上的晨星,

苦苦思索自己的人生道路该如何重新选择。

1938年4月,孙继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与 八路军办事处的谢觉哉有过接触。在国民党特 务的跟踪围剿下,孙继武决心离开兰州,投奔 延安。

1938年7月,孙继武徒步数日,跨过黄河, 经银川到达红军驻防的盐池县,最终到达红色首 府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开始新的征程。

孙继武在延安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一场报 告,感到了太阳一般的光芒和温暖。

组织上找孙继武谈话,为了简化续转手续,可以办理重新入党,孙继武无怨无悔,欣然同



孙继武

意。1939年1月,孙继武重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学习尚未结业的情况下,孙继武即被调到军事 队任区队长。

1939年7月,孙继武在抗大毕业后,尽管工作不断变化,但他始终愉快地面对。因为他的心在和延安一起跳动,积极向上。

阎达寅(阎燕军),1918年出生在山西省榆次县一座典型的晋商风格的深宅大院中。父亲阎崇礼是一位祖传的郎中,享有盛誉。哥哥阎建寅,初中毕业后到太原国民师范学习,其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34年加入共青团;1937年加入共产党。从此拉开了这个家庭戏



阎认宙

剧性变化的序幕, 在他的带动下, 一家人前仆后继地开始了投奔革命的征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的飞机在家乡的屋顶上盘旋,沦陷近在眼前。阎达寅的父亲坚决不愿当亡国奴,但也无力给遍体鳞伤的中原开出什么医治的药方。他毅然决然抛家舍业,带着夫人和两个女儿(阎萍、阎颖),一同找到在晋南驻扎的儿子阎建寅所在的部队,参加革命。在当地邮局做职员的阎达寅,也随之投奔革命,一家人在同一战壕战斗。

1938年,阎达寅经过一路艰辛,顺利到达延安,进入抗大学习。1939年,阎达寅在抗大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阎达寅的父母和小妹妹,逃出敌占区,来到陕西省米脂县解放区,终于找到了大儿子阎建寅和大女儿阎萍。但此时,阎达寅已到了太行山根据地。阎氏这一家人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闪动着一家人心向延安的义举,他们一个个光辉的名字构成了阎氏红色族谱。

曲荷,1921年3月出生在河南省焦作市孟县璩沟村一户士绅家庭,原名璩含华,取"璩"姓谐音。"曲荷"为敬词,有承受、承蒙之意。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封



曲荷

晋东南,与八路军汇合。

阎文康,1920年1月出生于山西省灵石县 县城内,从小家境败落。

后来,阎文康当了乡村小学教员。年青的 阎文康在学习中逐步接受进步思想的启蒙,他 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利用小学教师的身 份,积极向学生和市民宣传共产党的"停止内 战,团结抗日"的主张。

1937年春,阎文康投笔从戎,进入山西国 民兵军官教导二团。

1937年,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了山西新军的第一支部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同时,阎文康所在的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二团

建大家庭中,他的母亲张氏作为妾室,而且 是出身贫穷的屠户家庭,因此受到各种不公 待遇,他自小在家族中也备受欺辱。后来, 他成为最好学校的学生,果然母随子贵,张 氏终于可以在正厅用膳。

1938年7月, 曲荷受哥哥的影响, 投身革命, 加入山西第一战区牺牲救国同盟会。

1939年6月,曲荷的哥哥正在山西八路军前方总政治部工作,他送曲荷奔赴了延安。 在延安由王世英介绍,曲荷到抗大上学。毛泽东在为抗大转移召开的欢送大会上,亲笔为曲荷题词留念:"斗争"。

1940年6月, 曲荷加入共产党。抗大到达



阎文康

改编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决死二纵队。阎文康在教导团期间,近距离地得到了 光明的照耀,他终于和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11月,由党组织介绍,阎文康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徒步由山西来到延安,参加抗大学习。

曾任中国人保第二任总经理的吴波,早年任晋察冀干部大队参谋,第十八集 团军野战政治部统战部驻洛阳办事处秘书。受周恩来委托,通过地下党组织的关 系,帮助营救被捕的西路军将士,其中包括刘延东的父亲刘瑞龙等。

1939年4月,吴波告别自己的家庭,只身一人,化装成商人,穿过敌占区,历尽千辛万苦,一路奔赴心中的圣地延安,寻找已在那里的南汉宸。但在陕甘宁边区前沿,吴波复杂的从业经历和来历不明的身份,遭到当地政府的质疑,差点被造送回去。最后还是靠南汉宸的出面证明,吴波才被安排到晋西北临时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1941年,吴波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统战部担任传记委员会编辑。当南汉宸调到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当厅长时,他把吴波也调到了财政厅做秘书主任。

1937年, "七七"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西安的一次会议上,风趣地问大家,在座的谁是老醯儿(山西人)?一位个子高高的人举起了手。周恩来看了看说,好,就是你!跟我回趟山西,找阎锡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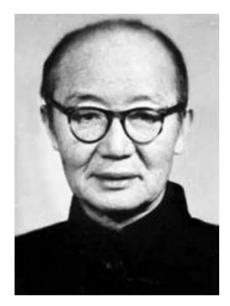
这个人就是南汉宸。他是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也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 缔造者。

1895年12月,南汉宸诞生于山西洪洞。他幼年丧父,4岁时即与祖母、母亲相依为命。1909年初,不满15岁的南汉宸结识了喜爱西学的教书先生狄龙田,并成为他的得意门生。他们以兄弟相称,南汉宸在思想上得到启蒙。南汉宸走出私塾,进入太原陆军小学,与傅作义等一些青年才俊成为同窗。随后,南汉宸加入同盟会,并考取太原师范学院。

南汉宸在家乡种过地、教过书,也办过煤炭公司。他也曾在当地教堂看过基督教教义,在广胜寺读过佛经。



南汉宸



吴波

1919年,南汉宸响应于右任的倒阎运动。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南汉宸参加了其旗下的国民联军,并成为训练处长,在保定、包头一带与军阀作战。1926年10月,国民联军组织参观团访问苏联,南汉宸主动要求前往。启程前,他找到共产党人刘伯坚,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一直隐藏身份在国民革命军中开展工作。

1928年,在安徽太和,杨虎城素闻南汉 宸训练干部有方,热情邀请南汉宸担任革命 军事干部学校校长,并与他结下了兄弟般 的情谊。1930年7月,中原大战,冯玉祥、 阎锡山在陇海线失败,杨虎城被蒋介石任 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南汉宸被杨虎城委 任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其间,他多次解 救共产党人。1931年春,刘志丹被捕。南 汉宸力劝杨虎城排除阻力放人,最后把刘 志丹营救出来。

1932年夏,国民党行政院电告杨虎城,南汉宸是共产党员。不久,蒋介石又派胡逸民携函会见杨虎城、南汉宸。胡逸民把委任状和通缉令一起摆在南汉宸面前,脸色一沉说:你要么到南京当中央监察委员,要么就到南京下狱,任选一张。南汉宸说:"我宁愿选择通缉令。"然而,杨虎城知道南京方面对他重用共产党不肯善罢甘休,建议南汉

宸夫妇东渡日本避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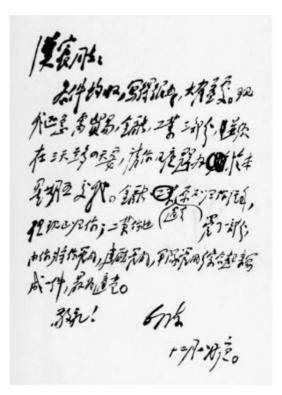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震惊中外。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周恩来征得杨虎城同意,决定调南汉宸协助代表团工作。南汉宸是国共双方的重要代表人物,一明一暗,能够处理好"西安事变"中的种种棘手问题,南汉宸的政治地位可见一斑。

1941年,日寇残酷"扫荡",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和经济遇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一次,毛泽东在枣园召见南汉宸,风趣地说,我们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们要自己动手。中央决定由你任边区财政厅厅长,我就是要你做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

毛主席伸出宽大有力的手,紧紧地与他相握,并亲自送到窑洞外,临走时毛主席又叮嘱一句说: "以后,每个星期到我这里汇报一次情况。"这次谈话长达4个小时之久。[3]

南汉宸一回到延安,就受到毛泽东如此的重托。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他把"钱"作为解决边区迫在眉睫的问题,紧抓不放,一抓到底。为了保证供给,解决财政与发展生产的资本,他提出禁止法币流通,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的建议。

边区的经济得到改善, 但作为



毛泽东给南汉宸的信

功臣的南汉宸一直保持着无私无畏、艰苦奋斗的精神。一次,毛主席看见南汉宸 孩子的鞋还是破的,亲自嘱咐林伯渠要关心一下。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其间,南汉宸负责撰写了粮草、税收、金融、贸易等资料,为毛泽东的报告提供了重要参考。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说过,革命胜利后,要为南汉宸立个碑。可见在毛泽东眼里,南汉宸是一位财经战线的功臣。尽管毛泽东说的那个碑一直没有建立起来。 但在今天,至少在中国人保人的心中已经矗立起了这块丰碑。

要说曾在延安的人保人,欧阳天娜应是岁数最小的了。她是随父亲欧阳山、母亲草明来到延安的,那时她才3岁多。在延安时,毛泽东亲自给叶剑英写了条子,安排欧阳天娜及姐姐欧阳代娜、弟弟欧阳加3人进入延安保育院的子弟小学及中央托儿所,当时欧阳天娜曾和李敏、李铁映等人在一个班。周恩来有一次见她冬天穿得少、特向毛泽东请示、批给她了一件棉衣。

3. "马背"与"挎包"的冀南银行

1935年11月,苏维埃国家银行随中央主力红军到达陕北,更名为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银行西北分行、同时将陕甘晋苏维埃银行并入西北银行。

1937年10月,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西北分行更名为陕甘宁边区银 行,是当时共产党金融业中最核心的金融机构,总行设于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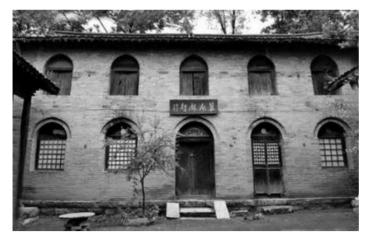
当时,林伯渠任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陈云任西

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 任: 南汉宸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 厅长: 曹菊如任陕甘宁边区银行 首任行长。

1938年1月, 晋察冀边区政 府成立,通过了设立晋察冀边区 银行并分析了钞票的决议案, 随 后, 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五台 山成立。

在日寇的严酷封锁下, 抗日 晋察冀边区银行







冀南银行旧址

冀南银行行徽

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处于极端艰难困苦中,国民党顽固派扣发八路军军费,万般危急之时,毛泽东决定在被隔断的地区设立地方银行,发行纸币与敌伪经济展开斗争,同时,推行农村信贷,发展生产,保障抗日根据地的军需民用。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报告中指出:"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的伪币及破坏法币作斗争,允许在被隔阻的地方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会议决定由八路军一二九师负责在山西黎城县组建冀南银行。

1939年10月15日,合并上党银号后,在长治市黎城县东崖底村,冀南银行召开成立大会,总行就设在附近的小寨村。该行隶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由冀南行署领导。冀南银行之所以选择晋东南的小寨村,而没有选择河北南部,就是要给敌人造成错觉,声东击西、遮人耳目,减少敌人对银行的破坏。

冀南银行担负着边区军民所需财物供给的责任,是"培养抗战的摇篮,保护人民利益的堡垒"。冀南银行发行的冀钞是我边区独立自主的本位货币。它是打击敌伪币的有力武器,是发展根据地经济的重要措施。历史证明,冀南银行没有辜负党的重托,它胜利地完成了党和人民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冀南银行的白手起家和艰苦创业,是从1939年9月开始的。筹建工作是在八

路军一二九师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印制钞票,二是培养银行业务人员。进行这两项工作,在当时是十分困难和艰巨的,既无设备材料,又无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一切都需从零开始。没有人才,就培养人才,没有设备,就因陋就简,自己创造。

在冀南银行成立后的初期,工作是极其危险的,随时都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特别是面对敌人的频繁扫荡,银行业务人员一手拿枪,一手拿账,夜晚行军,白天工作,跟随大部队与敌人周旋,群众称冀南银行是"马背银行"和"挎包银行",如果遇到敌人,银行员工就成为战士,有些同志还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但是,艰苦的环境造就了银行干部的钢铁意志,从行长到员工,从工作台到宿舍,到处都充满了银行员工的革命热情和乐观主义,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高捷成任冀南银行首任行长,胡景澐任冀南银行总务部主任。

胡景澐,1909年10月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的南胡家堡村。他和刘胡兰有亲戚 关系。

胡景澐的父亲胡理治,早年是个舞刀弄枪的 武举人。辛亥革命那年,胡理治参加抗袁新军, 负责把守娘子关,抵抗清军,可惜晋燕联军功败 垂成,娘子关失守,胡理治被阎锡山追责,竟遭 斩首示众。胡景澐14岁时,不愿为读书而给家里 增添负担,毅然去了太谷的一家票号当学徒,从 此走上了一生从事金融生涯的道路。

山西的票号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在晋商发源地的太古地区产生了大财阀孔祥熙。民国十一年(1922年),太谷农工银行在县城内西大街成立。首任大掌柜也是位姓胡的世家子弟,叫胡世泽。银行中主要管理人员都是票庄



胡景澐

出身,胡景澐也在其中。太谷农工银行的票子可以在包括太原县的晋中平川各县流通,而且控制各县市场,可见其生意兴隆。胡景澐理财记账,甚至看家护院, 样样是把好手,深得掌柜的器重。

1928年,胡景澐考上山西银行专科学校,重新深造银行业务知识。毕业后他在太原晋恒造纸厂等处从事会计、审计工作。

1937年8月,胡景澐放下算盘,拿起了刀枪,投身八路军,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同年,他转任太行纵队司令部太行合作总社四科副科长、社长。1938年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胡景澐凭借早年学习的银行专业知识和从事财会工作的经验,在冀南银行的初创时期,默默耕耘。1941—1944年,日寇对根据地不断进行大规模围剿、扫荡,加上大旱、蝗虫等灾害,根据地军民遭遇到空前的困难。

冀南银行的职工说是管钱的,但他们的生活和前方的战士是一样的待遇,实行供给制。每月发几元津贴作零用钱,吃的是小米、高粱和黑豆;穿的是一样的军服,分不出领导和普通职工。在最困难时,还要自己动手,开荒种地。胡景澐曾率领开荒队在圪垃铺村开荒种植马铃薯。[4]

胡景澐写的《一年来之冀南银行》一文介绍,当时,他们的工作付出了巨大的体力,因此,再简单的饭菜都吃得很香。他们经常是一手拿枪,一手持账本;一边战斗,一边生产。

1939年9月,胡景澐担任冀南银行路东支行副经理。胡景澐一行17人,带着准备发行的冀南银行钞票,从太行区黎城县南陌村起程,到冀南区抗日根据地的路东,准备开展建立支行的工作。这是一次经受考验的旅程:每当黑夜降临,驮运钱币的马队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可以说危机四伏,充满惊险。

1942年,日本侵略者对太行山根据地发动"大扫荡"。胡景澐在一次带队转移中,由于叛徒的泄密,队伍被包围。在战斗中,胡景澐与大部队失联。胡景澐将

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埋藏好后,被日军俘虏,关押在山东德州监狱。胡景澐坚持咬定自己是一个棉花商人,后经过多方努力营救,终于获释出狱,辗转回到八路军总部左权县。



1939年9月, 冀南银行驮运钱币的马队

胡景澐被俘入狱后,他

的夫人李如萍把地下党"不要抵抗,伺机逃脱"的指示抄在纸条上,放进大葱的葱段里,买通狱守,给胡景澐送饭。李如萍正直不屈,表现突出,做了冀南银行的库房管理员,她整天把银元绑在身上。

正是由于出生人死的经历,练就了胡景澐的坚定信念,是过得硬的干部,因此,他没有被送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

1943年,胡景澐任冀南银行部行副行长,承担新员工的培训工作。为培养银行会计及业务职员,他着手成立建业会计学校,并亲自兼任校长。

1944年,胡景澐任冀南银行行长、太行工商总局局长、晋冀鲁豫中央财经办事 处金融处处长。

我们是一群经济拓荒者, 在民族革命的狂潮里, 激情地从事祖国伟大的建设, 从芬河到运河, 从平静的泸沱河到滚滚的黄河, 我们站在经济斗争的最前线, 打击伪币,统一货币, 发展工农业,活泼市场,

改善人民的生活, 在广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开遍了繁荣的金融花朵。^[5]

这是当年流传在冀南银行的行歌。

为了充分保护广大员工饱满的工作热情,冀南银行的领导决定把艰苦创业场面 谱成歌词歌曲,激励全体员工奋发向上,激励后人继承先辈的意志,不断革命,不断创新。于是,在1940年初夏,冀南银行副行长胡景澐指定贾星五等5位银行文 化干部同志完成这一光荣任务。由于行歌受到全体同志的喜爱,所以很快都学会唱了,并很快流传到分支行。大家在唱这首歌时,无不感到豪情满怀,每天早晨总是纵情放声高歌,行外的许多同志听了,对银行行歌都流露出赞许之意。

一首好的歌曲能顶十万支毛瑟枪,在战争年代,冀南银行行歌为什么能迅速传诵并得到人们的赞许?因为它气势雄壮、豪迈,鼓舞人心,蕴藏着深厚的边区银行的文化底蕴,激发全体银行员工的革命斗志。大家唱起来,有革命主义的英雄气概,蔑视貌似强大的敌人,唱出了一个革命战士的心愿;加上曲调优美动听,唱起来感觉轻松愉快,心情舒畅!这在艰苦的革命岁月中,虽然物质生活极端困难,但能激励每个银行员工的斗志。

1941年9月,冀南银行在河北邯郸涉县索堡村成立,隶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1945年12月,鲁西银行并入冀南银行。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大区行由冀 南银行统一领导。1946年初,冀南银行迁至武安什里店,3月迁驻邯郸市。1948年 4月,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成立华北银行;12月,华北银行与西北农民银行、北 海银行等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在晋察冀边区,还有一些战斗在银行系统的人保创业者。

程仁杰,1908年9月生于河北巨鹿前堤村。程仁杰自幼好学,在村里上的 私塾,读完初小、高小。1930年,程仁杰考入巨鹿师范学校,成为本家的出众 后生。





1946年4月12日,冀南银行邯郸支行员工合影。其中,阎达寅 程仁杰 (二排右一)为人保创始人之一

程仁杰在巨鹿师范学习期间,接触到许多进步思想,开阔了眼界。1938年,经 同村同学郭福生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投入到抗日武装斗争中。

1939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需要充实大量的特别是有文化的新生力量。程仁杰奉上级之命,踏上了太行山之行。程仁杰在抗大(太行山分校)经过短期受训,被分配到八路军一二九师供给部。在一份1948年晋冀鲁豫边区干部登记表中,有程仁杰亲笔写的思想汇报材料,他诚恳地写道:

参加工作的动机,在好的方面是为了抗战,在另一方面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打算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争名誉与发财观点在当时自己的思想上,已占统治地位,对八路军有些好奇的想法,并没有意识到革命是怎么一回事。[6]

程仁杰在胡景澐的带领下,积极开展工作。或许正是由于他们都是河北、山西 一带的北方汉子,脾气相投,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情谊。

1942年,日本侵略者对太行山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在他们参加的一次战斗中,胡景澐被捕,而程仁杰为了保护账本,滚下山沟,腰部撞到石头上,保住了性命。他忍痛顺着山沟摆脱了追击,但因腰部受伤较重,加上长期住的山洞潮寒,从此落下病根。

1944年11月,程仁杰调到冀南银行工商管理局第六分局行邢台县办局任主任局长。

巧合的是人保第三任总经理贝仲选和程仁杰都是来自河北巨鹿的人,两家相距 只有四五里路。

1927年,贝仲选考入河北冀县省立第六师范学习。在冀南革命斗争史上,冀县六师与邢台四师、大名七师并称为冀南革命的三座摇篮。

1930年12月,在学潮斗争中,贝仲选等10名同学被反动当局挂牌开除。1933年10月,中共在保定成立中共保属特委,贝仲选担任书记。

1937年, 贝仲选任冀南行政公署财经处长。1939年11月, 贝仲选加入共产党。 1941年, 贝仲选任冀南行政公署粮食局局长。



贝仲诜

1945年,解放军攻克临清城区。冀鲁豫行署冀南办事处发布通令:"刻临清已被我克复,经本处行政会议决定,划临清城区为临清市,由办事处直接领导",贝仲选随即上任为临清市第一任市长。

贝仲选虽任临清市市长仅两个月,却成为临清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人。这不仅是因为他签署发布的文告经常贴在街头巷尾,更是因为他的身影频繁地出现在各类集会和民众的生活中。他高高的个头、老成持重、为人和蔼的形象,临清一些健在的高龄老人至今记忆犹新。

1947年6月,贝仲选调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 队后勤部办事处主任。他随冀南第一批南下的干部 渡过黄河, 开始了新的旅程。

在晋察冀边区银行冀中分行中,有一位叫杨子 久的人,也是人保的创建者。

杨子久,1921年2月出生在河北省衡水市安平 县的一户农民家庭。杨子久上小学时,每次在县里 的会考成绩都是前三名,为学校争得了荣誉。每次 都是校长亲自套马车陪他去,中午还可以在县城的 饭馆吃顿饭。

1938年9月,晋察冀边区银行冀中分行在安平 县招收员工,杨子久在村民的鼓动下,前去报考, 考取了第三名。他被录取分配到冀中分行加印部检 香科工作,负责在新钞票上盖章、编号。



杨子久

1940年,杨子久被调到冀中分行总部。随后被分配到冀中第一专区银行办事处任出纳组长。为了躲避日军的扫荡和干扰,他们每隔三五天就要转移一次,每次都要连续行军好几天。在行军过程中,他们用骡马驮运钞票,但装卸费事,行动不便。杨子久就研究设计了一种用人背的装置——一种用土布缝制成多层、有多个口袋、可反复折叠的背包,可以把各种货币、大小金额的钞票分别装在粗布背包的各个口袋里,使以前的"马背银行"变成了"布袋银行"。

1941年,杨子久任冀中银行任河县(任丘、河间)营业所主任。1942年5月,侵华日军对冀中军区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杨子久和同志们又开始转战,他们掩埋了边区票,带着枪和账本,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阜平总行驻地。杨子久把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营业所的账目、报表、枪支等物品——上交。总行经理关学文特此接见了他。杨子久由于劳累,得了伤寒,昏迷了好几天。

1945年3月,杨子久在利民总店被发展为正式党员。

1946年2月,杨子久到阜平县边区银行冀西分行报到,任唐县银行办事处主任,重新回到银行系统。

4. 人保创业者的摇篮——瑞华银行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金融市场十分混乱。抗日战争胜利后,边区政府对金融市场进行了整顿,在全区实现了完全以冀南银行币为本位币的统一货币市场。但在新解放区,冀南银行的货币还没树起威信,所以就出现了一批私人银号,作为冀南银行管理和活跃金融市场的补充。

银号对边区的经济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它毕竟是旧社会的产物, 弊病也不少,如高利盘剥、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等,给市场造成了一 定的混乱。

针对以上情况,边区政府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民营金融组织,以促进解放区经济的发展,更好地适应形势发展及加强对敌斗争,迅速恢复遭战争破坏的工农业生产,搞活市场金融,调剂社会资金,解决群众生产中的困难,促进工农业和商业发展。

1946年3月下旬,根据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指示,在冀南银行区行经理会议上向正在邯郸召开的第一届第二次边区参议会提出了建立瑞华银行的议案,并邀请经济界参议员,进行专题讨论研究,得到参议员们的齐声赞同和邯郸工商业界的大力支持。

1946年4月23日,由冀南银行行长牵头,边区参议员、邯郸商会会长等人参加,召开瑞华银行创办发起人会议。会上决定在邯郸设立总行筹备会,各地分行也将逐渐成立;确定资本为2亿元(后又增为5亿元)。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指示胡景澐化名胡竹轩,发起募集5亿元冀钞,筹建民营性质的瑞华银行。1946年4月,胡景澐在《新华日报》刊登了《瑞华银行募集股金启示》,并由冀南银行出面在长治、晋城、邯郸、邢台、临清、南宫、菏泽、济宁等地同时募集股本。

瑞华银行的经营方针是: "开放存放款业务,发展汇兑,运用社会游资,扶持 工农业生产为主。"

边区政府对瑞华银行的成立给予了有力支持,批准立案后,即号召全区各界人 士踊跃入股,动员干部参加储蓄,并特许经营仓库、买卖金银和办理外汇,在经 营业务上不加限制。冀南银行更是竭尽全力予以扶持,动员本系统各支行为瑞华 银行进行宣传,代收股金。

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瑞华银行于1946年5月17日在邯郸市和平路总行筹备处 召开筹备会,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瑞华银行章程》,选出了董事会和监事会。

1946年6月11日,瑞华银行在邯郸举行开幕典礼,总经理为胡景澐,下设邢台、临清、南宫、长治4个分行。

开幕第一天,银行就收到存款17600余万元,往来、活期、定期存款达60 余户。

瑞华银行准备以30%的资金扶植农业信用事业,30%投资用于工商业,放款利率比私人银号低1/3。

经过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及有关部门的宣传帮助,瑞华银行自成立之日起便得到广大民众的信任,纷纷向该行认股、存款。到1946年6月底共收存款25300万元,放出各种贷款12000万元。

在瑞华银行举行开幕典礼以后,各地分行也陆续开始营业。各分行开业后,存放款都十分活跃。



1946 年,瑞华银行成立,首届股东大会召开时股东暨董事、监事合影,第二排左十 为胡景澐,第三排木梯下四为孙继武,第二排左边的女士左手边是阎达寅



1948年4月,瑞华银行成立两周年迁移至石家庄时,全体同仁合影,第一排左八为孙继武、左九为阎达寅、左十一为程仁杰



瑞华银行员工合影,左五为阎达寅、左九为胡景漂

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瑞华银行克服重重困难,为恢复和发展邯郸市及边区的工商业,安定人民生活,支援前线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它把吸收的大量存款投入边区各种生产建设事业。例如,邯郸面粉厂,邯郸解放时只有300人左右,日产面粉200~800袋;解放后,瑞华银行为该厂提供贷款,使其生产能力大大加强,日产面粉1500~1800袋,产量增加了一倍多。邯郸的瓷业,最盛时有碗窑240余座,缸窑50余座,资本家40余人。在日本侵略者的严重摧残下,瓷业日趋衰败,瓷窑所剩无几,大批工人失业,生活极为困苦。瑞华银行建立后,及时对瓷业提供贷款3200余万元,同时对瓷业运销总店投资3亿元,又提供贷款500万元;给瓷业信用合作社提供150万元的长期贷款,使瓷业得以恢复和发展。

瑞华银行的另一项主要任务,是搞黄金和外汇。组织将大批土特产,如太行山

区的桃仁、花椒, 冀南、冀鲁豫平原的棉花,以及土布等, 卖到平津等地,从敌 占区换回大量的黄金和外汇。

瑞华银行共召开过两次股东大会。第一次是在银行刚成立不久,地址在邯郸; 第二次是1947年5月4日,地址在武安县阳邑。会议均由董事会、监事会向全体股 东报告开业以来瑞华银行的经营状况,讨论决定分红问题及今后的营业方针和 任务。

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银行里面,瑞华银行非常特殊,它以民营商办的面目独树一帜,形成了独特的管理和经营方式,开办了一些专有的业务种类,建立起它在解放区银行体系里重要的地位。瑞华银行的经营方针是:开放存放款业务,发展汇兑,运用社会游资,扶助工农商业为主。体现为三大主要工作任务,一是吸收各类存款和股金,以增强银行的资金实力和经营能力;二是发放工农商业贷款,促进边区生产生活的发展和经济的恢复;三是办理汇兑、仓库业务、储备黄金。[7]

1945年8月, 抗战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军区决定, 调孙继武到晋冀鲁豫中央局经济部开展隐蔽的经济工作。

突然要脱去军装,孙继武感到浑身不自在,故向组织提出不愿转业。刘伯承司令员、李达参谋长及邓小平等领导与他谈话,说明工作的重要意义,孙继武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部队。

华北解放区经济部长杨立三派孙继武到邯郸市组建光华房地产公司并任公司经理, 归华北金融处处长胡景澐直接领导,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胡景澐, 从此俩人结下了毕生的情谊。

当时国共斗争日益紧张,共产党准备先撤出邯郸。孙继武组建的光华房地产公司的任务,是以民间公司的名义经营共产党在邯郸的房地产,经过保护、修缮,谋取开辟财源,并为将来邯郸政权更迭做好准备。

1947年9月,孙继武被调任瑞华银行总经理兼光华房地产公司经理,该行是共产党组建的最早的金融机构,划归冀南银行领导,胡景澐任冀南银行总经理,孙继武担任冀南银行党委会委员。

阎达寅从抗大毕业后在太行山八路军民运部工作。1945年后,调到晋冀鲁豫边 区银行工作。

1946年, 阎达寅跟随胡景澐, 来到瑞华银行, 任放贷处主任。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解放区连成一片。1948年5月,冀南银行与晋察冀银行合并,成立华北银行,这便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瑞华银行也随之迁往石家庄,直到接管北平时撤销。

瑞华银行在中国红色金融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冀南银行是八路军的银行,是抗日根据地的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瑞华银行是解放区的第一家民营银行,从其诞生到结束,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却在中国经济金融事业的初始阶段进行了探索和试验,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因此,有人说它是中国金融的"祖庙",也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先坛"。 瑞华银行可以说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也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创建者的摇篮。 瑞华银行培养了一大批银行人才,有的成为中国人保的创始人。瑞华银行的首任 行长胡景澐、第二任行长孙继武、放贷处主任阎达寅、会计部主任程仁杰等人, 后来都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创始人。

5. 用鲜血染红的货币

冀南银行成立之初,钞票印制是当务之急。冀南银行发行的钞币(简称冀钞, 分为太岳版、太行版、平原版),是作为边区的本位币发行的。冀南银行在前后9 年时间里,共发行本币47种,本票9种,累计发行冀钞2012.7亿元。

1939年,一二九师将师部一架石印机调出,又从邢台敌占区请来印钞技师张裕 民,正式开始了钞票的研印工作。

在边区党政军的支持配合下,从冀西、太北、太南、鲁西南各有关报社和上党银行印刷厂等部门调集印刷、铅印等机器设备,抽调部分干部职工,同时从部队选派了一批优秀青年战士。四个印钞所和两个厂部及铜印、分裁、鉴定封包等机构在很短时间内便依次建立,在八路军总后勤部和一二九师的领导下,实行军队建设、军事管理、军队供应。

1939年6月, 冀南银行发行部在黎城县小寨西村建立第一印刷所, 胡良英担任 指导员。

胡良英带领大家艰苦创业,很快一批批朴素典雅的冀南银行币(简称冀钞)问世了。当时,冀钞面值有19种,本着"培养抗战经济的摇篮,保护人民利益的堡垒"的宗旨,流通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冀南银行票样

1941年,冀南银行开展生产自救,精兵简政。将印刷一所、二所合并,成立太行第一印刷厂,厂部设在石泉。胡良英担任厂长,张存泰担任教导员。

1943年,遇到罕见的大旱、蝗虫等灾害,为维持基本生活,胡良英带领大家上山挖野菜,补充给养,经常以野菜、树皮、黑豆充饥。

由于汉奸的告密,冀南银行所在地小寨村遭遇过日军七八次扫荡。在一次反扫 荡战斗中,胡良英布置员工将机器设备储藏在山洞中,命令一部分同志持枪守护 设备埋藏地,他率领另一部分同志与敌人周旋打游击。胡良英英勇阻击,拖住敌 人、保卫了国家资财。当年战友满怀深情地回忆:

想起了胡良英同志:他是湖北人,鄂豫皖的老红军形象;矮小的个子,三十多岁,黑瘦干瘪的脸上,镌刻着久经艰苦奋斗留下的皱纹,满口鄂东话,但他精力充沛,品格优良,对人和善,步履轻快,坚苦细致的工作作风,谨慎负责的态度,白天打里照外,夜间巡岗查哨,全部心神为革命,人人都很敬重他。胡良英同志特别善于在勤杂人员中做工作。这是他贫寒出身,又经历了长期战斗生活锻炼成的。在敌后战争环境下,要进行极度保密的印刷事业,如果没有那些警卫战士、勤杂人员和工作技术人员的一致努力,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白天搞环境保卫,夜间要放哨;印就的成品要向外运送,各种器材要及时送来,说要就得要,说走就得走,稍有懈惰便影响生产,那是不能允许的。他们出差,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是家常事.都是为了顺利安全印钞票。没有他们的辛苦血汗.像一个人



冀南银行印钞车间



印钞厂劳动模范合影

只有心脏没有动静脉血管流通,也活不成。胡良同志看重这一着,因而经常做勤 杂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不是板着面孔说教或以严厉命令,而是与群众推心置 腹地交流情感,说服教育。效果是异常显著的。

在那深山老沟,穷乡僻野地区,物质是很贫瘠的,机关的伙食问题最大。能吃到一顿猪肉,无论对谁都像过一次"大年"一样的高兴,伙房炖肉的香味一出来,便是有力的鼓动工作。生产就可能突破记录。事务长改善大家的生活,常下山到很远的地方去买猪,后来自己所里也养起猪来。

有一次,事务长带领驮队要去运粮了。胡良英同志送他们到山下,嘱咐途中事,事务长说:"胡指导员,我们好几天才能回来,家里的猪,你们先宰杀吃了吧。"胡良英同志答说:"不!等你们都回来,再宰杀,大家一起改善生活。"

一句话说得战士们心上热乎乎的。"改善生活",这个很有诱惑力的词,对谁都是一样的兴奋剂。胡良英同志想着全所的每一个同志。他的一句话,一桩小事,一个思想,都闪烁着革命队伍的团结友爱之光,流淌着无产者的感情,发扬着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优良传统。

胡良英同志,在每次改善生活时,都必亲自掌勺,给每个盆盆碗碗里盛肉,不偏不倚,先人后己,他生怕在这艰苦中的一点享受上惹出不愉快的麻烦,扫了大家的兴。

胡良英同志,识字不多,他有个记事小本本,不会写的字,便画些别人看不懂的符号,而他什么事都记得一丝不漏,各方面的工作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这是他 关心同志、关心团结、关心生产、关心党给他的光荣任务所学来的本领。^[9]

1944年,胡良英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中工作,积劳成疾,再加上旧伤复发,使他患了重病。上级党组织命令他暂停工作,就地休养。随着解放军大举南下,胡良英从部队转业,离开戎马生涯,与夫人一同来到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做行政工作。

1941年2月, 曲荷从抗大毕业,来到十八集团军总后勤部的冀南银行,担任政治指导员和支部书记。曲荷在1991年撰写的《反扫荡中的印钞厂》回忆文章中介绍:

当时印钞厂有20多台石印机,纸张、油墨都是从敌占区运来的,就连印制总技师张裕民也是从敌占区邢台请来的。但共产党还是重用他,使他感激涕零,愿为共产党肝脑涂地,后来张裕民还真的入了党。[10]

1943年, 曲荷任冀南银行第一印刷所所长及监委。在洪岭战役中, 负责留守厂部的曲荷, 看到日军在掩埋着印石机器的地方驻扎, 情况十分紧张。他机智地带领战士从侧面引开了敌人, 保护了贵重机器的安全。



1948年,晋察冀边区银行与冀南银行扩大行务会议参会人员合影

1943年5月,冀南银行行长高捷成在河北内邱县(内丘县故称)白鹿村被叛徒告密,遭遇包围。高捷成在突袭中,中弹牺牲。冀南银行副行长陈希愈指示曲荷寻找烈士遗体,曲荷带领警卫排长连夜赶到白鹿村,挖出高捷成烈士的遗体,运到涉县索堡镇,冀南银行在那里为高捷成召开了追悼会。会后,高捷成的遗体被掩埋在石门村左权的墓地旁。

1948年,华北地区的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晋察冀边区银行和冀南银行开始联合办公,并成立华北银行。同年5月,冀南银行发行处改组为华北银行第二印刷局。曲荷任晋冀鲁豫边区华北人民银行第二印制局的秘书。

秦道夫,1929年10月出生在荣成县北下河村。其传记中写道:

父亲秦有丰平日里话很少,家门外的事一概不管。他上过小学,应当是个识字的人,可是我从来没有见他读过书、写过字,也从来没有教过我认字。倒是和我说过应该好好读书,长大了好不当农民,不种庄稼。[11]



秦道夫

但秦道夫的抱负何止如此。他在小学时,就被推选为儿童团团长,使用鸡毛信和消息树,为八路军服务。他的书包里,除了课本,还多了一颗木柄手榴弹。

1945年春天,秦道夫从抗日中学毕业,被分配到八路军山东军区东海区司令部机炮轮训队担任文书,成了八路军战士。

1945年秋天,秦道夫奉命从文登县政府调到 山东北海银行文登办事处工作,开始了毕生的金 融生涯。他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负责点钞票。握 过枪的手,点钞技术也很强。

1946年2月,秦道夫到了北海银行胶东印钞厂。由于国民党军逼近印钞厂驻地,印钞生产停止。工厂将印钞机全部拆卸,涂上润滑油,在深夜用马车拉到河边,深埋进沙里。他换上军装,带上工厂里的武器,上了前线。他还负责撰写敌情通报,发到后方。

1948年8月,秦道夫加入了共青团。1949年1月,加入了共产党。他的入团和入党的时间几乎是连在一起的,这可以看出他有多优秀。

秦道夫一直珍藏着一份他在解放战争期间写的入党志愿书,上面有的字都洇了。在当年一次躲避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时,他在河里隐藏印钞机,随身携带的志愿书漂在水面上,被已经上岸的他回头看到,他冒着敌人的炮火,再次跳入水中,奋力捞起志愿书。也许有人不理解他为何冒着生命危险去捞那份申请书,回头再写一份不就得了。秦道夫捞起的不是一张纸,他捞起的是镌刻在内心的信念。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在中国人保早期创建者中,竟有13人来自陕甘宁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瑞华银行、冀中银行、北海银行等红色根据地银行;其中,来自瑞华银行的有5人;来自边区银行印钞厂的有6人。其中,胡景澐、崔平、李绍禹、冯天顺、尚明、宋国华、秦道夫先后担任过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



印钞厂



1949年10月,北海银行印钞厂员工合影

理,还有孙继武任副总经理、阎达寅任办公室主任、曲荷任人事处处长、程仁杰任检查室主任、杨子久任北京分公司经理、胡良英任办公室总务科科长。他们共同组成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来自北方的红色血脉。

不忘来時路 BUWANG LAISHILU

第四章

布局海外

卢绪章完成将广大华行并入华润公司的任务

寒风阵阵,摇荡着香港的海岸,月明星稀的夜空,似乎可以传来遥远的解放战争的炮声。1948年12月26日,华润公司的钱之光、杨琳等人正在举行记者会,与会的李济深作出当天根本不会离开香港的假象。入夜,李济深家里的窗帘儿故意拉开,附近隐藏的特务可以看见他家里的衣架上挂着他的衣服。李济深趁着起身去洗手间的功夫,悄悄坐上了我党安排好的小汽车,奔到了邓文钊家里,那里正在为何香凝举行欢送晚宴,一派歌舞升平的节日景象。李济深和其他民主人士陆陆续续被接到铜锣湾避风港,他们每人都有专门的接送员引导着登上小游艇,好像是去油麻地游览夜景。在夜色的掩护下,小游艇驶近停靠在岸边的"阿尔丹"号轮船,他们在神不知鬼不觉中纷纷登上这艘轮船。第二天上午,"阿尔丹"号轮船驶出香港,一直北上,奔向大连。

原来是为了保证新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1948年9月周恩来等同志拟定了一份77人的民主人士名单,电告华润公司,务必将他们安全地送回解放区。广大华行的卢绪章也在这艘轮船上,负责护送民主人士北上。船上有龚饮冰、李济深、章乃器、茅盾夫妇等一批民主人士共30多人。卢绪章后来辗转到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学习七届二中全会文件,为接管大城市,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做准备。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东移。根据形势的变化,经中共中央同意,广大华行总行和民安保险公司东迁上海、扩大经营,将原在重庆、天津、汉口的三家分公司改为华西、华北、华中三家区公司。随即又在南京、广州、青岛、沈阳、长春等地建立新的分公司或代理处。

民安保险公司紧紧依托广大华行,并通过民孚企业公司,开辟国外保险业务,随后又与美亚保险公司建立了合约分保关系,一时业务蒸蒸日上,令同业刮目相看。

1947年初,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中共上海分局书记刘晓审时度势,决定将广大华行的业务重心南移香港,从而为战争胜利做准备。为配合这次战略转移,开拓国际保险业务,此前始终与广大华行共进共退的民安保险公司也立刻决定筹设香港分公司,并派遣太平保险公司出身的沈日昌作为专员前往筹备。

1948年,卢绪章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结束了广大华行在国内的分支机构。广大华行全体党员干部平安转移到了香港,卢绪章以总经理的身份继续主持公司事务。这时,民安保险公司也扩股到20万股,资本总额为2亿法币,扩大了20倍。



卢绪章

1948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乘飞机到达 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10月初,由周 恩来引见,毛泽东接见卢绪章,并高度评价 了他们的工作。

1948年11月,国内战局变化极为迅速。经中共上海分局刘晓书记请示中央后,决定广大华行除暂时保留香港分行,张焕文和舒自清留港主持工作外,其他国内外机构一律清理结束,各党员干部陆续调往解放区承担新的任务。

1948年12月、根据中央的安排、卢绪章

辞去广大华行董事长和总经理职 务。出身广大华行的舒自清就任 香港华润公司总经理。

1949年3月,中央决定广大 华行香港分行并入华润公司。作 为广大华行附属企业的民安保险 公司,同时也接受指令,保留其 香港分公司,国内各分支机构清 理结束。



卢绪章(右)、张平(左)合影

根据《红色华润》一书中记载:

1949年春节刚过,华润公司董事长钱之光、支部书记袁超俊与广大华行的负责人张平、舒自清,他们四人约在九龙渡轮上见面。后又一同来到九龙塘罗福道8号刘晓住所开会。钱之光拿出一封周恩来、任弼时从西柏坡发来的电报,电文写着:"广大华行保留香港、纽约、东京、汉口四个分支机构,其余的机构一律结束,人员除舒自清、张平留在香港工作外,其余人员回解放区分配任务,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由钱之光统一领导。"在场的五人都表示服从中央决定,以最快速度办理好公司合并的手续,比如资产清理、部分股东退股等。[1]

广大华行向华润注资500万港元,华润公司实力得以壮大。广大华行完成了它 在香港的历史使命,成为盛名远扬的香港华润集团的前身。

广大华行资产清理后,卢绪章上交组织近200万美元,加上1949年初送交组织的100万美元,卢绪章等人已将全部身家悉数上交,而这些钱都是他们的私有财产。

卢绪章毫无保留地把他原先以自己名义在各企业投资的股份及各类收益款项全 部上交政府。卢绪章的亲密战友杨延修在代他上缴一家企业股权的报告书中,详

细写下如此内容:

代卢绪章同志上缴凯利织造厂股权的报告。上海凯利织造厂是在1947年由詹子琴(是卢绪章同志父亲的学生)与人合资创办的小型手帕厂。当时卢绪章同志是从旧社会的关系及对詹照顾出发的,投资总数为伪币1200万元。在解放后,此项股票已被过户为卢廷安名义。由于相隔过久,卢绪章同志对于此项投资已经遗忘,是最近卢金璈来告,并在卢绪章同志存在上海的衣箱中检出来此项股票收据的。

现据凯利厂报告,重估财产时该厂总值股金为12000元,卢绪章投资600元, 占总额百分之五。又据卢金璈告,该厂五一年前的股息红利已由卢同志的母亲收 用。附上凯利旧股款收条及账单各一纸,请转报市委交有关部门指示处理。

此致

中共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支部。[2]

这笔款项最后由上级组织部门决定作为特殊党费接收。这一无私的举动,真实体现了卢绪章那一辈老革命者身上的道德情操与高风亮节,令人动容。

1949年5月,卢绪章作为上海市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的一员,随同接管大军进入上海。他与徐雪寒、吴雪之等人一起负责接管官僚资本的中央信托局、上海海关等工作。

卢绪章那时的工作很紧张,白天去接管,晚上打地铺睡办公室。原中央信托局等机构经过改造,在其基础上组建了华东贸易处和对外贸易管理处。

1949年6月21日,民安保险公司在上海茂名路陈鹤的家中召开了第五次董事会,会议首先讨论了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卢绪章和总务处处长程恩树的辞职问题,决定接受他们的辞职。国内的民安保险公司则于1953年5月26日清理结束。

自1943年初亲手创办到1949年6月辞去总经理职务,卢绪章在民安保险公司的时间一共六年。经过前后六年的努力与付出,他把一家新式的朝气蓬勃的保险企

业交给了新中国,也使民安保险公司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家以香港为总部的国有保险企业,为延续红色保险的血脉和服务新中国的经济贸易发展立下了不朽功绩。因此,如果说周作民是"太平之父",那么卢绪章完全担得起"民安之父"这个称号。

1950年3月10日,中国进口贸易公司在北京成立。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他在重庆时的爱将卢绪章出任公司首任经理。任命书上说:"兹任命卢绪章为中国进口公司经理,特此通知。中国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此后,卢绪章开始了对外贸易领域的工作,他曾任对外贸易部常务副部长。

改革开放后,卢绪章大力推动国家旅游事业的发展,也非常关心他的家乡宁波的建设。他积极牵线搭桥,与他的表妹夫、世界船王包玉刚联络,支持了宁波开发区和宁波大学的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他催生了宁波大学的创办和建设。就其一生而言,为党的事业、为新中国建设、为桑梓发展,卢绪章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1995年11月8日,卢绪章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他没有留下任何房产和港元、美元,仅有积存的工资收入1万多元。

2. 沈日昌南下

1935年,沈日昌在机缘巧合下,取得了太平保险公司的任职资格。从此,伴随着太平保险公司成长,他在保险业务发展中得到历练,也在太平保险进步人士的影响下,追逐新生活的梦想。



沈日昌

1936年,中国垦业银行投资开办的中国天一保险公司因无人管理,以低微的价格转让给太平接办。太平只需用一套管理人员来处理四家公司的业务,这种欧美托拉斯性质的管理形式,在当时中外保险公司中尚属独树一帜,为业界所瞩目。不过数年间,太平成为全国最大的华商保险公司之一。

沈日昌随着太平保险公司的变革重组,也逐步 走上参与企业管理的岗位,他在太平保险公司与安 平保险、丰盛保险合署经营的太安丰保险总公司担 任稽核。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上海租界,昔日操纵上海保险市场的英、美、法等国的保

险公司,被勒令停业,其外籍人员被关进集中营。

1940年,中央信托局保险部随总部正式迁入重庆,标志着重庆保险的中心地位正式确立。1941年,另一家国营保险公司邮政储金汇业局保险部也将总局迁入重庆。中国保险公司则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重庆设置总管理处。此外,民营保险公司中实力较强劲的太平、宝丰、四明等公司也将业务重心改放在重庆。

1941年,沈日昌随太平保险公司迁到重庆工作,他担任太平保险重庆市分公司副经理一职。他在重庆积极参与抗日时期的后方保险建设,并被选为重庆市保险工会委员。

1945年, 抗战胜利, 沈日昌又随着太平保险公司总部回到上海。

1946年,沈日昌升任太平保险公司总部稽核,成为上海保险界的显赫人物。

1947年,上海经济和金融市场萧条,各行各业一片凄凉,一些企业纷纷把资金转移到香港、当做一条活路。

广大华行董事会决定,民安保险上海总公司筹划在香港设立分公司,单独向港英政府申请注册并继续营业,总公司及国内各机构则陆续停业并清理结束。这样,民安保险香港分公司也为日后开展地下斗争做资金方面的准备。

民安保险公司凭借太平保险公司的老关系,也考虑到沈日昌的开明和进步的身份,便指示沈日昌负责到香港筹设民安保险分公司。

1947年,已近30岁的沈日昌,以民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特派专员的身份,独自一人自上海一路南下,到香港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保险环境。

当时的香港经济萧条、百业待兴,目光独到的沈日昌敏锐地发现了香港的地理 位置优越,乃天赋优良的海港,有发展重要航运枢纽的大好前景,保险业务潜力 丰厚。

1947年,杨琳(秦邦礼)领导的联合进出口公司(华润公司的前身)以东北解放区开展了航运贸易。当时,两艘3000吨的轮船满载东北的黄豆和土特产,从朝鲜的罗津港出发,驶往香港。我军有大批工作人员在罗津港工作。轮船从香港返杭,满载着药品、布匹、无线电器材、印钞纸等物资。

从香港起航前,杨琳会向当地的保险公司办理保险。这些保险公司都有英资背景,其验货严格,速度极慢,而且要价高,时常提出办理"战争险"的要求。

面对此情况,杨琳向中央提出,建议在香港注册一家自己的保险公司。周恩来 在重庆南方局批准了这一要求。

因此,沈日昌南下香港,也是落实周恩来指示的体现。他在卢绪章的直接领导下,配合华润公司的杨琳开展货运保险业务。

民安保险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华润的航运做保险,两家公司都是共产党领导的 红色公司。1948年,华润组建了华夏航运公司,每天有十几艘轮船航行在香港与 内地相连的大海上。

1947年3月,沈日昌开始筹建民安保险香港分公司。同年10月15日,民安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正式开业,由广大华行香港分行经理梁次渔兼任经理,沈日昌为副经理。

公司创业初期,公司职工只有两名,经营条件异常艰苦。沈日昌虽然任副经



1947年10月15日,民安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开业合影

理,但同时身兼工作人员、承保员、出单员、记账员等多职于一身,事无巨细均 亲历亲为,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用广东话来说,沈日昌非同一般的 "勤力"。

民安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与广大华行香港分公司名分两家,事实上差不多是一体,两者在业务上互相照应、相辅相成。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作为广大华行附属企业的民安保险公司,同时也接受指令,保留其香港分公司,其他分支机构的结束安排比照母公司处理。同年6月21日,民安保险公司在上海召开了第五次董事会,讨论香港分公司是否继续营业以及解放后国内营业问题。董事会最后决定,香港分公司单独向港英政府申请注册并继续营业,总公司及国内各机构则陆续停业并清理结束。

1949年9月,民安保险及其香港分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动,已筹建好的公司 只好决定办理结束。

但沈日昌并不甘心,他紧急策划由内地和香港保险、银行界人士另行筹集资金。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原民安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便在香港注册改组为独立法人的香港民安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民安保险公司、香港民安保险),向港英政府提出了注册申请,注册资本100万港元,实收资本50万港元。

1949年9月29日,得到港英政府核准并获颁营业执照。原民安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及保险责任均由新成立的香港民安保险公司承继。公司首任董事长为梁次鱼,石景彦任总经理,沈日昌任经理,并聘用原民安产物保险香港分公司职工,以及接管有关保险业务。香港民安保险成为中国在香港注册成立的第一家民族资本保险公司,也成了中国红色保险资本的摇篮。

1949年10月1日,作为独立法人的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宣告成立并开门营业。 当时香港仍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但为庆祝新中国的诞生和公司的同一天成立,怀着拳拳赤子心的沈日昌与同事们就在租用的华人行办公室里,挂出了自制的五星红旗。他们为新中国的成立欢呼,为香港民安保险公司的开业志庆。从此,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在香港的悠长历史正式展开。

沈日昌日常生活非常节俭,不计较生活的质量,他家里的电视机一直都是租用的。但他对公司事业却兢兢业业,公司的公章一直放在他的身上,从不借外人保管。沈日昌没有儿女,但公司成了他毕生挚爱的孩子。

沈日昌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为保险事业奉献了他的一生。他辞世后,家中也没有留下多少财产,但他留下了高尚的品德。

3. 周作民北归

1950年8月,从香港归来的周作民在北京中南海与淮安老乡周恩来见面。他们互相握手时,周总理说,你我同姓同乡,也许是同宗嘛。你比我年长,是老前辈呢!周作民激动地回答,不敢当。总理摇摇头说,我们家乡很贫困,你我都多年没有回去,很想去看看。

周总理称赞金城银行、太平保险对发展我国 民族工业的历史业绩,并说,新中国百废待兴, 像周先生这样的理财专家是有用武之地的。会谈 期间,周总理谈到了1945年底他们二人在重庆的 相见。周总理感谢他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支持以 及当年对新四军的帮助,宾客相谈甚欢。

周作民是新中国成立前金融界头面人物中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归的第一人,也是唯一的回归者。而像陈光甫、张嘉璈、李铭、钱新之、宋汉章、丁雪农等这些民国时期著名的银行家、保险家均飘零海外,周作民为何会独自北归?



周作民





太平保险公司保单

因上海特殊的经济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在解放上海之前就着手做对金融人士的统战工作。随着人民解放军南下脚步的临近,上海滩的银行家们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不少人携家带口离开内地前往香港。

1948年8月,国民政府为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推出金圆券改革,金融业受到剧烈冲击,财力巨量缩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金融政策所体现的国家行局取向,使得以上海银行家为代表的商业银行家失去了话语权,处境更加艰难。

在这批银行家驻留香港期间,共产党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对周作民的统战工 作一直是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指导下进行的。

周作民是金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抗战期间,上海沦陷后,周作民滞留上

海,拒绝了陈公博、周佛海等人要他担任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主席的提议,但也保持了与他们的私交,希冀以此来保全金城银行。抗战胜利后,军统对滞留上海的精英人士进行审查,借机对周作民进行敲诈勒索。随后上海展开金圆券改革,国民政府迫使各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上缴黄金、外汇以换取金圆券。当时蒋经国对上海的银行家们进行威胁,要他们在交出银行外汇的同时交出私人外汇,并限制其人身自由。周作民在万般无奈下通过陈纳德的帮助秘密逃往香港。

在香港期间,周作民仍关注上海的形势,与金城银行的各分行主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也曾和当时在香港的潘汉年等人联系,并帮助他们。

1949年2月,金城银行动用40万港元,租用"华中"号轮船运送民主人士去北平和华北解放区,同时运载西药等到达天津。这些举动,为周作民返回内地并得到优待奠定了基础。

但周作民对中共的经济政策不了解,担心自己在抗战时滞留上海的经历会为自己招来祸患,因此犹疑不定。中共方面多次派出民主人士章士钊等劝说其返回内地,同时派潘汉年面见周作民,向其解释中共的统战政策,并对金城银行作了妥善处置。

处在观望中的周作民派亲信徐国懋回内地打理行务,也是让其探探路。徐国懋一回去,就受到周恩来在中南海的宴请,并准许其将汽车开入中南海。这一举动 让徐国懋十分感动,马上向周作民作了汇报,并催促其北返。

周作民致信徐国懋:自己已准备回来,不过放心不下香港金城银行的头寸。当时金城港行的周转时有困难,他曾向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商谈透支100万港元,如果成功则可放心北归。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则认为透支数额太大,须经人民银行总行同意。因此周作民让徐国懋去北京找人民银行总行活动。

徐国懋到北京后,首先找到卢作孚,经卢作孚与黄炎培联系,约定与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见面。南汉宸当即电告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拨给香港金城银行500万港元,作为定期一年的存款。周作民闻此消息,"深感共产党办事气魄之大",打消了最后一丝顾虑,下定决心北归。

周作民动情地说:"我曾接触过北洋军阀,也接触过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这些人善于乘人之危,投井下石,总想吞并或掌握私人银行。现在共产党才真正体现了全民族的利益,这样的党是可以信赖的。"

1950年6月,周作民接受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的邀请,在潘汉年的策划下,由香港回到北京。周恩来亲自接待了他,并以淮安老乡的身份请周作民在自己家中享用淮扬菜。周恩来总理请周作民担任"北五行"公私合营总管理处董事长一职,并列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在我国对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整个过程中,周作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 他从北京回到上海金城银行总部,指导改造工作。金城、盐业、中南、大陆、联 合五家银行实行公私合营,周作民任董事长,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人保上 海分公司总经理谢寿天任副董事长。

1952年12月,全国60家合营银行和私营银行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成立公 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人保总经理胡景澐任董事长,周 作民任副董事长。

周作民无偿地将北京西交民巷108号的原金城银行及太平保险公司办公楼捐献 给国家,作为新成立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公地。

与此同时,周作民又将他的资产美金证券25万美元、金城银行股票约值人民币100万元,连同个人收藏图书5300册,名人字画、碑帖、工艺品等珍贵文物1045件,全部捐献给国家。他的爱国热忱和爱国行动,得到了文化部的褒奖。

北京西交民巷108号新建的金城银行办公楼,是一座花园式的建筑,别具一格。这座建筑是当时著名的建筑师朱兆晋设计的,该楼仿西方近代宅邸城堡样式,不是临街而建,而是退到庭院中,主体两层,局部三层,二层原有过街楼同东西面邻楼相通;主立面(北立面)及平面左右对称,北立面左右两端向前凸出,有装饰铁艺雕花栏杆的阳台,顶层高起三角山花;加之主楼入口处在长而稍有曲折的铁艺栏杆,阳台下配置粗壮挺拔的古典罗马门柱,从而使北立面显得丰富而又有变化。

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北京成立,办公楼就在西交民巷108号金城银行旧址,老洋楼换了主人,自此,这个楼成了中国人民保险的一块风水宝地。

在上海,周作民还主持了太平保险公司"为配合国策、集中经营并接受国营经济切实领导"的公私合营事官。

1950年7月,上海私营保险公司在以太平保险公司为主的同业代表一行9人赴京访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胡景澐和副总经理孙继武接见了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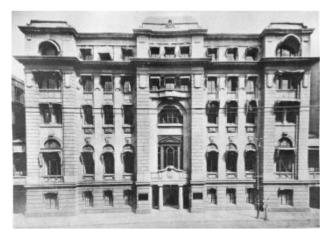
1951年9月,上海、天津28家私营保险公司合并组成太平、新丰两家保险公司,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入一半以上资金,从此,太平保险公司开始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1951年10月2日,周作民主持召开太平保险公司董事会,他特别强调"本次会议主要议题为有关公司合并事项",并由副总经理李祖模报告合并经过。李祖模汇报说:"现合并公司共有太平、安平、天一、华商联合、宝隆、福安、大丰、扬子、裕民、大信、太安丰、建国共十二家,并请国营方面加入公股,正式改为公私合营新机构,名称为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资本总额为人民币一百亿元,除由各私营公司将固定及流动资产依重估及调整方式审查决定后之数字作为各单位参加之资本外,不足之数概由公股投资。"对此,董事会致议决通过。

1951年10月15日,太平保险公司呈文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就合营事宜汇报说:"以本公司为基础,正式改为公私合营机构。资本总额人民币一百亿元(旧人民币,下同),内十二家私营保险公司占四十五亿元;国营人民保险公司占五十五亿元。一应手续在准备办理中。"从资本总额的构成而言,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已经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附属子公司了。

1951年10月22日,《关于参加合并组织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的协议》正式签署。此后,董事会推选周作民任董事长,谢寿天为副董事长,林震峰为总经理,李祖模和金瑞麒为副总经理。

1951年11月1日, 焕然一新的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正式开门营业。



太平保险公司上海总部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旧上海一些银行家们对国民党政权失去了信心,不愿去台湾,却又不敢留在大陆,遂在彷徨中前往香港。驻港期间,这些银行家们仍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的争取,最后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回到了大陆,有的留在香港或者远走海外。虽然最终回到大陆投身新中国

建设的银行家不占多数,但总体上还是保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乃至全国金融业的基本稳定,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生产奠定基础。在周作民归国的这件事上,从统战工作的角度来说,是颇有成效的。

这里其实还有保险业地下党的功劳,谢寿天、林震峰在其中也发挥了许多作用,成为红色保险的一段篇章。上海破晓前夕,周恩来、任弼时致电香港,"点名"要已赴香港秘密工作的谢寿天"尽先"返回黄浦江畔,任命他为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副处长,运用其对申城金融界情形了然于胸的特长,负责接管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银行。在香港期间,谢寿天配合内地的林震峰,对周作民、宋汉章等人做了大量的工作。据《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记载:

1944年9月,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部署下,谢寿天曾会同银行界的吴承禧、胡宣同与金城银行董事长、太平保险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周作民和中国银行董事长吴震修进行过多次接触,他们两人在上海金融界是颇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日伪曾派人找周作民想拉拢他,被周作民婉言拒绝了。在上海沦陷的最困难时期,争取团结他们,对于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意义。谢寿

天等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和他们进行坦率耐心的交谈,从国际国内形势,抗日战争的前景以及国共关系等方面,阐明中共的主张和政策,陈明利害,晓以大义,消除他们的疑虑。在有针对性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后,周作民、吴震修的思想开始有了转变,态度也明朗了。吴震修表示:"抗战胜利后,建国的希望是在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周作民表示愿意到新四军地区参观访问,吴震修也积极赞同和支持。谢寿天向党的上级组织汇报后,同意沿途给予保护,交通等方面也都作了妥善安排。后来,由于日伪对周作民的行动监视很严,未能成行。但从此他们对谢寿天更加接近和信任了。[3]

1948年10月,谢寿天、郭雨东在离沪去港的前夕,又亲自到周作民家中宣传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进一步做争取团结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周作民任太平保险公司董事长,吴震修任中国保险公司总经理。

4. 孙文敏主导三家红色保险公司在香江河畔的聚首

1938年,上海保裕保险公司职员孙文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保险业 地下党的骨干分子。

1942年,通过谢寿天的介绍,孙文敏到共产党领导的大安产物保险公司工作,任主任。



孙文敏

孙文敏成为地下党的一员。在这个不满 30人的企业中,高中级职员多属中共各系统 的地下党员,如谢寿天、陈巳生、蒋学杰、 赵帛、孙文敏、蔡同华、吴福荣、施月珍等 (其中蒋学杰是谢寿天的夫人,曾任上海中 国职业妇女俱乐部副主席)。他们以大安产 物保险公司的职业为掩护,在大力发展业务 的同时,遵照上海地下党的意图,从事革命 活动,并为支持保联的各项活动作出了重要 贡献。

在谢寿天的领导下, 孙文敏根据不同时

期党的不同工作要求,经常参加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和知名人士组织的座谈会、 聚餐会,联系和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同时,掩护中共地下党员的 秘密活动,公开支持上海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的各项活动。

1946年夏,孙文敏从重庆回到上海。他立刻加入保联地下党组织,并成为党团成员。此时,沈润璋是党团书记,成员有徐天碧、蔡同华、吴福荣、孙文敏。

1948年10月,上海保险业地下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准备力量,配合接管,迎接解放的斗争。地下党组织派孙文敏、徐天碧去华中解放区学习接管城市的政策。

在丹阳学习期间,上海军管会金融处副处长谢寿天与先行抵达的孙文敏、施哲 明共同商讨,决定成立军管会保险组。林震峰任保险组组长,孙文敏任副组长, 郭雨东协助保险组全面工作。

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华东区公司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成立。华东区公司总经理为谢寿天,副总经理为林震峰、孙文敏,专门委员为过福云、孙广志。当时,华东区公司管辖范围包括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福建、台湾(待解放)6个省的业务。

孙文敏军装未脱下,就投入华东区公司的创业发展中,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

1951年6月5日,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的策划下,中国保险公司第一届第一次董事、监事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孙文敏(军代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东区公司副总经理)为赴外稽核,驻香港办公。在中国保险公司第一届第一次董事、监事联席会议上,由孙文敏报告了《军管期间关于业务、机构、人事之变更及措施》。

1950年,孙文敏被派往香港,担任中国人保驻香港联络办事处负责人。他代表公股参与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旗下的中国、太平及民安三家保险公司的改制与管理工作。他一人兼任三家保险公司的领导,精心呵护着香江河畔刚刚升起的中国红色保险的旗帜。

1951年,中国保险公司董事会决定在香港成立中国保险公司赴外稽核室,由孙 文敏以董事及驻港稽核身份负责管理香港分公司,当时的总经理是金通明。

同年,太平保险公司成立了太平保险公司驻港常董办事处,由孙文敏代表公股,丁雪农代表私股任驻港常董,管理太平保险香港分公司。1952年,丁雪农赴台湾出任台湾太平产物保险公司总经理后,孙文敏成为太平保险香港分公司的唯一管理者。中国保险公司和太平保险公司驻港机构分别成立后,为了加强并协调两者间的管理工作,又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指导下成立了两家公司联合驻港办事处,同样由孙文敏主事。

1951年初,孙文敏还出任香港民安保险公司总经理,后任香港民安保险公司董事长。孙文敏此时身兼数个要职,事实上成为中央驻港保险事务的最高主管。

中国保险公司是新中国成立后恢复营业最早的保险公司。该公司很早就关注华侨众多的南洋市场,1938年设立了香港和新加坡的分公司,但因为战争原因,都没能长时间经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无论是中国保险公司还是太平保险公司,凡属东南亚日占区的都被日军关停。直到抗战胜利后它们才逐一申请恢复。1951年中国保险公司改组为中国保险公司下属的专营外币业务的专业化公司。随后裁撤国内营业机构,其香港及各海外公司无疑上升为公司主体。此时,中国保险公司的海外分支机构主要有香港分公司,下辖九龙、澳门办事处;新加坡分公司,下辖吉隆坡、槟榔屿、砂捞越、恰保等地分支公司;雅加达分公司,下辖泗水、锡江、棉兰、三宝垄、万隆等地分支机构。从以上可见,中国与太平两家保险公司在东南亚国家的分支网络是比较一致的。

太平保险公司自1933年增资扩股后,实力大增,就产生了向海外扩张的计划。 1935年太平在香港设立支公司,由于当时香港的经济地位并未如后来般的举足轻重,某种程度上尚不如广州重要,故此这家支公司受太平保险广州分公司节制。 1950年以后,随着中国政局以及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巨变,香港的经济贸易迅猛发展,城市地位也快速上升为远东的经贸中心。为了形势发展的需要,太平保险公司将其香港支公司上升为分公司,同时又设立香港太平代理保险有限公司,两者相互扶植在香港的业务拓展。1956年太平保险公司在北京改组为经营港澳及海外业务的专业化公司,其香港分公司与香港太平代理保险公司随之合并。此后直至 管理体制上再次改组,除香港外,太平保险在海外运营的分支公司还分布在澳门、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恰保、雅加达、泗水、棉兰等地。

香港民安保险公司走了另一条路。与太平保险、中国保险在东南亚设有多家分支公司不同,自1949年10月1日开业以来,它的营业就聚焦于香港一地。公司坚持积极而谨慎的发展理念,及时把握商机,大力发展货运险、火险和相关意外险业务,为国家外贸服务。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对香港实行禁运期间,公司的货运保费依然保持了增长。同时,沈日昌领导公司充分运用香港的中西合璧优势,一方面担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货运险香港理赔代理人,另一方面代理英国著名保险公司法通保险公司的业务。

1956年,中国保险、太平保险、民安保险三家公司经理定期联系会议制度确定。

1964年,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加入,原先的两家公司联合驻港办事处发展成为中国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和香港民安保险公司联合驻港办事处,三家公司的整合度空前提高。

孙文敏在香港地区勤奋工作,为中国人保占领海外保险市场,为把好中国保险 事业的南大门作出了贡献。

孙文敏可能是因为工作身份的缘由,也可能是自身性格使然,平日里很少谈到自己的身世,低调做人。家人也并没有提供什么可以炫耀的史料。即使在太平公司,就连孙文敏的一张照片都很难找到。但时间的潮汐,把大海的沉沙淘洗,他人生的价值必将越发夺目。

不忘来時路 BUWANG LAISHILU

第五章

进京赶考

1. 石家庄的小灰楼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到处飘扬着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进攻,国民党溃不成军。解放全中国已然是大势所趋。

1948年7月22日,晋察冀边区银行与冀南银行在平山县城南关奉命合并,改称为华北银行。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长、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南汉宸任总经理,原冀南银行经理胡景澐和晋察冀边区银行经理关学文分别任副经理。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平津战役胜利在即。

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主持召开政府第 一次政务会议。会议上,认为各解放区已迅速 连成一片,物资交流和经济往来正在恢复,但 各解放区的货币不统一,有冀南币、北海币、



董必武



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成员合影,前排左起滕代远、聂荣臻、谢觉哉、薄一波、董必武、蓝公武、杨秀峰



董必武(前排左二)与出席华北财经会议的代表合影

晋察冀边币、西北农币四种钞票同时流通,而且比价不固定,给经济贸易、百姓 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接管平津后,有必要成立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以 减少混乱。

董必武就此向党中央发电,中央回电批示: "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是否有点过早,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董必武接电后,立即命令南汉宸着手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备工作。各个解放区银行都动员起来,由点到面,层层推进。随后,华北银行又与北海银行、晋西北农民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等先后合并。

1948年11月18日,董必武主持召开了华北人民政府第二次政务会议,中心议题是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会上,董必武再一次慎重地询问南汉宸:

"汉宸,待眼下已时不我待呀!你们的筹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可不可以明天就把人民银行的牌子挂出去呢?"南汉宸胸有成价地回答:"我看可以了!经过这一年来的筹备,各项工作都已经就绪了,12种面额的钞票版面,已经请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看过,我们已托晋察冀边区印制局给印制出来了,存放在发行准备库里,明天就可以把钞票发行出去。为了准备北平解放后立即由我们的人民币占领市场,我们城工部的同志已经派人携带印版进入北平,同那里的一家印制厂谈妥,已秘密地代我们印出一批钞票,等我解放军一进城,人民币就可以在市场上流通。"董必武高兴地说:"好!马上对外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成立。"[1]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宣告成立,并正式发行第一套人民币。华北人民政府当天发出布告: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在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币为本位货币。南汉宸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胡景澐、关学文任副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是新中国开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中国金融史开启了崭新的一页,中国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图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后左六)与副行长胡景澐(后左二)等同志合影

人民保险也将孕育而生。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地 点在石家庄的中华北大街 55号,俗称小灰楼。小灰 楼始建于日本侵略者占 领石家庄时期,为日伪建 设总署石门河渠工程处。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先遣 军侯如墉部强占石家庄, 即把这座小灰楼作为司令 部。因侯如墉字子固,所 以当时的老百姓都称这里 为"侯子固大院"。侯如 墉残部被歼灭,这里又成

为当时的国民党石家庄行政公署公路局所在地。

小灰楼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地点后,在二楼右手依次为南汉宸、胡景澐、关 学文3人的办公室,因此当时流行一句话:"到银行办事,必过南胡关。"

中国人民银行组织金融接管工作组开赴北平、天津,接管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以及设在这些城市的河北省银行、天津市民银行、山西裕华银行、金融管理局及其印刷厂等官僚资本金融机构。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当时的天津解放北路有49家国内外银行,其中12家国内银行总部设在这里,有"旧中国华尔街"之称。为了搞好对天津的金融接管,胡景澐亲自率领中国人民银行特别成立的金融接管处赴天津开展工作。此时,孙继武转去天津参加军管接收工作,并担任军管会金融处办公室主任和党总支书记。

2. 上海滩上穿军装的接收大员

上海政权更迭前夕,国民党特务开始恫吓金融、工商界的巨擘名流撤离上海, 逃往台湾。保险业地下党谢寿天、郭雨东等授命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开展安抚工 作,他们与太平保险公司董事长周作民、总经理丁雪农,中国银行沪行经理吴震 修,中国保险公司总经理宋汉章等上海金融界颇具影响力的领袖人物多次接洽, 稳定他们的情绪,团结争取他们留在大陆。

1949年初,谢寿天、郭雨东由香港北上,在石家庄参加接管上海金融业的干部培训。

1949年5月3日,饶漱石、陈毅、粟裕等率部进驻丹阳,与先期到达的总前委、华东局机关部队和南下干部会合,部署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6日,华东局在丹阳举行会议,讨论接管上海的问题;10日,陈毅在县城南门外大王庙对接管上海的干部作关于接管上海的报告。

在华中党校学习的刘凤珠等保险业地下党员,一边学习,一边随着党校逐步南 迁,并组建了"青州纵队"。他们随着南下渡江的部队和支前民工的队伍,浩浩 荡荡地快步前行。一路上他们高唱着新编的革命歌曲,兴奋异常。刘凤珠特别细 致地记述了他们当时渡江的感受:

那个凌晨,江边静悄悄的,气氛很严肃,我们登上木帆船,想到几天前百万雄师渡江的情景,不禁肃然起敬。我们重新踏上刚刚解放的江南田野,距离我们北撤仅5个月,而革命形势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

1949年5月27日,上海国民党守城部队投降,解放军进驻上海,开始接管上海的各行各业。

为了落实丹阳会议精神,在苏北解放区专门学习接管城市政策的孙文敏召集撤退到华中党校学习的保险业地下党员徐天碧、朱元仁、刘凤珠等随军渡江回沪,与留守上海的林震峰、吴越等地下党员汇合。在上海市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金融处,共同组建了"保险组"。他们穿着军装,胸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臂章是"上海市军管会"。

金融处副处长谢寿天分管保险组,林震峰任保险组组长,孙文敏任副组长,郭雨东协助保险组的全面工作,朱元仁兼任秘书,廖国英、刘凤珠负责审查各接管单位的财务账册报表。

保险组成员分工负责接管24家官僚资本保险机构,吴越主要负责接管中国产物保险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顾濂溪、姚洁忱接管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和人寿保险处;徐天碧、戈志高接管太平洋保险公司和交通产物保险公司;施哲明、陶增耀接管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和国民保险公司;朱元仁接管资源委员会保险事务所;杜伯儒、廖国英接管中国航联意外责任保险公司和中国航联产物保险公司;唐凤喧接管台湾产物保险公司。

其余如中国再保险、中国人事、江苏、世界、浙江、中南、人和、同信等保险公司早在1949年前已经停业,仅存空壳。中合保险公司的资金已全部转移台湾。四联盐运保险和盐运再保险是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中国产物、太平洋产物、中国农业四家官僚保险公司的联合办事机构,没有资本金,也无资产,就由保险组分工兼管接收。

他们反复学习军管会有关的方针政策和城市工作条例,拟定保险业接管方案,

明确接管范围和对象。在保险公司张贴布告、召开会议、组织学习。刘凤珠负责 起草入城规定: "一、遵守军管会及人民政府一切法令和各种规定:二、遵守城 市政策,站稳阶级立场,发言谨慎;三、克服工作上的粗枝大叶,随时总结经 验:四、无事不上街,外出必请假:五、不徇私舞弊。"

大家吃住在一起,白天分头工作,晚上汇报交流。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军管 会接管了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等24家保险公司。林震峰曾介绍接管战果:

接管黄金123两、银元1718枚、美钞15783元、港市3345元、英文打字机88台、 小轿车19辆以及少量股票、债券、金圆券和房地产,还有4支自备手枪。保险机构 的员工777人,其中职员652人,工人125人。[3]

经过整顿清理,部分保险公司获准登记复业,共计106家,其中华商64家,外 商42家。原专营寿险的公司均未复业。由于中国产物保险公司经营管理规范、人



哲明、吴越、唐凤喧等走在前面



1949年5月,保险业地下党欢迎上海解放,施 1949年5月,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参加庆祝解 放游行, 施哲明走在队伍前面

员整齐,市场影响力大,海外各地机构完整,再加上接收工作顺利,因此首先获准复业经营。经金融处批准,中国产物保险公司于1949年6月20日首获复业。

为增强华商保险公司承受保险责任的能力,在军管会保险组的促进和支持下, 由中国保险公司主持筹建一个办理分保业务的组织。

1949年7月20日,民联分保交换处正式成立,共有47家保险公司自愿参加。公推太平保险公司的丁雪农为主任委员,大东保险公司的董汉槎、合众保险公司的毛啸岑、中国保险公司的孙广志为副主任委员,兆丰保险公司的唐雄俊任经理,金瑞麒为理事长,林震峰为副理事长。

民联分保交换处属于互助合作性质,负责集中办理华商私营保险公司分保交换 的服务性机构,不直接经营保险业务,并与天津、南京、苏州等地建立了联系或 设立了办事处。

民联分保交换处增强了华商保险公司的团结,摆脱了外商的垄断,奠定了进一 步扩大联营的基础,是当时上海工商界中最早成立的一个联营机构。

3. 东北最先迎来人民保险的曙光

1945年,罗高元从延安出发,前往东北负责接收银行的工作,在陈云的领导下,开创了财经建设领域。

罗高元在部队的护送下,穿过敌占区,一路急行军。罗高元的小女儿坐在马背上的编筐里。东北依然是寒冷季节,女儿的小手指被冻得肌肉坏死,落下残疾。

在黑龙江黑河的北安、佳木斯、合江等地,罗高元参与东北银行基层机构的建立,足迹遍及陌生的黑土地。

1945年11月, 东北银行正式成立, 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在东北解放区成立的第一家国营银行。

东北地区的保险业依然处于瘫痪状态,为此,1948年8月,东北银行开始组建哈尔滨联合保险公司,由太平、联保、亚洲、阜成、中兴5家私营保险公司组成。哈尔滨企业公司经理杨裕民任理事长,东北银行哈尔滨分行经理张世昌任监事长,太平哈尔滨公司经理袁忠祥任总经理,东北银行哈尔滨分行副经理王雨田任经理。

哈尔滨联合保险公司以经营火险为主,后更名为新华保险公司,由王雨田主持 工作。它是东北人民政府领导下的第一家公私合营的保险公司。

1948年11月,解放军解放东北全境。为适应国民经济恢复,以及发展生产和保 障安全的需要,东北银行总行决定筹建国营保险公司机构。

1949年5月,由东北银行总行主导并拨黄金2万两,在沈阳组建东北保险公司,资本金为5万两黄金。同时任命东北银行业务处处长沈海清为东北保险公司经理。公司领导辽西、辽东、吉林、龙江、松江、热河、内蒙古等地的保险机构开展业务,这是共产党政权成立的第一家国营保险公司。

东北保险公司初创时期人员不足20人,以经营火险为主。随后,大连关东银行的保险部改组为大连保险公司,哈尔滨的新华保险公司改组为松江保险公司。

东北保险公司得到迅猛的发展,为今后纳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系统作出了铺垫。

罗高元随之加入了东北保险公司的建设工作,罗高元在东北工作时期的老同事程明星回忆,罗高元给人的印象非常严厉,但他从不以老红军自居,不压制任何人,总是创造条件帮助下属进步。在生活上,罗高元也十分关心同事,他在东北工作期间,组织上给他配有专门的厨师,他吃的是小灶。但他总会告诉他的厨师留一些肉分给大家,他从不独自享受,就连夫人也不能沾光。每到周末,他经常会请单身的同事到家里吃饭。

1949年11月,在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的领导下,东北地区各保险公司共同组织成东北区保险公司,与人保系统华南区公司、华东区公司、西北区公司等区公司遥相呼应。同年12月16日,东北银行总行以总字第49号文件任命罗高元为东北区公司第一任总经理。公司共有机构78处,员工140名。

4. 南北两条红色血脉汇聚成河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前门大街,穿过东交民巷 使馆区、西交民巷金融街,进入北京。

194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从石家庄迁入北平。同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 正式任命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胡景澐、关学文为副行长。孙继武负责接 收旧政府银行中央信托局的工作,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储蓄处处长,准备开办相关 业务。

人民银行的行长和综合 处在西交民巷西边的清朝户 部银行旧址办公,各专业 部门在北洋保商银行旧址办 公,后搬到西交民巷的大陆 银行办公。

当时人民银行采取的措 施是边接管,边建行;先后 布告社会民众,宣布人民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

币是唯一的合法货币,严禁一切伪币、外国货币流通,所有公款一律存入人民银行,不得存入私营行庄,公私团体与个人可以保存银圆,但不得私下买卖。致电中国银行伦敦、纽约、新加坡、东京、香港、加尔各答等行处,通知其总行已经被接管,要求驻外分支行及其员工坚守岗位,遵守新民主主义经济金融政策,保护财产,拒绝向国民党借垫款项。

南汉宸、胡景澐分别担任人民银行行长、副行长。巧合的是南汉宸、胡景澐都是从小丧父,上过银行学校,干过实业,胡父和南父共同在娘子关打过仗;他们共同组建过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出生人死的年代中,他们两人分别被冠以"一号首长""二号首长"的秘密代码。正是这些共同的经历,使得他们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南汉宸思贤若渴,为人民银行延聘了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如千家驹、王学文、章乃器、沈志远、陶大镛、冀朝鼎等,使人民银行成为"人才篓子"。

南汉宸将主要精力投身于建立新中国金融体系的伟大事业中,南汉宸以金融家的胆识,运筹帷幄,带领人民银行严厉打击地下钱庄和投机资本的不法活动,平息了上海的银圆风波。因此,南汉宸成为陈云、薄一波的得力助手,进入了中央财经委员会。他积极倡导成立保险公司。

正是接收中央信托局的工作经历,使孙继武认识到该局的储蓄、信托和保险三 大金融职能不可或缺。他以军人的谋略和经营者的头脑,深刻认识到组建保险公司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这在大多数进城的干部还不知道保险为何物之时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他对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能够在共和国成立之际就得以成立,起到非同一般的作用。

孙继武积极倡导成立保险公司,宣导保险公司的作用,人民银行的南汉宸、胡景澐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上报中央财经委,获得陈云、薄一波的一致同意。可以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成立之初,已呈现出从上到下一路畅通的大好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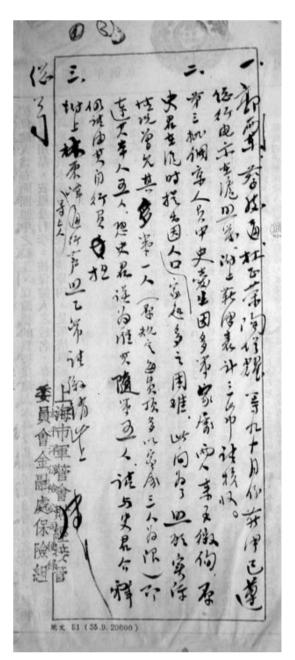
1949年8月,由陈云主持,在上海召开了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

地区的财政、金融、贸易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财经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一次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创建保险公司的建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来的。

参加会议的中国人民银行各区 行负责同志在金融小组会上一致 认为,对全国保险事业的集中领 导和统一管理十分必要,筹设一 个全国性的保险公司条件已经成 熟。在小组会上,关于建立中国 人民保险公司的议案得以批准, 同时提出,为了对国际贸易有关 的外汇进行保险,以原中国产物 保险公司为基础,专设中国保险 公司。

在南汉宸、胡景澐的直接领导下,由孙继武具体落实筹建工作。他将在人民银行信托局工作的赵济年、阎达寅、程仁杰带到保险公司筹建组。

随着工作加重,孙继武提出将 上海保险业的地下党员及专家请 到北京,参与保险公司的筹建。 这样,保险专业和保险公司原有 机构的沿袭就有了保证。



进京指令

上海军管会保险组即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在上海负责接收,另一路由郭雨东、姚洁忱、陶增耀、戈志高4位党员带领从接管单位挑选出的30多位思想进步、熟谙业务的中青年积极分子去北京,参与中国人民银行筹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此时,上海保险界许多地下党人及保险专家先后北上,到北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部任职。他们不仅走上了开创新中国保险的征程,也走上了新的人生旅程。

如此,延安根据地的金融干部及华北造币印制局的一批干部与上海保险业地下 党的金融家组成的南北两条红色的血脉,终于在北京汇合,使保险公司的队伍得 以壮大,人员组成单纯、专业,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部委组建中是 少有的。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工商、税务、海关等重要机构还没成立,保险 机构在银行成立后就得以设立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保的早期创业者,随着进京的人流,在前门东车站站台上汇聚。他们卸下行装,抖落一身的风尘,眺望着或畅想着自己新的人生启航。其中,来自北海银行的秦道夫在走出位于前门的东车站时,扛着一捆行李,当时不知他是充满自信,还是略显忐忑。那一年,他刚满20岁,一个意气风发的北方汉子:

1950年12月,我从天津乘火车到北京。下车后我肩上扛着一捆行李,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走出了前门火车站,穿过正阳门,越过棋盘街,来到西交民巷中国人民银行人事处报到。

人事处负责人看了我的介绍信后说,你就到保险公司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公楼在人民银行对面,西交民巷108号。我出了银行大门,过了马路就来到保险公司人事处,曲荷处长热情地接待了我。要我留在人事处工作。我的保险生涯从此开始。[4]

几乎与此同时,来自上海的魏润泉也走出了东车站。出生于1930年的他,比秦道夫小了正好1岁。但对于1951年初春来说,他和秦道夫到北京时的岁数一样,都是20岁,他晚年在自印的传记中对此写得非常详细:

一个傍晚,我们这些去北京的学员穿着解放式棉袄,胸前佩戴大红花,随着敲锣打鼓声进入了上海北站,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啊!我参加革命工作了。我到国家大机关去工作了,心中无比喜悦。[5]

1951年,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委托华东区公司在上海招收保险专业的学生,并进行培训。魏润泉等30多名经过了严格的政审的学员被选派到北京工作。魏润泉年轻气盛,很早就想报名到北京总公司工作,是向往革命事业的决心,打消了他一开始对在北方生活习惯"吃不消"的恐惧。他心中有些"骄傲",把这当成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响应党的号召"。

火车到达北京。魏润泉是蹦下火车的,可见他有多么兴奋。抬头看见大前门,似曾相识,面对北京城,一下子让他目不暇接,很快发现了北京与上海的鲜明 差异:

到北京了,下火车出了车站,大前门就在我的眼前。这个非常熟悉的图像在我小时候就印在脑海中了。因为我的堂三外婆一直抽大前门牌香烟,香烟外包装上的城楼就是这个样子。

总公司人事部门的负责同志来接我们,用一辆老式的黑色大轿车(据说这是原国民党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班车),把我们拉到离车站不远的打磨厂总公司招待所。听说,这个招待所过去是清朝官员的大宅门,有五进深,左右全是坐北朝南的房间,中间是个大走道。对我来说,在上海住惯小弄堂的房子,其特点是小,而这个大宅门,其特点是大,无怪乎北京是皇城的都城。[6]

人保公司就在东车站的西北角,他们在站台上急不可待地眺望一番,西交民巷 108号那座金城银行的老洋楼隐约可见。魏润泉回忆,新员工在北京用了3天,先 后参观了故宫、颐和园、北海、天坛等地。这个参加工作的典礼,令他难忘。仪 式感带来的光荣,这就是人保深厚的企业文化渊源。



中华门在东交民巷、西交民巷中间

2015年,人保公司策划口述历史纪录片的拍摄,在片子的开头,秦道夫面对镜头,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说:"1950年12月,我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工作,办公室在西交民巷108号。我毕生的保险生涯,从此开始。我再没有离开过它。"普普通通的一句话,让许多人潸然泪下。

东车站不仅是打开新时代历史帷幕的舞台,也是新北京的大门,同时也是新中国创业者人生转折的标的。在那个时代,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命运总是交织在一起,难舍难分。国家就是召唤,企业就是使命,个人就是"党的人"。忠诚和担当,化作了企业基业长青与个人身心健康的动力。

在他们眼里,参加工作,不是找到晋职的平台,更不是谋生的机遇,而是"参加革命"。正如魏润泉所说"干了保险就是干革命"。因此,选择了人保,就是准备从事毕生的事业。

秦道夫、魏润泉这两位来自一南一北的人保创业者代表,用自己满腔的青春 热血,书写了中国人保奠基的碑文,使中国人保的红色基因永远跳动着鲜活的生 命力。

中国人保与共和国同生共长,与共产党血脉相连,这两句话是有着实际内容的。中国人保有着根红苗正的传承,有着天然的红色基因,这是中国人保独有的保险历史特色。

5. 心向祖国



王恩韶

从瑞士归来的王恩韶。

1978年,项馨吾从美国回国探亲,在北京见到中国人保的外语专家——他的外甥周泰祚,这是他们30年后的重逢。项馨吾对周泰祚说:如果当年听我的话,凭你的能力和英语水平,在美国一定会很发达,日子过得要比现在强。周泰祚不以为然,也没有后悔。

项馨吾原来是民国时期中国保险公司的副总 经理。1948年初,项馨吾奉中央信托局委派前往 美国纽约设立中央信托局纽约分局,经营财产保 险业务,是中国第一家在美国开设的保险公司。 项鏧吾动员周泰祚与他一同前往美国创业,但周

泰祚婉言谢绝了他的邀请,他选择留在国内,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当然,还有一大批保险专家,在新中国诞生时,选择留在了国内。还有几位 保险专家是从海外回归到祖国的,他们心向祖国、心向共产党,怀着一片赤子 之心。

香港民安保险公司的孙文敏和上海华东保险公司的林震峰利用早期地下党的身份,积极策划、安排保险专家回国,成为他们的指路人。

1942年,王恩韶大学毕业后,受其父太平洋保险公司总经理王伯衡的影响,开始了保险生涯。

在保险职场上,王恩韶以过人的学识和精通外语的优势,在再保险市场得到了 历练。很快,王恩韶就担任了太平洋保险公司的科长、襄理,在那个时代,他可 以说是保险界最年轻的领导人士。

1948年10月,王恩韶被太平洋保险公司选派到瑞士再保险公司考察。瑞士再保险公司于1863年成立,位于苏黎世,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寿与健康险再保险公司。王恩韶较早地在这里获取了中国保险业的国外经验,接着王恩韶又在英国伦敦通用再保险公司工作。这种优越的职业条件和衣食无忧的生活条件,无不让人羡慕。

1949年10月,中国历史翻开新篇章的时候,中国人民保险也一同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王氏父子的人生同样面临新的抉择。民国时期的著名保险专家王伯衡,选

择留在中国人保上海分公司。受其感召,儿子王恩 韶毅然决然地从伦敦飞到北京,进入人保总公司工 作,成为新中国再保险的领军人物,父子俩依旧是 同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

从英国归来的李嘉华。

李嘉华是上海资本家的后代,其父早年资助过保险业地下党。抗战胜利后,李嘉华到英国伦敦大学继续深造法律专业并获得法律学位。上学期间,李嘉华还带着男佣,照顾他的起居生活,可见生活之优越。

李嘉华在游历欧洲的船上, 邂逅美丽的姑娘董 桂玲, 他们在旅游回程的船上, 就举行了婚礼, 全



李嘉华



船的游客见证了他们浪漫的爱情。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 已经在伦敦著名的劳合社保险公司工作的李嘉 华,偕夫人董桂玲选择了回国。

李嘉华归国,还与当时在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担任要职的林震峰、王永明等上海同仁的举荐有关。李嘉华成为公司急需的法律人才,他在经营国外业务的中国保险公司工作。李嘉华一回国,便遇上了中国人保成立以来最重大的理赔案——"海后"轮事件,他和同志们为新中国挽回了一笔不小的保险赔款。

从香港归来的童一翱。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美亚集团将在上海的东南亚总部迁至香港,其在内地的业务就此结束。

童一翱为了寻找谋生的出路,经亲戚介绍,南下香港,投奔美亚公司。通过 美亚保险公司一位同事的介绍,童一翱和香港民安保险公司的地下党员孙文敏结 识,了解到新中国上海保险业的动态。

童一翱在外祖父家时的租房邻居徐懋德,此时也来到香港,他早就是地下党党员。非常巧合的是,徐懋德住在童一翱的宿舍九龙太子道园艺街的对面。

在他们的接触过程中,徐懋德经常传阅给童一翱《西行漫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进步书籍,向他推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州的报纸,使他了解共产党的思想,接收来自内地的最新动态。

通过这一切,使童一翱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抗美援朝的爆发,极 大地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越来越不适应香港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与公司同事 的思想差距日益加大。童一翱终于作出决定,只身北上,投身中国人民保险的 建设。 1951年9月,孙文敏为童一翱给人保旗下中国保险公司的施哲明写了封介绍信,施哲明当时是公司里唯一的共产党员。其实,通过香港和北京之间的信件往来,已为童一翱在中国保险公司的工作做好了联系。

当时有香港的同事吓唬他,你放弃每月500港元的待遇,北京的工资每月只是300斤小米。但童一翱因过去一直生活困苦,并不在意生活水平的高低。当时,许多人从内地南下投奔香港,但童一翱一心向着北京,投入祖国的怀抱。他怀揣单纯的理想,不想再为"美帝"工作。

1951年9月,童一翱先乘火车从香港回到上海;10月8日,童一翱乘火车来到北京,进了中国保险公司总管理处——南长街的办公地,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中国保险公司刚从上海迁入北京,百废待兴。章一翱被分配在财务室工作。

从美国归来的张鑑。

1948年4月,张鑑被中央信托局派往美国工作,任保险分处工作人员。在出国前夕,张鑑主动找到地下党,征求意见。

1949年初,中央信托局在纽约设立驻美代表处,张鑑任驻美代表的助理,为一等专员。代表处除了保险业务,还开办贸易业务,后来主要办理台湾的进出口贸易。

在美国期间,张鑑始终与国内的共产党保持联系。他通过阅读《人民日报》等 进步报刊,了解国内动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军管会保险组组长林震峰给张鑑写信,向他通报国内情况,希望他报效祖国。张鑑向林震峰表示要马上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林震峰指示他等待时机,并安排了秘密活动。

1956年,驻美保险处宣告结束,项馨吾调到纽约州保险监理处,负责办理未了 事宜。张鑑被派往"台湾驻美代表处",代表处归"台湾行政院"领导。

1956年2月,张鑑写信给在香港民安保险公司的共产党代表孙文敏,请求准予回国。张鑑作为保险专家,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首肯,被邀请回国。3个月后,孙文敏复电张鑑,中央同意他回国。



张鑑

驻美代表处的代表孔士强知道张鑑要回国的 打算后,对他说,作为自己的助理,张鑑回国会 影响他在美国的地位。孔士强反复劝他重新考 虑,并设置种种障碍。但张鑑回国意志坚定,只 好先辞职,转到一家贸易行做临时职员,再从那 里办手续离开。

张鑑在美国出生的两个孩子属于美国公民, 而当时美国国务院规定,禁止美国公民到中国, 张鑑的回国申请需要到国务院做特别申请。张鑑 最终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决然地回归祖国。

1956年7月,张鑑变卖了家产,买了一部汽车,一家四口人,从美国东海岸的纽约抵达西部

的旧金山、从那里乘客轮返回中国、干8月底到达香港、又从香港到了深圳。

在边境海关,张鑑看见飘扬的五星红旗,热泪盈眶。时隔多年,他终于再次踏上了祖国的土地。1956年9月初,张鑑偕夫人一同来到北京,两人正式加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工作。

6. 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

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离开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河北西柏坡,向北京香山进发。临行前夜,毛泽东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接过话题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早在1948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国体有了明确的擘画。他还特别强调:

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它们,就要打倒它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7]

1948年11月,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主持召开政府第一次政务会议。在新建立的银行名称上,董必武认为,新银行名称不仅要考虑目前货币统一的问题,

还要与将来建立人民共和国联结起来考虑,要考虑将来使其成为人民共和国国家中央银行的问题。用"中国人民银行"这个名称,既表示这个银行是人民的,也不失作为将来成为新中国国家中央银行的规格。因此,中国人民银行这一名称成为国家机构之一,也被印到第一套人民币的钱币上。

1949年9月17日,由人民银行南汉宸、胡景澐、关学文署名,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呈请核准设立保险公司的报告。关于保险公司名称,他们建议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沿用"中国人民"字号,叫"中国人民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布告

保险公司",从此,这一以"中国人民"命名的保险品牌正式诞生。

2000年元旦,习近平同志在省政府党组成员(扩大)会议上讲道:"我们是人民政府,但现在很多政府部门已经忘记了自己名称前面的'人民'二字,所以我们很有必要重提这两个字。"可见"人民"二字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 "人民"这一概念,是在 1922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二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大会 发表的宣言中有一句话引人 注意: "中国已是事实上变 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中 国人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从此,党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紧紧 相连了。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瓦窑堡的油灯下,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他第一次使用"人民"对共和国的命名。

1981年2月,邓小平为《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写下序言:"我是中国人民的 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2012年11月,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上,习近平在记者见面会上讲道: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他强调党与人民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积淀成为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建党百年以来,共产党与"人民"心连心。"人民"高度概括了党的性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党的根本宗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共产党的宣言和承诺。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使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大手笔,让"人民"这条鲜明的主线,无比亮丽。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品牌同样拥有"人民"。多年来,每当灾难发生,灾区总会有这样的话到处传递,"大水来了,首先想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着就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中国人民保险""人民的安危冷暖,时刻挂在人民保险员工的心上。"

"人民性"是中国人保与生俱来的独特价值,代表着根红苗正的传承,天然的红色基因。人民保险,源自人民,服务人民。

"人民"是"中国人民保险"品牌的核心要义,这两个字闪闪发光,独具魅力。中国人民保险,是带有"人民"二字唯一的保险企业。70多年来,中国人保与人民相濡以沫,血脉相依,人民是我们的根和魂,是我们立身的托底。这是何等的"人民情怀",这是何等的"国企气质"。

不忘来時路 BUWANG LAISHILU

第六章

诞生,伴随着开国大典的礼炮

1 "人民保险号"在西交民巷 108 号起航

1949年9月21日,中央财经委的陈云、薄一波联名向中共中央报告:

八月在上海由陈云同志主持之财经会议,由人民银行各区负责同志组成之金融小组会上,提出了建设全国保险事业之建议,并进行了具体的讨论。顷接银行呈请关于建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之计划,内容大致如下:我之保险事业,开始建设于平津解放之后。以接收之保险机构为基础进行试办;但限于地区狭小,资金有限,对较大之建筑及大宗物资均无力负担保险之责任。因之,生产缺乏安全保障,也相当影响了出口贸易之经营。过去中国公司,由于实力薄弱,多依赖帝国主义之外商公司分保,造成资金外溢。上海解放前,全部保险费半数为外商公司拿去;上海解放后,才进一步建设我之保险事业。数月来,对恢复上海市场,起了一定的辅助作用,同时积聚了一批游资。八月底保费收入已达四亿以上。估计仅上海一地,年可收入百亿左右。如将此大批游资用于保障建筑、物资、生产工具及人身等方面之安全设备,国家可减少大量之建设财政开支;又在今后计划经济原则下,实行经济核算制;又须实行保险以防意外损失之发生;亦为平衡预算收支之重要保证;又现在东北实行之劳动保险,已有显著收获,可以推广。因







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文件

此, 我们认为保险事业对于保护国家财产, 保障生产安全, 促进物资交流, 安定人民生活, 组织社会游资, 壮大国家资金是有重大作用的。[1]

1949年9月25日,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筹备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负责干部,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各处的代表,还有华东、华中、东北、西北、西南、京、津等地人民银行与保险公司的代表。

大会主席团由9人组成,轮流主持会议、组织讨论。南汉宸、胡景澐报告了中央财经会议精神,各地代表汇报了当地保险工作情况,并进行相关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最后胡景澐作了以下总结: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 1949年10月2日,薄一波给南汉宸的信奇、陈云、薄一波等在报告上圈阅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下的国家金融机构的一部分,属于国营企业的一种形式,其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为生产服务。主要任务有下列三项:一、保障生产安全,扶助贸易发展,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二、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三、保障国家财产。[2]

苏联保险专家库图佐夫介绍了苏联保险的情况和实施原则。

1949年10月1日,参加保险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一同登上观礼台,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开国大典,共同见证了轰鸣的礼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中央批准了人民银行关于成立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前的天安门广场,在开国大典西侧可以看见西交民巷108号的大楼

保险公司的请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云、薄一波等都在报告上 圈阅。这么多重要领袖,这么及时的签署,可见中国人保成立的政治待遇非同一 般。刘少奇在报告上特别批示:"该公司组织请多与苏联专家商讨"。可见,在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方方面面都在向苏联老大哥看齐。

1949年10月2日, 薄一波亲笔函告南汉宸: "中央同意搞保险公司。"这个消息立刻在保险工作会议上进行了传达,与会代表感到极大鼓舞和振奋。

1949年10月6日,保险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与会人员在西交民巷37号胡景澐家的院子里合影留念。从照片上看共有42人与会,如今可以辨识的有胡景澐、关学文、孙继武、阎达寅、林震峰、郭雨东、薛志章、蔡致通、陶声汉、周志城、赵济年、陆权谋、俞彪文、刘公远、姚洁忱、程仁杰及陶笑舫、陶增耀(父子)等人参加了会议,他们作为新中国保险业的缔造者,共同走进了这一历史的瞬间。从他们的服饰上可以看出,当时南北地区的明显差异,来自上海的穿着洋派

两装,来自延安的穿着十布军装。

这张经典的照片拍摄于1949年10月6日上午9时左右,但照片上备注的时间是 1949年10月1日,说明了中国人保的创建者心向新中国,中国人保"与共和国同



1949年9月25日至10月6日,为筹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参与筹建的总部人员、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各处的代表,还有华东、华中、东北、西北、西南、京、津等保险分公司的人员。会议是在北京西交民巷37号司法部街内的二层小楼会议室里召开的,会议合影在此院内胡景澐家的院子里。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庆典也是在这个院子里举行的,标志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式成立

会议合影目前考证:

一排:谢寿天(左四)、胡景澐(女儿胡豫明)(左五)、关学文(左六)、孙继武(左七)、 阎达寅(左八)、林震峰(左九)、郭雨东(左十)、于智(左十一)等:

二排: 薛志章(左四)、蔡致通(左八)、陶声汉(左十一)、周志诚(左十二)、赵济年(左十三)、陆权谋(左十四)等:

三排:库图佐夫(苏联专家)(左二)等:

四排: 俞彪文(左一)、刘公远(左十二)等。

参加会议的还有姚吉忱、姚乃廉、王关生、程仁杰、张普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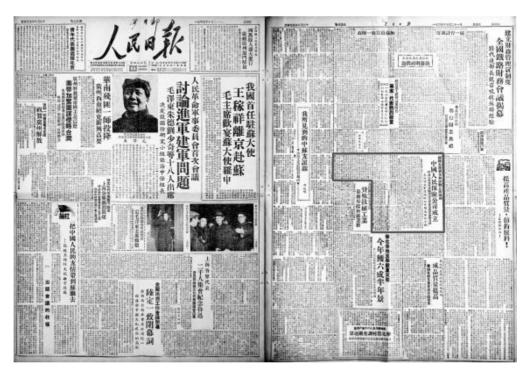
生共长""共和国保险业长子"的红色概念。当时换了三个地点,照片才完成拍摄。接着上午10时,苏联财政部次长到会场做了2个小时的报告。当天恰好是中秋节,晚上却下起了濛濛细雨。为欢迎刚刚报到的第二批从上海到北京的人员,晚上组织了舞会,直到雨停后舞会才结束。

为筹建中国人保,南汉宸当年曾向周恩来总理要人才,要求选派一名政务院参事的专业人员担任保险公司总经理。周恩来说,可由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景澐兼任。其实,南汉宸还有点舍不得让得力助手胡景澐前往,但最终还是由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景澐兼任人保公司的首任总经理。

1949年10月20日上午9时30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成立庆典在西交民巷的银行长宿舍院内的二层小楼会议室里举行。南汉宸到会祝贺并宣布,胡景澐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孙继武任副总经理。公司在北京西交民巷108号办公。《人民日报》在1949年10月21日进行了报道。



南汉宸(后排左一)等在西交民巷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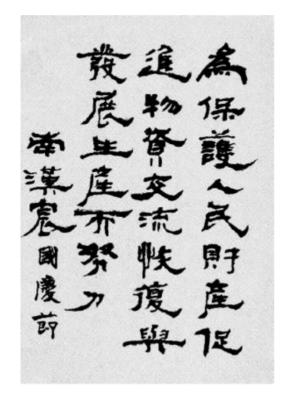


1949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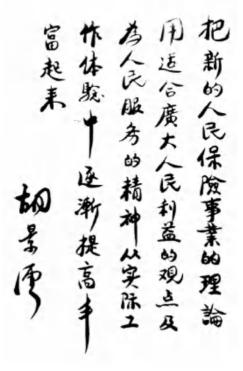
1950年,身为中国金融学会理事长的南汉宸,在创办《中国金融》杂志的同时,也积极筹划了《人民保险》杂志的创刊,南汉宸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隶书体的题词:"为保护人民财产,促进物资交流,恢复与发展生产而努力。"

胡景澐的儿子胡晋光曾讲到筹建时的情景:在筹备人民保险的那段时间,胡景澐忙得顾不上回家,尽管家就与保险公司在同一条胡同内。有时胡景澐和人谈话,顾不上去职工食堂吃晚饭。到了晚上,谈话地点就挪到家里,到他家串门的人特别多。

作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筹建组组长的孙继武,着手开展建章立业的工作,他 精雕细琢地研发保险规章守则,团结南北不同地区的同志,总结不同身份公司的 典型经验,加班加点开展筹建工作。为了方便工作,他安排来自上海保险业的专



南汉宸给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题词



胡景澐给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题词

家、人保设计室主任郭雨东,来自瑞华银行的专家、人保监察室主任程仁杰,来自人民银行第二印制局的秘书、人保人事处处长曲荷这三家人与自己一家共同住进离西交民巷办公地点不远的小四眼胡同10号的四合院。

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的同时,以原北京中国产物保险公司为基础,建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公司直属营业部。与总公司同时成立的还有中国保险公司,中国人保华东区公司和天津分公司。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成立,宣告了新中国国家保险机构的诞生,中国保险史从 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2. 更旗易帜,中国保险公司的成立

"利用、限制、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私人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而制定的基本政策。

1949年5月,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保险组逐步接管了官僚资本的保险机构,为了保障广大投保人的利益,决定重新办理复业登记手续。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及时召集保险同业公会全体会员代表会议,倾听各界意见。当时复业的华商保险公司业务不振,一些从业者看不到出路,情绪低落。军管会金融处派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代表,对私营保险公司逐个做劝解工作,鼓励、安慰他们,面对未来要抱有信心。

当时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国保险公司董事长宋汉章采取的是脚踩两条船的策略,既不去台湾,也没留在大陆,而是待在香港观望。周恩来指示,被接管后的中国银行新董事会原来的董事,只要不是战犯全部予以承认。

为了恢复国民经济、保障物资运输与外贸保险的需要,为了争取中国保险海外机构为祖国服务,随着"中国银行"经中央批准复业,原为中国银行投资含有民族资本的"中国产物保险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改组为"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上海军管会批准,于1949年6月20日正式复业。

在人民银行档案室里留存着一封手书的信件,是1949年10月25日华东区公司的谢寿天、林震峰、孙文敏三人写给北京总部胡景澐、孙继武的。在信中,他们提出建议。

由于旧上海银行家宋汉章的夫人患半身不遂疾病,宋在香港滞留,使目前不宜 宣布中国产物保险公司的改组,为保持纺织业保险业务的稳定,先默认中国保险 的总经理人选,待宋回国及海外机构接收完毕,军代表撤出后再宣布。[4]

胡景潭、孙继武同信,同意他们的建议。

1950年1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和马寅初,回复了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和副行长兼人保总经理胡景澐一封公文:关于处理中国保险公司事,所拟将中国产物保险公司改隶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内,以利用其开展海外保险业务。经研究,中国产物保险公司为中国银行所设立,且中国银行尚有私人股份,其领导关系的变更须经董事会决定,目前新的董事会尚待组成,故仍暂时维持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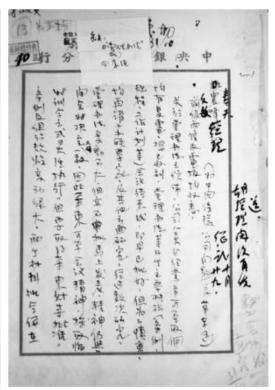
在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的统战工作决策下,中国保险公司总管理处 很快恢复了对海外分支公司的领导。随着海外员工的回归,香港、新加坡、吉隆 坡、槟城、雅加达、泗水等分支公司恢复了领导隶属关系,并积极筹划改组中国 保险公司董事会。

1951年6月5日,中国保险公司在北京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第一次董事、监事联席会议,宋汉章仍被选为董事。

军代表孙文敏作《军管时期关于业务、机构、认识之变更及措施》报告。会议 决定保留原有的《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会议选举龚饮冰(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总经理)、孙继武(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谢寿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东区公司经理)、吴震修(原"中保"常务董事)、潘久芬(原"中保"常务董事,1939年曾任"中保"董事长)为常





胡景澐、孙继武给谢寿天、林震峰和孙文敏 胡景澐、孙继武给谢寿天、林震峰和孙文敏回信的回信

务董事。董事有宋汉章、郑铁如等14人;监察有闵一民、黄子良等7人。推选龚饮冰任董事长;聘请吴震修任总经理,施哲明任第一副总经理、陈柏源任第二副总经理、孙广志任第三副总经理副总经理。聘任过福云为赴外稽核,驻上海办公,孙文敏为赴外稽核,驻香港办公。

对于这次会议,《中国保险史》一书有如下评价:

中国保险公司第一次董监事会的召开和总管理处迁京办公,加强了中国人保对海内外分支机构的领导,密切了各公司的业务联系,对于推动海外保险业务的发



1951年6月5日,参加中国保险公司第一届第一次董事、监事联席会议的人员合影

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从此中国保险公司以东南亚地区为工作重心,以发展私营外币业务和面向海外广大侨胞服务为主要任务,正式完成了向国家专营外币业务的专业化公司的转变。[4]

中国保险公司总管理处原来在上海,1951年9月25日,从上海迁到北京,在天安门西侧南长安街44号正式办公。林增余在《我的保险生涯》中回忆:

当时公司在京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全靠购买民宅作为办公和居住之处, 公司在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44号购买的一套旧王府的三进四合院办公,职工宿 舍全城东南西北都有,留给我最深印象的是给每个四合院内都专门安装了冲水便 池,这是南汉宸行长为了照顾上海来的同志的生活习惯专门嘱咐修建的。[5]

中国保险公司总部迁到北京后,公司设秘书室(张信甫任主任),业务室(蒋炳麟、朱瑞堂、景吉森分别任正副主任)、会计室(廖国英任主任)、设计室(潘华典任主任,朱元仁继任,王恩韶任正副主任,李嘉华、周泰祚任研究员)、人事室(阎文康任主任)。业务室设运输险(王仲石任副科长)、火险(黄承宏任科长)、人寿、意外险(沈才伯任科长)、分保(张伯勋任科长)和理赔(林增余任科长)6个科。

时任中国保险公司办公室主任的秦道夫曾回忆对吴震修的印象:

1951年,吴震修总经理从上海迁到北京之初,就住在护国寺街9号梅兰芳的家里,梅家称他为"吴四爷"。有一天,吴震修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新加坡中国银行的经理想要一套梅兰芳的剧照。他要我去梅兰芳家去取一下。说着,他顺手从办公桌的台历上撕下一张日历,很随便地拿起笔写了几个字,要我持这张便条去梅家取照片。我至今还记得他"唰"的一声撕下日历纸,提笔在上







吴震修



过福云

面写字的情景。[6]

吴震修通新旧两学,学养深厚,诗文都好。因此,他成为梅兰芳的得意干将。 《霸王别姬》是梅兰芳的经典剧目,久演不衰,这个戏就倾注了吴震修的大量心 血。他还曾指导梅兰芳拍摄了多部戏剧电影。

中国保险公司赴外稽核过福云,应是当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旗下最老的员工,也是新中国保险业聘用的民国时期的保险专家里级别最高的人。过福云从清朝末年就加入保险业,并在民国和新中国两个时代创建中国保险公司,从事保险职业70余年,见证了中国保险业跌宕起伏的70余年。他算得上是新中国保险业绝无仅有的"三朝元老"。

3. 太平保险公司的尘埃落定

1950年6月,周作民从香港回到北京。他是金融界头面人物中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归的第一人,作为太平保险公司董事长的周作民,成为留在大陆的最高级别的保险家。

太平保险公司副总经理王伯衡,也已明确表示留在大陆,并积极配合接收工作,他发挥着引领团结的作用。

1950年,周作民回到上海金城银行总部,指导公司的改造工作。金城、盐业、中南、大陆、联合五家银行实行公私合营,周作民任董事长,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人保上海分公司总经理谢寿天任副董事长。

1950年,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成立,金瑞麒作为进步人士、保险界专家,被业界同仁公推为主席,成为上海保险业的实际掌舵人。

1950年4月,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东区公司指引与帮助下,上海"民联分保交换处"进行改组,调整了成员公司,成立新民联,共有25家公司参加。大会选出林震峰、董国清、金瑞麒、刘聪强、陈鹤、金性初、李劲根、郭晓航、周仰汶、张明昕、林子和11人为理事。推举金瑞麒为理事长,陈鹤、张明昕为副理事长。理事会聘任唐雄俊为经理,席乃杰为副经理,关可贵为专员。

新民联在分保业务上继续坚持将全部溢额悉数分给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新民联的共同自留限额,最初定为人民币62500万元,其中,20%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认占,80%由全体交换公司按照平均基数及业绩比例分占。

新民联成立后,加强整肃行规业规,查处违法经营,提高承保理赔质量,实现 了华商私营保险业的大团结,为后来完成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



太平保险公司保险单

1951年9月,上海、天津的28家私营保险公司合并组成太平、新丰两家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入一半以上资金,从此,私营保险公司开始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公私合营后的太平保险公司一共由15家公司组成。 其中,上海的12家公司为太平、安平、天一、太安丰、华商联合、福安、宝隆、建国、大丰、大信、裕民、杨子;天津的3家公司为大昌、中安、平安。

原太平公司的周作民任 董事长,由中国人保上海公司的总经理谢寿天任副董事 长,中国人保上海公司副总 经理林震峰任总经理,金瑞 麒、李祖模为副总经理。周 作民、谢寿天、林震峰、孙文敏、阎达寅、丁雪农、顾濂溪7人为常务董事。

在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组建的同时,另一家之前已敲定的公私合营保险机构 也在进行中,这就是新丰保险公司。

1952年1月1日,公私合营的新丰保险公司正式成立。该公司是由大安、大华、中国统一、永安、永宁、泰丰、先施、光华、长城、兴华、华业、泰安、新丰共13家合并成立。公司总资本60亿元(旧人民币,下同),其中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资25亿元。

公私合营新丰保险公司由上海的13家私营保险公司合并而成,人保上海分公司总经理顾濂溪任总经理,周仰汶、李劲根任副总经理。

至此,全国范围内除国有保险公司外原先市场中所有还能营业的私营保险企业,按照计划,统一被整合为公私合营性质的太平和新丰两家保险公司。

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最终目的是消灭私有制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展开,公私合营不久的太平与新丰保险公司面临新的形势。接下来太平再次展现出与生俱来且被历史证明的强大归并能力。

1953年3月,全国保险会议在北京召开,其指导精神是"整理城市业务,停办农村业务,整顿机构,在巩固的基础上稳步前进"。同年9月,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全国掀起了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国内保险业务由国家专营的步骤更是明显加快。1955年3月8日,周作民因心脏病突发,在上海病逝。他一手打造并控制的太平保险公司也于此后转轨,向国家管理体制靠拢。

1955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加快步伐,保险业的公私合营进一步推进。在中国人保的指导下,太平、新丰两家保险公司进一步合并为一家公司,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直接领导下的专业性的保险公司,停办国内业务,主营海外业务。新公司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国际贸易、吸收外汇资金。

对于合并后的公司名称,考虑太平保险公司在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而新丰保险公司没有海外机构,因此决 定保留太平保险公司名称。



20世纪50年代,人保同仁在挂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三块牌子的办公楼前合影



20 世纪 50 年代,人保同仁在挂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三块牌子的办公楼前合影

新的太平保险总公司迁到北京,设址于北京阜成门外天宁寺路(现在的月坛北小街4号)新建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公大楼内,从现存的老照片可以看见公司大楼的门口分别挂有三块木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

太平、新丰两家保险公司完成合并,标志中国保险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完成。太平保险公司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所属的中国保险公司、民安保险公司共同成为专营海外及中国香港地区的保险业务的子公司。从此,私营保险公司彻底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正是由于中国保险公司及太平保险公司的积极努力,海外保险业务为国家创收了大量外汇,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也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发展,作出了具有历史作用的贡献。

4. 民安保险公司成为海外市场的桥头堡

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民安保险公司,比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成立还早20天。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后,民安就成为第一家在中国人保旗帜下的子公司。

与太平保险公司和中国保险公司在新中国初期的复杂演变不同,民安保险公司 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除香港外的停业清理工作。

1949年6月21日,民安保险公司在上海召开第五次董事会。董事会决定,香港分公司单独向港英政府申请注册并继续营业,总公司及国内各机构则陆续停业并清理结束。9月29日,独立法人香港民安保险公司的注册申请获得港英政府批准。10月1日,香港民安保险公司正式开门营业,由梁次渔任首任董事长,石最彦任总经理,沈日昌任经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大量进口物资需经香港转口,公司坚持积极而谨慎的发展理念,大力发展货运险、火险和相关意外险业务,为国家外贸服务。即使在50年代西方对香港实行禁运期间,公司的货运保费依然保持了增长。同时,沈日昌领导公司充分运用香港的中西合璧优势,一方面担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货运险香港理赔代理人,另一方面代理英国著名保险公司法通保险公司的业务。沈日昌带领大家努力耕耘,公司的业务逐步走上正轨。

1951年,伴随着国内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热潮,红色出身的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划归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领导,事实上已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海外公司之一,公司总经理也改由孙文敏担任,沈日昌改任协理,席乃杰为副经理。

1951年8月,民安保险总公司正式发布清理公告。此时,民安保险公司的国内各地业务已停止两年多。此后又经过近两年的梳理工作,并经上海市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金融处批准,1953年5月底民安保险公司登报声明清理结束。

1953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派华东区公司副经理孙文敏担任香港民安公司董事长,沈日昌任总经理。后来董事长几经变化,由乔彬、苑骅、于葆忠担任,但总经理沈日昌一直没有变动。

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国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和香港 民安保险公司的业务在1949年后有了很大发展。在为进出口贸易服务、为当地华 侨服务的业务方针指导下,上述3家公司在香港及海外的分支机构认真办理各项保 险业务,并严格遵守当地政府法令和当地保险公会的各项规章,积极增加为当地 华侨服务的保险业务种类,对保障当地华侨及促进当地工商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 作用。

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领导下,香港和海外保险业务逐步纳入了国家统一管理的轨道。海外保险业务在政治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获得了稳步发展,为了支援国内建设,海外各地保险机构积极设法筹集资金汇回国内,自全国解放至1953年11月,仅中国保险公司从海外调回的资金便有680多万港元,为国民经济恢复作出了贡献。

为了配合祖国贸易需要,在香港的中国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民安保险公司为客户办理转单手续,以及为国内的转口商品提供了保险方面的方便。此外,香港和新马地区机构还代理国内出口商品保险的香勘理赔工作。

海外保险业务在为华侨服务、为国家对外贸易服务、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和 争取长期存在的方针指导下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当时中国保险公司和太平保险 公司在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都设有分支机构。截至1960年

底,这些机构汇入国内的资金合计90854万美元,有力地支援了国内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全国形成了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9月,财政部即认为人民公社化后保险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10月,西安财贸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人民公社化以后,保险工作的作用已经消失,除国外保险业务必须继续办理外,国内保险业务应立即停办。"12月,武汉全国财政会议正式作出决定,立即停办国内保险业务。

从1959年起,国内保险业务除上海、哈尔滨等少数几个地方仍维持一段时间外,其他各地一律停办。国内保险业务停办后,出于精简机构的考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和太平保险公司分别撤销建制,只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管理局下设保险处,负责处理中央和北京地区的进出口保险事项,集中办理国际分保业务和对外活动。仅是在对外联系业务时,仍可分别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三家公司的名义进行。

不忘来時路 BUWANG LAISHILU

第七章

建章立业

1. "咖啡"和"大蒜"的融合

1952年8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积劳成疾,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他的亲密战友、副行长,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胡景澐立即向国务院领导报告了这一情况:

南汉宸同志八日上午感觉不适,头晕恶心,会后十二点至宿舍猝然晕倒,即送 北大医院急诊。经检查系疲劳过度,睡眠不足所致,血压尚不为过高,需住院静 养一星期,始能恢复工作。此次犯病原因,主要是连日会议较多所致。

谨此报告,请予批准暂为修养是荷。[1]

邓小平副总理当日批复:"即应停止工作,完全休息。"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在那个时期,领导与下属之间、同事之间,有着真诚无私的友谊。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是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的名言。同时,毛泽东还指出,我们的干部要关 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1949年9月25日,为筹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主持召开了

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从会议结束后的合影照片中可以看出,一个个历史人物都气宇轩昂,神采奕奕。这些前辈或来自硝烟弥漫的战场,或来自波诡云谲的敌占区;有的人出于僻壤市井的寒门,有的人出身名门望族的大户;有的人是中国传统的耕读文化的后代,有的人则是负笈海外的博学之十……

那些身穿军装的人,就是来自北方红色根据地的银行家及上海保险业地下党的 军事接管大员;那些身穿西装的人,便是来自上海大都市的保险专家。

纵览那个时代的银行保险创始人的人生轨迹,就可以发现:北方这条线,从人生经历上说,大多数是商户的后代,他们早年投奔革命,投奔红色政权的中心,筹建银行,接管金融体系,创建保险公司;从地理路径上说依次为山西(甘肃)、延安、太行山、邯郸、石家庄、天津、北京;从单位上说主要包括商家、国民军、八路军以及冀南银行、瑞华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南方这条线,从人生经历上说,大多数是银行家的后代,他们传承耕读文化,参加银行、保险工作,声援抗日,参加地下党,向往苏区,新中国成立后接管金融体系,创建新的保险公司;从地理路径上说依次为江浙、宁波、上海、昆明、重庆、北京。从单位上说主要包括银行、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太平保险、华东区保险、中国人民保险。

事在人为。清朝晚期,山西地区出现了一种介于钱庄与银行之间的旧式金融组织,号称"山西票号"。使晋商逐渐成为中国金融界之翘楚,并逐步成为当时国内商业和金融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当中很多人成为早期的革命者,这些人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在根据地为巩固政权精打细算。薄一波就是当时山西地区最著名的革命者,在他的影响下,山西的南汉宸、胡景澐、阎达寅及其他地区的孙继武、吴波等一大批金融实业家走上了革命道路,先后奔赴延安等地。

上海口岸开放后,使之逐步成为中国金融的中心,保险公司也鳞次栉比。一些 出身自书香门第和银行实业家的青年,在保险业中逐渐成为保险专家。其中涌现 出一大批进步青年,他们在白区恐怖的血雨腥风中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中共 地下党员,胡詠骐、程恩树、林震峰、谢寿天、卢绪章、杨延修、郭雨东等就是 其中的代表。

来自南北两大阵营的创业者,在出身、学识、经历、性格、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甚至存在"吃大蒜"与"喝咖啡"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但他们为新中国的保险事业尽心尽力。

在保险建章立业上,他们也有区别。来自北方的保险干部大多数崇尚苏联及捷 克保险的理论;来自上海的保险干部,脑子里装的是伦敦和苏黎世保险的法规。

来自北方的孙继武、阎达寅,为人耿直,都是打枪的好手;而来自上海的薛志章、周志诚,很有书香门第的味道,善于古琴和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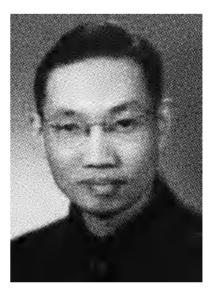
来自北方的秦道夫曾回忆,那时在西交民巷人保办公楼里,看见从上海来的保险专家跳交谊舞,他还是很不习惯,还会脸红。看见他们的学历毕业证上,印有国民党的党旗,在情感上很是不舒服。

进了保险公司,最让秦道夫头疼的就是事事要写书面报告。不管什么事,经理 们总是说写个报告交上来。不像在战区,首长亲口交代完事情,下属就去做了那 样简单。

上海出身的蔡致通,当年军管会在向他征求去北平工作的意见时,他心里犯嘀咕:一是自己是旧政府职员,对新政权有所顾忌;二是想远离政治,希望发挥自己的所学专长,从事外贸实业;三是去了北京,意味着失去了上海的汽车洋房。他写的"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道出了他当时内心矛盾的心声。

蔡致通有个妹妹,丈夫是国民党军统上海站站长,本来是要到台湾的,但妹妹执意跟随他来到北京,让他感到恐慌;而他的一个旧同事去了香港,生活很闲适,又让他羡慕。

蔡致通不但要和自己过去的资产阶级腐朽



蔡致诵



魏润泉



陶声汉

生活方式决裂,甚至要和过去的"亲朋好友"断绝往来。但他在北京依然保持着穿西装、打领带、戴礼帽的习惯。

魏润泉从上海学校一毕业,就来到北京工作, 一直做涉外业务。他有点知识分子的清高,常感到 怀才不遇。为此,也得罪不少人,吃了一些苦。同 样来自上海的徐天碧,年轻时爱写抒情诗,难免自 负,有些文人的幼稚之气,遇事习惯冲动。对于这 一点,徐天碧在回忆文章中也有反思:

我参加保联后,结识了一些后来才知道是共产党员的青年同志。特别是由于程振魁同志的耐心帮助、教育,使我这个在政治上茫然无知、思想作风上有不少小资产阶级毛病、在人生道路上彷徨的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2]

在职务安排上,来自北方红区的干部大多数担任了行政领导岗位,来自南方白区的干部大多数做了专业部门的负责人。对于公司当时任职的情况,秦道夫在书中回忆:

当时中国人保公司下设办公室, 阎达寅担任主任, 监察室主任是程仁杰, 他们都是老解放区来的干部。业务部门的干部多数来自上海, 他们在新

中国成立前从事保险,有的是保险专家,如人身险处处长陶声汉是精算师。还有财险处处长薛志章、副处长周志诚、设计室主任郭雨东、设计委员蔡致通和李进







赵济年

俞彪文

周志诚

之、理赔处副处长王关生、国外保险处处长施哲明、副处长王永明、财会处长李晴斋、华北保险处处长来如福等。^[3]

对于中国人民保险的先驱者来说,他们所有的功绩必将被记载在光荣的族 谱上。

2. 书写"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2007年6月26日,中国人保在北京饭店金色大厅隆重举行复名揭牌仪式。秦道夫等老保险首次获得人保工作25年以上纪念奖章。秦道夫在台上发表感言时,手



薛志章

里拿着一张人保50年代的老保单,他动情地说,看着这张老保单,仿佛又回到了创建人保的峥嵘岁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这个金字招牌上的几个字,我还记得是当年的财产室主任薛志章写的。

1947年12月2日,董必武将晋察冀边区政府 财政处长南汉宸考察山东地区有关发行统一货币 需求的汇报和晋察冀银行何松亭建议拟定"中国 人民银行"名称的报告,送到毛泽东在延安的窑 洞里,毛泽东当即同意筹建的中央银行采用"中 国人民银行"这一名称。

作为筹建处主任的南汉宸,为了做好人民币 的发行印制,亲自到西柏坡请董必武书写了楷书 "中国人民银行"行名。1948年12月1日,第一套人民币正式发行,中国人民银行标准字第一次亮相。1952年,在筹划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时,南汉宸找到人民银行经济研究室的山西人马文蔚重新书写了行名。

或许由于南汉宸对隶书情有独钟,使人民银行这个隶书体的行名—直沿用至 今,也影响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隶书体标准字的确立。

人保公司总经理胡景澐邀请公司财险部的薛志章,书写了隶书体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几个字。因此,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标准字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标准字极其相似,力足丰润、典雅和谐

作为品牌标准字,这几个字 被印在中国人保开发的第一代保 单上。至今,中国人保虽经历次 变革,但标准字一直沿袭着隶书 字体,并成为文化内涵的体现。

目刚柔并济。

薛志章从小深受江南耕读文 化的侵染,善于书法,勤于金石 篆刻,造诣很深。1949年12月21 日,在斯大林70岁大寿典礼上, 在毛泽东所带的贺礼中,就有一 方由薛志章所刻的精美印章。

薛志章的古琴、二胡造诣也 很深。他早年参与张伯驹、管平 湖、吴景略、王世襄、溥雪斋、 查阜西、汪孟舒、杨葆元、郑珉 中等人倡议成立的"北平琴学 社"。后来受周恩来邀请,薛志



太平保险公司保险单

章曾到中南海为毛泽东、朱德、陈毅等演奏古琴。据薛志章女儿介绍,当年,她随父亲去过古琴大师查阜西老先生家,父亲离开北京时,先后把家里的九张古琴全部赠送给了香老和古琴协会,那些古琴在今天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1931年, 薛志章由宋汉章董事长亲自录取, 在中国保险公司任职, 很快成为上海保险业的一名翘楚。

1949年5月,薛志章婉拒了宋汉章撤离上海到香港创业的邀请。他坚持留在上海,配合共产党的接收工作。

1949年8月,经陆自成举荐,薛志章来到北京参加筹办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为新中国保险业的奠基人之一。

在人保成立初期,薛志章是财险室第一任主任,还曾同时任国内业务处、国外业务处、防灾理陪处三个处的处长。可见他当时在公司的地位举足轻重,为公司发展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

中国人保创建不久,标识与标准字几乎是一同诞生的。人保公司的第一代标识,很快被广泛应用。

在现存的那个时期的保单及人保员工佩戴徽章的老照片上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标识的运用还是很普遍很规范的,这在中国早期的经济建设粗犷发展时期,是并不多见的现象。原因可能一是中国人保那时毕竟是中央一级机构,工作效率高,人员素质高;二是人保干部很多是从上海的外国保险公司转换过来的,保留了西方经营中的品牌意识与习惯。



中國人民保險公司

人保第一代标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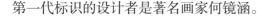


人保第一代标识墨稿



人保第一代徽章

第一代标识充满了强烈的时代特色和浓厚的政治色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标识的设计,深受国徽、政协徽志及前苏联文化等影响,形象元素构成为麦穗、齿轮、五星、绸带,代表中国工农大众的主体,而徽标中的中国地图图形又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保险"这一品牌的具体形象。地图中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繁体字,标识颜色为红色。整个标识丰厚饱满,复杂而又不易制作,象征意义全面具体。



何镜涵出生于北京满族世家, 从小受父母



何镜涵

影响,舞文弄墨,曾得到徐悲鸿赏识。他有个同学在人保公司工作,秘书室让他推荐个画家,从事宣传工作。何镜涵在河北为首届劳模农民大会画画时,人保公司就已经为他办好了人职手续。

但当时参加工作还要有个保人,何镜涵就找到著名画家黄均,他为何镜涵写了 一封很长的保证书。

1951年初,何镜涵正式加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任美术组组长。到了公司,他 就设计了人保的第一代标识,很快就被印到保险单上了。

何镜涵平日还要负责人保公司板报橱窗的日常宣传、会场布置、办公区域的美化等工作、十分辛苦、需要付出许多体力劳动。

当时,保险宣传和思想发动工作显得十分重要,保险公司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 向全社会宣传解释强制保险的意义和具体规定。《人民日报》发表《必须实行强 制保险》的社论,对强制保险推广进行了舆论主导。但这些还不够,还要有通俗 易懂、有形象感染力的宣传形式,如广告招贴,幻灯片、连环画等。何镜涵用他 的专业水平,保证了人保美术宣传工作的开展。



中国人民保险的老招贴(旅客意外伤害保险)

尽管保险招贴画有服务 于一定商业的目的,但其属 于服务社会的需求,因此保 险招贴画也被时代特色熏 染,深受当时的宣传画影 响,有着极强的政治性。那 个时期的保险招贴画大多数 体现出支持国家建设、爱护 国家企业社队财产、劳动人 民过上幸福安康生活等朝保 家卫国""安全生产、防止

阶级敌人破坏"的口号。

1950年,中国人保就提出了自己的文化理念: "保护国家财产,保障生产安全,促进物资交流,增进人民福利。"

1949年10月后,中国进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 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国民经济,成为新中国成立初的三年时间里首要的艰巨任 务。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就是在这种大规模经济建设需求的基础上孕育而生的。

1949年9月25日,由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第一次全国保险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下的国家金融机构的一部分,属于国营企业。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为生产服务,主要任务有以下三项:

(1)保障生产安全,扶助贸易发展,促进城乡物资交流; (2)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 (3)保护国家财产。[4]

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经过加工整理,形成了中国人保最早的文化理念内容。中

国人保从一开始就肩负着重大使命,充满着时代特色,展现出国有大公司的企业 形象。中国人保从一诞生起,便发挥着保险保障社会经济、促进生产发展的独特 功能,以有效克服当时经济和民生方面的种种时弊和困境。

虽然还不能说"保护国家财产,保障生产安全,促进物资交流,增进人民福利"是一条规范意义上的企业文化理念,但它忠诚地体现出企业经营的职能与服务国家和人民相结合的特色,兼顾了人民和国家、生产和经济各方面。

它的语句也有时代特色,语言烦琐,追求对仗,上下句字数统一。考虑当时人 们薄弱的保险意识,特意将"保险"一词转换为"保障"和"保护"。

标准字、标识、文化理念,共同构成了中国人保初期的品牌文化形象。

3.《组织条例》和排兵布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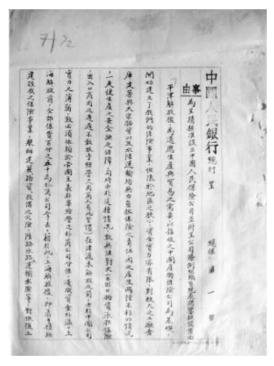
在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条例草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组织规程草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各区公司按此条例和规程进行了组建。后来中国人民银行将两个文件合并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组织条例草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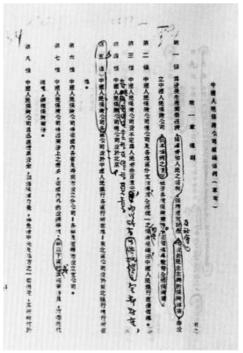
1949年12月30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核准批复:

总管字第十六号呈与保险公司组织草案均悉。目前政务院各部、委行署之组织结构,均未正式批准。因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之组织条例,亦准于暂时试行,在试行过程中,有何问题,应研究改进,施行一个时期,再呈报批准。^[5]

财经委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马寅初分别在批示上署名。1950年1月4日,中国人保正式颁布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组织条例(草案)》。这一草案勾勒了中国人保最初的体制架构。

关于工作方针,最初的提法是"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并执行新民主主义保险 政策,特设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依本条例之规定经营各种保险业务并领导与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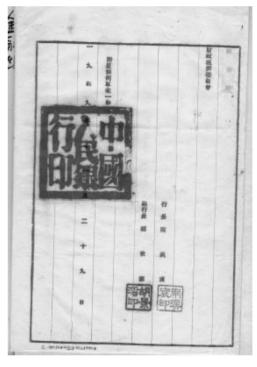
"组织条例"手稿

"组织条例"手稿

督全国保险业",后来随着情况变化,改为"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保护国家及社会财产,保障劳动人民之福利,特设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各种保险业务"。按照前一提法,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不仅是一个经营各种保险业务的经济实体,而且是兼有领导与监督全国保险业职能的行政管理机构。所以,开业时总公司和各区公司均设有监理室和监理科。1950年1月下旬开始,保险监理业务划归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部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所属的监理部门相继撤销,从而实现了向完全的金融企业过渡的转变。

关于公司资本,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议定为200亿元,1949年11月3日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为300亿元。为适应公私企业财产保险的需要,1949年12月1日又上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要求增资为600亿元。这个要求得到批准后,1950年《中





"组织条例汇报"

南汉宸、胡景澐签发的"组织条例汇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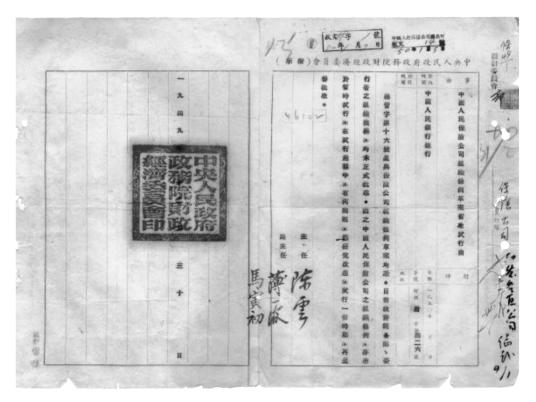
国人民保险公司组织条例(草案)》中正式确立公司资本为600亿元,并以全部财产对其业务及债务负责。

关于机构设置,根据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拟订的公司组织规程草案,总公司机构分四室一会,"四室"即秘书室、业务室、会计室、监理室,"一会"为设计委员会;各级区公司设秘书、业务、会计、监理、研究5个科室。随着业务的发展,机构设置也相应变化,1950年《组织条例》正式确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公司机构为10室,即秘书室、人事室、检查室、财产保险室、人身保险室、农业保险室、国外业务室、理赔室、会计室、设计室。区公司机构则改为8科,即秘书科、人事科、检查科、财产保险科、人身保险科、农业保险科、会计科、研究科。其他分支机构也作了相应调整。

人保公司最初的机构设置及负责人为:秘书室主任阎达寅,人事室副主任曲荷,检查室主任程仁杰,财产险室主任薛志章,人身险室主任陶声汉,会计室主任李晴斋,设计室主任郭雨东,设计委员蔡致通,营业部主任郑揖庄。

当时总部人员平均年龄为41岁,那时的工资以小米折实。人保总公司人事室 1950年3月4日制作的"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三月份名册表"中记载了当时人保全 体员工的薪酬状况:

副经理孙继武为最高一级,月薪860斤小米(总经理因由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景 雲兼任,其工资在人民银行发放)。正主任一级月薪在700斤小米上下,如秘书室



陈云、薄一波、马寅初对"组织条例"的批示

主任阎达寅720斤,检查室主任程仁杰640斤,财险室主任薛志章750斤,人身险室主任陶声汉750斤,设计室主任郭雨东及设计委员蔡致通同为750斤,会计室主任李晴斋640斤(原主任为林正荣,750斤),营业部主任郑揖庄620斤。副主任一级月薪为500多斤小米,如人事室副主任曲荷540斤,秘书赵济年510斤。科级干部月薪约400斤小米。普通干部一般月薪为300多斤。警卫、通讯员、锅炉工、厨师月薪200斤上下。实习生月薪140斤。^[6]

从上述情况看,当时总公司的薪酬水平比地方略高。根据记载,同期湖南省政府厅级干部月薪400~450斤小米,外级350~400斤小米,办事员200~250斤小米。

关于资金运用,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通过的公司组织条例对于资金运用有明确规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资金,交由中国人民银行保本运用之。

关于税赋和纯益分配问题,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通过的条例没有作出规定。1950年条例分别在第五条与第四十九条中明确规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迅速积累资金,加强保障力量,得免缴中央及地方一切捐税,其所给付被保险人







郭雨东的仟命书

之赔款或保险金免缴所得税或遗产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每届决算,除应提各种保险责任准备金外,其纯益应按左(下)列比例分配之:一、公积金百分之五十。二、特别准备金百分之二十。三、提交中国人民银行百分之三十。"

上述关于税赋和纯益分配的规定, 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央人民政府财 经委员会对保险事业的支持和爱护。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实力不 断壮大, 信誉空前提高, 与政府采取的合乎保险规律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以后,依靠人民政府的有力支持,迅速在全国建立起多个分支机构。先后成立了华东、华中、西北、西南、华北5个区公司及天津分公司,又协助原东北保险公司改组为东北区公司。

华东区公司:经理谢寿天,副经理林震峰、孙文敏,专门委员过福云、孙广志。

东北区公司, 经理罗高元。

西南区公司: 经理郑辰西, 副经理陆自诚。

中南区公司, 经理何幼琦, 副经理牛牧野、钱家泰。

西北区公司, 经理王慈。

华北区公司为总公司直辖区,总公司财产险室设华北业务科负责管理,科长许 树华,副科长孙辅基。

北京分公司由总公司营业部改组成立,营业部主任郑揖庄任经理,原营业部副 主任周庆麟任副经理。

天津分公司: 经理赵步崇, 副经理王佩璋、龚作霖。

绥远分公司: 经理张光, 副经理吴彩、李铁军。

河北分公司: 经理刘秀实, 副经理冯国俊。

察哈尔分公司: 经理杨泽生。

平原分公司:经理薛际春,副经理杨自卫。

山西分公司:李进军,副经理巩文义。

各大区公司成立后,注重加强机构和队伍建设,一方面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各地



李晴斋

分支机构广泛开展保险代理业务,另一方面在有 条件的省、市、县建立人民保险公司的下属分支 机构。

从1949年10月总公司成立到1950年6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建立各级机构共73个,包括5个大区公司、31个省分公司、8个支公司、25个办事办、4个营业部及派驻所。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机构分布之广、业务覆盖 范围之大,前所未有,一举改变了过去保险集中 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少数大城市的畸形现象, 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保险业务,在更广泛的范围 内分散风险创造了条件。

人保成立初期,人手非常紧张,总部再次从上海调入保险专家。经谢寿天、郭雨东推荐,李晴斋调入北京总部。1950年2月,李晴斋任人保公司设计室委员。随后,李晴斋被任命为人保公司财会室主任。

从1949年10月20日至1949年底,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账面盈余纯益为16901651万元,扣除资金600亿元,折实保本升值数为16695492万元,实际纯益为206159万元,按公司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的30%上缴中国人民银行,计上缴61847万元,较好地发挥了提供风险补偿和增加财政积累的作用。

李晴斋主管人保财政大权,任务艰巨繁重。他整日在西交民巷108号原金城银行老洋楼的办公室里伏案工作,经常加班加点。李晴斋如账房先生一样拨打着竹木算盘,财会室员工有节奏的算盘声,如同新时代的旋律。如今,公司办公室里响起来的是敲击电脑键盘的声音,这也是新时代的旋律。

4.《保险法》试水

1949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组织成立了法规编审委员会,开展对有关金融 法规的制定和研究工作。委员会内分7个小组,其中保险法规小组由中国人民保险 公司组织开展工作,负责草拟制定新的保险法和保险业务章程,这是新中国首次 对保险法进行的探索实践,薛志章任法制条款组组长。

考虑到国立上海商学院是中国设立保险学系的唯一大学,国内私营保险公司及保险专家又多集中在上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指示华东区公司负责组织法规研究委员会,草拟保险法草案。

1949年11月26日,华东区公司按照北京总部指示召开保险法规研究会。会上产生了保险法和保险业法两个研究小组,由与会的人任选一组参加。

参加保险法小组的有魏文达等15人。保险法小组推定陆自诚、王效文、龚汇百、刘焕文、叶志修5人负责起草,其间孙广志、魏文达分别草拟了火灾保险部分和海上保险部分的初稿,经过数次讨论修改,最后由王效文统稿定稿。

参加保险业法小组的有施哲明、王伯衡、陶听轩等16人,该小组推定关可贵、潘华典、金瑞琪、毛啸岑、王伯衡、施哲明等6人负责起草,关可贵执笔。

当时拟定保险法的基本精神是:保险法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由于订立保险

契约而发生权利与义务的法规,根据人民政府保护人民财产、减少国家财富损失的号召,新保险法应强调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防灾设施有指导与检查的权利,同时被保险人对保险人的指导与检查有遵守的义务。

拟定的保险法主要内容是: (一)总则(包括定义、标的和当事人); (二)被保险人利益; (三)保险契约; (四)特约条款; (五)保险人之责任; (六)保险费; (七)保险金额(包括超额保险、全部保险、部分保险、复保险等问题); (八)再保险; (九)时效; (十)损失保险; (十一)人身保险。

保险业法小组的基本精神是:一方面,要根据新民主主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原则,对私营保险业加以扶助监督和改造,达到摆脱外国的垄断;另一方面,把不利于国计民生的经营方式彻底改变过来,使保险业在政府领导下走上正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该小组将保险业管理办法改为保险业管理条例。主要内容是: (一)保险业之分类(包括保险公司、保险合作社、保险经纪人、保险代理人、保险公证人等); (二)各种保险业设立、登记、领照手续; (三)保险公司与保险合作社(限于农业保险)之最低资本或基金; (四)保险公司应缴之保证金; (五)保险业资金运用之范围; (六)保险业对主管机关之报告制度; (七)保险业应遵守之事项及罚则; (八)保险业自留额之登记及溢额之处理; (九)外商保险业之管理; (十)保险业之停办清理手续。

1950年3月3日,保险法草案及保险业条例经研究会全体讨论通过后上报。新的保险法草拟以旧保险法为蓝本,剔除了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对外国的保险法规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合理吸收,但不照搬抄袭,比如参照了苏联的保险法。

可是,由于计划经济思想的主导以及法制观念的淡薄,保险法并没有实施颁布,被长期搁置。由于对私营保险业改组进行得很快,保险经纪人、公证人业务逐渐减少,保险业管理条例也因此没有对外公布,只是成为保险业管理政策的参考。

1950年起草的"保险法"成为新中国保险法出台的最早探索。直到1995年,新中国第一部《保险法》才正式公布和实施。

不忘来時路 BUWANG LAISHILU

第八章 重打鼓 另开张

1 苏联老大哥传授的强制保险

1950年9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依据苏联保险的经验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了实行强制保险的建议。当时大家认为苏联保险发达的原因,是推行了国家强制保险政策,使保险业务开展得普遍而又深入。

1950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邀集中央财经系统各部委召开会议,讨论强制保险问题,使强制保险工作首先得到财经系统的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胡景澐在会议上作了《实行强制保险的重要意义》的报告。

苏北公司经理李继明曾在回忆录中说:

那时的保险工作可以说是既难做,又好做。说它难做,是因为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大多数地方的人们在旧社会没有形成保险习惯,所以要动员人们参加保险需要做很多宣传动员工作。大家风里来、雨里去,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到田间地头、工矿车间宣传保险。大家想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绝没有用公家的钱吃吃喝喝的事。说它好做,是因为那时做保险,讲求依靠党政结合中心工作来开展业务,只要得到党政领导的支持,红头文件发下去,业务就上来了。怎样才能取得支持呢?就是多请示、多汇报,要口勤脚勤。[1]



1950年中共上海地下党财经系统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合影(前排左一谢寿天、左二卢绪章,后排左三程恩树,中排左一杨征修)

1951年2月3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财产强制保险及旅客强制保险的决定》,规定"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及合作社因保险而支出之费用,准予编入预算报销,或列入成本计算"。同时,"指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办理强制保险的法定机关。"同年4月24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关于颁布财产强制保险等条例的命令》,对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拟定的《财产强制保险条例》《船舶强制保险条例》《铁路车辆强制保险条例》《轮船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飞机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核定准予公布施行。这些条例公布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各地分支机构迅速行动起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和部署下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强制保险。

政务院命令下达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多次下达指示和规定,要求各级行处代保险公司收缴强制保险保费及滞纳金;对当地保险公司推行强制保险业务,应尽量予以协助;对于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及县以上供销合作社的有关财产,如不涉及国家机密,均可由该单位提供材料,由保险公司派员前往协助办理投保。同时,总行还要求各地行处,凡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尚未设立机构的地点,均由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特约代理处办理保险。

强制保险是一项新的工作,为了加强领导,总公司专门成立了强制保险小组,



《保险业务条例办法汇编》

主动与在京中央行政机关、国营企业的主管部门及合作总社联系,促请将此令分 别依照垂直系统从速转发所属机构,以便及早办理投保手续。

在推行强制保险工作中,公司确定了"重点掌握、全面推行"的原则,即分别给予支公司5000万元、分公司1亿元、区公司10亿元的强制保险赔偿核定权,如超过核定数额时,应上报核定。

此时,宣传和思想发动工作显得十分重要,保险公司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向全社会宣传解释强制保险的意义和具体规定。作为保险公司的第一支笔杆子,阎达寅积极撰写宣传材料,联系渠道发表。1951年2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实行强制保险》的社论,对强制保险推广进行了舆论主导。这篇社论的初稿主要是由阎达寅撰写的。这也是中国人保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可见当时人保公司宣传力度之大。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保公司依然延续了在党报宣传的传统。

总公司要求强制保险要善于抓试点、抓典型,以点带面。其中,东北区公司



1951年2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实行强制保险》的社论

强制保险工作做得比较出色。东 北区公司深入了解各单位对于执 行强制保险的意见与困难,经过 分析研究,归纳出财产估价、保 密、投保范围、公产和房产的保 费负担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并拟 定出相应的具体处理方案。

1951年2月,东北银行邀请东北区级和沈阳市府各有关局、处、公司等单位举行强制保险座谈会后,各单位很快统一了意见;3月就有财政部、工业部、贸易部系统的21个单位及东北邮电总局、东北银行等与保险公司发布联合通知,分别督促其下级机关认真执行强制保险决定,限期投保,大大推动了强制保险业务的开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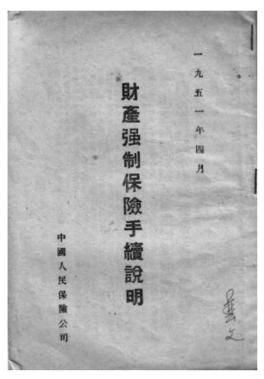
铁路、轮船和飞机三种旅客

意外伤害强制保险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委托交通运输部门代办。从1951年7月起, 铁路和飞机旅客的强制保险在全国同时实施。轮船旅客的强制保险,由于当时尚 有私营航运企业存在,航线也比较分散,直到1951年9月才在全国普遍实行。

三种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规定,保险费都由运输部门在售票时随同票价 附收,然后按月交国家保险机构,保险费按照各种客票票价的一定比例计算,火 车为2%,轮船为3%,飞机为0.5%。对于持半票、折扣票的旅客都按实收票价计算 保险费,对持免费票的旅客不收保险费。每一位旅客的保险金额不分席位、舱位 等次,不分全票、半票或免票,一律为人民币1500万元(旧币)。凡是旅客由于意外事故受了伤害需要治疗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1500万元的数额以内给付医疗费用。如果旅客由于意外伤害丧失劳动能力的,除给付医疗费用外,对死亡或丧失全部劳动能力的,给付保险金1500万元(旧币);对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则视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按照比例给付保险金。

人保烟台分公司开办公路旅客保险,当时理赔科的严柏昌是刚从华东保险培训 班毕业的新员工,他回忆道:

有位祖籍山东的东北人, 从大连坐船到烟台, 再乘汽车回家。他领着老伴上







人保强制保险保险单

了车。那时候的车是烧木炭的,手摇的。老伴刚上车,车突然启动,一下把老伴摔了下来,不幸身亡。运输公司投了保险,就给保险公司投案,公司派我去现场查勘。保额是1500元左右(新币),那时我的工资才42.5元。结果给东北老乡赔了一千多元。老乡在悲伤的时候,领到保险赔款,手都是颤抖的,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他感觉是政府行为,感动得连声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2]

搭乘客运汽车的旅客意外伤害保险办法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当地情况制定,事实上是一种地方性的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到1952年底,全国各地都已办理。

2. 以火灾为主的城市自愿保险

在前门大街的全聚德餐厅大堂,展示着一件人保1951年的火灾保险单,见证了 全聚德和人保公司两家著名企业的悠久历史。

为了使私营工商业能够正常从事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和经营,督促它们加强 防灾,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展了普通火灾保险业务。这也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 立以后最早开办的一项业务。

火灾保险包括普通火灾保险和公民财产保险。普通火灾保险主要承保私营工商业的财产。在实行强制保险以前,国营企业自愿投保了普通火灾保险。公民财产保险则是承保个人的财产。当时,在我国的外国使馆和不少外侨的财产也投保了火灾保险。

火灾保险刚开办的时候,为了适应迅速开展业务的需要,基本上沿用了新中国成立前的火灾保险办法,只是对其中某些明显不合理的部分作了修改。1951年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制定并实行了新的全国统一的普通火灾保险办法,扩大了保险责任范围,大大降低了保险费率。在保险责任方面,增加了地震、地陷、爆炸等责任;为了鼓励投保人在发生灾害事故时,积极抢救保险财产,减少损失,新办法还规定,凡是发生灾害时投保人因抢救或保护保险财产而支出的合理费

用,都可以由保险公司赔偿;同时,大幅度降低了保险费率,保险费率约比1949 年前降低了65%。

普通火灾保险除承保私营工商业的财产外,还承保县以下供销合作社和城市 手工业合作社的财产。针对县以下供销社地处分散、货物品种多、流动性大的特 点,采取了通过县社统一投保、按期凭账结算的简化保险办法,并实行了优待保 险费的规定,体现了国家扶助合作经济的政策。1952年10月,国家保险机构开办 的普通火灾保险有了很大发展,据中南、华东、东北76个城市的统计,投保的工 商户占全部工商户的21.36%。

公民财产保险自1951年开始办理。当时开办的业务有职工团体火灾保险和简易火灾保险两种。职工团体火灾保险以厂矿、企业、机关团体的职工为对象,采用团体方式投保;简易火灾保险以一般城市居民、手工业者、小商小贩为对象,采用个别投保方式。这两种方法都因为费率低、保障大、手续简便而受到职工和居民的欢迎。1951年下半年以后,这两种业务在全国各个城市中普遍展开,得到各厂矿、企业、工会和街道居民组织的积极支持,业务发展迅速,仅上海一地,1952年就有40余万户职工、居民参加了保险。

1951年初,东北区公司在全区开办了小额简易火灾保险,承保对象为住户,工厂、农场或机关的职工宿舍,资本额在5000万元(东北币)以内的小商店及小制造业或加工业,保险标的为衣服、行李、家具、食品、燃料及小量的原材料、货物、工具等。费率为2%~7%,期限为半年。截至1952年12月底,东北全区约60%的私营工商户和20%的城市居民户以及15%的农村居民户参加了火灾保险。

从1949年10月至1952年底,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火灾保险保费收入达4300余亿元,支付赔款289亿元。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办理的物资运输保险有轮船、木船、火车、汽车、驿运、航空6种运输保险和各种附加保险。物资运输险主要承保国营和私营工商企业在运输过程中的物资,附加保险主要是沿海匪盗险和破碎渗漏险。

物资运输保险是城市财产自愿保险业务的主要组成部分。开办之初, 承保的

主要是国营和私营商业的运输物资,以后逐步发展,陆续承保了很多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工业部门的运输物资。1951年,国营企业财产实行强制保险,大大推动了物资运输保险业务的发展。木船运输保险的发展尤其迅速,到1951年底,国内每一条江河,包括黄河、乌江等河流,以及历史上从未通航而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开辟的航道在内,都开办了物资运输保险业务。其中,黄河、汉江的上游,以及西南大部分地区的船运物资,90%都参加了保险。内河运输险费率除了轮船、木船、机帆船及100吨以下小船等分档收取保险费外,还以水流急缓来制定保险费率,内河运输和沿海运输的保险费率也有区别。

在开办物资运输保险业务过程中,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根据投保单位主要是国营企业,其经济活动主要依靠计划调节的特点,充分发挥国家保险机构资金雄厚、信誉卓著的优势,在开展业务的方法上作了重要改进,普遍采取了预约保险合同的投保办法,即投保单位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事先商定投保范围,以合同形式确定下来,保险公司则根据这个范围承担保险责任。到1951年底,全国各商业部门所属单位基本上都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签订了预约保险合同。

为了方便保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普遍委托运输机构代办保险手续,并在一些物资转运量大的火车站、汽车站和码头设立保险服务站,方便零星分散物资投保。在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方面,各地分支公司积极参加当地物资交流会的服务工作,不少地区保险公司与银行、税务、运输、邮电等部门一道,在物资交流会上设立联合服务处,并对成交物资和滞销土特产给予保险费的优惠。

在当时运输条件比较差的条件下开展物资运输保险业务,对于促进物资交流、配合进出口贸易、支援沿海地区物资调拨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当时反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的斗争作出了应有贡献。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办理的运输工具保险主要有汽车保险、船舶保险和海洋 渔船保险,这三种保险都是自愿保险。在1951年实施强制保险以前,曾对国营企 业的船舶办理了自愿保险。汽车保险主要承保地方国营交通运输部门和国营厂矿 的汽车。私营工商业投保的汽车,起初占整个汽车保险业务的30%左右,以后随着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比重逐年下降。当时,各国外交使馆和外侨的汽车也参加了保险。

随着国家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汽车保险业务逐年增长,汽车保险的规章办法也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做过多次改革。其中,保险费率经过几次调整以后,只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前的28%左右。

在开办汽车保险业务的初期,国家保险机构曾沿用旧中国汽车保险的办法,办理汽车公众责任险。这是汽车保险的附加保险。投保这种保险以后,如果投保人驾驶投保汽车发生事故而伤害他人的身体或财产,依法应由投保人负责赔偿时,国家保险机构在保险金额的限度内,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后来对这项业务的开办产生异议,认为这一险种的开办会减轻企业加强交通安全管理的责任心,有副作用,因此在1954年停办。

船舶保险和海洋渔船保险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保险业务。在木船运输业和 渔业合作化以前,承保个体船民、渔民的木船;合作化以后,承保合作社的木船 和渔船。木船保险和海洋渔船保险在1950—1951年先后开办,从1952年开始,凡 是有木船运输和海洋渔业生产的省、市、自治区、都普遍办理了这两项业务。

此外,为了扶持新中国"年幼"的民航事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还用一般费率 承保了当时民航部门数量不多但单机价值甚高的飞机保险。

1953年的运输保险业务(主要是国营企业投保的)较1951年增长67%,运输工 县自愿险较上年增长35%。

3. 人身保险先树形象后做业务

1949年以前,全国范围内共有35家人寿保险公司,其中官僚资本3家、私营14家、外商18家,但大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停业,使存款人和保户受到极大损失,受害者超过100万户,涉及近千万人的切身利益。1947年底,国民政府曾制定《银行业战前存款清偿条例》,对寿险清偿也拟定了条例,却未实行。

人民政府本来没有清偿义务,但从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考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成立不久,便开展了1949年以前的人寿保险契约中未清偿部分的清理给付工作。这体现了国有公司勇于担当的气魄,同时在树立政府形象、维护人保公司信誉方面,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这也是保险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内容,是人民政府尽职尽责解决保险业遗留 问题、维护被保险人利益的实际行动,也是团结港澳同胞和居住在国外的华侨, 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一项具体工作。

中国人保发出了《关于解放前银钱业未清偿存款给付办法》,该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解放前人寿保险得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参照本办法另订标准清理之。" 为此,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制定了《解放前保险业未清偿人寿保险契约给付办法》,1954年12月15日由财政部批准公布施行。

按规定,3家官僚资本公司的清偿由邮电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国保险公司办理。1955年1月5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指定全国69个大中城市的分支机构接受登记,登记期限延长至1957年底。

全部清偿工作按照"重点登记(大中城市)、集中审查(上海、北京)、就地给付"的原则顺利进行。中国人保派出干部积极协助并组织各公司负责人成立工作小组,规定各公司定期报送登记、查对和给付情况的报表,重点做好审查工作。除有的公司因在我国大陆地区既无财产也无代表,无法对其寿险契约进行清偿外,其余各单位的寿险清偿工作基本上在1957年底如期结束。各清偿单位接受申请登记的寿险保户共有1.96亿户,应清偿361.86亿元。截至1959年11月底,已给付19.3万户,实付清偿金297.67亿元。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掌握了各公司未清偿的寿险契约清册,并对现有资产进行检查、冻结。督促各公司筹措资金,查工作。保户致信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要求协助向外商公司交涉的有1281户,分别涉及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保险公司。

新中国成立前寿险契约的清偿工作的影响相当广泛,得到清偿的保户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分布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港澳同胞和远居国外的侨胞也得到清偿)。

1949年底,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上海市试办了职工团体人身保险,1950年起陆续在全国各省、市和自治区开办。

1951年,随着财政经济状况逐渐好转,国家开始对100人以上的工矿企业职工和铁路、航运、邮电部门的职工实施劳动保险,使这些单位的生、老、病、死、伤、残等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但这只是一部分单位,而且待遇标准也比较低,没有实施劳动保险条例的单位继续为职工办理团体人身保险。一些由职工自己负担保险费的单位,也在实施劳动保险条例后继续参加团体人身保险。到1953年初,全国有近100万名职工参加了团体人身保险。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还开办了船员团体人身保险、渔工团体人身保险和建筑工人意外伤害保险。这三种保险业务都是按照集体方式投保。在保险责任方面,除了

按保险人死亡或丧失劳动能力时给付保险金外,还包括给付意外伤害医疗津贴的责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了适应航运企业员工的需要,开办了船员团体人身保险,保险费由企业方面负担。船员团体人身保险在1949年底首先在上海开办。朝鲜战争发生后,海上运输安全受到威胁,不少航运企业为职工又加保了海上匪盗险。

1950年,船员团体人身保险被推广到沿海各港口和长江的一些港口办理。1951年国家对主要工矿、交通企业的职工包括航运职工在内实施劳动保险以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就停办了团体人身保险。中国



公司就停办了团体人身保险。中国 1952年,中国人保发行的宣传挂历 人民保险公司还开展了海工团体人身保险,为海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保障。

建筑工人意外伤害保险是在国家开始重点基本建设的情况下开办的。当时,对于建筑工人发生意外事故时如何进行补助,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因此国家要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理建筑工人意外伤害保险。这种保险由建筑企业缴纳保费,为固定工人和临时工人投保,保险费按照一个工程的实际劳动日计算。

1951年开办的简易人身保险的主要对象是城市手工业者、小商小贩、搬运工人和其他个体劳动者以及他们的家属。简易人身保险各地差别很大,有的地区业务发展缓慢,而有的地区业务增长较快。截至1952年底,全国约有10万人参加了这种保险。

1953年2月,政务院公布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人身自愿保险完全由中国人民

保险公司开办。当时办理的人身自愿保险分为两类:一类是按集体方式投保的不带储蓄性质的人身保险,其中主要是职工团体人身保险;另一类是按个人方式投保的带有储蓄性质的人身保险,其中主要是简易人身保险。

4. 防灾防损抓得早

1949年12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东区公司召开全区保险公司会议,部署落实总公司会议精神。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副行长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东区公司经理谢寿天,在上海广播电台播讲了人民保险事业为保护国家财产安全和开展防火工作的业务方针。

当时,上海市工部局消防处队长王文涛听到广播后,深受触动,他写信给谢寿天,表示愿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参与防火工作。华东区保险公司成立了防火小组,楼茂庆和范燕生、张异卿、姚文奎等负责防火防灾的宣传和组织。中国保险公司的林增余、施开先等也参加了小组工作。据楼茂庆在回忆文章中介绍:

王文涛在上海市工部局消防处工作多年,对消防与预防火灾都有丰富的经验。他负责教导人保员工学习防火知识,使用的教材是美国的"防火手册",教学内容是:火的原理及构成因素,火灾及发生的原因,火灾施救的方法,消防设备器具的种类及使用保养方法等。[3]

人保华东区公司开创性地开展工作,探索新型防灾措施。他们先后到工厂、仓

库进行防火检查。工厂方面,主要检查厂房建筑、机器设备、安全管理、消防组织、消防设施等;仓库方面,主要检查库房建筑、一般物资与危险品的储存、用火用电情况、管理制度、消防组织、消防设施等。

检查中,发现违反消防条例规定的,一般情况的,当时提出改进意见;情况严重的,提出防火建议书,要求改进,并进行复查。被检查的单位都是国营企业,全部实行财产强制保险,都能按照防火建议进行改进。这不单是确定保险费率、计算保险费的消防检查,更是重在为企业所想的防灾服务。

1950年,在华东区公司的指导下,上海民联分保交换处创办了《防灾》杂志,以函索即寄的赠送形式向社会发行。该杂志版面不大,但内容丰富,经常刊载保险知识,介绍业务发展动态及新修订的业务规章,宣传树立防灾意识。尤其是通过保险专家撰文研究防灾课题,不仅深化了保险防灾的理论深度,而且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拓展了防灾实务范围。

1951年,人保华东区公司率先成立防灾理赔科,张仲良任科长,杨紫竹任副科长兼防灾股长,楼茂庆任副股长。由于防灾工作涉及面广,内容复杂,技术性



楼茂庆

强,全面开展难度较大,因此,上海公司总是 先从防火工作开始,培养了专业干部,掌握了技术,积累了经验,并在全国得到逐步推广。楼茂 庆也被调到人保总部,负责防灾防损工作。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创立之初即明确:作为人民保险公司,要从保护国家财产出发,降低赔付率,积极将风险补偿和防灾防损有机结合,把实现风险补偿和增加财政积累统一起来。公司成立后,一改过去旧中国保险机构单搞业务的作风,将防灾防损作为业务的重要环节之一,真正发挥保险保障的作用。

当时,各区公司对保户、非保户开展经常性

的防灾检查。财产保险除了防火检查和防火宣传外,还协助地方政府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农村保险结合承保和理赔工作进行保护牲畜以及农作物的宣传。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业后的8个月里,总公司营业部对166个公私企业进行了287次检查,华东区公司对161家工厂仓库进行了检查。许多单位接受了检查后的建议,及时消除隐患,积极采取措施预防事故的发生,既大幅减少了国家和人民财产的损失,也大大改善了公司的承保质量;同时,还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风险管理和保险意识。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早期积极开展防灾防损的业务方针,体现了人民保险的崭新特点。更可贵的是,从保护国家及社会财产、降低损失率出发,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职能,积极开展防灾防损工作,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以贯之的传统并不断发扬光大。

不忘来時路 BUWANG LAISHILU

第九章 反复耕犁的农业保险

1 在希望的田野上

中国农村地区幅员辽阔,农业人口众多,而农业生产水平严重落后,农业生产情况呈现重大差异,解决农业问题一直是中国的重中之重,而农业保险也是一直困扰中国保险业发展的一个大问题。秦道夫曾说过,中国农业保险一直是在探索中发展的,就是现在也是试验性的。

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 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

尽管国家可以用各种方法来防止意外灾害的发生,但意外灾害并不能绝对消除,而分散的、个体的小农经济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弥补因意外灾害造成的损失,因此有必要通过保险的方法,来组织农民进行集体互助。农民在缴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后,就可以得到确切的经济保障,万一发生意外灾害,不致影响生产的持续进行。

1865年,中国民族保险业就已诞生,但农业保险一直没有起步。直到1944年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农业保险专业公司。

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也在探索农业保险:

1944年1月6日,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林伯渠作了题为《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的报告。他指出,1943年在全边区已有42%的农业劳动力参加了农民合作社(其中包括一个牲畜保险合作社)。并且号召组织起来,展开生产战线上的合作运动,其中包括"奖励和推广义和仓运动,建立救济事业的基础","提倡牲畜保险合作社"。[1]

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北京成立,在此前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提出,首先从火险、运输险、兵险做起,然后试办团体意外险、旅客险、人身险,也要试办农业保险。

1950年5月,第一届农村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根据土地改革后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的保险工作应作为农村金融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及时开展起来。

1950年8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第二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决定,要将保险业务从城市推向农村。

农村保险的方针是根据保险事业的总方针而确定的,其目的是"保障农业生产安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使分散的、个体的互助合作小农经济,在遭受灾害事故后能获得经济补偿,从而有利于农业再生产的恢复和农民生活的安定,并增强其互助合作的意识。

农村保险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拓的一项新业务。农村保险业务采取了自愿 投保的方式,承保对象是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国民经 济恢复期间,人保公司在农村主要开展了牲畜保险业务,还试办了农作物保险。 当时的农业保险业务,都是同农村工作结合在一起,由中国人民银行代办,这也 是时代特色。

1950年,人保公司在北京郊区、山东商河、重庆北碚三地试办牲畜保险,共 承保牲畜1384头,并对北京郊区6540亩棉田进行了"假保险"(双方约定不付 保费和赔款)。这些受到当地政府和广大农民的欢迎,也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人



1954年,中国人保湖南省分公司为集体投保的生猪保险农户支付保险赔偿



《人民日报》报道人保农业保险

民保险为人民的良好形象。

从此,中国农业保险翻开了新的一页,开始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探索 之路。

2. 保险漫画到了田间地头

开办农村保险的初期,中国人保十分注重宣传工作。当时的农村普遍存在意识落后,文化水平偏低的情况。因此,中国人保采用通俗易懂、简洁直白的语言,以及图文并茂、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田间地头,进行保险宣传。

当时的察哈尔省分公司就绘制了大量的宣传画和宣传手册。并根据本省3个专区的实际赔款例子,画成了3种牲畜险漫画,运用赔款实例进行宣传。因为姓名、地区、村名及内容都是真实的,农民获得了深刻印象。加之对赔款案件迅速处理,采取开大会当众宣布的办法,更加深了出险农民和一般群众对牲畜保险的好感。

当时,中国人保利用各种墙报、壁报、宣传栏、乡村壁画、招贴画等形式,以及广播、游行、社火、集会等手段宣传推广农业保险,做到家喻户晓。

那时的保险招贴画还是很讲究艺术手法的,许多画面沿用了民国时期的月份牌画风,人物时尚感人,水彩年画引人喜爱。人物情景真实,特别是一些牲畜保险的招贴画,非常注重农村风俗,牲畜形象可爱,洋溢着生活气息。

一些招贴画采用老百姓易接受的连环画、漫画形式,对保险条款、安全措施直接给予形象的解释;通过画面直接的对比效果,传达保险带来的好处,让人一目

了然。

保险宣传离不开政治宣传,当时的保单上充满了政治色彩,甚至是搭车的效果。如在有的"耕牛险保险证"上印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字样,可见人保公司在那时便很关心时代和国家形势。

河南辉县保险公司为了配合抗美援朝的中心工作,利用各种集会发动群众,并组织小学生成立宣传队进行宣传,开展村与村的挑战竞赛,提出"一头牲口不保险,半个家当太危险"的口号。

为解决缴纳保费的问题,召开社员群众动员大会,组织一同讨论。最终决定每村以互助组为单位,运用调剂办法,动员没有牲口而有粮食的群众,借给有牲口而缴不起保费的保户。有一位老汉高玉山自动拿出花籽油32斤,换成玉米195斤借给别人缴保费。有一位妇女家里没粮,到娘家去拿粮来缴了保费,为自家的牲口上了保险,还动员她的邻居都来投保,并发动妇女用做鞋子和砍柴等副业得来的钱来缴纳保费。在他们的心目中,参加保险,爱护牲畜,同样是支援国家建设,保证农业生产,为抗美援朝作贡献。

有的地方公司在牲畜险检验证明单上印有自己创作的"保护耕牛歌":

第一是草料,特别要留神,干草夹青草,混合喂均匀。 第二是饮水,喂时要小心,最好喂井水,莫得蚂蝗浸。 第三是牛圈,通风要得紧,屎尿和污水,随时要清除。 第四用牛人,也要有分寸,好好爱护牛,莫使累过分。 第五牛用了,汗水拭干净,牵去滚个水,牛就有精神。 第六下雨时,莫等牛去淋,寒风和烈日,也要忌干净。 第七牵牛人,硬是要谨慎,悬崖陡坎坎,莫牵牛去行。 第八防瘟疫,要打防疫针,增加抵抗力,牛就无毛病。 第九牛不卖,莫把市场进,免得遭传染,一死成群群。 第十牛死了,掩埋要挖深、牛瘟像匪特,彻底要整尽。[2]



20世纪50年代,人保耕牛保险单



20世纪50年代,人保牲畜险保单上的保护耕牛歌



20世纪50年代,人保养蚕说明书



20世纪50年代,人保牲畜保险说明书



20世纪50年代,人保农业保险宣传标语





20世纪50年代,人保牲畜保险宣传连环漫画



20世纪50年代,人保农业保险宣传连环漫画

有的地方人保公司在牲畜保险单上印宣传标语: "牲畜在目前是农业生产战 线上的主要工具。在总路线任务下,为促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高生产,发扬 社会互助精神,用组织保险的方法;补偿牲畜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遭受的损 失,因此保险公司举办牲畜自愿保险。"

有的地方人保公司在保单上印有优惠与奖励办法: "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地方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社组织投保之牲畜、一律给予应缴保费百分之十的优惠;凡投保单位或个人,对牲畜饲养管理具有优良成绩被评为各级爱畜模范者,经当地党政同意,对其所投保之牲畜给予应缴保费的百分之二十以内的优惠。"

3. 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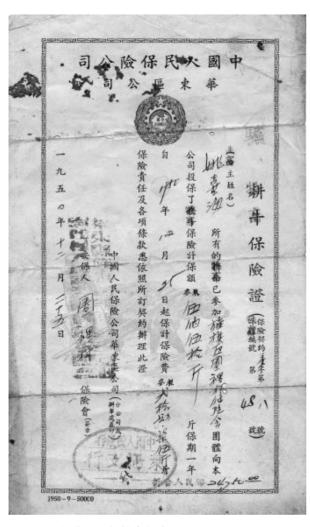
开展农村保险业务,首先是从牲畜保险开始的。这是借鉴了苏联开办牲畜保险 的经验,但更重要的是,从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作出的选择。

1950年《华东保险》上的《华东区公司一年来的工作报道》一文中写道:

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下的保险,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前提,我国的人口中百分之八十为农民,所以开办农业保险应为我们的最主要任务。农业保险种类繁多,目前的客观条件尚不容一一举办,但是耕牛、马、骡、驴系属农民的主要财产,农谚有云:一头耕牛,半份家私,可知农民对耕牛的重视。我们不办农业保险则已,欲办农业保险,必须自耕牛保险开始。[3]

有一张1950年12月山东莱阳试办耕牛保险的单据,是截至目前见到的新中国最早的农业保险单据。保单中间绘有一耕牛图案,以显示险种为耕牛保险。但在保单"耕牛"处加盖了"牲畜"二字,使本张保单变成投保的不只是耕牛一个品种。保单右上角又加盖了一个"驴"字。该保单上的牲畜主姓名是姚喜海;圈里村所有牲畜的保险金额为550斤小麦;保费为24斤小麦,其中"米"分别被划

去。为什么保额会以小麦多少斤论呢?原来在当时开办农业保险时,农民没有现金,便可以按小麦或稻米折算保额与保费。该保单的左侧加盖了村委会长形章,下方加盖了保险代办处人民银行莱阳支行的公章。可见这也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代办的。



20世纪50年代,人保耕牛保险单证

在一张1951年10月上海 地区的牲畜保险单据的背 面,印有相关耕牛保险除外 责任包括:(1)因战争或战 时征用以致死亡或永久丧失 全部劳动能力的;(2)被窃 去或走失的;(3)变更耕畜 的用途为驮载拉车拉磨事先 未经本公司同意的;(4)因 畜主故意行为以致死亡或永 久丧失全部劳动能力的。

有的牲畜保单上,特别标注了牲畜工作或行动地区为"以九区小黑山村为中心,最远不得超出250华里"。有的保单上加盖了一条"本牲畜承保金额是实质的八成"字样。

因为当时牲畜保险确定 的保险金额只能承保牲畜市 价的八成,其余两成由投保 人自己负责,以促进投保人 爱护牲畜。后来因为有些地区反映保八成,农民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便改为十成承保,但又出现了"牲口死了,可以用赔款另买一头",在农民中产生了不爱护牲畜的副作用,因此又改为八成承保。由此可见,农村保险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人保四川分公司的农险干部段云峰回忆:

组织农民开会一般都是在晚饭后,大约八九点钟。每次会议内容非常多,各家讲各家的,保险常常被安排在最后讲,讲完后已是鸡叫头遍了,农民听没听进去也不知道。开完会,乡政府安排我们睡在地主的大花床上,一张床可以横着睡八九个人。到了约定办理业务的时间,我们三五个人一组,看牛口的看牛口,填单子的填单子,还有的负责收费。这样干了一两年,农民精了,老牛、病牛也来投保,保额保得高高的;到了冬天,本该给牛穿蓑衣防寒,保了险就不穿了,导致大量死牛。[4]

在一张山东青岛地区的牲畜保险单的下方,有一可剪裁的"牲畜防疫注射免费券"。在防疫问题上有三条说明:一、在兽医院注射防疫针时,用此券代替打针费,不再另收费;二、本券只用于已保过险的牲畜以一次为限;三、此券由兽医院站汇总向当地保险公司收取打针费。并加印两条广告:要想牲口不发瘟,快打防疫针;要想牲口死不了,赶快去投保。

1951年5月,察哈尔省绥远分公司试办牲畜保险时,一开始只有村干部敷衍投保了12头牲口。当保险公司人员对投保的牲畜进行防疫注射时,讲解了一些饲养及爱护牲畜的方法,在群众中产生了初步的好印象。有一位农民任三娃的毛驴突然得了尿结病,兽医诊视后开了一个便方,需用薄荷一两、倭瓜籽一把煎服。当时村里没有薄荷叶,保险员工冒着风雪严寒,徒步跑到15公里以外的归绥市购得后,连夜赶回来救治。灌药后不多时,驴即得救,群众很受感动。大家踊跃投保,一夜之间承保345头牲口。后来又经群众同意成立了保险委员会和防疫小组,





耕牛保险介绍

耕牛防疫手册

督导群众进行爱护牲畜工作。在牛蹄疫流行期,还订立防疫公约,约定:不准病畜到井上饮水,病畜要进行隔离等。^[5]

当时,牲畜保险的对象包括地方国营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个体农民、机关企业与其他合作组织用于劳役(即耕畜和力畜)和配种(即种畜)的牛、马、骡、驴,在规范的年龄以内,没有伤残疾病、饲养管理正常的都可以参加保险。"保险责任为:保险牲畜因下列任何一种原因所致的死亡,(一)因疾病、胎产、阉割;(二)因火灾、淹溺、中毒、触电、摔跌、窒息、互斗、野兽伤害、碰撞、地陷、崖崩、雹灾、建筑物和其他物体倒塌等;(三)因前两项原因无法医治,经兽医部门证明,地区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宰杀或为防止疫病传染,

经当地县以上人民委员会命令扑杀掩埋。一些地区在《爱国增产护牛公约》中, 还列有"我的耕牛必须每年要打防疫针"的条目。

有的牲畜保单后印有畜主应尽的义务: (1)应尽力预防牲畜的疾病伤害或死亡。(2)对于牲畜的饲养和畜舍管理应妥善办理,不能任意虐待伤害或减少饲料。(3)应接受预防牲畜疫病的注射或接种。(4)应接受牲畜健康和管理的检查。(5)牲畜生病或受伤后应从速聘请兽医诊治。(6)遇牲畜发生疾病时应与其他牲畜从速分开,不能同槽饲养同地放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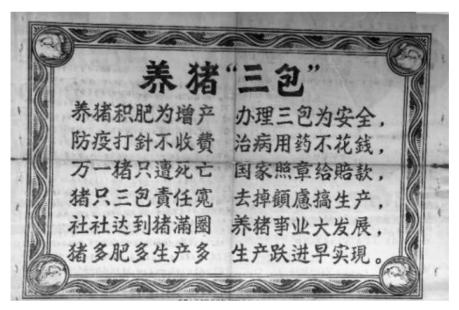
牲畜保险在全国各地逐步开展,受到农民的欢迎和政府的重视。截至1951年底,全国已有600个地方办理了牲畜保险,承保牲畜600万头。到1952年,牲畜保险有了更快的发展,承保数量达到1400万头,其中40万头牲畜在死亡后得到了保险补偿。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人保还曾在37个县试办了养猪保险,承保生猪22000头。湖南公司推出了"平时包防疫,病时包治疗,死时包赔偿"的"三包"保险,改善了原有的保险责任。全省共承保生猪612万头,死亡16.3万头,赔偿112万元,死亡率为2.5%。湖南养猪"三包"保险是农村保险的一个飞跃,在全国迅速引起反响,各地纷纷效仿办理。

由于养猪"三包"保险经验推广,也出现了耕牛



20 世纪50 年代,人保生猪保险现场会



20世纪50年代的养猪"三包"宣传单



20世纪50年代,人保养猪"三包"保险单

"三包"保险形式,新型的牲畜保险具体的保险手续委托农业生产合作社代办,保险公司指派专人在固定地区负责管理和指导。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社内牲畜的情况比较熟悉,在办理保险手续收取保费及处理赔款等方面,都比较及时,而且保险人员工作点固定以后,可以更好地开展工作和与保户联系,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业务费用开支。

4. 处暑里的雨 谷仓里的米

1951年,为配合国家扩大种植经济作物政策,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试办农作物保险。试办地区包括山东、苏北、陕西、山西、四川、江西、河北等省及北京、西安等市,共36个地区试办了棉花保险,并且还小范围试办了小麦、水稻、甘蔗、烟草、芝麻、葡萄等作物的保险。棉花保险一般只保收获量的50%,保量不保质,原则上不保旱灾。

1952年,河北石家庄、邯郸地区承保棉田后,因遭冰雹灾害而获得保险赔偿,不仅补偿了损失,还补发了种子费,当地政府因此有说服力地动员农民在3天内完成80%以上的棉田补种和改种。有的农民说:"要是早解放30年,赶上灾荒年,我就不会饿肚子了。"从那时起,农业保险就已是政府的形象工程了。

1952年6月,在河北张家口涿鹿办事处的一张农作物水稻保险单上印着两句话: "响应增产节约号召、积极参加农作物保险" "参加农作物保险是爱国丰产的有力保证"。保险站位的高度,前所未有。

保险责任一栏内印有"凡因遭受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如旱、冻、霜、雹、风、水、涝、雨、病、虫害等灾害及因防治和抢救自然灾害农作物之损失, 使收获量不足保险额时,由本公司负赔偿责任。但因兽类踩踏、嚼食及一切人为 的灾害损失(如盗窃、放火等) 本公司不负赔偿责任。"

1951年,李继明任中国人民 保险公司苏北分公司副经理。苏 北分公司起初人员很少,连半脱 产的乡保险员计算在内,也不到 1000人。

苏北沿海是一个老棉区,长期以来使用的棉花种子已退化,产量非常低。苏北政府要求保险公司配合农村推广优良种子的种植保险。

1951年, 苏北政府在本地区 大力推广"岱字棉"这一优良棉 花品种, 但农民对这一新品种又 不太相信。为了解除农民对风险 的顾虑, 李继明带领专家研发开



20世纪50年代,人保小麦保险宣传画

办了"棉花收获保险",该保险很受欢迎,开办的第一年,就承保了46.5万亩。

1956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迅猛,上上下下要求保险工作配合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的呼声很高。中国人保推行农作物法定保险,全国办理的农作物保险有小麦、棉花、杂粮、大豆、花生、烟草、稻谷、油菜籽、麻、甘蔗、甜菜等,其中四川、河南、山东等省的农作物保险品种最多,达7种之多。

1958年, "大跃进"席卷全国,保险也随之狂热。对农作物保险是否开办,意见不一。一种意见认为,全国各地灾害极不平衡,灾情严重,涉及面大的地区欢迎农作物保险,但灾情较少的地区则不然,加上农作物风险很大,保险公司自身必须具有相当的保险储备金,才能维持经营。而且农村生产技术落后,农民保险



20世纪50年代,人保棉花保险说明书

意识不强,因此开办农作物保险条件不成熟。另一种意见认为,农民负担虽有困难,但有能力支付保险费。农作物保险目前赔付不是很高,高级合作化后,可以开办农作物自愿保险,将对巩固合作化,维持农业生产起到重要作用。

1958年1月,中国人

保向财政部呈报关于试办农作物保险的请示,建议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合作社组织基础好的地区试办棉花、烟叶、油料等经济作物保险。当年在河北、吉林、河南3省开始试办,共承保各种农作物25.7万亩,保险责任包括水、旱、风、雹等自然灾害及因病虫造成农作物减产的损失。农作物保险逐步向水稻、玉米等全面展开。

随着农业"大跃进"的进一步深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高指标使农作物上报产量的虚数很大,这样对一亩地承保多少就很难确定,承保指数小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若按跃进指标承保,则公社须付出较大的保险费,这使保险公司和人民公社都感到为难,所以农作物保险开办时间不长,即鸣锣收兵了。



20世纪50年代,人保农作物保险单



20世纪50年代,人保小麦保险单

5. 成败之间

1950—1952年,农业保险共收保费超过4800亿元(旧币),支付赔款超过1800亿元(旧币)。

也许是受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涨的革命热情或中国人保在创业阶段奋发的工作干劲的影响,农业保险在工作方式上出现了过急过快的问题:

有人提出: "不保险就是不爱国,不相信政府",或质问老百姓: "毛主席好不好,好,那毛主席让参加保险你听不听?"等要挟群众投保的口号。有的地方甚至采用连续开会,民兵站岗把门,强迫学习保险条例,不保不准走,或者半夜敲门,催收保费的恶劣做法。在吉林长春开办牲畜保险时,竟把保险和镇反结合进行,提出"参不参加保险,就看你对政府有没有认识"的说法。有的地区提出"限定三天完成任务,否则村干部要受处分"的恐吓要求,生硬地把保险任务交给乡、村干部包办代替,结果形成乡、村干部强迫动员,层层摊派,造成了不良影响。[6]

1951年11月,人保公司在北京召开了农业保险汇报会,会议讨论了各地开展农

业保险出现的强迫命令的情况,财政部副部长王绍鏊在会上强调,今后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农业保险工作的自愿原则,彻底纠正强迫命令作风。

1953年3月,第三次全国保险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在总结农村保险业务时指出,牲畜保险有盲目冒进的倾向,由于工作不深入,简单粗暴,对牲畜不注意验体,不严格掌握评价,许多承保的牲畜只是依靠村干部开一个单子,报一个数字,以致手续混乱,账目不清,欠费大、赔款多,有的错赔、乱赔,有的该赔不赔。强迫命令的结果是保险公司没赚到钱,农民还认为是负担。

会议决定停办牲畜保险业务,停办农作物保险新业务。1952年承保的业务到期为止,1953年新保业务全部退保,个别农民坚决不愿退保的,可以保到期满为止。

1953年底,全国各地基本上完成了农业保险的停办工作。随着农业保险的停办,保险机构和保险从业人员也随之精简,机构从1784家减到1057家,人员从5.1万人减到3.2万人。

从农民对停办及退保的反应看,大部分人没有意见。他们当中有的是在过去强 迫命令的情况下投保的,有的是交保费有困难的,或者认为保险没有必要的。但 也有一部分农民因为牲畜比较老弱,交保费感到不是很困难,或者是对保险好处 有些认识和得过赔款的,都不愿意停办,更不愿意退保。

特别是东北地区由于农村经济和互助合作运动发展较快,加之马匹多、价值高,马尸体不如牛尸体值钱等原因,对保险有一定的要求,各地农民要求继续开办农业保险的意见逐级反映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经报请中财委批准后,1953年9月,东北地区在一些重点县乡重新开办牲畜保险,这为后来全国范围内重启农村保险业务积累了经验。

东北地区重点试办牲畜保险的实践表明,农村对保险有一定需求,而且保险对象集中,便于管理。但不利条件是农村经济比较薄弱,人员居住分散,一部分农民有浓厚的小私有者习惯,保不保与己无关,或者投保了,又不注意爱护牲畜。因此,人保公司为了提高牲畜保险的质量,按照"原则统一,因地制宜"的思

路,在验体、评价、理赔等具体工作方面比以前更细致,在加强宣传、解释的基础上,贯彻落实自愿投保原则。在一张耕牛保险理赔报告单上特别注明:"该牛劳动过度,未有吃药。"

1954年11月,第四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年前过分强调农业保险的收缩和停办,不够慎重和妥当,操之过急,在积极改进和提高方面考虑得不够。会议转发了重要文件《农村保险工作四年总结》。文件的"今后意见"部分指出。

农业是社会生产中的基本生产部门之一,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为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除国家应有足够的后备力量以应对农业上的重大灾害外,还需要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组织专门的保险基金,用来补偿集体或个体的农业经济单位因意外灾害所遭受的损失。因此农村保险是发展农业保险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公家保险的主要业务。[7]

1955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从此,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出现了整乡、整区、整县实现农业合作化的现象。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快速发展,上上下下要求保险工作配合农业合作化的呼声很高,许多地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求办理保险,沿海海业生产合作社也要求开办海业保险。

1956年2月,第五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公司副总经理张蓬提出,保险工作要适应农业合作化社会改革和农业生产发展的需求,要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农村保险业务,为逐步实行法定保险创造条件,争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负担起基本保险责任。

1956年4月,由人保总公司召开省分公司及重点支公司参加的农村保险调查研究会议,计划于1957年先在部分地区试行农作物和牲畜的法定保险。飞速发展的



1956年6月8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学习组人员合影

形势, 使广大的保险干部跃跃欲试。

1956年2月,第五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后,财政部领导到中南海汇报保险工作:

当提到农村法定保险的事项时,毛泽东主席当即指示: "愿保就保,不愿保就不保。" 周恩来总理在一旁也说道: "过去办得急躁了,冒进了,现在又要办,切记过去的经验教训,要谨慎,不可急躁。" [8]

1956年5月,财政部上报国务院有关法定农业保险的文件中指出,法定保险的好处是普遍投保,保险费收入大,局部地区受灾,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分摊灾害损

失,这样可以从低拟订保险费率,减轻群众负担,而且由于普遍投保,可以简化保险手续,节约人力和保险费用。

大家认识到,我国目前和苏联不同,不具备法定保险的条件,只能推行自愿保险形式,即"愿保就保,不愿保就不保"的原则。建议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再考虑试办法定保险。原本要推广前苏联"法定农村保险"的打算,因此被放下了。

1956年6月,人保公司召开21个省市分公司经理临时会议,贝仲选总经理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要求大家统一认识,坚决贯彻执行。

在明确提出停办法定保险以后,关于农村保险,时而要求发展,时而要求退缩,这种指导方针的反复波动在保险系统广大干部的思想上引起了极大震动,许多人陷入困惑之中,上上下下普遍感到迷失了方向。

1958年9月,人保公司计划在长沙召开养猪"三包"保险现场会议,但会议还没结束,就传来了停办国内保险的消息。当时作为会务工作人员的魏润泉记述:

我们满含热情,先期抵达会场进行筹备。正在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忽然传来一个消息,因为人民公社化了,保险没有办理的必要了,要仓促收场,全体筹备人员收兵回去。当时我有点想不通,保险在中国办了一百多年了,包括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怎么说停就突然停了呢?岂不草率! [9]

1958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全国财贸工作会议提出,"人民公社化以后,保险工作的作用已经消失,除国外业务继续办理外,国内业务应立即停办。"

反反复复的农业保险,磕磕绊绊地一路走来,最终也同其他国内业务一样,落 入了历史上最低潮的时期。 不忘来時路 BUWANG LAISHILU

第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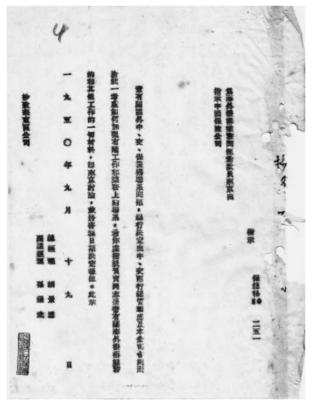
海外保险的浪花一朵朵

1 英美保险告别"东方巴黎"

1949年以前,英美等国家的保险公司凭借政治特权以及自身雄厚的资金实力,垄断和控制中国保险市场长达100多年。它们以上海为中心,不断向内地渗透,其分支机构遍布中国的各重要口岸城市,当时的上海被称为"东方的巴黎"。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勉强挣扎的民族保险业,以其薄弱的资金实力、较低的管理技术,很难在竞争中与外国保险公司相抗衡。无论是私人资本还是官僚资本经营的保险公司,本身所能负担的保险责任十分有限,只能长期依靠外商受理大量分保业务。抗战胜利后华商保险公司订立的自留责任限额仍然很低,各分保集团的部分公司业务还各自分往国外。

当时,由于中国进出口贸易很少,也没有自己的船舶,寿险保额又很低,所以分出的业务主要是火险业务。分出的分保业务的渠道主要有伦敦市场、瑞士再保险公司,另外还有美国市场。特别是美亚保险公司凭借国民政府依赖美国政治经济势力的有利条件和自身实力,获得政府部门大量进出口货物运输保险业务,并通过接受华商公司合约固定分保、预约分保和临时分保赚取大量外汇。中国的保险公司从某种角度等于做了外国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业务范围与业务规模甚至章则费率等都要受外国资本的控制与支配,大部分保险收入归外商所有。在丰厚利



1950年,人保总部给中国保险公司的指示

润的驱使下,外国保险公司 纷纷来华设立分支机构或代 理机构,到1949年前夕,仅 上海一地就聚集外商保险公 司63家。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彻 底改变外商垄断中国保险市 场的局面,维护民族独立, 不仅取消了外商在华保险公 司的种种特权,如外汇自由 汇出、华洋两种费率等,延 对其业务经营采取严格管理 的政策,如禁用外币保单, 禁止挪用保费经营商保险公 司只有在中国政府法律、政 策允许的范围内经营业务。

中国政府终止了中资公司的对外分保业务,规定对国外分保业务由中国保险公司统一对外,从而使国营公司有了较强的再保险能力。国营保险公司不仅自身能够承揽巨额业务,而且可以接受私营华商公司的溢额分保,为切断私营华商公司与外商公司的联系奠定了基础。旧中国保险业的殖民地买办性、投机性也随之被逐步克服。[1]

随着国有保险公司业务增长迅速,外商保险公司不仅失去了依靠政府特权获取的高额利润,也失去了大量的分保收入。在国营外贸系统和新的海关建立后,其

直接业务来源越来越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吴波在第三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讲道: "1949年在中国的外国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占全国保费收入的62%,1950年降到9.8%,1951年降到0.4%,1952年降到0.1%,实际上完全被排斥了。"至1952年底,外国在华保险公司陆续申请停业。

2. 苏联保险告别"达里因"

大连地名是"达里因"的音译。"达里因"系俄语,是"远处"之意。"达里 因"的由来,是在大连沦为俄国租借地以后,根据沙皇尼古拉之令将此地命名为 达里因,同时作为自由贸易港开放。后音译为大连。

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旅大后,苏联国外保险管理局于1946年在大连建立驻东北总代表办事处。当时主要承办苏联企业的火灾保险业务,也兼办中国企业的保险业务,如中长铁路、大连港、大连造船厂、大连海洋渔业公司、远东电业局和秋林洋行等单位的财产保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后,该办事处承办的企业财产保险已大部分移交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代理。1952年苏联红军撤退回国,苏联国外保险管理局指令其驻中国东北总代表尹米里雅诺夫,将所有在中国东北境内的财产保险业务,无偿地移交中国。

1952年12月23日,中苏双方在大连做交接的准备工作,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东北区公司派3人前往大连接洽。双方商定:

(一)苏联政府对外保险局决定无偿移交我方的保险业务为驻东北总代表所有 在东北境内财产险之全部有效保单,由我方自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零时起,按照 苏联政府对外保险局之章则条款继续负责,至到期日为止。(二)所有保险费均逐笔自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零时起按比例计算,扣除同一比例计算苏联对外保险局已支付之代理人佣金、营业税及附加税后,全部无偿交给我方。(三)全部有效保单之一切有关文件及保单副本无偿移交给我方。(四)于接交手续完成后,双方分别通知被保险人。另有哈尔滨秋林洋行在一九五二年申请自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减低保额之退费由我方接收后退还给该公司。(五)原苏联对外保险局之苏联代理人在苏方征得本人意见后由我方确定留用。(六)接交日期待苏方代表去哈尔滨回大连后确定。[2]

1952年12月31日,大连市苏联国外保险管理局驻东北代表办事处举行接交手续的签字仪式。参加仪式的共10人,中方代表为人保东北区公司经理罗高元、东北区公司副经理马学信、旅大分公司经理张信孚及旅大市政府外事处工作人员等;苏方代表尹米里雅诺夫、会计巴尔苏洛夫、苏联商务代表处大连分处沙越星雅夫及拉丁等工作人员。双方代表在互致贺词与谢词之后,分别宣读了中文、俄文的接交凭证、并在签字后互相交换凭证。

这次移交的是苏联承保的秋林公司和苏联居民的财产火灾保险业务。接交凭证上记载:有效保险单共20张,被保险财产之保险金额计人民币128674721847元(旧币,下同);自1953年1月1日起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负责至到期日为止,应收部分之保险费总计人民币1155285660元。接交手续完成后,双方于1953年1月3日分别通知被保险人,哈尔滨秋林公司的退费也于同日退交,并向旅大人民日报社联系发布新闻消息。

至此,标志着外国保险公司完全退出了中国保险市场。

苏联国外保险管理局驻东北总代表办事处设立7年来,曾经不断地介绍苏联保险业务理论和工作经验,对中国人民保险事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有益贡献。在移交工作中,他们以慎重细致的友好合作态度,认真贯彻无偿移交的原则。

这是中国人保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罗高元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罗高元在后

来的回忆录中,对当时中苏两国兄弟般的情谊和中苏保险同业间的友谊与合作,表达了深深的怀念。可惜当年他和苏联保险专家的合影照片,在"文革"时期,为躲避"勾结苏修"的麻烦,全都销毁了。

3. 靠"海后"轮起家的涉外保险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当时没有自己的远洋轮船,租用苏联轮船又太显眼, 因此,经常租用悬挂希腊、巴拿马等国旗的轮船,方便进出口货运,以免受到 干扰。

1951年2月,中国租用巴拿马船籍"海后"轮,从国外进口橡胶等军用物资,价值107万英镑。在回国途中,被台湾当局拦截,劫掠到基隆港扣押。

该轮保险均由中国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承保,出险后,中国保险公司立即将出险经过电告伦敦合约再保险人,审核了装上"海后"轮数以万计的物资的全部单证,核定确切的损失数字,要求支付现金赔款。当时在伦敦考察的王恩韶也帮着中国保险公司驻伦敦的代表,做了协助研究对策的工作:

首先要对事件定性,究竟是什么损失?货运险保的是两类损失:一是海运险,包括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如触礁、搁浅、失火等;二是战争险,但对"战争"并没有定义。作为分保分出人,我方认为,船货被劫,当然不能算海运险,只能算战争险。而伦敦市场分保接受人则认为,双方并未交战,不能算战争险。我们研究了保险条款,发现其中一条为海盗劫持是海运保险单承保的一项责任。于是

据理力争,本案虽无交战行为,但保险标的系被劫持,劫持既是海盗行为,理应赔付。这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3]

伦敦劳合社方面,先以"运载物资的船舶改变航程未获通知,保险期限自卸载孟买港终止"为理由,不同意赔偿。中方以"物资未到达目的港,出有'在孟买中转续运'的批单,同意继续航程,不能终止保险契约",驳回对方的拒赔理由。对方又以"海后"轮未遭双方交战,保险条款不包括劫持责任为由,企图再次拒赔。

人保的李嘉华刚从英国回来,他的法律专业得到施展的机会。大家一起研究, 在国际法律条款中寻找对策。人保据理力争,船舶与货物是在暴力劫持下遭受的 损失,保险人应按条款规定的"海盗"责任给予赔偿。

最终,伦敦分保的95%,被全部摊回。支付赔款后,主宰船货、海运战争险费率及条款的伦敦市场马上大幅提高了对中国进出口海运险的战争险费率,从原先的0.2%~0.5%提高到10%,这是保险史上前所未有的。人保经过数年的说理斗争,逐步将费率降到5%,最终降至0.1%。

周恩来总理知道此事后,非常关注。"海后"轮在中国人保历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称为"百万英镑"事件。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海外保险业务,主要是由为了保障国家进出口贸易安全开办的海洋物资运输保险及附加保险业务,以及为了分散风险减少外汇支出而进行的国际分保业务等组成。其中,进出口贸易的保险业务比重最大,是整个海外业务最重要的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恢复和发展了进出口贸易,进出口物资大部分通过海洋运输,在运输过程中遭受巨额损失的可能性很大。一旦发生意外事故,容易冲击国家外汇收支平衡。因此,进出口贸易需要实行物资运输保险,以解决进出口物资遭受意外损失后的外汇补偿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进出口物资的海洋运输遭到台湾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进出口贸易除需要运输保险

以外,办理战争险也尤为重要。为此,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办了海洋运输保险和战争险业务,主要险种有兵险、共同海损、平安险、水渍险、淡水险、潮湿险、偷窃险、碰损险、短少险、破碎险等。

对于海外保险业务,一开始就明确了由国家经营的原则。作为国家保险机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海外业务,最初是由所属专营外币业务的专业性公司——中国保险公司开办的。同时,通过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和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的海外机构承办少部分进出口物资的保险业务。从1950年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直接承办海外保险业务,主要业务在东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还与国家贸易部门建立了预约保险合约关系。截至1952年11月底,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外保险直接业务部分的保费收入累计为8325.6亿元,其专营机构中国保险公司直接保费收入累计为2772.8亿元。国外保险业务自1951年1月至1952年11月底,赔款金额(不含分保摊回赔款)为461.7亿元。

20世纪50年代后期,受"极左"路线影响,人保也曾提出"赶超英美""建立 北京国际再保险中心"等不现实的口号。

4. 分保分东西阵营

国际分保业务是海外保险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明确规定,国内业务不办理分保,国际再保险实行国家垄断,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统一经营。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保,由中国保险公司出面经营。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保险机构发展国际分保业务的方针是: "加强与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保险公司的团结与合作,而同时按照两利原则不放弃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为我服务。"

随着中苏贸易的发展,两国之间的保险合作也发展起来。1950年10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苏联国外保险局订立了一个100万美元的分保合约。波兰、捷克等国家的保险机构也加入了该合约。在分入分保方面,苏联、波兰、捷克三国在1951年都有少量业务。1952年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保险机构再次修订分保合约,扩大接受中方分出限额为300万美元。同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超过本公司自留额20%以上的业务与中国保险公司进行分保。这样,我国保险机构的国际分保总限额达840万美元,基本上适应了对外贸易的需要。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争取了苏、波、保、捷等国家保险机构的转分保业务。 另外,中国保险公司三次派人参加了8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中、捷、波、东德、 匈、保、罗)的保险会议。在分散风险、吸收外汇资金、配合国家对外政策等方 而起了一定的作用。

195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分入分保业务收入达97.44亿元。这些合作使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增强了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力量。

当时,中国人保对"同志加兄弟"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经常提供无私帮助。根据王恩韶介绍:

1954年,朝鲜国家保险局派两名业务骨干来中国考察、学习,领导让秦道夫和我向他们介绍国外业务和再保,并交代我们要无私地帮助他们。我们就将当时办理国外业务的一些经验和应注意的问题,毫无保留地介绍给他们。他们回去后,朝鲜也开始办理国外业务,成立了国外保险局,其中一位还当了局长。[4]

秦道夫在书中回忆:

我们还带领他们到各基层公司去考察了解。临走时,朝鲜同行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我们能给他们几本中文保险书带回国,学习参考。他们说,英文书看不懂,中文书可以看懂,朝鲜许多人是在中国工作多年回国的。非常遗憾,当时人保公司除了《苏联国家保险》外,也没有用中文写的保险著作。施哲明处长从中国保险公司管理处要来几本从伦敦买回来的英文书,加上《苏联国家保险》送给他们带回国了。[5]

其实,苏联专家康辛的这部《苏联国家保险》,是胡景澐访问苏联时带回来的,他指示公司的人组织翻译,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总部人手一册。1954年,人保公司总部作出学习《苏联国家保险》一书的决定,要求在人保系统 掀起学习的高潮,办公室主任阎达寅曾多次作关于学习这本书的辅导报告。此书 对人保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致交通部组织撰写的《海商法》,也要参考这本书及

《苏联海商法》。

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极为严峻,帝国主义在海上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外贸运输随时都有可能遭受战争损失,影响中国外汇收支计划。为冲破外来的各种障碍,中国保险公司保持了新中国成立前同伦敦保险市场的分保业务关系,使中国进出口贸易和海外各地分支机构经营的运输保险业务、火灾业务得以继续向伦敦保险市场分保。王恩韶在回忆录中说:

当时中国保险公司的对外分保业务主要通过伦敦保险经纪人公司Willis安排,只有分出,根本没有分入。人保在伦敦设立了一个机构,叫人保驻伦敦联络处,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一名英国人,名叫Noble,他负责和当地客户打交道,这是中国人保最早的涉外机构。^[6]

当时,伦敦再保险市场对于中国的分保合同所规定的分保条件非常苛刻,特别是在手续费、结算方法以及战争险业务条款方面。中国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据理力争,坚持不断地与伦敦保险市场进行交涉。从1959年开始,中方使用自己制定的战争险费率和条款,摆脱了伦敦保险市场战争险费率的束缚。

从新中国成立至1952年11月底,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保业务收入为344亿元; 其直属专业机构中国保险公司分保业务收入为722.2亿元。3年来国际分保业务的发展,充分发挥了保险在国际范围内分散风险、减轻国家外汇补偿的负担、平衡外汇收支的作用。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依靠和团结社会主义国家保险公司,增强竞争和承保能力; 坚持在"两利"的原则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保险公司发展业务关系,组成国际力量来分散风险,随后逐步争取分入业务,达到平等互惠。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与国外保险公司的交换业务中,既发展了同世界各国友好、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也促进了中国保险业务的快速发展。

5. 海外机构主要在东南亚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保险公司在香港设有总驻港处,在伦敦设有办事处。此外,在香港和海外还设有9家分支机构和代理处,其分布地点为香港、西贡、曼谷、马尼拉、新加坡、雅加达、吉隆坡等地。太平保险公司在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越南的西贡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和代理处。这两家公司的总公司都设在上海。民安保险公司则单独在香港注册。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外交的关系,除西贡、曼谷、马尼拉3地的机构仍归中国台湾国民党当局管辖外,中国保险公司和太平保险公司在其他地区的机构,已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公司领导。太平保险公司还在香港增设了分公司,中国保险公司在澳门增设了办事处。

1954年6月,姚洁忱被派往香港,担任中国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副总经理。为 了适应新的工作环境,此时他才由地下党身份的姚乃廉改名为姚洁忱。他的夫人 倪唯珍一同前往香港工作,他们的三个子女姚家训、姚家礼、姚家玲留在上海, 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留守儿童生活。

1957年5月,杨子久被人保公司派驻香港,任民安保险公司的董事兼副总经理,还兼任太平保险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这样,香港的3家保险公司

各配备了一名国内派出的党员副经理,太平保险公司是翁秉伟,中国保险公司是姚洁忱。1958年,杨子久同时兼任太平保险公司经理。

当时,国内和港澳工委指示,国内派往港澳机构的工作人员都要担负统战和宣传工作,要外圆内方,广交朋友。

1956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决定在北京召开海外保险公司经理会议,这是人保第一次召开此类会议。公司派秦道夫、刘凤珠亲自到深圳迎接会议代表。代表人员包括:

香港民安保险公司总经理孙文敏,经理沈日昌;中国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经理 金通明,中国保险公司新加坡分公司副经理周家清,中国保险公司雅加达分公司 经理徐绍之、副经理赖曾耀、襄理杨延桂、会计主任林渐炬,中国保险公司泗水 支公司经理马崇尧;太平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经理曹伯忠,太平保险公司新加坡 分公司经理陈克勤,太平保险公司吉隆坡支公司经理黄纪良,太平保险公司雅加 达分公司经理古简生等和他们的夫人。[7]

会议代表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廖承志主持会见,他 的母亲何香凝也参加了会见,何香凝还送给姚洁忱一幅画作。代表们登上天安门 观礼台,出席国庆庆典观礼。

根据进出口贸易和海外华侨的需要,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领导和支持下,在为进出口贸易服务、为当地华侨服务的业务方针指导下,中国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和民安保险公司在香港及海外的分支机构积极办理各项保险业务,并严格遵守当地政府法令和当地保险公会的各项规章。在大力改进经营、简化投保手续的同时,还积极增加为当地华侨服务的保险业务种类,如在新加坡开办了无须进行体检的人身保险业务;在中国香港开办了火灾综合保险业务,保险责任包括火灾和盗窃而造成的损失,以及在运送钞票和证券时遭抢劫等意外事故而造成的损失。在处理保险赔款方面,都能做到及时和公平合理。这一系列工作对保障当地



1956年第一次海外保险公司总经理会议与会者在北京天宁寺路(现在的月坛北小街)的总公司大门前合影

第一排左六是总公司总经理贝仲选,左五是副总经理张蓬,左四是太平洋保险公司副总经理金瑞麒,左三是香港民安保险公司董事长孙文敏,左一是总公司国外处干部杜伯儒,左七是中国保险公司总经理吴震修,左八是中国保险公司总经理孙广志,右三是中国保险公司副总经理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外业务处处长施哲明,右二是太平洋保险公司副总经理李劲根。秦道夫在最后一排左三,佩戴一枚徽章。

华侨的人身安全及促进当地工商业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上述3家保险公司在香港和海外的机构还积极为国家进出口贸易提供保险服务,特别是中国保险公司和民安保险公司作出了很大贡献。以1951年为例,由于抢购战略物资,进出口贸易庞大,香港对大陆的贸易额高达16亿港元,这成为中国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的主要业务。因此,这一年中国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的保费收入达1263.9万港元,赔款达384.98万港元,赔款率为30.46%。民安保险公司在承担国家进出口贸易保险方面也作出了较大努力。1951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对主

要进出口物资实行统保以后,民安保险公司的业务受到一些影响,由于及时调整发展方向、大力争取当地业务,民安保险公司在1952年每月仍可收入保费50万~60万港元。从1949年下半年至1952年底,中国保险公司在香港及海外的机构和民安保险公司收入净益为1270亿元(旧人民币,折合2976万港元)。

在各种海外保险业务中,人寿保险业务的发展比较迅速。随着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海外侨胞的爱国热情不断高涨,因而对中国的保险事业有了充分的信心,这就为拓展海外人寿保险业务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保险公司新加坡分公司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以海外推展人寿保险为重点。新中国成立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支公司归该公司领导,人寿保险业务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胶、锡涨价,出口量增大,当地外汇收入和人民的购买力提高,人寿保险需求激增,中国保险公司和太平保险公司在这些国家的机构适时拓展业务,满足了当地群众特别是华侨对人寿保险的需求。



20世纪50年代,海外保险机构人员回国时合影

中国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在香港和海外的分支机构与民安保险公司—道, 同当地华人经营的保险公司建立和发展了分保业务关系,并注意不断改进经营, 得到海外华侨的信任,业务规模不断扩大。

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领导下,中国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民安保险公司 在香港和海外的保险业务被逐步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的轨道,获得了稳步发展;同 时在筹措资金汇回国内以支援国内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10月至1953 年11月,中国保险公司仅从海外调回的资金高达680多万港元。

不忘来時路 BUWANG LAISHILU

第十一章

呵护羸弱的火种

1. 一次决定人保命运的会议

1958年5月,党的八届一中全会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国务院的指示及"保险下放"方案尚未实施,中国保险业即已登上"大跃进"的快车。但好景不长,保险业在"大跃进"的浪涛中,演变为偃旗息鼓。

1958年9月,湖南长沙养猪保险现场会议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组织分公司经理参观了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并在郑州开会。会议上财政部领导提出,人民公社化后,保险已完成历史使命。

1958年10月,西安财贸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人民公社化以后,保险工作的作用已经消失,除国外保险业务必须继续办理外,立即停办国内保险业务;12月,武汉全国财政会议作出决定,立即停办国内保险业务。同时,财政部发出停办国内保险业务以后财务处理的通知。

1959年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召开第七次全国保险会议,贯彻落实国内保险业务停办精神,并布置善后清理工作。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历年积存的4亿元准备基金,下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400万~600万元,留5000万元作为国外业务继续办理基金,其余全部上缴财政。国务院第五办公室随后批转了财政部、中国人

民银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停办后的善后清理工作和国外业务一律由中国人民银行接办的报告》。至此,全国各地即着手进行停办国内保险业务及其善后的清理工作。

1958年,国内保险停办后,人保机构归属财政部领导。保留的国外保险业务并入中国银行,有38人调往中国银行,有20人留在财政部,其余人员被分配到北京、广西、贵州、青海、宁夏、新疆、陕西、福建、浙江、甘肃等地。

在全国停办国内保险业务的情况下,上海、广州、天津和哈尔滨4市的保险业务还存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甚至还有局部的和短时期的快速发展。4市保险业务的继续或短暂恢复对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稳定地方财政预算、安定群众生活起了积极作用,充分体现出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4市党政领导与保险干部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同时,所积累的经验为日后国内保险业务的恢复做了一定的准备。4市国内保险业务在1966年以后相继停办,新中国保险史上的国内保险业务从此留下土余年的空白。

其实, 国外业务是否继续保留也是经历了一番曲折的经历。

1959年初冬的一天,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召集会议,讨论国外保险业务的前途问题。由于当时国内保险业务已经停办,干部纷纷外调,财政部决定把保险公司的领导关系转到人民银行。

保险公司内外纷纷议论,国外保险业务是否也要停办?而且主张停办的人还不少。上级领导为了听取意见,召开了这次讨论会议。

因为这次会议的相关决策,将关系到保险业务人员的命运,会议气氛显得十分 紧张。出席会议的除了国外保险处的人员,还有一些国内保险处的人员和一些与 保险业务相关的中国银行、外贸运输公司、进出口公司等外单位的人员。

首先发言的是主张停办国外保险业务的人。他们的理由是国内保险既可停办, 国外保险也可停办。他们一个个义正词严,似乎理直气壮,甚至有些老保险出于 位子的考虑,也带头反对保险。

而主张继续办理国外保险业务的人,在当时被认为是"保守派",他们的心情



干永明

都战战兢兢,处于弱势。出席会议的王永明、孙 广志等一些保险专家,力主继续开办国外业务。 他们都是民国时期在中国保险公司工作的老专 家,对保险事业怀有深厚的情感,深知保险在涉 外商务活动中会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王永明的性格说一不二,他在会上据理力争:保险是对外贸易报价的必要组成部分,CIF (成本费+保险费+运费)是全世界公认的国际贸易计价标准,我国不设保险公司,不办理国外保险,势必都推给别的国家去办,会使国家蒙受重大的外汇损失。估计王永明阐述的理论,在场的领导显然会有人并不明白,但他作为知识分子,

已经习惯了坚持原则、坚持学理。

当时,孙广志因历史问题,受到排挤,虽然人微言轻,但他还是尽力为中国人保这艘在风雨中飘摇的"大船",再拉起一次风

的航程。

当然,会议中也有中间派。他们的主张是, 停办进口贸易保险,继续办理出口贸易保险。大 家各执一词,争执不下。

帆。他像一位老船长,在指导、修正着国外业务

在人数上,似乎主张停办的比主张继续办的 要多。但中国银行、外贸运输公司及进出口公司 的人员大多数支持继续开办保险。因为,继续开 办保险会方便他们开展相关业务工作。

主持会议的是国外保险处的领导,他既没有 摆出自己的观点,也没作结论。财政部的最高领



孙广志

导综合大家的意见和实际情况,最终决定国外保险要继续办下去。

争论结束了,从事保险工作的同志放下了心。王永明、孙广志等人心里也踏实 了许多。王永明后来做了国外业务处副处长,孙广志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外事片小 组长。

王永明、孙广志等保险专家在当时可以勇敢地做到义正词严,决然不是因为自己的私利,他们只是从关心国家的命运、企业经营的正确理念出发,从爱自己从事的事业出发,义不容辞地站出来的。

这件事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荒诞,甚至可笑。但在当时来说,对于王永明、 孙广志为代表的"保守派",他们的一言一行,随时可能付出不可想象的代价。 中国人保有着70多年不间断的品牌历史,正是由于老一辈无私的存在,由于他们 的坚守和付出,才换取了今天的成绩。历史必将不会忘记,人保人将世代感恩!

2 走进中南海的"跃进"轮赔案

1963年4月30日,我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海轮"跃进"轮首次出航,它装载1万多吨玉米,从青岛出发首航日本。第二天在经过韩国海域时,意外触礁沉没,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

当时王恩韶负责"跃进"轮的分保,合同组还有张鉴、李嘉华、周庆瑞、韦向 辰4人。"跃进"轮保额120万英镑,其中人保自留20万英镑,其余100万英镑主要 通过Willis在伦敦市场分保。在"跃进"轮出航前的那个星期,王恩韶通知Willis办理分保。Willis接到分保电传后,就拿着分保书在劳合社开始安排分保,各承保人 (Underwriter)接受了就写个数字并签名。由于这是新中国的第一艘轮船,国外保险专家考虑的时间普遍较长,起航前总共分出了80万英镑。

1963年5月1日,放假在家的王恩韶等几个人正在月坛北小街宿舍里打桥牌。突然,国外业务处的施哲明处长敲门进来说,不得了了,"跃进"轮沉了!这下大家都很着急,马上开始商量该怎么办。

他们主要有两个顾虑:第一,虽然伦敦方面发来电传,告知已经安排了80万英镑的分保,但并没有出保单,会不会赖账?第二,我们要求分保100万英镑,才分出80万英镑,那20万英镑算不算数?几个人整整商量了一下午。



"跃进"轮



"跃进"轮

王恩韶立即给Willis发电传说:关于"跃进"轮分保的事宜,相信你方已全部安排完毕,请出具保单。对方回电传道:我方收到分保申请后,即去劳合社安排,因时间所限,只分出80万英镑,并已通知你方,这80万英镑没有问题。本当继续安排所余20万英镑的分保,但目前我方拜访劳合社,一进门,劳合社的"卢丁"钟就响了,报告了沉船的坏消息。所以非常抱歉,20万英镑未能再行分保。

由于这是中国自建的第一艘万吨级巨轮,也是人保出具的第一份海轮保险单,很多技术问题需要逐一核实,所以出单比较晚,但能分出80万英镑已是不幸中的万幸。而且,120万英镑保额是比较高的,一是因为此轮国内造价高,二是此轮按苏联巡洋舰的规格造的,钢板标准比普通商轮高。Willis当时也表示国际上没这样高的价格,人保以水险保单是定值保单为由,阐述了足额承保,并无不妥。其实,这个金额,当时可以在西方船舶市场买两艘同样的轮船,可见其政治意义之大。

当时意识形态非常紧张,人们的第一反应, "跃进"轮不是被美帝潜水艇打沉的,就是被台湾特务炸毁的。事实上,是我们自身的原因,导致"跃进"轮触礁沉没。一是船舶持有人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在工作安排上比较仓促忙乱,船长虽然经验丰富,可是没有开过这么新的船,对船的性能、途经海域情况比较陌生。二是选择的海航路线的问题,由于当时敌情观念太强,有意选择了一条难走的路线,目的是躲避可能出现的美帝捣乱。三是轮船质量的问题。这些情况虽不影响再保立案和承担赔偿责任,但也极易被分保接受人找茬赖赔。

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开会,分析"跃进"轮出事的原因。交通部在汇报工作时说到"跃进"轮有保险。周总理听说后,立刻叫办公室打电话给人保公司,请派个领导和做具体业务的人来国务院开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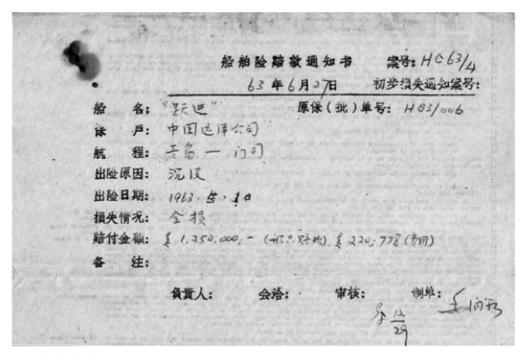
林震峰副总经理带着王恩韶赶到中南海,王恩韶用布袋装了一大堆资料,包括保险条款、保单以及海上保险的书籍等。

周总理见面就问,"跃进"轮沉了,保险公司赔不赔?他们回答的是,赔。周总理问,都什么情况下赔?他们回答的是,如果是触礁搁浅等海上风险。周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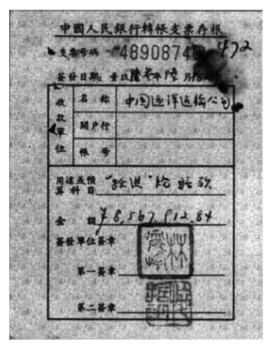
又问,如果是让美帝国主义打沉了呢?他们回答的是,也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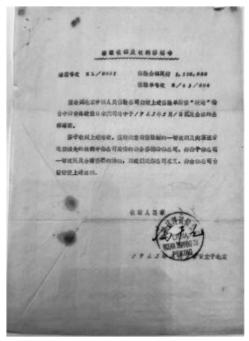
参加会议的罗瑞卿将军用浓重的川音说,哪有这样的好事哦?如果是美帝打沉的,英帝还能赔钱?像是不相信。他们介绍道,"跃进"轮保了两种险,一种是航运险(Marine Risk),另一种是战争险(War Risk),按保险责任,都会按合同办理。周总理听后,松了一口气,要求人保公司抓紧对外索赔,并请外交部条法司的专家配合,争取早日拿到赔款。

一个月后, "跃进"轮的赔款陆陆续续摊回来了,总共104万英镑。周总理在总结的时候说, "跃进"轮沉没,船长有问题,其他相关部门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唯有保险公司立了功,挽回了经济损失。交通部长孙大光曾说,保险公司来人谈工作,我马上见。



"跃进"轮赔款通知书





"跃进"轮的中国人民银行转账支票存根

"跃进"轮赔款收据即权利转移书

通过这件事,国家领导人看到了保险的重要性。1965年,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一同着手进行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可行性调查。在"文革"期间,人保公司虽然历经磨难,但还是得以保存下来了。

3. "保险业务9人小组"

1961—1966年,中国人保坚持办理的涉外业务,仅远洋船舶保险—项业务共付出外汇分保费35万英镑,摊回外汇分保赔款125万英镑,创收外汇90万英镑。这些举措对我国发展远洋航运事业起到了稳定作用。同时,对我国在那个特殊时期加强对外联系、保持国际形象方面,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力。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中国人保历尽艰难,那是中国人保发展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

"文革"不仅使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设想成为泡影,就连举步维艰的涉外业务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对外有再保险业务关系的国家从原有的32个减少到17个,有业务往来的保险公司从67家减少到20家,业务合同从219份减少到49份。一时间,各地保险机构先后解散,人员分流,全国的保险业凄然落幕。

"文革"时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胡立教被"打倒",人保公司的一些老保险也遭到批斗。中国人民银行临时负责人为乔培新,副行长李绍禹负责人保公司工作,崔平、林震峰是人保公司的副总经理。其间,成立的人保公司"文革"领导小组,苑骅为组长,徐振彬为副组长。那时,人保公司在东交民巷办公,不久又迁回西交民巷的人保办公旧址。大家在迷茫中坚守着。

1967年,国务院各部委开始实行军管,中国人民银行随之进驻军代表,人保公司也同样被接管。

1969年6月10日,在国务院直属各部门负责人(包括军队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上,周总理传达了经中央讨论过的政府各部门精简方案。根据该方案,将国务院原61个部、委、局裁并为19个工作部门。方案说明中指出,中央党政机关的斗、批、改到了解决其组织形式的时候了。政府各部、委成立革命委员会要慎重(如外交、财政、国防),将来不可能所有问题都在革命委员会里讨论,要有核心领导小组,其成员更要慎重,将来就是党组、党委。会议要求减部门的同时也减层次,以提高工作效率。精简工作要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具体方案要组织群众讨论落实。会议还强调,抓革命就要促生产,现业务方面最急需抓的是工交系统。

1969年4月,中央提出"在职干部也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国人保总公司86名在职干部中的绝大多数人员被下放到河南淮滨"五七"干校劳动。从此,西交民巷22号院落中那栋老洋楼,人去楼空,一派萧条景象。

同时,为对保留的部分涉外业务进行"收摊""守摊",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在人保总公司中挑选9名从事具体业务的人员,组成一个保险业务小组临时机构,该机构与中国银行成立的银行业务小组共同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管理。

保险业务小组的9名成员分别是:1名组长,姜云亭,原海外业务管理及会计处(以下简称海会处)处长。2名副组长,于葆忠,原业务处副处长;徐文智,原海会处会计。6名组员,王仲石,原再保处科长;刘恩正,原再保处办事员;王淑梅,原业务处科员;徐振彬,原业务处办事员;丛泽兹,原业务处办事员;刘薇,原业务处办事员。

保险业务小组的9名成员,在当时可以说是又红又专,都是保险业务骨干。 他们没有受到冲击,也没有成为各种派别的成员,非常具有代表性。其中,姜云亭、于葆忠是来自江西、山东的地方干部;徐文智、刘恩正、徐振彬、丛泽兹、刘薇是来自新中国年轻的大学生;王仲石是来自旧上海的老保险专家;王淑梅有



北京分公司负责大使馆保险业务的从业经验。他们当时大多负责公司的财务、再 保险及进出口货物运输等相关的保险业务工作,属于老实干实事的人。

1969年7月, 财政部军管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军代表经请示国务院批准, 决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于7月底合署办公。

最初,保险业务小组在西交民巷22号院人保办公楼的工会大厅内集体办公。 1969年8月,随着人民银行归属财政部,保险业务小组又搬到三里河财政部大楼的5楼办公。人保办公地址仍处于"运动"之中。

由于涉外业务繁杂,保险业务小组人手明显不够。不久一些留在北京及从农场提前回来的人保员工先后加入进来,协助保险业务小组开展工作,他们是翻译罗烈仙、吴成钰,再保险业务专家周庆瑞,会计专家童一翱、沈才伯等。另外,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协助处理有关海损理算规则(海商法)事宜的人保专家李桂清、王恩韶也留在了北京,协助开展工作。因此,后来9人小组也有了13人小组之说。

这些患难与共的同志,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人保在"文革"时期留守看摊的人员,被后人笑称为"治丧委员会人员"。他们当时每天履行着"早请示,晚汇报"的政治生活形式,还要参加上街游行等活动。他们一边批判西方保险理论,一边按西方保险费率结算着一笔笔涉外分保业务。他们当时大多数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有的家属在外下放劳动,有的或在外地参与"四清"运动,孩子都很小,生活举步维艰。

于葆忠在2011年《中国保险报》上发表的《保险业曾险象还生》的文章中讲到9人小组,后来保险公司的同志自己叫它"治丧委员会",其实在当时机构精简、干部下放劳动以及"备战"的形势下,谁也不能例外,各大机关90%以上的人都下放到干校,只留下不到10%的人,保险公司留的人还算多的。于葆忠的爱人欧阳天娜带着孩子去了"五七"干校,他成了"单身汉"。根据"备战"的需要,留守的同志都做了轻装的准备,每个人的家都搬到财政部附近,主要集中在三里河。







罗烈仙

周庆瑞

童一翱

保险业务小组的成员保持了对中国人保企业的忠诚,对保险事业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他们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笔保险业务,尽职尽责地延续着中国人保的微 弱命脉,呵护着中国人保残留的最后一点火种。

4. 在逆境中的坚守

1969年,中国人民银行军事代表和交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生产指挥部联合向国务院呈交了《关于停保自营远洋船舶保险的请示报告》,其理由是远洋船舶和设备、货物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固定资产,发生损失,国家照样可以弥补解决。而保险是拿国家外汇向帝国主义国家保险公司投保,依赖垄断资本集团的补偿,违背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外汇挂帅的思想。

报告还提出,每年向国外支付的9万英镑分保费,积攒4年,就可购置一艘普通 货轮。至于承保货物运输中的罢工险,更是对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和革命行动的污 蔑和抵消。

报告指出,现有的部分海运公司承保的20余艘货轮,来自阿尔巴尼亚、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一律停办,他们将会转向"美帝"和"苏修"国家的保险公司投保,对外影响不好,因此,此种业务继续由我们承保,但不再向外办理分保。或许正是由于这个政治原因,以及部分再保业务的连续性不能立刻终止合同的业务原因,才使得涉外业务没能一下子全部停下来,一小部分涉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再保险业务得以保存。

于葆忠在文章中讲, 当时流行一种"倒口袋"的说法。认为保险人和被保险

人都是国家所有,发生损失赔与不赔意义不大,不过是一个人把钱从左口袋拿出来放到右口袋里。这是一种吃大锅饭的思想,实际上否定了保险存在的意义;另一种是"反垄断"说,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垄断,反对崇洋媚外,要独立自主地办中国保险,不要跟着伦敦市场走。曾经一度,保险公司本身要不要存在下去都成了问题。当时,有的军代表和人民银行负责人否定保险对经济的保障作用。他们说,保险保的是官僚主义——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由保险公司赔,主管部门却没有责任;保的是大偷和小偷——国家财产被盗了,保险公司也赔。

当时发生了铂金空运丢失事件,我国进口的80公斤铂金,在巴基斯坦转机时不 翼而飞,损失七八百万美元。有人提出要停办保险,"报告"经李先念副总理转 到周恩来总理手中,总理做了批示,大意是,现在敌人要孤立我们,我们不能自 己孤立自己,我们要开辟对外联系的渠道,保险就是渠道之一。

在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人保在总理亲自过问下才得以保留下来,避免了更大的 损失,度过了存废一关。在业务方面,过去80多人做的事情由十几个人来做,只 能应付眼前的业务,根本没法开拓。当时,其他经济领域,如外贸、外运等,也 受到很大损失,保险业随之萎缩也是必然的。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大形势下, 保险业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

9人小组成员王仲石在为中国再保险公司撰写的回忆文章中讲到,在"文革"期间,有人认为保险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提出"砸保险"的口号,并扣上"洋奴哲学"的帽子。人保以往通过分保将一部分责任转嫁到国际保险市场的远洋船舶险,于1969年1月1日停办;进出口货物运输保险中附加的"罢工险",本来是国际市场普遍承保的险种,被认为是违背国际主义原则立场,也被要求停办;香港的中国保险、太平保险和民安保险等公司也被要求停办,造成大量业务流失。

王仲石还讲到,1969年6月,中国外贸部门从巴基斯坦进口手表和铂金,在 空运途中丢失,造成重大损失。外贸部向周总理汇报时,周总理批评为什么不保 险?原来外贸部未向总理说明已按"声明价值"办理保险,只说国外保险停办 了。至此,周总理立即指出:"保险还是要办,保险是对外渠道,敌人想要孤立 我们,我们不要自己孤立自己"。李先念副总理连夜向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领导 乔培新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乔培新当夜凌晨2时召集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 及保险业务组人员开会,及时传达指示。周总理的指示是我国保险业得以发展的 一个转折点。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已停办的"罢工险""远洋船舶保险"分别于 1971年和1972年恢复办理,国际分保业务也被保留下来。

小组中同是再保险专家的刘恩正介绍说,当时他和王仲石一起到外贸部商谈进口铂金保险事宜,人保要求留下30万英镑自留额,但外贸部想全部进行分保。最终他们提出了"声明价值"保险,但是并没有办理手续。当时的外贸部部长李强为此挨了批评。

刘恩正还讲到,他当时参与处理过收回一笔人保自留额项下起额赔款事宜。自留额是体现保险公司实力、能力的标志,也能减少保费支出,一般设立危险单位,造成全损,才可赔付。人保当时以船为单位,超过38万英镑,再进行分保。英国分保机构超赔保障条款以连续3个全损才赔付。1967年,埃及关闭苏伊士运河,封港的船只中有人保承保的3艘货轮。人保要求按全损赔付3艘货轮,但英方提出没有按时间通知出险、船货情况不详、存在开航的可能性等拒绝。刘恩正等人仔细研究条款,提出以战争险为由赔付。英方以不是战争为由,强词夺理。人保承保的另一艘陈旧货轮,在公海上被船长放弃,保险赔款大于船货。刘恩正以合同中"已经发生,没有了结的情况下,也可以作赔"为由,一共60多万英镑,争取赔付了38万英镑。到1970年,赔款被全部收回。此事件体现了人保业务知识与技术水平,对后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为国家创造了宝贵的外汇,促进了中国进出口贸易渠道的畅通。

9人小组之一的徐振彬回忆,在9人小组工作期间,有一次军代表找到他们,提出要在保险单上印上毛主席语录,他们据理力争,保险单主要是涉外业务,是法律条款,印上语录,容易引起歧义。但军代表说,业务影响不影响是技术水平问题,印不印毛主席语录是政治立场问题。

其实,在1970年,周总理就针对在出口商品包装的图案上是否加印毛主席语

录的问题作出过指示,如果将带有语录的包装商品出口,反而会被敌人利用。各省的同志可以去广州商品交易会,看一下商标、包装图案,都可以查出一些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应该讲了,不仅外贸,内贸商品的包装、名称等也都要注意。另外,在汽车上搞语录也是不严肃的,这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什么事情搞极端了,总是走向反面。

在人保员工的坚持下,保险单上并没有印毛主席语录。

徐振彬还讲到,有一年,印度驻华大使馆的车辆在长安街发生了车祸,原因是有飞虫飞进驾驶员的眼睛,导致车子撞在路边的树上,造成车辆破损。大使馆要求理赔。但有人以印度是反动派为由,阻挠赔付,并提出飞虫飞进眼睛也只能是一只眼睛。用这种原由拒赔,成为一时的笑谈。

小组成员王淑梅回忆,当时她负责北京地区的涉外业务。印度使馆汽车赔案是 她负责处理的,那是一辆菲亚特汽车,赔案当时还惊动了外交部。

王淑梅还讲述了另一件事,有一年冬天,英国驻华大使馆官员的运输货物发生破损,她和秦克赶去查勘,他们穿着大衣,骑着自行车,从北京西边三里河的财政部赶到北京东边的三里屯使馆区,路途很远,还要顶着寒风,因此迟到了。外交官很生气,向财政部告状。财政部领导了解情况后,指示人保公司以后到使馆区查勘,单位要派车。

现退休在吉林的丛泽兹回忆,当时他是28岁的小伙子,曾与人保的其他人员一同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第十九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主要工作任务是向参会的各出口商品交易团宣讲保险的意义和重要性,努力争取我国出口商品都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以确保国家和各出口贸易公司的权益;他们解释保险条款的相关内容,并配合各交易团业务部,做好出口商品交易合同条款中有关保险协议内容的审查把关工作。同时,他们利用交易会外商云集的机会,寻找相关客户治谈保险业务,开展对外的保险展业工作,扩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对外影响。

不忘来時路 BUWANG LAISHILU

第十二章 春风化雨

1,恢复业务的牌子挂在大树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为了适应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恢复和发展国内外保险业务势在必行。

1979年2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在北京召开,及时作出了"从1980年起,通过试点,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会议指出,利用保险形式,建立保险基金以补偿意外损失,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是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环节,是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重要措施。当时,国家副主席李先念及国务院余秋里、谷牧等领导同志均听取了会议汇报。

1979年3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正式成立恢复国内保险筹备小组,着手推进相关工作。同年4月9日,国务院在批转的第99号文件《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纪要》中明确指示,要根据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和自愿的原则,通过试点,逐步恢复国内保险。该纪要第六条指出,开展保险业务,为国家积累资金,为国家和集体财产提供经济补偿。今后对引进的成套设备、补偿贸易的财产等,都要办理保险。凡需赔偿外汇的保险业务,其保费,改收外汇。保险公司所得利润,不再上缴财政,留作国家发展保险事业的基金。为了使企业发生意外损失能及时得到补偿,而又不影响财政支出,要根据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原则,

不点来時路

通过试点、逐步恢复国内保险。重要口岸和各省、市、自治区分行所在地要根据 保险业务发展的需要,逐步设立保险分公司,受保险总公司和人民银行分行的双 重领导, 业务上以保险总公司领导为主。"

根据国务院的文件精神,1979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恢复保险业务 和加强保险机构的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分行根据全国分行会议精神, 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一切从头做起,通过试点,总结经验,为逐步恢复国内 保险业务做准备。通知指示,凡是在机构、人员和各项条件具备的省、市、自治 区,可以选择几个主要城市进行试点。

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可先办理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 险、运输工具保险以及个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以地方经营为主,由省、市、 自治区为单位统一经营,独立核算。办理国内保险的干部来源,主要是吸收大中 专学生培养训练, 也可以遴选一些曾从事保险工作的骨干归队。

上述两个文件下达后,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立即开始筹备相关工作,撰写规 划,并从上海、南京抽调人员。首先是设计制定保险条款、费率和单证格式: 当 年5~6月, 先后推出企业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和家庭财产保险三个条款, 报送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下达:7~8月,先后派出几批干部赴广东、福建、浙江、上海、



1979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贯彻 1979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贯彻国 国务院决定恢复国内保险大会



务院决定恢复国内保险大会



险工作会议



1979年11月,蓮一波等领导同志出席全国保 1979年11月,召开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主席 台就座者左起宋国华、薄一波、李葆华、陈希愈

江苏、江两等地, 同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分管保险的行长共同商量如何贯彻中国人 民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关于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的精神,以及筹建保险公 司、冼择营业地点和开展保险业务等事官,并对停办国内保险业务期间的灾损、 救济、恢复生产等情况作了粗略统计。

经讨近一年的酝酿和筹划,1979年11月19日至11月27日,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 北京召开,这是国内保险停办20年重新复业后保险工作者的第一次盛会。中国人 民银行各分行主管保险业务的副行长、中国人保各分公司、支公司负责同志和保 险业务干部以及国务院财贸小组、国家经委、财政部、公安部等有关部门的同志 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希愈主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 理宋国华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保险工作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 明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险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研究保险工作如何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并对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

会议客观地分析了国内保险业务停办20年之久的现实状况,由于各地办理国内 保险业务的机构早已撤销、保险专业干部分散到其他行业、人们对保险的认识还 需要有一个过程,在无机构、无人员、无办公用房的"三无"条件下进行恢复工 作,必然困难不少;从上述实际情况出发,大会要求全体保险工作者充分认识到 自己肩负的任务艰巨,努力克服主客观条件的各种困难,为恢复和发展人民保险

不点来時路

事业作出贡献。

在无机构、无人员、无办公用房的"三无"条件下进行恢复工作,可想而知 恢复工作的举步维艰、但是、人保员工激情昂扬、艰苦奋斗、再大的困难也能克 服。没有条件要创作条件、虽然还没有办公室、但大家已经开展业务了。

那时,保险员工基本没有像样的交通工具,要跋山涉水、顶风冒雨去展业,在 偏远牧区要骑马、骑驴、好一点的也是骑自行车、路上渴了喝上一捧山泉水、或 饮用自带的铁皮水壶装的水。

在浙江乡下,有一家保险公司没有办公地点,为迅速开展业务,他们没有等靠 要,就把公司的牌子挂在大树上,在街上办公。

湖南省古丈县的人保支公司开办了很长时间。仍然没有自己的办公地点。就把 公司的牌子挂在别家单位的墙上。

国内保险业务恢复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按照国务院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文件精 神、克服重重困难、迅速建立起各级保险机构。随着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国 内保险业务的恢复,海外保险机构与人员也得到相应扩张。

国内保险机构恢复初期、根据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文件规定、中国人 民保险公司仍沿用以前的建制,即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直接隶属中国人民银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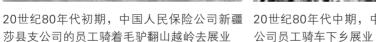


分公司员工跋山涉水去展业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湖南 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西藏分公 司利用大喇叭和卡车宣传保险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新疆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甘肃分

局级专业公司。管理体制也基本沿袭20世纪50年代的总公司、分公司、支公司垂 直领导形式。

1979年5月1日,上海市率先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9~11月,重 庆和江西的南昌、九江、景德镇办理国内保险业务的班子也组建完成。截至1980 年5月底,已有上海、天津、江苏、四川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了分支机 构。截至1980年底,除西藏、台湾以外,中国人保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恢复了分支机构。各级机构总数达311个、专职保险干部达3423人。

截至1981年底,中国人保员工人数较上年翻了一番,达7954人。截至1983年 底,全系统已有分支机构1214家,干部人数猛增到19701人。

此时,中国人保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来,获得了更大的经营自主权。

2. 老当益壮的归来者



叶奕德

人保公司在停办国内业务时期,部分人员由 财政部划归中国银行国外局,其余大部分人员 转业到西南、西北等地。

老专家叶奕德当时本来是要被分配到贵州 三线工作的,但业务股股长罗高元劝他留在北京,发挥写作能力。最终,叶奕德到朝阳区呼 家楼中学,当了语文教师。

叶奕德仍然心系保险,曾先后三次向中央写信,主张恢复保险。1962年中秋节,叶奕德到同住月坛北小街人保宿舍的贝仲选家做客,向他提出,国家现在说人民公社是"共产风",保险就是被"共产风"刮掉的,我们应该向中央建议恢复保险。贝仲选答应他向上级转达。

叶奕德回到家,连夜写了建议书,一式两份,一份请贝仲选通过财政部转递,另一份请林震峰通过银行转递。

过了一段时间,保险公司留守的人员告诉叶奕德,他的建议书中央有了回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批示是,暂缓办理。尽管如此,叶奕德认为中央并没有否定,恢复还有希望。

1978年7月的一天,叶奕德参加完人保第一任副总经理孙继武的追悼会,在回家的路上,遇到同行的林震峰。林震峰此时正在参与人保公司准备复业的领导工作,他问叶奕德愿不愿意回人保工作,叶奕德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归队。

1978年11月,恢复国内保险已经内定,但叶奕德的调职手续还没有办好,但时间不等人、叶奕德先离开学校,回到阔别20多年的人保公司上班。

197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正式作出恢复国内保险的重大决策,老保险们奔走相告,群情激奋。叶奕德也成为中国保险业的"三朝元老",见证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

1979年5月,在中国人民银行与北京市教育局的直接协调下,叶奕德正式接到调令,办理了手续,从此成为人保员工。

此时, 叶奕德已在人保干了半年多, 因没有办公室, 就在自己家里办公。

据叶奕德的儿子叶骅回忆,当时叶奕德把自己家两室一厅的房子,拿出一间做临时办公室,他经常和魏润泉、李嘉华、李锵等筹建小组人员在一起讨论保险条款,研究国外保险最新动态,遇到有些细节,还经常争吵。叶骅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讨论战争险,条款中有关不明飞行物撞击造成损失是否需要赔款,大家争论了好久。他们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因为吸烟屋子里乌烟瘴气。

人保恢复后,叶奕德作为国内业务处处长,经常下基层开展调研,遇到发生 大的灾难和理赔事件,他提包就走,到现场查勘,指导理赔,在当年许多的照 片中,都可以看见叶奕德消瘦的身影。

1992年4月,叶奕德接到一个从台湾打来的电话,原来是他早年在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公司的同事范广大打来的。范广大1949年去了台湾,从此音讯全无,他现在是台湾航联产物保险公司总经理,要组织台湾保险业代表团访问大陆,约叶奕德在北京见面。





中央组织部对秦道夫同志的仟职文件

在叶奕德的积极策划下,1992年5月,台湾代表团抵达北京,实现了海峡两岸保险业首次接触,并开启了保险业务及学术的一系列交流活动。1994年1月,叶奕德随中国保险学会代表团到访台湾。在一次联欢会上,叶奕德即兴填词并仿《何日君再来》曲调登台高歌: "海峡两对岸,本是一家人,英雄来论事,交流意义深。"

1984年11月20日,中央组织部任命秦道夫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副部长级)。这标志着中国人保正式升格为副部级单位。秦道夫从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他回忆道:

1984年12月初, 我和淑梅由九龙红磡火车站乘火车到深圳, 过了海关转车到

广州,然后在广州白云机场乘飞机回到北京。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陈松想到机场迎接,我的女儿秦玉、秦珊、秦小丽和外孙龚臣、外孙女薇薇也到机场迎接。12月的北京已经进入冬季,大自然褪去了绿色,城里的树枝都变成光秃秃的,公园里的草地也变成了灰黄。回到位于月坛北小街财政部宿舍的家中,年迈的父母面带笑容以充满兴奋和喜悦的心情迎接我们,室内温暖如春。第二天,我坐着公司的班车到西交民巷108号公司去上班,并立即投入到准备召开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中去。[1]

1979年人保公司广大干部员工的归队,与1949年人保创建队伍的组建一样,充满着革命豪情。许多人回到北京,回到曾在这里工作多年的母公司,见到了许多老同志,见到了许多熟悉的亲切的面孔。他们又走到一起来,朝夕相处一起工作,开始了新的征程。

3. 世界屋脊上的保险公司

197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国内业务后,很快在全国几乎所有的县市设立了分支机构,但西藏自治区还没有设立省级机构。

1986年7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派副董事长宋国华等4人,就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保西藏分公司、西藏分公司)事宜到西藏进行考察,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进行了交流会谈。双方一致认为,在西藏成立保险机构是西藏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改革配套的需要。成立中国人保西藏分公司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并提出了具体的开办意见。

1986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复,经研究同意设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级别为副厅局级。

1986年底,人保公司派王以才进藏,开展分公司组建工作,他是人保公司第一个进藏工作的人。那时,大家对西藏信息知道的不多,感觉西藏很神秘,都为王以才捏了把汗。

王以才临行前,对人保总部的领导说,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是跟着母亲穿着破衣裳讨饭度过的。母亲领着他和哥哥沿街讨饭,从山东走到安徽,是吃千家饭长大的,这样的生活度过了8个春秋。他说,他能吃苦,不怕吃苦,请领导放

心。王以才带着总公司的重托和坚定的信心踏上了进藏的征途。

王以才进藏后,通过登报招聘的方式,吸收了一批大学生,当时登报招聘的条件是大专以上文化,热爱保险工作的青年,崔玉英(藏族)、赤云多吉、李富华(藏族)就是当时招聘进公司的大学生。

西藏自治区政府拨给西藏分公司40亩土地作为办公楼和职工宿舍用地,总公司 拨给他们300万元进行基本建设。西藏分公司的办公楼和职工宿舍先后建成,并购 买了办公设备。此外,总公司还拨给3辆汽车。西藏分公司的李兴祥、赤云多吉等 员工从北京、沈阳、连云港把三辆汽车先后开到拉萨。

西藏分公司使用的保险单由总公司设计,在北京译成藏文经专家修改后,带到 西藏印刷,交付使用。

在中国人民银行西藏分行的直接领导下,西藏分公司的筹建工作顺利进行,并 于1987年3月27日开始试营业。当日,西藏分公司首任副总经理王以才签发了西藏 历史上第一张保险单(货物运输保险)。

1987年7月2日, 西藏分公司在拉萨罗布林卡公园隆重举行了开业典礼。

总公司领导秦道夫、苑骅等前往拉萨出席开业典礼。西藏自治区以藏族的礼节 向人保公司代表团献了哈达,接着举行了敬酒礼。

西藏自治区主席多吉才让和副主席普穷穿着崭新的藏族服装出席了开业庆典。中国人民银行西藏分行行长索朗达吉和中国银行西藏分行行长德珍分别主持会议。

中国人保西藏分公司成立后,很快相继开办了企业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 机动车辆保险等业务。

那时,西藏分公司的员工开着大卡车,在拉萨街头宣传保险,成为拉萨一景。

王以才在西藏吃苦耐劳,和藏族同胞打成一片。1987年,他还在《红旗》杂志 上发表了《浅谈西藏保险的必要可能与措施》宣传西藏保险的文章。

1990年1月,西藏自治区政府召开了保险工作汇报座谈会,时任自治区的党委



1987年7月2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开业典礼在拉萨罗布林卡公园隆重举行。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左二是西藏自治区主席多吉才让,左四是副主席普穷,左一是秦道夫,左三是苑骅



1987年,人保西藏分公司负责人王以才向藏族 干部讲解保险条款和有关政策

书记胡锦涛、政府副主席普穷、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广玺,以及自治区党政军和各部委厅局的负责人和人保公司的部分客户出席了会议。会上,胡锦涛作了重要讲话,他充分肯定了西藏分公司的工作,强调了发展保险事业的重大意义,为大家指明了保险工作的方向。

根据秦道夫的回忆,他当年在西藏出席开业庆典时,曾和苑骅一起到公司看望 职工。两位年轻的藏族女职工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一位名叫崔玉英,另一位叫次仁史宗。崔玉英身穿白色衬衣,外面穿着不带袖的灰色长袍,腰间捆着有条纹的短裙,皮肤微黑而细润。从她纯净有光亮的眼睛里可以看出她是一位聪明的姑娘,但从她脸上的皮肤看与一般藏族姑娘稍有不同。我好奇地问她,你是哪个民族?她幽默地回答说: "我是团结族。"接着她又说: "我爸爸是汉族,我妈妈是藏族,我就成为团结族了。"她从小跟她妈妈多,全身都是藏族打扮。她从西藏农学院毕业之后,考入保险公司,在业务处任业务员。次仁央宗大学毕业之后考入保险公司在财会处做财务工作。[2]

崔玉英的父亲是山东威海人,当年是进藏的解放军军官,根据上级指示,他所在的部队全部转到西藏地方工作,曾任西藏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她父亲后来与西藏姑娘结婚生下两个女儿,崔玉英是老大。

崔玉英来公司后,进步很快,于1999年11月被提升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西藏自 治区分公司总经理。

4. 劳合社主席米勒的来访

1986年4月18日,伦敦劳合社主席彼德·米勒(Peter Miller)和夫人应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邀请,率领劳合社代表团对公司进行友好访问,这是劳合社主席第一次来访。

当时人保公司董事长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尚明兼任,秦道夫是总经理,他们 在西交民巷22号公司总部接待室与米勒主席举行了会谈。

尚明董事长致辞对米勒主席来访表示欢迎,希望通过此次访问增进相互了解, 扩大双方的业务往来。秦道夫介绍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历史和当前的发展情况,回顾了人保公司与劳合社之间的业务关系。

会谈中,秦道夫介绍了关于人保公司职工培训方面的情况。他说,目前人保公司采用开办短期培训班、开办保险专科学校、委托有关大学开设保险专业班等方式进行培训。

他提出人保公司有的青年职工愿学习英国皇家特许保险学会(Chartered Insurance Institute, CII)函授课程,参加ACII资格考试。如果考试地点在国外对他们很不方便,希望在中国每年对中国的学生举行一次考试,可以由中国保险学会秘书长王永明负责联系。

米勒主席表示,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中国保险业务进入伦敦劳合社市场,进一步密切劳合社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合作。关于英国皇家特许保险学会ACII考试地点设在中国的问题,他表示回到伦敦后,将尽快研究并给予答复。

米勒主席还表示,为了支持中国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劳合社愿免费为中国人 民保险公司在英国皇家特许保险学会下设的伦敦保险学院培养一位职工。

当天晚上,尚明董事长和秦道夫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欢迎米勒主席一行。这种 国家级的接待礼仪,也体现出人保公司当时在国家的地位。

宴会开始前,双方举行了赠送仪式,米勒主席赠送给人保公司会议桌一张,这 张会议桌是米勒主席专门从伦敦带到北京的。他介绍说。会议桌由伦敦著名设计 师设计,使用英国核桃木制作。这张会议桌长546厘米,宽148厘米,高73厘来, 设计精美,质量很好,既有使用价值又有很好的纪念意义。

当时人保公司在阜成门内大街新建的办公大楼已经竣工,公司由西交民巷22号搬迁到阜成门内大街后,这张会议桌安放在大楼10层总经理会议室内,总经理室开会、党组会议、行政会议都在这里举行。

人保公司向劳合社赠送的礼品是一幅大型长城挂毯。它是在天津地毯厂专门订做的,做工精巧,图案明晰。在挂毯的图案里,中国的万里长城翻山越岭蜿蜒迂回在重山峻岭之间,把这个世界上伟大的人工奇迹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米勒主席和代表团成员都很高兴,非常喜爱这块挂毯。

代表团将挂毯带回伦敦后,把它挂在劳合社新建大厦的营业厅里,向世界各国的保险从业人员展示。据说,当时这个样式的挂毯在中国只有两幅,另一幅由外交部送给联合国,挂在联合国大厅里。

那张核桃木会议桌和这件长城挂毯,成为人保公司与英国劳合社友好合作的 象征。

1988年8月,人保公司员工王育宪飞到伦敦,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他学完了英国皇家特许保险学会规定的9门功课,通过考试,获得了ACII证书,成为该学会的首名联络会员。



1986年4月,伦敦劳合社主席米勒率团访华期间,人保公司向劳合社赠送了礼品——大型长城挂毯一幅。右一是米勒主席,左二是秦道夫

1989年8月,伦敦保险学院院长 J.A.Wheeler先生在写给王育宪的信中说,你是 该学院学生的楷模 (you were a model student) 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派出的友好使者 (you were a very good ambassador for PICC)。

1986年9月,人保公司投资的中国保险 (英国)有限公司在伦敦创立,王恩韶出任 董事长兼总经理。人保公司秦道夫一行到伦 敦出席公司开业庆典,同时拜会劳合社主席 米勒。

此时,劳合社新大厦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米勒主席在新大楼的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了秦道夫一行,并带领他们到新的营业大厅观看长城挂毯,大家对挂毯赞不绝口。

在人保代表团访英的第二天,米勒主席 邀请秦道夫和王恩韶夫妇出席晚宴,请帖上

写明要穿燕尾服。可是,他们当时没有燕尾服,现做也来不及了。中国保险(英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梁志东说,中山装是中国的礼服,没有燕尾服可以穿中山装,大使馆商务参赞的体形跟秦道夫差不多。他就到使馆为秦道夫借了一套中山装和旗袍。这样秦道夫和王恩韶穿着中山装,王恩韶的夫人龚益初穿着中国的旗袍,出席了米勒主席的晚宴。

5. 大亚湾上了保险

大亚湾核电站是我国第一座中外合资兴建的大型商业核电站,位于广东省深圳市东部45公里大亚湾畔。1987年8月主体工程开工,1994年建成投入商业运行。核电站安装了两台98.4万千瓦水堆核电机组,设计年发电量140亿度。

在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和转入运营的过程中,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提供了全程的保险保障,为我国的核电建设提供了配套服务,也为以后开展核电保险业务积累了经验。

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开始前,经国务院领导推动,广东省电力公司与香港中华电力公司于1979年11月21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研究在广东省境内合资兴建核电站的可能性。经过历时一年的研究和实际考察,两家公司认为建设核电站对双方都有好处,因此双方都有发展核电的愿望。

同时,两家公司还与国内的银行、保险、财政、税务、外贸和法律等部门接触,商谈有关的问题。此外,两家公司还请地质、地震、水文、气象、环保、机械制造、核能和电力等部门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到广东帮助指导工作。

1982年12月,广东省和香港双方签字,提出了《在广东省合资建核电站可行性研究联合报告》。大亚湾核电站于1982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建设。

1984年3月17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程万铸和公司国外业务部副总经理李锵、丁运洲一起从北京飞到广州,与核电站总指挥彭仕禄就核电站保险问题进行商谈。彭仕禄是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中国核潜艇专家,会谈中双方都表示了合作意向,彭仕禄表示愿提供核电站的资料供保险公司研究承保方案。

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际保险市场上分散核电站的风险,为了使分保接受人了解 核电站保险,人保公司积极向国外分保机构说明实际情况,以达到分散危险、安 全保障的目的。

人保公司在设计拟定核电站的保险合同和条款时,深感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人才。公司决定派国外业务部的干部陈南洋、王真等到伦敦塞奇维克公司学习核电站保险知识和保险实务。

1987年8月,大亚湾核电站动工兴建,建设工程浩大。建设期间的主要风险包括土建工程、安装工程、货物运输等方面的风险,以及存仓火灾、人身意外伤害和第三者责任方面的风险。

人保公司根据核电站的实际情况,设计了建筑、安装工程—切险和货物运输—切险的保险合同,另外还有一些小险种由深圳分公司直接承保,这使核电站在建设期间的各类非核风险得到了完善的保险保障。

大亚湾核电站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是一份保额较大的非核风险的保险合同。

大亚湾核电站在建设期间的各类风险,经人保公司出单承保后,除自留少部分外,将其大部分风险通过再保险方式,分散到国际保险市场,英国、法国、德国等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国接受了较大的分保份额。

由于此次分保是我国第一次将建设核电站的风险在国际市场上办理分出,国际上的再保险接受人在接受人保分保业务时,出于谨慎考虑,设置了赔款限制条款。为了消除国际再保险接受人的顾虑,人保公司组织他们到大亚湾核电站工地进行实地考察。

他们在工地考察时,对有关工程的组织安排、仓库的消防设备和具体施救措施 以及其他有关工程安全方面的问题十分关注。国际再保险接受人一行非常认真, 中午在工地食堂吃饭,下午继续考察。

前两次考察,他们只看不说,不加评论。1989年下半年第四次到工地考察时,在座谈会上他们一致表示,通过考察对大亚湾核电站的施工组织、安全措施、工作安排有了全面认识,是满意的,愿意提供全额的再保险保障,并当场签字同意取消2000万美元的限制条款,愿意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保险责任范围,全额承担分保责任。从而使核电站的风险得到充分的再保险保障。从此,中国人保的核电保险登上国际保险舞台,领军中国保险业。

在沉默了20年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了勃勃生机,恢复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职能作用,承担起国家现代化建设中不可替代的重任。中国的保险事业,就像蕴藏在万顷波涛之下的海底火山,孕育着巨大的能量。



1986年,人保公司承保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公司领导与有关人员合影

不忘来時路 BUWANG LAISHILU

附录

附录— 不忘来時路

中国人民保险历任主要领导人简历



胡景澐(1909.10-1995.12)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1949.10-1952.5)

山西省文水县人。1931年毕业于山西银行专科学校。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曾任太谷县八路军游击队三大队副队长、支队参谋、太行纵队司令部合作社社长。1943年任冀南银行副总经理、总经理。1946年任瑞华银行行长。1948年任太行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华北银行副总经理。1948年11月

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1949年10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1963年10月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1979年11月任中国保险学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吴波(1906.12-2005.2)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1952.5-1953.5)

安徽省泾县人。1939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干部大队参谋,第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统战部、驻洛阳办事处干事、秘书。后奉调到延安,在中央统战部担任传记委员会编辑。历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秘书主任,晋察冀边区粮食局副局长、代理局长。解放战争时期,兼任晋察

冀野战军后勤司令部供给部副部长,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处长,华北解放区财政厅副厅长,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财政部办公厅主任、部党组副书记、机关党委书记,中央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兼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副书记。1978年后历任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财政部顾问、党组成员。1988年离休。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贝仲选(1908.1-1970.6)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1953.5-1956.10)

河北省巨鹿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45年11月任临清市第一任市长,冀南行署第 一支署专员。1947年6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后勤 部办事处主任。1947年11月任鄂豫皖行署财经处处长。 1948年11月任豫皖苏分局临时支前委员会委员,负责指 挥各分区支前工作。1949年4月任皖北行署财经处长、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运输大队政委。1949年7月任皖北行署财政处会计训练班

主任。1949年12月随二野进入四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第一副部长。1953年5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部保险总公司经理。1954年底任国务院财政部部长助理。1961年1月任华北局财贸办公室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57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张蓬(1907.6-1989.12)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1956.10-1958.11)

浙江省余姚县人。1931年在上海做职员。1934年在 大中华火柴公司任职。1935年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习小 组。1936年开始接受党布置的工作,参加革命。1937年 参加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任益友社支部书记。后任工华难童收容所主任,曾 受党派遣打入敌伪内部工作。1941年转入浙江抗日根据

地,任浙东行政公署秘书主任、渤海行政公署副秘书长、财政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省财政厅副厅长。20世纪50年代初期,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东区公司经理,后调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1956年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1958年任福建省财政厅副厅长。1979年任宁波市人民政府顾问。



崔平(1914—1995)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1959.12—1962.1)

辽宁省盖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任陕甘宁延安银行货币交换所主任。1945年任辽西银行、东北银行、辽宁银行的副

经理。1948年任东北银行沈阳分行副总经理、副行长。东北区银行计划处处长。1955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司副司长,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副主任,国外业务局副局长,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1979年任中国银行副行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顾问。1985年离休。



李绍禹(1915.5-1990.1)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1962.1-1966.5)

河南省南阳市人。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先后在陕北公学和抗大分校学习。后任冀南银 行办事处主任,太岳经济管理总局金融部副部长,冀 南银行太岳分行副行长。1949年任中州农业银行豫西区 行副行长。1949年任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第一任行 长、中南区行行长。1955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兼

农村金融管理局局长,中国农业银行行长。1962年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兼国外业务管理局局长,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后任中国银行行长。1981年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耿道明(1916.4-1994.10)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1971.9-1975.11)

山东省潍坊市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 支队分队长、宣传员,第八支队连副政治指导员,山东 纵队一支队连政治指导员,陇海南进支队政治部锄奸科 科长,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 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第三十五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保卫部部长,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华东野战军军法处处长兼保卫部副部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1964年4月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政治部主任,中国银行副总经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副总经理、顾问。1986年离休。



冯天顺(1921.1-2011.12)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1975.11-1981.11)

山西省闻喜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曾任中共夏县中心县委警卫连政治副指导员、 八路军总后勤部冀南银行印钞厂任政治指导员、冀南银 行太行四分行副主任、邢台市行主任、太行区行调查研 究科科长、中国人民银行太行区分行副经理。新中国成 立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副行长、行长、党

组书记,福建省财贸办副主任兼行长,中国人民银行信贷计划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伦敦分行经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国家外贸管理委员会外资管理局局长等职务。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1981.11-1983.3)

山东省乐陵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参加中国 共产党,在抗日游击队里任职。1938年7月,任冀鲁边 区地委秘书室干事、总务科会计、科长,乐陵县区委

书记。1941年任北海银行鉴定股股长,印钞厂副主任、主任。1943年任渤海区北海银行印钞厂厂长、清河支行行长、渤海分行副行长。1948年随部队进入徐州,任北海银行徐州支行行长,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徐州支行行长。195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农金处副处长,后奉调北京,任中国人民银行农金局专员。1954年任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副行长。1955年任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行长。1958年任湖北省恩施地委书记、专署专员。1964年任中监委派驻中国人民银行监察组监察员,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管理局局长。1979年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后任中国银行副董事长。1976年任中国银行驻香港总稽核。1981年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后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董事长。中国保险协会名誉副会长。



尚明(1915.7-2009.2)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董事长(1983.3-1983.7)

河南省商丘市人。1938年初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中央青委做干部工作, 后到青年干部学校高级班学习。结业后,到中央研究院 (后改为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并进行研究工作。1941年 到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1944年调入中央财政经济部金 融财政科。1945年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任秘书。1945年

秋到晋察冀边区,历任晋察冀边区银行研究室主任、业务部长,华北银行处长。 1949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副行长兼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总经理。1950年任中 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管理局局长、办公厅主任、计划局局长、机关党委书记、党 组成员等职务。1959年发放山东、内蒙古等地劳动多年。1970年回中国人民银行任 计划局局长。1980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1982年任中国人民银 行特邀顾问,党组成员。1983年兼任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公司董事长。1987年担任 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退居二线后,担任中国金融发展教育基金会会长。



宋国华(1924.1-1997.8)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董事长(19837-1984.1)

河北省人。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任冀南银行印钞厂科长。1950年任中共新乡地委工业处处长、工业部部长。后任洛阳市副市长。1960年任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行长,后任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副总经理。1977年任财政部国外业务组组长。1979年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1983年7月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董事长。

曾任中国保险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副会长、中国保险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会长、 《保险研究》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苑骅(1927-2017)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代总经理)(1984.1—1984.11)

辽宁省人。1946年参加革命,曾任江西省宁都县县长、县委书记。历任中国银行卡拉奇分行副经理,中国驻港澳保险联办处副主任。1979年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再保险处处长,后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代总经理)、中国年1月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代总经理)、中国

人民保险公司副董事长。曾任香港民安保险公司董事长、中国保险学会第一届理 事会常务理事、中国保险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会长。



秦道夫(1929.10—)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党组书记(1984.11—1990.7)

山东省荣成市人。山东胶东抗日中学毕业。1945年参加八路军,历任八路军山东军区东海分区司令部机炮轮训队文书,县政府科员。1945年在山东北海银行胶东印钞厂工作,任山东北海银行文书、科员、政治教员。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天

津印钞厂厂部秘书。1950年11月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工作,历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处长、中国银行卡拉奇分行吉大港支行副经理。1964—1966年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驻印度尼西亚代表。1969—1971年调巴基斯坦任中国银行卡拉奇分行副经理兼吉大港支行经理。后任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再保险(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1990年5月被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授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993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1996年离休。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11年10月获《亚洲保险评论》"个人终身成就奖"。



李裕民(1930.5-)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党组书记(1990.7—1994.8)

吉林省敦化市人。1946年参加敦化中苏友好协会工作。1949年南下到浙江、江西,先后任区委书记、县委委员、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64年到中国银行工作,

先后任国外局局长、中国银行副行长。1990年7月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党组书记。1996年任中国保险学会顾问。



马永伟(1942.10—)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党组书记(1994.8—19993)

山东省荣成市人。1966年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财政金融专业。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安徽省六安地区人民银行干部,六安县燕山林场会计,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安徽省六安地区中心支行干部、科长。1981年任安徽省政府财贸办公室干部。1982年

任中国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信贷处副处长、分行副行长。1984年后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1985年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党组书记。1994年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组书记。1995年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组书记。1998—2002年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2003年1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



孙希岳(1940.5—)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1999.3—2000.8)

江西省玉山县人。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 毕业于江西财经学院贸易经济系。1985年任江西省副省 长。1992年9月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经理、总经理。

2000年6月任国务院派驻国有重点金融机构任监事会主席。2003年1月任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国金融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美术院副院长,中国人民书画院副院长,中国湖社艺术顾问,中国名家书画研究院高级顾问,北京中外民间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会名誉会长,江西省老年书画学会名誉会长。中华母亲节促进会副会长、中华父亲节促进会副会长。



唐运祥(1945.12—)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2000.8—2007.1)

湖南省邵阳市人。高级经济师、编审。邵阳师范专科学校毕业。1964年8月参加工作。196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8月至1965年参加"社教"运动。1966—1978年在邵阳地委农村部、地革委公交办、财贸办工作,任副科长、科长。从1979年起历任湖南省洞口县委

副书记、县长,中国人民银行邵阳分行副行长、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邵阳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办公室主任、金融管理处处长、省分行副行长、省外汇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副主任、稽核监督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兼中国金融工会主席;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兼任中国人保财险、中国人保资产管理、中国人保寿险、中国人保健康险公司董事长以及中国人民保险(香港)公司董事长;还曾任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中共十六大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吴焰(1961.2-)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2007.1—2017.11) (2009.9 任董事长)

陕西省汉中市人。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1981年新疆财经学院金融专业毕业。1985—1998年先后任共青团新疆自治区委副书记,中共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委常委、博乐市委书记,共青团新疆自治区委党组书记,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98—2003年担任中央

金融工委团委书记,全国金融青联主席(正局级)。2003—2006年担任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副总裁,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裁。2007—2009年担任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2009年至2012年3月担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裁,同时兼任人保财险、人保资产、人保寿险公司董事长;2012年3月担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副部长级)。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2017年12月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缪建民(1965.2-)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17.11—2020.7)

浙江省海盐市人。经济学博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1986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保险系国际保险专业毕业。 1989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货币银行学专业毕业。 1989年加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95年起先后任香港中 国保险集团副总经理、常务董事、董事,中保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2005年任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副总裁,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年任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裁。2017年兼任中国人寿养老保险公司董事长。2017年4月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总裁、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2017年11月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曾任中国人寿富兰克林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候补代表,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会长。2017年10月当选为第十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罗喜(1960.12--)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20.9-)

江西省南昌市人。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1977年在江西省上高县蒙山林场下放知青。1987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研究生毕业。1987年后任职于中国农业银行总行。2002年后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执行董事、党委委员。2009年后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执行董事、党委委员。2013年后任中国出口信用保

险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16年后任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18年后任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2020年9月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先后兼任东方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研修院名誉理事长,中国农村金融学会、中国城市金融学会、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和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香港中资企业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名誉会长,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红色保险、中国人民保险大事记(1921—2021)

◎ 1921年

8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了《劳动法大纲》,其中,要求工人享受劳动保险的权利,并且主张雇主和国家承担劳动者的保险费用。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的保险概念,成为红色保险的渊源。

◎ 1922年

7月,在党的二大会议上通过了工厂保险中关于保护女工、童工和失业工人的条款。

○ 1928年

7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规定苏维埃委员会分设劳动监督部、社会保险部、社会保险委员会、劳动保险委员会和劳动法庭。

◎ 1931年

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劳动法》,此法对养老保险、工伤救济、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做了详细规定。

◎ 1932年

12月,中央劳动人民委员部下达了建立社会保险局的命令。

◎ 1934年

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修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此大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制定统一的社会保险立法具有指导作用。

◎ 1935年

6月. 罗高元、胡良英等人参加了万里长征。

◎ 1936年

2月,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银钱业和保险业会员编入第四大队,张承宗任 大队长,程思树、林震峰、施哲明等人加入。

◎ 1937年

7月, 胡詠骐、杨经才、谢寿天、郭雨东发起成立了上海保险界战时服务团, 组织募捐, 支援前线抗日。

11月, 胡詠骐在邓脱摩饭店发起了保险界定期聚餐会, 秘密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11月,上海金融业地下党总支书记张承宗先后发展了宁绍水火保险公司的程思树、中国保险公司的林震峰两人入党,他们成为上海保险业中最早加入中国共产

党的人。

◎ 1938年

- 3月,胡詠骐协助胡愈之组织"复社",资助出版斯诺的《西行漫记》、《鲁 迅全集》、瞿秋白的《海上述林》及《瞿秋白文集》等进步书籍。
- 5月,在张承宗的领导下,上海保险业地下党支部成立,程恩树任书记,林震峰任官传委员。
 - 7月, 上海保险业业余联谊会成立。胡詠骐任顾问, 郭雨东任理事会主席。
 - 11月,《保联》月刊创刊。

◎ 1939年

- 1月,保联创始人、上海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胡詠骐经沙文汉介绍,中共中央 特批准其为中国共产党后补党员。
 - 2月、保联话剧组演出独嘉剧《春回来了》。
 - 7月、保联话剧组演出话剧《日出之前》、讲行慈善公演。
 - 7月, 孙继武, 曲荷等在延安抗大毕业。
- 10月,林震峰、程恩树等13人去大后方开展保险服务,史称"十三太保"。施哲明接任保险业地下党书记。
 - 10月,保险业地下党输送党员饶志德、青年积极分子周础前往抗日根据地。
 - 12月, 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亲自约见卢绪章, 并布置任务。

◎ 1940年

12月,为悼念胡詠骐,胡愈之撰写了《忆詠骐先生》一文。

◎ 1941年

11月,在中共上级组织的支持下,谢寿天发起筹建大安保险公司。

◎ 1942年

1月,大安保险公司成立,郭雨东任总经理。

○ 1943年

11月,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卢绪章在重庆发起成立民安保险公司,卢作孚任董事长,杨经才任总经理。

○ 1944年

11月,延安革命根据地根据实际情况,着手制定实施关于社会保险、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的政策法规,并对商业保险进行试验和探索。陕甘宁边区华池县联社为此设立了牲畜保险委员会和牲畜保险合作社。

○ 1945年

11月,为加强对保联的领导、中共地下党组织成立保联党团、林震峰任书记。

◎ 1946年

- 2月, 地下党领导太平保险公司罢工。
- 3月,陈尺生发起成立保险界民主促进会。
- 6月. 廖国英任中共保联党团书记。

○ 1947年

- 2月,保险业成立二九惨案后援会,支持工人斗争。
- 5月,保险业地下党员施月珍、陆瑛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 1948年

8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南汉宸、胡景澐当选

为政府委员,并任政府党组干事会成员。

- 10月,中共地下党组织派孙文敏、徐天碧到华中解放区学习接管城市政策。
- 11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先后逮捕中共党员廖国英、吴越及保联骨干洪汶、赵伟 民4人。
 - 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宣告成立,并正式发行第一套人民币。
- 12月,中共地下党组织将沈润璋、朱元仁、刘凤珠等人撤退到苏北华中解放区。
 - 12月,中共地下党组织调林震峰、姚洁忱到上海局,以策反国民党军队起义。

○ 1949年

- 1月,谢寿天、郭雨东由香港北上,在石家庄参加接管上海金融业的干部培训。
- 5月,由东北银行总行主导并拨黄金2万两,在沈阳组建东北保险公司,资本金5万两黄金。同时,任命东北银行业务处处长沈海清为东北保险公司经理。公司领导辽西、辽东、吉林、龙江、松江、热河、内蒙古等省的保险机构开展业务,这是共产党政权成立的第一家国营保险公司。
- 5月,上海解放,保险业地下党员成为军管会保险组成员,负责接管保险 机构。
- 8月,中央在上海召开财经会议。中国人民银行各大区分行的负责同志建议设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 9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备文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核准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 9月21日, 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就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事报请中共中央, 并获批准。
- 9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通过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条例草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章程草案》,标志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筹建工作全部完成。

10月1日,民安保险公司在香港重新开业。

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北京西交民巷108号正式成立,标志着新中国国家保险事业的诞生,开创了中国保险业的新纪元。

12月30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批复了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条例草案》《中国 人民保险公司组织规程草案》合并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组织条例》。

◎ 1950年

6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已有5个区分公司,31个分公司等73家单位,从业人员 达2263人,代理机构564个,其中中国人民银行代理处385个。

5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北京郊区、山东商河、重庆北碚三地试办牲畜保险,共承保力畜1384头。

10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苏联国外保险局首次签订100万美元的分保合约。

11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邀集中央财经系统各部委,讨论实行强制保险事宜,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会议上做了《实行强制保险的重要意义》的报告,使强制保险工作首先得到财经系统的理解和支持。

◎ 1951年

2月,由中国保险公司承保的"海后"轮出险,中国人保驳回了伦敦保险市场的拒赔理由,最终获得80多万英镑的分保补偿,在国际再保险业市场初露头角。

2月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财产强制保险及旅客强制保险的决定》,规定"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及合作社因保险而支出之费用,准予编入预算报销,或列入成本计算"。

4月,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布《关于颁布财产强制保险等条例的命令》。

12月,上海和天津的28家私营保险公司分别组成太平和新丰两家公私合营保

险公司,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入50%以上的资金,使其走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 道路。

◎ 1952年

- 6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中国人民银行划归财政部主管。
- 1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各级分支机构发展到1300个左右,并在全国建立了3000多个代理处。
- 10月,苏联国外保险管理局指令东北代表处总代表将所有在我国东北境内的财产保险业务无偿移交我国。至此,外国保险公司完全退出了中国保险市场。
- 10月,国家保险机构开办的普通火灾保险有了很大发展,据中南、华东、东北76个城市的统计,投保的工商户占全部工商户的21.36%。
- 1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外保险业务的直接业务部分的保费收入为8325.6亿元,其专营机构中国保险公司直接保费收入为2772.8亿元。国外保险业务赔款金额为461.7亿元(不含分保摊回赔款,以上均为旧币)。
- 12月,全国国营企业合作社的财产全部投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县以上国家机 关财产大部分参加了保险。

◎ 1953年

- 3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第三次全国保险会议在北京举行。
- 5月, 财政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第三次全国保险会议情况及结束农村保险业务的综合报告》。
 - 6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整顿收缩,精简机构。
- 12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国内保险业务保费收入计划总额为17055亿元,实际完成18567亿元(分入业务34亿元,以上均为旧币),全国超额完成任务的8.87%。

◎ 1954年

- 3月,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停止实施财产强制保险。
- 4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扩大陆运转运地区的责任范围,取消了海运转运地的 附加费用规定,强化了对外贸易的保障,减轻了对外贸易保险费的负担。
- 12月15日,国家财政部批准公布施行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制定的《解放前保险业未清偿的人寿保险契约给付办法》。
 - 12月,全国行政区划变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也做了相应调整。

◎ 1955年

- 1月,中国保险公司正式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合并办公。
- 2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停办了铁道、粮食、邮电、地质、水利、交通6个系统的财产保险,以及铁路保险和船舶强制保险。
- 9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理赔中兴海运公司临城轮案,合计7000万余元(旧币)。

◎ 1956年

6月5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召集了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公司经理临时 会议,着重研究农村保险贯彻自愿原则的事项。

7月3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财政部的名义向周恩来总理做了书面汇报,详细报告了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新中国保险状况。

8月1日,太平保险公司、新丰保险公司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刊登联合启示,通知"自1956年8月1日起,我两公司合并为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并将合并后机构迁移北京办公,两公司原在上海机构同时撤销"。

12月,当年保险费收入实现21963万元(不包括国外业务),运输保险、火灾保险、人身保险都超额完成任务。

○ 1957年

1月29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出《关于1956年保险工作总结和1957年工作安排的报告》,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和存在的问题,以求端正和统一广大保险干部的思想认识。

4月, 湖北省发生的"圻州"轮失事案件,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13.3万元, 近100户的旅客和旅客家属领到了保险金或者医疗津贴, 每户平均得到1300多元。

9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牲畜有效头数约为400万头。在37个县试办了养猪保险,承保生猪22000头。

○ 1958年

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各地(除台湾、西藏外)普遍设立了省、市、 自治区和县的各级分支公司,全国保险工作人员逾5万名。

10月,全国财经会议指出: "人民公社化以后,保险工作的作用已经消失,除国外业务必须继续办理外,国内业务应立即停办。"随后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停办后的善后清理工作和国外业务一律由中国人民银行接办的报告》。

12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派代表参加了在埃及开罗召开的亚非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第一届亚非经济会议,并参与讨论筹备组织"亚非保险、再保险联合会"事宜。

◎ 1959年

1月15日,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发文批转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停办的善后清理工作和国外保险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接办的报告》。

6月1日,中共上海市财政局党组向中共上海市委做了《关于本市国内保险业务的处理意见》的报告。

6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财政部划归中国人民银行领导。

7月,中国开始使用自己制定的战争险费率和条款,摆脱了伦敦保险市场战争 险费率的束缚。

8月, 国营、公私合营企业的财产强制保险(包括船舶强制保险)停办。

◎ 1960年

1月1日,保险机构正式并入银行系统,对外保留保险公司名义,国内保险在上海市分行内部则为保险处,区支行内为保险科,县支行内为保险股。国外保险业务并入中国银行。

12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共在72个国家和地区委托了60名代理人,处理赔款业务。

○ 1961年

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采用超额赔款方式将船舶险和运输险另组成一个超额赔款分保合同,降低了自负赔款责任。在当年发生的一笔9万英镑的巨额船舶险赔款中,成功通过超额赔款合同从民主德国摊回4万英镑。

2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编写了《船舶险实务处理手册》《海运分保业务》教 材和部分急需用的业务资料和工作手册。

12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即已同27个国家的61家保险公司签订了222份分保合同。分出分保业务涉及进出口货物运输险、海外火险、船舶险、航空险4种类型;分入分保业务涉及货物运输险、海外火险、船舶险、航空险、信用险、建筑工程险、意外险等10余类。

◎ 1962年

1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发了《关于各地参加进口保险货物残损检验工作的通知》,恢复港口保险公司和内地中国人民银行参加进口货物残损的检验工作。

7月,中国人民银行储蓄部门将保险职能分设出来,单独成立保险处,同时组

织保险干部归队。

10月,在广泛征求各专业部门的意见后,把原有的强制保险条例修订为自愿性质的《企业、机关、团体财产保险办法》《国内船舶保险办法》,同时扩大了保险责任范围,降低了费率,简化了手续,实施账面责任赔偿方式。

○ 1963年

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32个国家的51家保险公司签订分保业务合同达267份。

4月30日,中国远洋运输公司所属的第一艘自造万吨级船舶"跃进"轮首航装载1.2万吨玉米,从青岛港出发,开往日本东京门司港,5月1日,在韩国海面触礁沉没。该轮在出航时曾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跃进"轮保额120万余英镑,人保自留20万英镑,其余100万英镑主要是在伦敦市场分保,涉及船壳险全险、费用险、战争险。

9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对已经使用的一些条款再次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如修订《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航空运输一切险条款(进口专用)》《邮包一切险条款(进口专用)》等。

○ 1964年

6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向国务院财贸办公室请示,建议恢复保险公司建制;恢复后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公司,对外仍以3家公司的名义出现。

9月, "亚非保险、再保险联合会"筹备会正式在开罗举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派代表出席会议。

10月15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再度组建,并正式对外营业,主要办理企业财产险、货物运输险、汽车险、船舶险、公民财产险、简易人身险、轮渡旅客意外伤害保险等业务。

12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天津市分公司承保的出口商品保险在国内保险市场上的占比达72.7%;进口货物除某些特殊物资必须在国外办理保险外,90%~95%均在

国内办理保险。同时为国家节约了外汇,创造了外汇收入。

○ 1965年

- 3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向各级有关单位颁发《关于将我行国外局保险处改组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通知》,保险处改为局一级机构,对外行文均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名义。至此,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再次独立建制。
- 5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联合发出的《关于国内保险统一由财政部管理问题的联合通知》中指出:"目前国内保险业务虽均由地方自营,但财务情况、业务规章制度等方面,在中央也需有一个主管部门加以综合了解和管理。为此,经部、行研究做了明确的分工,国际保险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所属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管理、国内保险业务由财政部统一管理。
- 1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制定了《货物运输罢工险条款》,颁发了《关于调整 出口货物保险费率的说明》等文件。

◎ 1966年

- 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调整出口货物保险费率。
- 5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将强制保险的范围扩大到县以上供销合作社。
- 6月,几乎所有的工业产品的技术经济指标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幸存的涉外业务也因此得到稳步发展。
 - 9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停办人身保险业务。

○ 1967年

1月1日,上海市财政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决定:停办企业财产保险(包括运输工具险)。今后,国营企业的灾害损失,由财政局另行考虑补偿办法,予以解决。在财政局办法未出台前,仍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

2月13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下发《关于停办各种国内保险业务的通知》给各投保单位。

2月,恢复两年的国内保险业务再次被迫停办。

7月1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决定:即日起停办国内货物运输保险。至此,所有国内保险业务全部停办。

10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下发《关于国内保险结束工作的意见》。

○ 1968年

2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下发通知:今后各地不再以中国保险公司的名义对外承办进出口货物运输险业务,统一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集中办理,一律签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保单。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自5月1日起实行。

6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的机构宣布撤销,开始处理善后工作。

8月,船舶险分保费率由原来的0.35%提高到0.50%,此项要求未被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接受,致使部分分保合同中途废止。停办远洋船舶保险业务是对伦敦保险市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需要。

12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决定海外业务对外的分保由民安保险公司办理,寿险业务由中国保险公司办理分保,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等地区的保险业务下放到中国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管理。

◎ 1969年

2月,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批转《关于停办财产强制保险的报告》。

4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停办了远洋船舶保险,不久又停办了汽车保险中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和进出口保险中的罢工险。

4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由9人组成的业务小组,负责国外保险业务。

6月19日,交通部、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停办自营远洋船舶保险的通知》。

7月. 在"在职干部也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要求下,中国人

民保险公司机构被精简。

◎ 1970年

- 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中日建交前首次接待日本富士、住友两家保险公司的代表访华,并与其建立了分保业务关系。
- 6月,中国人民银行从淮滨"五七"干校调回一部分业务骨干,充实保险业务小组的力量,涉外保险和国际再保险活动重获新生。
 - 6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对海洋船舶运输和货物运输条款进行修改。
- 12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全年保费折合人民币658.2万元,其中出口货物运输保险保费为637.6万元,进口货物运输保险保费为20.6万元。

◎ 1971年

- 3月8日,上海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同意上海市财政局、银行机构,合并后机构 名称改为上海市财政局。
- 5月,装运上海出口货物的"南城"轮沉没,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承保的货物有210笔,保险金额总计224万元,按全损赔付。
- 5月, 财政部、外贸部、外交部联合给国务院呈报《关于改变一律不保"罢工险"的请示》。
 - 9月, "保险业务小组"撤销。
- 11月5日, "金春"轮在上海装货后, 航行至浙江海面触礁沉没。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承保的出口货物137笔, 保险金额共计133万元, 按全损赔付。

○ 1972年

- 1月1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决定:恢复保险统计工作。
- 2月1日,交通部、财政部向国务院呈交《关于恢复远洋船舶保险的请示》。
- 3月24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交通部水运组下发《关于远洋船舶投保的

涌知》。

4月1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颁布修订《海洋货物运输保险条款》,其中包括全 损险、基本险、综合险三种。

12月,远洋船舶保险恢复。

◎ 1973年

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办了来料加工、建筑工程安装、石油开采、钻井平台、油轮的油污及其他保险。

3月24日,外交部、外贸部、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对美国和对外进出口货物保险问题的请示》,经国务院批准,其主要内容是:进口货物一般由我方保险,出口货物一般由对方保险的原则。

3月,第一次日本损害保险界友好访中团访问中国,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单位进行了友好交流。

7月2日,外贸部、财政部发出《关于进出口货物保险问题的通知》,具体部署贯彻执行"两个一般"原则的办法。

○ 1974年

9月29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中国民航承保了四架民用客机,这是中国第一 张符合国际惯例的飞机保险单,首开我国航空保险的先河。

10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代表团出席"亚非保险、再保险联合会"第十届执委会,主动同与会各国代表进行接触,以增进相互了解。

1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组织代表团参加了第三届非洲保险会议,加强了与非 洲各国保险界的团结合作。

◎ 1975年

3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代表闭访问朝鲜。

- 7月. 越南保险代表闭来华访问。
- 7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天津市分公司开办国际旅行旅客人身意外保险。
- 9月19日,上海港务监督根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的要求,对"菲立斯"轮口头宣布扣船,9月20日船方即通过伦敦巴克莱银行提供75万元的银行担保。

◎ 1976年

3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对《国际保险条款——油污和其他保赔责任险条款》 讲行了修订。

7月1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兰州支公司的成立,标志着甘肃省国内保险业务的恢复。

12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全面保费收入折合人民币1361.3万元, 其中出口货物运输保险保费为1012.8万元,进口货物运输保险保费为90万元,船舶 险保费258.5万元。

◎ 1977年

6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领导率团参加在伊朗召开的"亚非保险、再保险联合会"第五次会员大会。

8月29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宣布,经财政局党委批复,重新设立保险科。

- 9月,外贸部、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重新制定"关于进口各类设备保险的赔付外汇办法"通知》。
- 11月26日,上海市财政局革委会发出《关于财政、银行机构分设的请示报告》。

◎ 1978年

1月, 上海市革委会批转了财政局的请示报告, 财政、银行机构分设。

- 11月,中国人民银行、外贸部为改变对外进出口货物保险的问题,以[1978]银保字第21号文上报国务院。
- 12月,日本东京海上火灾保险公司与中国有关方面就宝山钢铁厂的保险项目进行协商。
- 12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全年保费收入折合人民币1743.6万元, 其中出口货物运输保险保费为1164.9万元,进口货物运输保险保费为118.4万元, 船舶险保费为460.3万元。

○ 1979年

- 2月,国家副主席李先念及国务院余秋里、谷牧等领导同志听取了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有关恢复国内保险问题的汇报。
- 3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式成立恢复国内保险筹备小组,着手撰写规划,并 从上海、南京抽调人员草拟条款、费率。
 - 4月. 国务院作出"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定。
 - 10月,中央下发《关于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和加强保险机构的通知》。
- 11月,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停办20年的国内保险业务开始复苏,财产保险率先恢复。

○ 1980年

- 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驻伦敦联络处成立。
- 3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首次承保海上及陆上石油与天然气勘探开发保险,为中外石油公司、承包商及分承包商提供各种保险业务。
- 9月,经财政部批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恢复国际保险专业,并在全国范围招收4年制本科生。
- 12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已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恢复了保险分支机构。

12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美国国际集团合资建立中美保险公司,并在纽约和香港设立分公司。

○ 1981年

- 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颁布修订《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海洋运输货物战争险条款》。
 - 3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恢复办理国内船舶保险业务。
- 4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保险公司管理体制的通知》,明确各级保险公司受同级人民银行和总公司双重领导。
 - 8月,四川省遭受特大洪灾,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共支付赔款8100万元。
 - 12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颁布《简易人身保险条款(甲种)》。

◎ 1982年

- 2月11日,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报告的通知》,指出保险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是国民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 3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决定,逐步恢复试办人身保险和农业保险。
 - 4月, "亚非保险、再保险联合会"第22届执委会在北京召开。
- 5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颁布《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团体人身保险条款》。
- 12月,国务院批复了中国人民银行呈报的《关于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董事会的报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章程》。

◎ 1983年

3月,英国海事法庭审判1976年天津远洋运输公司"金平"轮与巴拿马籍的挖

泥船"玛丽亚·路易斯"号在苏伊士海碰撞一案,中方船东代表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天津市分公司的支持配合下胜诉。

4月13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的补充规定》,其中要求个体工商业者向保险机构投保,以解决医疗保险问题。

7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立。

9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升格为国务院直属局级经济实体,独立行使职权,进行业务活动。

9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试办家庭财产两全保险。

○ 1984年

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式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升格为国务院直属局经济实体。

8月22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下发了《关于改革深圳经济特区保险工作问题的通知》,深圳分公司成为人保系统第一家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10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颁布《个人养老金保险试行办法》。

11月12日,中国人寿保险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12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出资1000万元,先后委托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辽宁 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开办保险专业。

◎ 1985年

1月,大连石油七厂发生爆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赔款1016.9万元。

9月, "亚非保险、再保险联合会"第九次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当选为联合会主席,并主持了大会。

10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共同投资的中国保险(英国)股份有限公司在伦敦成立。

11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关于发展涉外保险业务增加外汇

收入的报告》。

◎ 1986年

- 2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我国发射的通信、国土普查两颗卫星。
- 3月,国家教委正式批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长沙成立中国保险管理干部 学院。
- 6月,第五届第三世界国家(地区)保险会议和第三届发展中国家保险监督官会议在北京召开。
 - 9月21日,中国保险学会与英国保险学会达成协议,在北京建立ACH考试中心。 10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了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的保险业务。

◎ 1987年

- 3月6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决定将国内业务部改建为城市业务部和农村业务部。
- 3月15日,哈尔滨亚麻厂发生爆炸事故,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支付赔款1014 万元。
- 4月15日, 受英国保险学会委托, 由中国保险学会主办的CII学位考试首次在北京举行。
- 5月6日,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区发生特大森林火灾,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支付了 1.18亿元的保险赔款。
- 7月2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成立。至此,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在全国除台湾省外均设立了分支机构。

○ 1988年

7月6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办国内分保业务,并同深圳平安保险公司和上海 交通银行保险部建立了分保业务关系。 8月1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驻纽约联络处成立。

9月8日,7号台风袭击浙江省象山、杭州等7个市41个县。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共支付赔款8000万元。

11月6日,云南澜沧、耿马分别发生7.6级和7.2级强烈地震,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支付赔款3000万元。

◎ 1989年

2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保险事业管理的通知》,肯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我国保险事业中的主渠道作用,要求按照国务院颁布的《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整顿保险市场。

3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国民用航空局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国内航空运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业务的通知》。

3月29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驻东京代表处成立。

10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关于贯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企业财产保险条款、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费率"的通知。初步建立了财产保险的基本保险条款。

○ 1990年

2月12日,国家气象局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发布《关于加强保险与气象部门合作的联合通知》,指出各级保险和气象部门要密切合作,积极采用科学手段,有效地防御自然灾害,减轻损失,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4月7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升空,保险金额为1.2亿美元。此为我国第一次承揽发射国际商用卫星,也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首次承保国际商用卫星。

8月29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承保第十一届亚运会总保险责任限额为20亿元,同时资助亚运会160万元。

10月2日,广州白云机场发生劫机事件,致使3架大型客机毁损,中国人民保险

公司支付赔款9000万美元。

◎ 1991年

- 1月,李鹏总理在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座谈汇报会上讲话时指出: "保险兴起的时间不长,保险的潜力还很大。保险不仅可吸收社会一部分资金,更重要的是可以促进社会稳定。"
- 3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为改革上海农业保险经营机制,建立农业保险风险基金,选择金山、松江、宝山三县进行试点。
- 6月,中国遭受特大水灾,尤以苏、皖两省为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支付赔款 共计26.35亿元。
 - 11月22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证券部正式开业。

○ 1992年

- 1月23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中国长城工业公司签订为澳大利亚发射卫星的保险协议。
- 5月7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四家专业银行召开签订代理保险业务协议书协调会。
 - 8月4日,国务院批准同意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会员。
 - 10月20日,香港中国保险(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
- 10月28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故宫博物院赴韩国文物展览,保额为1400万美元。

◎ 1993年

- 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中国长城工业公司签订为澳大利亚发射卫星的保险协议。
 - 2月,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在英国注册成立。

- 6月、深圳发生严重水灾、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赔款1.6亿元。
- 7月, 西北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银川机场起飞时失事,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支付机身险赔款1800万美元, 旅客人身意外险420万元人民币。

7月11日,朱镕基副总理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全国分公司总经理会议上讲话时 指出: "我们主张竞争,主张开放,推进改革,但是我们必须加强对保险事业的 宏观调控,监督管理,不管是不行的。"

8月,深圳清水河仓库发生大爆炸,损失惨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支付赔款1.5亿元。

◎ 1994年

- 1月,中国大陆保险代表团一行20人首次赴台湾,参加"海峡两岸保险学术研讨会"。
- 6月, 西北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西安发生空难,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支付赔款达8000万元。
- 7月,在国务院等单位联合发布的"1994年中国500家最大服务企业"排行榜中,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名列金融保险业第8位。
- 10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首次为中国银行提供总值为3570万美元的出口买方信贷担保。
- 11月, "东方红三号"卫星发射升空后由于燃料耗尽未能正常投入使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赔款3.92亿元。

◎ 1995年

- 7月, 辽河油田茨榆蛇采油厂在洪灾中出险,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赔付2280万余元。
- 7月,湖南省常德市遭受特大洪涝灾害,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支付赔款4500 万元。

- 8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近百名高层人士聚集京城,举行首次"保险法"研讨会。
- 10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进行机构体制改革,成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下设中保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中保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和中保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家子公司。
- 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接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出席海外公司总经理会议的代表。

○ 1996年

7月,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

- 7月,中保财产保险公司承保"中星七号"和"东方红三号"卫星发射保险,总保额为2.8亿美元。
- 9月,中保集团在汛期支付赔款达30多亿元,派出救灾理赔小组2000余个,出动员工3万余人次,抢救受灾保险财产价值20亿元。
 - 9月, "中星七号"卫星发生全损,中保财产保险公司赔款2590万美元。

◎ 1997年

- 1月,安徽"如意2号"轮碰撞后沉没,中保财产保险公司支付赔款280万 美元。
- 5月,南方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在深圳机场降落时坠毁,中保财产保险公司支付机身险赔款4200万美元,责任险赔款300万美元,中保寿险公司赔偿旅客人身意外险200万元人民币。
- 8月,国内9家财产保险公司共同组建、承办国内卫星保险业务的中国航天联合体成立,中保财产保险公司当选为联合体主席。
- 11月,中保财产保险公司对国内和涉外机动车辆开始执行统一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

12月,中保财产保险公司与三峡公司签署三峡二期工程泄洪大坝及相关工程保险合同,保险总金额为40.2亿元。这是我国保险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份水利水电建筑安装工程保险合同。

◎ 1998年

- 4月,中保财产保险公司分别承保"鑫诺1号"卫星发射保险及黄河小浪底水利 枢纽工程机电安装标的保险,保额分别为2.35亿美元及14亿元人民币。
- 5月,中保财产保险公司承保广东沙角B电厂财产一切险及利润险等险种,总保额为100亿元。
- 9月,中保财产保险公司为"98航展"承保金额高达2000多亿元,创下我国保险史上承保规模最高纪录。
- 10月,中保财产保险公司正式成为国际信用与投资保险人协会(伯尔尼协会) 会员。
- 10月,全国遭受百年不遇特大洪灾,29个省市先后受灾,中保财产保险公司支付25亿元赔款。

○ 1999年

- 1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签发关于中保财产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及更换机构法人许可证的报告。
- 2月,中国西南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浙江省瑞安市坠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支付机身险赔偿金6600万元以及法定责任赔偿金350万元。
- 3月,经国务院批准,中保财产保险公司继承人保品牌,恢复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 2000年

3月3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北京召开全系统电话工作会议,正式启动机构

体制改革。公司重新制定了"三定"方案,推进以减员增效为重点的三项制度改革。

- 6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及平安保险公司共同承保三峡工程首批电站设备,总保额达100亿元。
- 6月,国内保险业第一个统一号码的服务专线电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服务 专线电话95518在全国范围内开通。
- 6月,武汉航空公司一架运七客机发生空难。承保机身险、雇主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险以及旅客人身意外险的中国人保等公司支付赔款近9000万元。

◎ 2001年

- 2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与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签署三峡左岸电站设备安装工程险等保险保单,保险金额超过100亿元。
- 4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推出"金锁"家庭财产综合保险新 险种。
- 5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广场音乐会提供1.1亿元的责任保险。
- 6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在山东烟台召开的第二届APEC博览会提供保额为1000万美元的财产及责任险。

◎ 2002年

- 2月8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第19届冬季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独家保险。
- 3月5日, "中国人保三个中心建设与运行现场交流会"在长沙举行。长沙分公司"三个中心"的运行模式在系统内全面推开。
 - 4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承保国家大剧院工程保险,保额约为23亿元。

5月7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赔付大连空难机身险保额1049万美元,航空意外险1700万元人民币。

7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秦山三期(重水堆)核电站核物质损失险和核第 三者责任险为150亿元。

11月4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承保长江三峡导流明渠截流与三期围堰工程,保险金额为4.68亿元。

11月27日,中国人民保险(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开业。

◎ 2003年

1月9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宣布,股份制改造方案获国务院批准,股改各项工作加速运行。

2月28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95518专线电话服务获得ISO9001、2000标准国际国内双认证。

7月19日,中国人保控股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京举行揭牌庆典。

11月6日,中国人保财险作为内地金融机构海外上市第一股正式在港挂牌交易, 由此成功拉开了内地金融业进军海外资本市场的序幕。

12月,中国人保财险按照业务流程特点,调整"三个中心"设置,建立了承保中心、理赔中心和财务中心。

◎ 2004年

2月6日,中国保监会批复中国人保控股公司筹建保险经纪公司。

4月26日,中国人保财险在香港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公司上市后的首份业绩。

8月5日,中国人保财险承保中国奥运军团综合保险签字仪式在京举行。人保财险为雅典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7.8亿元保额的财产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

11月18日,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召开创立大会。人保健康是 我国首家专业健康险公司。

◎ 2005年

4月1日,中国人保财险在国内率先推出电子保单。

4月8日,中国人保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揭牌。

6月28日,中国人保中元保险经纪公司在上海揭牌。

7月18日,中国人保中盛国际保险经纪公司在北京成立。

9月15日,中国人保财险与北京奥组委签署《北京2008保险合作伙伴赞助协议》,中国人保财险正式成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保险合作伙伴,标志着中国保险业首家也是唯一一家保险企业正式登上奥运大舞台。

11月18日,中国人保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揭牌。

◎ 2006年

3月9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人保资产获得短期融资券承销业务资格,成为 首批具有该业务许可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4月21日,中国人保财险公司95518呼叫中心荣获"2006中国最佳呼叫中心" 大奖。

7月25日,中国人保与慕再集团举行建立合作关系50周年庆典及合作协议签约 仪式。

12月,中国人保财险向北京奥组委签发了全面保障北京2008年奥运会成功举行的综合责任保险,这是北京奥运保险中保额最大、分量最重的一张保单。

◎ 2007年

4月12日,中国人保系统下发了《中国人保关于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大

力发展农村保险的指导意见》。

4月16日, 财政部同意将中国人保控股公司恢复(更名)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

6月26日,中国人保隆重举行复名揭牌仪式,正式恢复使用中国人民保险集团 公司的名称。

12月26日,中国人保财险与上海世博会签署《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保险全球 合作伙伴协议》。

◎ 2008年

1月1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统一OA和邮件系统项目正式上线运行。

1月15日,我国南方遭遇罕见雨雪冰冻灾害,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全力投入抗灾 理赔工作。

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紧急启动大灾 处理应急预案。

7月25日,中国人保财险正式启动第29届北京奥运会赛时保障服务体系,并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总金额高达17亿元的保险保障。

◎ 2009年

5月18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举行"盛世中国,人保同行——PICC中国人保60周年客户节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启动为期一个月的"中国人保客户节"系列活动。

7月7日,人保寿险给付因法航空难触发的中国保险史上最大个体单笔人身险赔款960万元。

8月18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荣获中央电视台"新中国60周年60个杰出品牌" 殊荣。

9月24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在京召开,审议通过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议案。

10月19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庆祝公司成立60周年庆典暨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在京举行。

◎ 2010年

1月,人保寿险完成第三次增资扩股,资本金由54.6亿元增至88.02亿元,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持股比例提高至71.07%。

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地震,中国人保第一时间启动大灾应急机制,抗震救灾,并干次日向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捐物500万元。

5月1日,上海世博会开园首日,世博会159年历史上首个保险行业馆——中国 人保馆正式开馆。

5月21日,人保财险总部正式入驻位于北京CBD核心区域新址。

7月8日,美国《财富》杂志发布了2010年"世界500强"榜单,中国人保成功入围,排名第371位。

12月24日,人保财险保费突破1500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在11月18日突破1000亿元,成为公司第一个突破千亿元的非寿险产品。

12月,人保财险江苏、广东和河北分公司保费突破百亿元大关。

12月30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以股权收购的方式购置北京西长安街88号大楼 (原首都时代广场),作为未来新的总部办公大楼。

◎ 2011年

1月31日,日内瓦协会2011年第一季度董事会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人保集团承办。

2月1日,人保财险电销渠道推出新的呼入专用号码——"4001234567"。

4月21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南方信息中心启用仪式在广东省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举行,中国人保集团全面进入数据大集中时代。

4月,人保寿险正式推出网上缴纳续期保险费功能,并采用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易宝支付(北京通融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作为独家支付平台-

7月7日,美国《财富》杂志公布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国人民保险 集团再次荣登"世界500强"排行榜,排名劲升83位。

10月8日,人保财险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支公司挂牌成立。

○ 2012年

3月7日,人保财险正式启动"掌上人保"移动终端应用软件,并发布向电网销渠道客户作出的七项理赔服务承诺。

6月20日,证监会国际部出具中国人民保险集团H股发行批文;H股通过香港联合交易所聆讯。

10月9日,人保财险开发的文化产业保险电子商务投保咨询平台—— "E-Culture" 电子商务平台正式上线。

11月19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H股上市全球路演正式启动。

11月30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H股敲定发行价格为每股3.48港元。

12月7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H股上市仪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隆重举行。首个交易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票交投活跃。全日交投量达14.22亿股,总成交额约52.45亿港元。

◎ 2013年

4月20日,四川雅安地震发生后,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第一时间捐款1000万元,并启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即时调动投入"中国人保"号无人机查勘灾情,全面掌握受灾信息。

8月,人保财险全面上线的新收付费系统业务收付操作顺畅,系统运行平稳,标志着该系统在全国的上线工作取得成功。

8月23日,人保财险、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联联手正式推出国内首款中国银联单品牌、芯片介质保险(放心保)类汽车主题联名信用卡——工银人保爱车信用卡。

9月,人保财险分别与阿里巴巴旗下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及腾讯公司旗下在线支付公司——财付通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为其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用户资金交易及支付安全保证保险,在互联网金融服务领域开展全新尝试。

11月27日,人保财险保费收入突破2000亿元,成为中国财险市场首家年度保费超越2000亿元量级的公司。目前保费收入稳居亚洲第一,在全球单一品牌财险公司中排名第二。

◎ 2014年

1月17日,经李克强总理批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表彰了一批在国家定点扶贫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扶贫办荣获"定点扶贫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4月19日,2014年度"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举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退休干部、百岁老人王永明同志获得本年度奖项,成为我国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保险从业人员。

6月27日,人保资本获得由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发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资格。

7月7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在最新美国《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榜单中排名第208位,较2013年大幅跃升48位。

◎ 2015年

1月13日,人保财险荣登2014年度"港股100强"评选活动的主榜榜单,位列"港股100强""综合实力100强"第44名。

3月28日,人保财险荣获"全国质量诚信品牌优秀示范企业"称号,并成为中国质量万里行"质量诚信联盟"会员。

4月,人保财险成功承保上海国核自仪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控制系统首台套保单,该项目为人保财险首个核电首台(套)重大装备保单。

7月22日,美国《财富》杂志2015年"世界500强"榜单发布,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荣登"世界500强"榜单第174位。

8月12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启动应急预案应对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人保财险在现场建立大灾理赔指挥部,截至2015年底支付赔款3.37亿元;人保寿险经审核快速给付受益人保险金6.82万元。

◎ 2016年

2月22日,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保监会批筹,成为再保险行业首家获 批筹建的新设中资主体。

3月,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召开基层内控体系建设工作启动会,原创搭建覆盖地 市、区县级机构的基层内控体系框架模型。

5月25日,人保财险连续两年荣获香港投资者关系协会颁布的"最佳投资者关系公司——大型股"奖项。

7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荣登2016年《财富》"世界500强"第119位,6年来累计跃升252位。

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迁址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88号中国人保大厦,举行"不忘初心、再创辉煌——中国人民保险成立67周年大会"。

12月25日,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创立大会。

12月26日,人保财险召开全系统视频大会,庆祝保费跨越3000亿元。

12月31日,人保财险共接长江中下游地区暴雨洪涝灾害报案85640件,估损19.65亿元,已赔付13.03亿元;共接华北地区暴雨洪涝灾害报案54009件,估损13.34亿元,已赔付5.92亿元。

◎ 2017年

4月20日,人保健康社保渠道2017年累计保费规模突破百亿元,实现规模保费100.39亿元,同比增长182.16%。

5月5日,人保财险首席承保的中国商飞C919大型客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成功首飞。

6月9日,人保财险首席承保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风云三D"卫星发射保险项目。

6月15日,人保养老召开创立大会,相关筹备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7月20日, 备受全球关注的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榜单揭晓: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位列第114名。

12月12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凭借多年在公益慈善事业的持续投入和长期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优势,分别荣获"2017年度中国公益企业"和"2017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奖优秀企业"两项殊荣。

◎ 2018年

4月25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在深圳召开"创新区域发展模式,打好中心城市翻身仗"座谈会。

4月27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在京举行数字化战略发布会,全面启动"智·惠 人保"数字化战略。

6月15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顺利通过中国证监会第十七届发审委2018年第85次会议审核,成为国内首家以财险为主,采用"A+H"形式发行的保险集团。

6月28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在京召开"新时代 新人保 新发展"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布会。

11月16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中国人保" 股票代码:601319)正式登陆A股市场,成为国内第五家"A+H"股两地上市的金融保险企业。

◎ 2019年

3月31日,国务院扶贫办举办《中国企业精准扶贫50佳案例(2018)》发布暨表彰会,中国人民保险集团"金融扶贫,保险先行"案例入选2018年全国企业精准扶贫50佳案例。

4月11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在京隆重召开"智·惠人保,一触即达""中国人保"APP上线发布会。

10月23日,人保金服发布了国内首个由大型保险集团发起的保险科技孵化加速器"保创空间"。

12月5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与北京冬奥组委在京举行签约仪式,正式成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合作伙伴。

12月11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召开集团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会议,用保险力量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并推动自身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 2020年

1月25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快速反应,加大力度共战新冠疫情,两日内累计提供紧急捐款1000万元。中国人保助力复工复产,"小微E保"围绕多种风险情形、线上服务等四个方面为中小企业全面复工复产提供保险保障。

3月25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与广东越秀完成人保越秀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投资基金(一期)设立签约,中国人保百亿产业投资基金首期落地。

9月11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新一届集团党委班子首次提出要赋予人民保险新时代的使命和内涵,"做有温度的人民保险"。

11月12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在北京召开 2020年度战略研讨会,确立了"卓越保险战略",吹响了新征程再出发建设新人 保的冲锋号。

11月16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在北京与瑞士再保险集团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谈, 就人保集团与瑞再集团未来合作与发展交换了意见。

12月3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在北京与汉诺威再保险集团以视频方式举行会 谈,就深化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与汉诺威再保险集团的业务合作进行了沟通交流。

12月23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与中国建设银行举行双方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12月28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与招商局集团举行《深化产融结合助力高质量发展专项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12月30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审计中心在京举行揭牌仪式。

◎ 2021年

1月26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在京召开集中采购中心成立大会。

2月23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组织各子公司签订绩效合同、各部门签订责任 状,下发三个工作清单,向全系统发出集合和启程的动员部署。

2月26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贯彻五中全会精神专题培训班"在京开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3月17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召开首次创新研讨会。

3月19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有关要求,对全系统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全面动员部署。

引 文 不忘来時路

第一章 在鲜红的党旗下

- [1]本书编写组. 中国共产党简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1.
- [2]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M],上海, 1987.
- [3] 李征. 卢绪章传 [M].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 [4]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太平史话 [M]. 香港: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2019.

第二章 一条来自南方的红色血脉

- [1] 郑振铎. 蛰居散记 [M]. 上海: 上海出版公司, 1951.
- [2] 颜鹏飞,等,中国保险史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 [3]上海保险学会. 中国民族保险业创办一百周年纪念专集: 1885—1985 [M]// 林震峰. 怀念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胡詠骐同志. 1985.
- [4] 郑振铎. 蛰居散记[M]. 上海: 上海出版公司, 1951.
- [5]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 [M]. 上海, 1987.
- [6]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M].上海, 1987.
- 「7]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M]. 上海, 1987.
- [8]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 [M]. 上海, 1989.

- [9]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M].上海,1987.
- [10]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 [M]. 上海, 1987
- [11]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M].上海, 1987.
- [12]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M].上海, 1987
- [13]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M].上海, 1987
- [14] 王珏麟, 十三太保和陆地兵险[OL], 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2015-02-27.
- 「15] 王珏麟, 十三太保和陆地兵险「OL], 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2015-02-27.
- 「16〕姜伟. 潜伏「Z]. 电视剧台词.
- 「17〕申报「2〕. 1935-08-24.
- [18] 中国人保, 不忘初心——吴越, 为了曾经的誓言 [Z], 2017.
- [19]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M].上海, 1987.

第三章 一条来自北方的红色血脉

- [1]本书编写组. 中国共产党简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1.
- [2] 贺敬之. 回延安.
- [3] 邓加荣, 韩小惠[Z]. 南汉宸传[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2.
- [4] 陈国庆. 拓荒者 [N]. 中国保险报, 2015-07-17.
- [5] 孙冰峰. 晋冀鲁豫的瑞华银行[]]. 中国金融家, 2015(10).
- [6]程仁杰, 思想汇报, 家人留存,
- [7] 贾星五. 回忆冀南银行九年[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3.

- [8] 王立章. 回忆冀南银行九年[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3.
- [9] 曲荷. 反扫荡中的印钞厂 [Z]. 1991, 家人留存.
- [10] 秦道夫. 我和中国保险[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第四章 布局海外

- [1]华润(集团)有限公司《红色华润》编委会. 红色华润[M]. 北京:中华书局. 2010.
- [2]中共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支部. 上缴凯利织造厂股权的报告 [Z].
- [3]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 [M]. 上海, 1987.

第五章 讲京赶考

- [1]孔祥毅. 南汉宸: 新中国的第一位金融家[]]. 当代金融家, 2012(2).
- [2]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M],上海, 1987.
- [3] 林震峰. 建国初期的上海保险业[J]. 中国保险, 1999(10).
- 「4〕秦道夫. 我和中国保险「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 [5] 魏润泉. 天润新泉——保险岁月六十载 [Z]. 2013.
- [6] 魏润泉. 天润新泉——保险岁月六十载 [Z]. 2013.
- [7] 毛泽东.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 [R]. 1948-09.

第六章 诞生,伴随着开国大典的礼炮

- [1]中国保险学会,等.中国保险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 [2]中国保险学会,等.中国保险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 [3] 林震峰. 给胡景澐、孙继武的信 [Z]. 人行档案馆.
- [4] 中国保险学会, 等. 中国保险史[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8.
- [5] 林增余. 我的保险生涯 [Z]. 回忆.
- [6] 秦道夫. 我和中国保险 [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第七章 建章立业

- [1]中国贸促会编, 南汉宸纪念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 [2]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 [M]. 上海, 1987.
- [3] 秦道夫, 我和中国保险[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 [4]中国保险学会,等.中国保险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 [5] 中国保险学会、等, 中国保险史[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8.
- [6] 童伟明.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初创期人员、机构与薪酬状况 [Z].

第八章 重打鼓 另开张

- [1] 王安、徐晓. 我经历了中国保险50年[M].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5.
- [2] 陈国庆, 严柏昌, 岁月的馈赠[1], 中国保险报, 2019-01-11.
- [3] 王安、徐晓, 我经历了中国保险50年[M],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5.

第九章 反复耕型的农业保险

- [1] 王珏麟, 民国农业保险的主体回望[N], 中国保险报, 2018-12-08.
- 「2]太原支公司牲畜保险单,牲畜保险诊断证「Z],1952-09.
- 「3]华东.华东区公司一年来的工作报道「N].华东保险,1950(1).
- 「4]王安,徐晓. 我经历了中国保险50年「M].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5.
- [5] 人保. 各地农业保险介绍[N]. 人民保险, 1951 (9).
- [6]人保. 彻底纠正牲畜保险工作强迫命令作风[N]. 人民保险, 1953(1).
- [7] 中国保险学会, 等. 中国保险史[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8.
- [8] 中国保险学会, 等. 中国保险史[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8.
- [9]魏润泉. 天润心泉——保险岁月六十载 [Z]. 2013.

第十章 海外保险的浪花一朵朵

[1]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外业务处,一九五二年工作总结[Z].1952.

- [2] 苏联国外保险管理局已将该局在东北保险业务无偿移交我国[Z]. 大连保险点。
- [3]王安、徐晓. 我经历了中国保险50年[M].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5.
- 「4]王安、徐晓. 我经历了中国保险50年「M].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5.
- [5] 秦道夫. 我和中国保险[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 [6] 王安、徐晓. 我经历了中国保险50年[M].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5.
- [7] 秦道夫. 我和中国保险[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第十二章 春风化雨

- [1] 秦道夫. 我和中国保险「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 [2] 秦道夫. 我和中国保险 [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参考文献 不忘来時路

- [1]本书编写组. 中国共产党简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1
- [2]中国保险学会、等,中国保险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 [3]姚庆海、童伟明、等、保险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 [4] 中国保险学会,中国保险报.中国保险业二百年[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
- [5]吴申元、郑韫瑜,中国保险史话「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
- [6]中国金融博物馆. 图说中国保险史[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8.
- [7] 颜鹏飞,等,中国保险史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 [8] 北京市保险公司编写组. 简明中国保险知识辞典[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 [9] 王安. 保险中国 200 年 [M].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8.
- [10] 赵守兵. 仰望百年——中国保险先驱四十人[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 社, 2014.
- [11] 高星. 族谱的墨迹——中国人保成立初期创始人列传 [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
- [12]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研究室. 金城银行史料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 [13] 林振荣. 原太平保险掌门人丁雪农: 太平"守望者" [N]. 中国保险报,

2018-07-20

- [14] 王珏麟. 宁波帮与中国近代保险史略[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 [15] 裘争平. 中国保险业先驱胡詠骐 [J]. 档案春秋, 2008 (4).
- [16] 王珏麟. 不逝的绝响:宁绍保险公司往昔沉浮[N].中国保险报,2013-08-28
- [17] 王珏麟. 胡詠骐与宁绍保险 [Z]. 博客, 2012.
- [18] 张亚圣. 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出色领导者 [Z].
- [19] 林振荣. 与"魔鬼"打交道的人——记秘密战线上的保险业杰出人士程恩树 [OL],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2017-10-04.
- [20] 林振荣."七七事变"80年: 烽火岁月"保险界十三太保"演绎陆地兵险传奇[OL],保险史志,2017-07-07.
- [21] 林增余. "老人保"与"十三太保" [Z]. 中国人保, 2007(2).
- [22] 杨延修, 民安产物保险有限公司亲历记[1], 上海保险, 2010 (5),
- [23] 秦道夫. 我和中国保险[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 [24] 王安, 徐晓. 我经历了中国保险50年[M].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5.
- [25] 俞世红,徐斌,等.上海财经大学博物馆馆藏集萃保险卷[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
- [26]中国太平保险公司,上海社科院.中国太平发展简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
- [27]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M].上海, 1987.
- [28] 刘燕如. 众志成城——上海店职员运动战友谱 [M]. 上海: 上海画报出版社, 2007. 保险史志微信号baoxianshizhi
- 「29〕苏原. 陈氏父子的上海往事「J〕. 中国报道, 2009 (4).
- [30] 颜鹏飞,李明炀,曹圃,等.中国保险史志: 1805—1949 [M].上海: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 [31] 中国保险学会, 中国保险史[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8.
- [32] 王元周. 卢绪章与广大华行[M].北京: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1999
- [33] 林振荣. 民安保险第一任总经理杨经才: 经邦济世一英才 [N]. 中国保险报, 2019-07-15.
- [34] 稗史候. 他是一名特工,先后为国家贡献10亿资产,自己却一分钱都没有留下[Z],博客.
- [35] 陈斌. 杨延修: "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N]. 中国保险报, 2015-04-10.
- [36] 沈惠民. 杨延修: 为党掌管钱袋的红色特工[OL].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4-01-14.
- [37] 王昌范. 从童子军到市工商联党组书记[N]. 联合时报, 2018-07-03.
- [38]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中国太平的"红色基因"——记民安保险与广大华行 [OL].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公众号.
- [39] 王昌范. 从童子军到市工商联党组书记[N]. 联合时报, 2018-07-03.
- [40] 王元周. 广大华行: 从小西药行到中共三线地下机构 [J]. 百年潮, 2018 (1).
- [41] 伊里. 中共第三条秘密战线的杰出战士杨延修 [J]. 百年潮, 2003 (5).
- [42] 伊里. 中共第三条秘密战线的杰出战士杨延修[1]. 百年潮, 2003(6).
- [43]华润集团. 乱世"合伙人"[Z]. 华润, 2019.
- [44] 王安,徐晓. 我经历了中国保险50年[M]. 北京:现代出版社,2005.
- [45] 宋国华,等. 保险大辞典[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 [46] 郑伟. 北京大学早期保险学科发展小考 [J]. 中国经济, 2011 (4).
- [47] 杨建业. 马寅初传 [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6.
- [48] 彭华. 马寅初全传 [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8.
- [49] 陈国庆. 贝仲选: 赤胆忠魂 [N]. 中国保险报, 2016-06-06.
- [50]上海保险学会. 中国民族保险业创办一百周年纪念专集: 1885—1985 [M]

//唐雄俊. 重庆四联分保办事处的诞生和结束. 1985.

- [51] 陆坚心, 完颜绍元. 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5) [M]//王伯衡. 从太平保险公司到太平洋保险公司.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 [52] 陆坚心, 完颜绍元. 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5)[M]//徐国懋, 邵怡 度, 金城银行简史,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 [53] 王珏麟. 王伯衡的保险生涯[N]. 中国保险报, 2013-01-18.
- [54]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太平史话[M]. 香港: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2019.
- [55]何予良. 超以象外 得其环中——何镜涵的中国画艺术 [Z].
- [56] 高文瑞. 何镜涵笔下的人物画 [Z].

后 记 不忘来時路

2021年2月1日,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活动时指出,中共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不断加强党的建设。

罗熹董事长第一时间向我们提议,为配合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加快撰写、出版《不忘来时路——中国人民保险的记忆》一书,以弘扬中国人保红色血脉,激励后人改革创新。

随后我们组织了专题编写组,成员有:高星、朱丹、董海燕、崔兴岩等开始了紧张的收集整理资料、考证撰写的工作。

首先,我们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有关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牢牢把握"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及"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方向。

通过大量研读有关党史著述, 我们认识到中国人保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始终一脉相承。党史与司史之间的天然联系, 是中国人保独有的光荣传统, 也是 中国人保弥足珍贵的红色资源。

百年恰风华,党史的那头连着一代代革命先辈的矢志奋斗,党史的这头通向一个个蓬勃发展与创新的梦想。每一次对党史的回望,都是一次对精神的洗礼、对初心的叩问;同时也是对中国人保红色历史的集结、对中国人保红色族谱的梳理。

近年来我们在对中国人保历史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再一次对公司现存的档案、资料,进行了深入的查阅、挖掘。我们把这些历史碎片连缀起来,初

步勾勒出中国人保红色历史的脉络。

我们结合公司正在建设中的博物馆展陈内容,尽力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复制 可以信赖的全景式的背景环境和历史情态。

近年来,我们先后对全公司系统健在的近70位老同志进行了共计200多个小时的口述采访,留下了大量实录资料,生动鲜活的历史故事和丰富清晰的细节。

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广泛听取了公司领导及有关部门的建议和意见。聘请了有 关党史、保险史、其他行业史的著名学者和专家进行指导和审读。

关于本书的写作体例。《不忘来时路——中国人民保险的记忆》是一部史书, 我们严格按照历史发展脉络,提纲挈领。但在对红色保险历史的研读中,我们发 现大量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和细节非常感人,呈现出浓厚的历史色彩,组成了 红色保险的灵魂和血液。

为了还原历史的深切和真实,增加本书的生动和可读性,我们决定改变以往的史书写作体例,放弃学术性的修史写法,在"史"中加入"故事";在"传记"中加入"人物"。适当保留一些散文描述的"生动细节",甚至是诗情画意的"传奇色彩"。

罗熹董事长对本书写作的逻辑和体例进行了指导,并撰写了序言。红色保险历史人物、人保原总经理秦道夫为本书题写了书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宣传教育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黄如军;中共中央党校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彦民;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著名保险史专家颜鹏飞等对本书进行了校审。《红色华润》一书作者、高等教育出版社专家吴学先对本书写作给予了指导。

对此,我们深表谢意。并真诚希望保险老前辈和相关人士给予批评指正。

《不忘来时路——中国人民保险的记忆》编写组 2021年4月